

张士海
程恩富◎主编

马克思主义 文化研究



中国人文社会科学AMI核心集刊
主办单位：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2023年第 1 期
总第 11 期

RESEARCH ON MARXIST CULTURE

张士海 程恩富◎主编

本期焦点：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发展
——访山东大学世界政党研究中心主任王韶兴教授
靳贺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及其实践
杨戏戏

“中国道路”的哲学阐释
——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思想的双重视域
汪进超

从新民主主义文化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结合”
郭娟

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

二〇二三年第一期
总第十一期

山东大学出版社
SHANDONG UNIVERSITY PRESS

山东大学出版社
SHANDONG UNIVERSITY PRESS

马克思主义 文化研究



RESEARCH ON MARXIST CULTURE

2023年第1期

总第11期

张士海 程恩富◎主编

山东大学出版社
SHANDONG UNIVERSITY PRESS

· 济南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 2023 年. 第 1 期 ; 总第 11 期 /
张士海, 程恩富主编. -- 济南 : 山东大学出版社,
2023.6
ISBN 978-7-5607-7835-8

I. ①马… II. ①张… ②程… III. ①马克思主义-
文化理论-研究 IV. ①A811.67

中国国家版本馆 CIP 数据核字(2023)第 078901 号

责任编辑 肖世伟

封面设计 王秋忆

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2023 年第 1 期, 总第 11 期)

MAKESI ZHUYI WENHUA YANJIU (2023 NIAN DI 1 QI, ZONG DI 11 QI)

出版发行 山东大学出版社
社 址 山东省济南市山大南路 20 号
邮政编码 250100
发行热线 (0531)88363008
经 销 新华书店
印 刷 济南华林彩印有限公司
规 格 787 毫米×1092 毫米 1/16
15 印张 315 千字
版 次 2023 年 6 月第 1 版
印 次 2023 年 6 月第 1 次印刷
定 价 63.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目 录

访 谈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发展

——访山东大学世界政党研究中心主任王韶兴教授 靳 贺/3

论 文

中国共产党组织力的多维向度：内涵意蕴、政党需求、历史逻辑、提升路径

..... 刘 华/19

“二七”纪念中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

——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中央机关报纪念文本为中心

..... 卢 鹏 俞祖华/30

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的人民性论析 江 峰 朱梦露/44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基本特征 石 然 朱梦竹/55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及其实践 杨戏戏/69

文化帝国主义数字殖民的危机表征及应对路径 李明哲 高福进/80

大数据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现实境遇及优化策略

..... 樊瑞科 杜宝君/93

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方法论 许秀娜/112

“两个结合”视域下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和儒家生态思想比较研究

..... 刘红梅 吴 苇/123

“中国道路”的哲学阐释

——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思想的双重视域 汪进超/136

从新民主主义文化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结合”	郭 娟/149
新时代公安机关廉政风险防控的文化路径新探	卢文忠/159
论新时代思想道德建设的着力点和主体向度	迟成勇/171
左翼电影中红色基因的影像建构与当代启示	黄芳芳/187
马克思《资本论》的当代相关性	
——《资本论》教学如何回应普遍性批评的思考	吴 楠/198
“大思政课”视域下思政课双线混融教学优化探析.....	鞠 澈 王建新/206

动 态

建构汉语哲学视域下“马克思与孔夫子”的融合会通	
——首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思想”学术研讨会综述	刘冠呈/217
论点摘编	/227



访 谈

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发展 ——访山东大学世界政党研究中心主任王韶兴教授

靳 贺*

【王韶兴简介】山东大学特聘教授、博士生导师，山东大学世界政党研究中心主任，山东省政党理论研究基地主任、首席专家，全国党建研究会特聘研究员，教育部研究生思政课教学指导委员会副主任委员，中国科学社会主义学会副会长，中国政治学会常务理事，山东省科学社会主义学会会长，山东省人民政协理论研究会副会长。先后荣获“全国百名优秀社科普及专家”“山东社会科学名家”等称号，是山东省首批理论人才百人工程、山东省智库高端人才首批入选者。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社会主义政党政治问题研究，先后主持国家社会科学基金专项工程重大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点项目、中央马克思主义理论建设与研究工程项目、教育部人文社科基地重大项目等各类项目 20 余项，出版《政党政治论》等学术专著多部。在《中国社会科学》《政治学研究》《马克思主义研究》《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等高端学术报刊发表学术论文 100 余篇，其中多篇被《新华文摘》《中国社会科学文摘》等转载。获教育部高等学校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 1 项，山东省优秀社科成果一等奖 5 项。围绕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理论与实践问题在《中国社会科学》发表 7 篇中英文学术论文，提出的标识性概念、形成的学术见解和理论观点，奠定了社会主义政党政治问题研究的理论基础和分析框架，被称为社会主义政党政治问题研究的“学术地标”。

习近平总书记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仪式上的讲话中强调：“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更要符合本国实际，具有本

* 靳贺，法学博士，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党的建设。

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色。”^①百余年来，在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共产党历史性地承担起探索中国现代化道路的重任。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在中国革命进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和现代国家建构的宏阔实践中，将自身价值与中国式现代化融为一体并发挥统领性的主导作用，赢得了中国社会奋力走向现代化的历史性巨变，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开创了人类文明新形态。这既是现代化与政党政治共生互动深刻彰显的社会进步过程，更是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相互形塑的文明创造过程。置身于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宏大时代背景，奋进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如何更好地理解 and 把握现代化与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关系，围绕这一主题，访问者采访了山东大学世界政党研究中心主任王韶兴教授。

访问者：在人类文明发展进程中，政党政治是人类社会必经的发展过程、必有的政治形态，政党成为国家政治运行的枢纽和政治发展的主导性力量。只有切实了解政党政治的深刻内涵、基本特征、发展变化，才能在新的历史起点上以新的认识自觉和实践主动，开展新的历史创造。王老师，我们知道您长期从事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政党政治问题研究，并着力构建一个全新的政党政治的解释框架，请您谈谈怎样认识和把握政党政治的核心概念和内容体系。

王韶兴：我们知道，政党的自身发展和价值实现是迄今为止最为波澜壮阔的政治现象，直接影响着现代政治生活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质量。经过 330 多年的发展，它由初时“难以拿到出生证”，被认为是不可接受的事物，到目前已拓展为 160 多个国家 6200 多个不同类型的政党^②，深刻地“决定着相关国家的政治生态情势和内政外交走向”^③，是现代社会制度变迁和政治设施中最具政治能量的组织形式。作为“当代政治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④，政党政治以鲜明的制度性质和特有的政治运行方式，跃升为包括社会主义国家在内的世界各国民主政治发展的首要论域。

政党政治起源于政党组织产生，发展于政党价值实现，成型于政治文明进步。它的核心标志，就是政党的产生并成为政治行为的主体；它的关键支撑，就是政党的发展权和发挥作用权；政党政治过程，就是政党意志表达和价值实现的政治过程。

^① 《习近平在学习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研讨班开班式上发表重要讲话强调 正确理解和大力推进中国式现代化》，《人民日报》2023 年 2 月 8 日。

^② 参见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研究室编：《当今世界政党政治研究报告（2013 年）》，中央编译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 页。

^③ 于洪君：《当代世界政党文献（2012）》，党建读物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2 页。

^④ 李慎明：《为建设社会主义政治文明 加强政党政治问题研究——在“政党政治：模式、理论与实践”国际研讨会上的讲话》，《政治学研究》2003 年增刊。

因此我认为，政党政治是人类社会的政治活动和文明程度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是以政党为行为主体，围绕国家政权问题而形成的相关事务及其治理。政党政治的核心内容是政党权利，政党政治过程即政党权利的实现过程；政党权利的表现形式是“政党之政”，实现机制是“政党之治”。政党政治是由“政党之政”和“政党之治”引起的政党实践及其相应政治关系的总称。就基本内容来看，政党政治包括政党自身事务治理——“党内政治”，政党与政党之间的事务治理——“党际政治”，政党与国家间的事务治理——“党政政治”，政党与社会间的事务治理——“党社政治”，以及民族国家政党之间的事务治理——“政党交往”或“政党外交”。可以认为，这样认识和把握政党政治，与当时存在的把“政党制度”等同于“政党政治”的学术理解不同，与对政党政治只作“社会阶级属性”的学术把握不同，还与对政党政治只作较为宽泛的学术定义有着很大的区别。

这些年来，我们依据政党政治核心要义和内容构造的不同，从“宏观”“中观”“微观”三个层面进行了系统阐释。“宏观”意义上的政党政治，指的是政党围绕自身发展和价值实现而开展的内部生活和外部活动的总和。它作为一种新的政治类型，既不同于“神权政治”和“君权政治”，又区别于理想社会的“自由人的联合体”。它所揭示的是政党政治的“抽象”化形态，标识的是不同的政治发展类型。因民主的一定发展而产生，为民主的继续发展而存在，最终将因民主的高度发展而自行消亡，是政党政治的历史由来、政治使命与价值依归。“中观”意义上的政党政治，指的是由性质不同的政党围绕自身生存、发展和价值实现而开展的内部生活和外部活动的总和，是政党政治的“类型”化表达，标识的是政党政治的社会属性。依据意识形态、阶级基础和价值取向的不同，可以把它分为资本主义政党政治和社会主义政党政治两种基本类型。从历史维度上看，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又分为以取得国家政权为核心内容和以建设国家政权为核心内容两个发展阶段，并相应地形成了资本主义（及半殖民地半封建）国家内部的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和社会主义国家的政党政治两种实践形态。从发展逻辑上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政党政治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的逻辑前提和必要准备，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是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价值跃升和逻辑结果。“微观”意义上的政党政治，指的是具体民族国家的政党围绕自身发展和价值实现而开展的内部生活和外部活动的总和。依据国家性质的不同，可以分为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政治和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我认为，具体民族国家的政党政治，既有政党政治的自然属性，又标识政党政治的社会属性，还反映政党政治存在的空间属性和发展进程的时代属性，是政党政治“时”“空”“态”的统一体。它作为政党政治的直观对象和实践形态，表明的是政党政治的“具象”化样态。

访问者：基于政党政治内涵的进一步揭示，在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语境下，您刚才提到了“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以及具体民族国

家的政党政治这些标识意义很强的话语范畴。接下来请您进一步谈谈“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基本内涵及其相互关系。

王韶兴：我们认为，在马克思主义政党政治科学中，“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是既有内在联系又各不相同的基本范畴。在对象范围上，三者依次包含；在逻辑关系上，三者依次递进；在价值空间上，三者依次趋向具体。

第一，社会主义政党政治是无产阶级政党为实现工人阶级彻底解放而开展的内外政治活动的总和，是无产阶级政党以取得和巩固国家政权为首要目标的政党政治。作为一种新兴的政党政治类型，它与资本主义政党政治的根本区别在于：政治行为主体性质不同，决定了理论基础、目标追求的不同；产生、发展与发挥作用的历史条件、现实基础不同，决定了政党政治实践形态的不同。科学社会主义理论的诞生，为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实践奠定了理论前提；马克思主义政党的建立，为社会主义政党政治提供了主体力量。以实现共产主义为目标指向、以科学社会主义为理论指导、以无产阶级政党为领导力量而开展的国际共产主义和世界社会主义运动，是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实践机制。

作为人类新型政治文明形态中的重要政治过程和实践形态，社会主义政党政治根源于资本主义旧文明必然让位于社会主义新文明的历史逻辑，发端于19世纪中期欧洲资本主义危机背景下社会发展转型和欧洲工人运动国际化的历史进程，起步于“工人革命的第一步就是使无产阶级上升为统治阶级，争得民主”^①，发展于实现物质财富极大丰富、人民精神境界极大提高、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如果以1847年“共产主义者同盟”建立为组织准备，以1848年《共产党宣言》发表为理论准备，以1864年第一国际建立及其活动为较完整意义上的实践展开的话，社会主义政党政治迄今为止已有170多年的发展历史。其间，历经了以第一国际为组织载体在欧洲的整体性推进，第二国际尤其是第三国际（共产国际）时期世界范围内无产阶级政党的加速发展，二战后亚非拉地区国家制度变迁的社会主义历史性跨越，20世纪90年代惊心动魄的苏东剧变，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实践有力推进社会主义民主政治发展的政治过程，呈现出鲜明的时代与国别发展特征。

整体考察世界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演进，可以将其分为两种基本样态：以“统”（世界性）为主要形式的初级形态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如以第一国际、第二国际和共产国际为政治主体的政党政治；另一种是以“分”（民族性）为主要形式的中级形态的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如以具体民族国家共产党为政治主体的政党政治这样两种基本样态。经验表明，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发展状况及其实践成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2页。

果，既与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体制机制有关，更与社会主义政党政治主体——无产阶级政党的能力建设密切相连。因此，在应然与实然的逻辑会通中，有序促进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发育，有效提升社会主义政党政治体制机制的科学化水平，切实增强无产阶级政党深刻认识和把握社会主义政党政治规律的能力，不断提升遵循客观规律的过硬本领，是社会主义政党政治走向成熟的现实要求。

第二，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作为一种全新的政治实践类型，其显著标志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掌国家政权、领导社会发展。作为整体性概念，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围绕自身发展和价值实现而形成的内外事务及其治理的统称。作为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民族化、时代化表达和国家层面的制度化形态，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与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政治有着本质区别。作为一种新型政治体制和运行机制，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涵盖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内部生活和外部活动两大领域，是治党管党和治国理政的有机统一。

从要素构成看，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是由众多要素构成的政治发展系统，既包括政党自身的政治、政党与政党间的政治，也包括政党与国家间的政治、政党与社会间的政治以及政党与国际社会（主要包括执政党与其他国家的政党以及政党国际组织）间的政治。由此形成的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关系，既有政党内部的、不同政党之间的政治关系，还有政党与国家之间、政党与社会之间以及政党与国际社会之间的政治关系，构成了一个复杂的政治关系体系。其中，政党与国家及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是最基本的政治关系，实质上是党权、政权、民权的关系。

从主旨要义看，“以人民为中心”^①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的根本性质和价值本源。一方面，在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的关系体系中，“党政关系”实质上是党权与政权的关系，相对于“民权”而言，具有“工具”属性，反映的是“工人阶级的政党不是把人民群众当作自己的工具，而是自觉地认定自己是人民群众在特定的历史时期为完成特定的历史任务的一种工具”^②。另一方面，以人民为中心的“党社关系”实质上是政党权力与社会权利的关系，而社会权利具有本源性和目的性。这表明，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不仅具有“政党是治理国家不可缺少的工具”^③的一般属性，承担着最具人民正义性的工具理性功能，而且明确表达了时代发展与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实践诉求，锻造了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的独特优势，具有“两个先锋队”^④的实践理性功能。

① 习近平：《胸怀大局把握大势着眼大事 努力把宣传思想工作做得更好》，《人民日报》2013年8月21日。

②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18页。

③ [美]希尔斯曼：《美国是如何治理的》，曹大鹏译，商务印书馆1986年版，第327页。

④ 中国共产党“从成立那一天起，就是中国工人阶级的先锋队，同时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先锋队，肩负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庄严使命”。参见《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574页。

从价值层次和功能定位的角度看,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可以从“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文明”等不同的价值维度认识和把握。政党政治道路,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把政党政治的一般原理、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基本原则与本国实际相结合而开展的以实现“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为最高价值依归的政治过程。它属于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起源学”范畴。政党政治理论,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政党政治实践中逐步形成的关于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的理论前提、理论基础、理论观点、理论结构以及理论方法的知识体系,属于政党政治“发生学”范畴。政党政治制度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政党政治实践过程中逐步确立的一整套相互衔接的规范体系。它既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发展成果的“刚性”表达,也是其进一步可持续发展的行动准则。政党政治文化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在政党政治实践中形成的以政党意识形态为核心内容,由政党的组织心理、情感取向、学说理论、行为作风以及由此决定的区别于他党的精神风貌构成的相对独立的观念体系,属于“政治文化的一部分”^①。政党政治文明,是政党政治道路、理论、制度以及文化各项因素的高度融合与凝练,表达的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治党管党和治国理政所具有的整体水平及其达到的政治进步状态。它所承载的是与时俱进的政治发展目标和人类社会政治进步的价值取向,是政党政治过程中社会主义民主的有序化实现和民主成果的有效性累进。“道路”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的逻辑起点,属于历史选择和政治经验问题,具有鲜明的客观性、探索性和实践性。“理论”则是政党政治道路认知的主观表达,既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实践的经验总结和规律把握,也是其道路正确、制度科学的首要前提,反映的是政党政治主体的认识自觉。“制度”是政党政治道路与理论的规范化、模式化体现,具有根本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特征。“文化”作为一种历史积淀,它是政党政治发展的真实写照;作为一种时代见证,它是政党政治能力的时代凝练;作为一种价值引领,它是政党政治面向未来的深厚滋养。“文明”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的历史积淀和成果综合,集中标识政党政治发展历史的阶段性特征和发展进步的整体性水平。“道路”“理论”“制度”“文化”“文明”作为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价值系统的构成要素及其综合性表达,体现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党内关系、政党关系、党政关系、党社关系以及对外关系各个方面,统一于治党管党和治国理政的协同发展总体进程。

历史地看,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百余年探索,经历了跌宕起伏的历史性磨炼:20世纪初期,列宁领导的俄国布尔什维克党以高度的政治自觉和非凡的革命胆略,取得十月革命胜利,开创了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实践之先河;20世纪中叶,欧亚多国马克思主义政党顺应历史发展大势,建立新型国家政权,开创了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系列发展的宏大局面,为人类政治文明发展与进步提供

^① 王沪宁:《从政党文化看执政党建设》,《解放日报》1989年5月24日。

了崭新的实践素材；20 世纪末期，苏东剧变导致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遭遇挫折，进一步证明只有始终坚持马克思主义，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才能在实践创造中不断健康发展；20 世纪 90 年代以来，中国、越南等国共产党人始终坚持共产党执掌政权，“不忘初心、继续前进”^①，并“成功从苏联模式过渡到本国模式”^②，不断开拓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发展新境界。整体上看，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百余年实践，既内蕴政党政治的一般价值，又表达其特有的政治属性，还因其产生、发展与发挥作用的历史传统、现实基础以及外部条件的不同，彰显出鲜明的多样性、民族性和时代性特征，成为人类政治文明光谱中集政党政治的“一般规律”“特殊规律”“具体规律”于一体的“政治群像”，至今仍产生着不可替代的重要历史影响。

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百余年实践经验表明，能否从规律层面认识和处理党内关系、政党关系、党政关系、党社关系以及对外关系，是马克思主义执政党一直面临的历史性课题。在这场难度持续增加的“考试”面前，一些社会主义国家的执政党因被“考”垮而退出历史舞台；一些执政党正历经艰辛，殚精竭虑，上下求索。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的跌宕起伏，尤其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创新发展揭示了一个重要规律，那就是增强党内关系、政党关系、党政关系、党社关系以及对外关系运行的科学化水平，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执政党的理论自觉。政党意识及其价值意蕴、政党权利及其实现机制、政党权力及其监督制约、政党执政资源及其开发利用，以及政党政治制度及其发展完善，是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理论自觉的基本内容和实现机制。

总体而言，作为高于资本主义国家政党政治的新型政治形态，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应人类文明发展的现代化转型而出场，由马克思主义政党执掌国家政权而确立，因实现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而展开。它以生动的实践向世界宣示：人类文明发展规律赋予被压迫者“打碎旧世界”这一神圣的政治权利，人类社会在资本主义逻辑框架之外依然有新的道路选择；这一世纪伟业的开启，创造了人类解放和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实践形态，深刻地影响着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和人类文明的前进方向。

第三，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是中国共产党以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为目标，围绕自身发展和价值实现而形成的相关事务及其治理，是由政党自身政治、政党与政党、政党与国家、政党与社会间的政治和政党外交诸多内容构成的政治认知体系和实践机制。在这里，以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为指导，以领导和支持人民当家作主为指向，以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目的，是中国社会主义政党

①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95 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8 页。

② Mario Ferrero, “Political Exchange in Mass Party Regimes and the Transition from Socialism”, *Economic Systems*, Vol. 25, No. 4, 2001, p. 366.

政治的本质属性和价值依归；坚持中国共产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是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最大优势和根本特征；高质量的全领域、全要素、全过程人民民主，是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生命源泉。这是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较之于西方国家政党政治在本质属性和运行机制上的根本区别和最大优势。

21 世纪的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属于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但不是其他社会主义国家政党政治实践的再版；学习借鉴国外政党治国理政经验，但不是西方国家政党政治实践的翻版。在国内经济社会发生深刻变革、国际交往进入新全球化条件下建设现代化强国，中国共产党必然面临“实行什么样的政党政治，怎样实行政党政治”的实践课题。这需要中国共产党以更加深刻的理论自觉和政治自信，对党内关系、政党关系、党政关系、党群关系和政党对外交往进行理论创新和实践创造，形成既体现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中国发展规定性与时代进步规定性又蕴含人类现代文明具有普遍价值特征及自主塑造未来发展大趋势的若干支撑要素。

访问者：在党的二十大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新时代新征程中国共产党的使命任务，强调要“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①。请您谈谈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是如何相互影响、相互形塑的。

王韶兴：作为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性运动过程，现代化深刻体现了人类自我解放的本质力量和主体性特征，从而决定了现代化的发生与发展成为社会进步与文明成长的必然趋势。作为现代化这一历史性运动的有机产物和重要成果之一，政党政治及其实践是现代国家建设与发展的现实性要素构成，深刻影响着现代社会进步的质量和方向，进而决定了政党政治实践必然成为现代国家体系化构造与运行不可逾越的历史过程。政党政治与世界现代化展开的具体实际相适应，不仅经历了在民族国家生成、区域性实践、全球性扩展等若干历史阶段，而且形成了以不同制度性质为鲜明表达形态的诸种类型，核心差异在于是否以提高人民生活与发展质量根本指向。以社会主义为价值取向的现代化进程，孕育了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发展过程与制度形态，并经历 20 世纪多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历史性实践，更对 21 世纪世界现代化发展产生了重大现实影响。中国共产党把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与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实践相结合，创造性地形成内在契合于中国现代化的政党政治价值系统，在现代化宏大的历史主题与现代化实践的历史主体互动中，有力地形塑了中国式现代化的时代进程。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国家走向现代化，既要遵循现代化一般规律，也要符合本国实际，具有本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21 页。

基于自己国情的鲜明特色。在“普遍规律”的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鲜明揭示了社会现代成长与政党政治有机嵌入的历史逻辑统一、政党政治与“以人民为中心”的现代化理念相互促进的时代走向；在“独特逻辑”的意义上，中国式现代化进程内蕴的以促进人的全面发展为根本目标，以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为价值取向，以马克思主义政党为核心领导力量，以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发展有力推进经济社会历史性进步为实践形态，深刻展现了中国式现代化总体进程的本质特征。由此，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普遍规律”与“独特逻辑”相统一，集中体现了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引导中国现代化发展，是近代以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和实践逻辑的必然结果，是中国社会面向未来宏阔的进步洪流中马克思主义政党立党宗旨和使命担当的价值表达和实践形态，对人类政治文明的实践创造与社会进步的总进程产生了深远影响。

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是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催生的政治成果。马克思的“一元多线历史发展观”^①深刻表明，推动社会发展的根本力量是经济力的变革，“现代生产力的跳跃式增长不仅加速了现代社会的发展进程，同时也拓宽了发展的形式”^②。在不同历史条件下，相同性质和水平的生产力可与多种生产关系相结合，从而形成不同的现代化道路、不同的社会形态以及不同的理论与实践表达形态。伴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近代中国是被动卷入世界现代化浪潮的典型国家。半殖民地半封建的社会状况是中国现代化发生的内部根源，而近代中国现代化发展逻辑的历史性转换，则促成了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中国缘起。这鲜明地表现为：近代中国社会发展的深刻危机以及现代化转型，是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在中国缘起的社会根源；辛亥革命的历史成就和西式政党政治在中国的失败，是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在中国缘起的历史契机；世界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深化发展，是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在中国缘起的逻辑前提；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在中国缘起的思想条件；中国共产党的诞生，是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在中国缘起的决定性因素。总体来看，兴起于中国革命与民族解放进程中的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发展，根源于近代以来中国现代化对其核心价值的现实需求，发展于其核心价值的实践表达与理论认识的动态对接，集成于新的政治形态——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

随着中国现代化的历史性推进，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呈现出相应的价值指向和实践内容，从而构成了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的内在发展逻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宏阔实践，决定了社会主义政党政治不仅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重要内容，而且是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核心驱动系统；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成长水平有赖于社会主义现代化发展水平，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发展方向和发展质量

① 罗荣渠：《现代化新论——世界与中国的现代化进程》，商务印书馆2004年版，第61页。

② 罗荣渠：《建立马克思主义的现代化理论的初步探索》，《中国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

更离不开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价值引领和政治保障。这就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话语目标下揭示了中国现代化发展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价值融通与逻辑必然。

需要强调的是，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与中国现代化相互形塑、同构共生的历史逻辑与实践逻辑，内在地决定了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成长史也是中国现代化的发展史。百余年来，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主题牵引之下，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通过“根本性的价值定位”——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基于人的彻底解放和全面发展的价值追求而产生，为人的彻底解放和全面发展的价值实现而展开，人的彻底解放和全面发展的核心理念，为中国现代化提供科学的灵魂和道义的制高点，“前提性的理论引导”——马克思主义是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理论指导，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相结合而形成的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理论，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提供前提性的理论引导，“主导性的制度支撑”——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制是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主体结构和运行机制的制度化体现，中国共产党与其他各政党关系的这一新的政治创造，为中国现代化提供主导性的制度支撑，“目的性的价值牵引”——由党权、政权、民权构成的党内关系以及政党与国家、政党与社会的关系是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基本关系，这一关系体系所揭示的民权“本源性的”，为中国现代化提供目的性的价值牵引，“关键性的政治保障”——中国共产党是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主导力量，建设现代化强国是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价值指向，把中国共产党建成坚强的马克思主义执政党和世界上的强大政党，为中国现代化提供关键性的政治保障等政治认知体系和实践机制，将党自身与中国现代化融为一体并发挥了统领性的主导作用。在世界政党政治的价值系统中，中国特色政党政治以最深层次的价值追求、最独特的实践特征和最显著的文明贡献，深刻改变了中国历史的发展进程，赢得了中国社会奋力走向现代化的历史性巨变，深度影响了世界格局的时代性变迁，进而从知识体系、制度体系和实践机制高度统一的维度，在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最高价值层面塑造了政治文明发展的新形态。

我们还应当看到，中国现代化所取得的历史性成就及其为人类文明发展所提供的中国经验，进一步彰显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科学价值，这意味着，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已经成为世界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发展的一面旗帜和走向振兴的中流砥柱，进而担负着推动“世界历史”更加有序发展的历史责任。这就要求将中国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未来发展置于全球史背景中加以考量，以凝练“共同价值”的价值定位和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的使命担当，回应民族复兴与“世界历史”发展的新需求。

访问者：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价值目标相适应，中国共产党成立以来，以马克思主义政党巨大的理论勇气与远见卓识、坚如磐石的革命意志和脚踏实地的实干精神，奋力推进特色鲜明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建设。请您谈谈强大政党建设

和现代化国家建设的相互关联性。

王韶兴：实现现代化是中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所在，中国共产党是中国人民根本利益的忠实代表。中国共产党建立百余年以来，团结带领中国人民所进行的一切奋斗，就是为了把中国建设成为现代化国家，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客观上要求在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坚强领导核心的同时，也必然要在政治实践逻辑的意义上把中国共产党建设成为世界上最强大的政党。

与中国现代化建设的价值目标相适应，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把“历史中国”改造为“现代中国”的实践创造中，经由自我革命与社会革命的相互形塑和革命性锻造，着力从政党领导和政党执政的有机统一、政党政治活动与国家法治生活的有机统一、依规管党治党与依法治国理政的有机统一，形成了以政治创造为根本、思想引领为先导、组织运筹为基础、制度创设为关键、自身建设为支撑的强大政党建设的理论表达体系和价值实现机制。它以不断产生新坐标的文明要素和富有时代气息的价值形态，代表着一种新型政党文明的兴起，标注着强大政党建设格局的进一步确立。

其中，中国共产党基于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特殊规律的深刻认识和社会主要矛盾变化的准确把握而确定的关于革命、建设、改革的基本路线和基本方略，是“政治创造”的主旨要义，在强大政党建设的内容体系中具有价值导向作用；基于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创造性实践而形成的原创性很强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是“思想引领”的首要前提，在强大政党建设的价值体系中具有精神旗帜的作用；基于中国式现代化的奋斗目标及其在不同历史发展阶段的主要任务而汇聚的各种力量及其组织架构与政策供给，是“组织运筹”的核心要素，在强大政党建设的价值体系中具有基础性支撑作用；基于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内在要求及其科学化呈现而大力推进的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是“制度创设”的内在要求，在强大政党建设的价值体系中具有规范性保障作用；基于“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事情办好，最根本的是要把中国共产党的事情办好”^①的政治自觉而持续推进的“伟大工程”，是“自身建设”的生动实践，在强大政党建设的价值体系中具有前提性保证作用。这些既是中国共产党百余年以来在现代化国家建设的丰富实践中对强大政党建设作出的原创性贡献，也是中国共产党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持续推进强大政党建设的实践基础和基本遵循。

我认为，中国共产党强大政党建设的实践成效表现为中国式现代化建设的成果创造，集中体现为实现了中国从几千年封建专制政治向人民民主的伟大飞跃；实现了中华民族由不断衰落到根本扭转命运、持续走向繁荣富强的伟大飞跃；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的历史性飞跃。如期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了从大幅落后于时代到大踏步赶上时代的新跨越，为到 21 世

^① 习近平：《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要一以贯之》，《求是》2019 年第 19 期。

纪中叶把中国建设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以人民为中心”作为中国式现代化与中国共产党的生命性要素，为政党与国家的天然联结注入了更具主体性的价值灵魂，“人民”的科学内涵和历史作用在中国共产党的理论与实践得到了更为彻底的揭示并予以制度化体现。这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式现代化既有现代化的一般特征，更有基于国情的中国特色。中国式现代化是人口规模巨大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相协调的现代化、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走和平发展道路的现代化，既是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重要特征，也是中国共产党强大政党建设的核心价值体现。

总的来说，在现代化国家建设中建设强大政党，本质上是政党意志表达和实现的政治价值创造过程。现代化国家建设与强大政党建设的中国逻辑，起始于中国共产党“政党意志”的自主诉求，发展于历史对政党的筛选及人民对中国共产党的选择，升华于中国共产党在资本逻辑依然主导全球化进程中创造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打造人类命运共同体相统一的伟大实践。强大政党逻辑的上述内生自主性，从根本上决定了中国共产党能够超越西方政党工具化的集团政治设定，在解释中国与世界进而改造中国与世界的时代性宏阔实践中，既以建设现代化强国为实践形态表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真实含义，又在尊重人类文明多样性维度中建构人类命运共同体，从而以不断更新的文明坐标提升强大政党建设与与时俱进的生命品质。

访问者：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中国共产党要始终走在时代最前列、站在攻坚克难最前沿、站在最广大人民之中，在人类政治文明发展中彰显应有的政治品质和价值引领，不能没有一套独立成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建设话语体系。请问您在关于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话语体系问题上有哪些见解。

王韶兴：我认为，百余年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实践创造及其话语成果，既是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中国化的实践样态和理论表达，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话语体系建设的丰硕成果。

我们知道，政党政治的话语体系在政党政治的实践中产生，必然也会随着政党政治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完善起来。就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话语体系的进一步建设来说，我的基本认识是：加快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话语体系建设，是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政党理论创新发展、开辟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发展新境界的内在要求；是使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话语在面向“第二个一百年”的历史性进程中，在面向世界、面向未来的创造性实践中，不断彰显其生命力、文明贡献力和价值引领力的内在要求。

关于如何加快构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话语体系问题，我认为关键是要解决好学理化支撑、概念化表达和系统化构建的问题：一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理论内涵及其价值实现问题上，关键要回答的是，真理如何对接现

实、道义如何贴近生活，以及理论如何面向未来、思想如何走向世界的问题；二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概念化表达与思想凝练问题上，要通过提出新范畴、凝练新概念，形成新表述，从学科体系、学术体系等方面构建一个全方位、全领域、全要素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知识体系；三是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话语体系支持要素的完整性、体系化问题上，涉及理论前提、理论基础、理论根据、理论观点、理论结构、理论认知的方法论等问题，需要进一步厘清阐明，形成完整系统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话语体系。这就要求我们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思想成果和实践创造开展扎实、高质量的学术研究。在这个过程当中，我们要敢于、善于用新概念、新范畴和新表述，自主表达原创性很强的学术成果。在深刻认识和准确把握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的自身规律——历史逻辑、价值表达规律——理论逻辑、功能发挥规律——实践逻辑以及发展完善规律——创新逻辑的基础上，从话语生成机理、话语表达形态、国际话语融通等不同维度，进一步揭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政党政治话语体系的终极意义、世界意义、民族意义、国家意义，以及对“强大政党”成长的意义。

[责任编辑：马秋丽]



论 文

中国共产党组织力的多维向度：内涵意蕴、政党需求、历史逻辑、提升路径

刘 华*

【摘要】 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力是指中国共产党根据政党使命，依托组织资源对内开展党的活动，对外进行国家治理，是党聚合多元力量对内对外治理的总体性能力。政党使命、政党起源、政党功能、政党组织形态和组织原则等重要要素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具有增强组织力的必然要求。经历了革命建党、运动建党、制度建党的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力建设经历高潮、曲折、重建的艰难探索过程。中国共产党需要坚持以政党治理引领国家治理的发展逻辑，坚持增强党的内部治理能力与党的对内组织力，坚持提升党引领国家治理能力来增强党的对外组织力。

【关键词】 组织力；组织建设；国家治理；制度建党

中国共产党是一个组织路线明确、组织体系健全、组织纪律严明的政党组织，坚强有力的组织建设是党的传统和优势。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严密的组织体系是党的优势所在、力量所在”^①，要增强党的政治功能和组织功能。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强调，要注重党的组织体系建设，不断增强党的政治领导力、思想引领力、群众组织力、社会号召力。^② 新的时代条件下党提出了“提升组织力”的时代命题，学界需要对党的组织力的内涵、历史发展和现实问题作出回应和解答。

一、内涵意蕴：回归政党本质

对于中国共产党组织力内涵的理解，需要回归词源本义，进行词源梳理解析。

* 刘华，法学博士，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政党建设、当代中国政治制度与法治建设、思想政治教育。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67 页。

② 参见习近平：《在全国组织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党建研究》2018 年第 9 期。

但更为重要的是回归政党本质,从政党地位、政党功能等政党要素进行分析。

组织是指人们为了达到某种共同目标将其行为彼此协调和联系起来所形成的社会团体。^①《当代汉语词典》中“力”的含义包括五种:①改变物体运动状态的作用;②力量、能力;③体力;④尽力、努力;⑤有力度或工力。在“组织力”一词中,“力”应理解为能力。组织力是指组织为了实现组织目标组织协调运作的的能力。

政党显然是一种组织,具有超大型组织和复合组织的特性,组织研究分析是政党研究的重要方法。政党研究学者王长江将政党界定为“一定社会集团中有着共同政治意愿的人们自愿结合在一起,以取得政治权力为首要目标的政治组织”^②。意大利学者安格鲁·帕尼比昂科认为:“无论是何种政党,无论政党回应何种诉求,它们首先是组织,因而组织分析必须在其它的分析视角之前。”^③政党本质是一种政治组织,是人们为了实现共同的政治追求、政治价值而聚合在一起的团体。政党起源、政党类型、政党地位、政党功能等差异导致政党的组织形态各异,政党的组织力呈现强弱不同的状态。

在政党与国家的关系中,我们国家是典型的“党建国家”。政党先于国家产生,中国共产党是国家体制的建构者、塑造者,居于长期执政的地位。党的领导、党的建设和国家社会发展紧密相连。中国共产党的特殊地位和功能决定了对党的组织力的分析,绝不能局限于政党本身的内部组织管理,还应当着眼于党领导的国家治理活动。因此,本文所说的“党的组织力”是指中国共产党根据政党使命,依托组织资源对内开展党的活动,对外进行国家治理,聚合多元力量进行对内对外治理的总体性能力,包括对内组织力和对外组织力两个不同向度。对内组织力主要包括党组织建设和党员教育管理监督等党的活动,涵盖党的自我管理、自我完善、自我革新的内部建设能力;对外组织力指党聚合多元力量进行国家治理,是党领导国家社会发展的综合性能力。

与国家结构形式相对应,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划分为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组织。不同层级党组织的组织力侧重点不同。中央组织的组织力体现为党统筹协调国家发展全局,系统谋划国家战略远景,统筹各方力量推进社会主义事业的能力;地方组织的组织力体现为对党的政策的贯彻落实,结合地方实际科学谋划地方发展方向,统筹地方力量塑造地方治理格局的能力;基层组织的组织力体现为规范党内活动,教育管理监督党员,密切联系群众,领导基层治理的能力。中国共产党是动员型大众型政党,党的基层组织是政党动员和政党政治发展的末梢神经,是组织动员成功的关键。

① 参见于显洋:《组织社会学》,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1年版,第12页。

② 王长江:《政党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4页。

③ [意]安格鲁·帕尼比昂科:《政党:组织与权力》,周建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16页。

二、政党需求：中国共产党增强组织力的必然要求

中国共产党的政党使命、政党起源、政党功能、政党组织形态和组织原则等重要要素决定了党具有增强组织力的必然要求。

一是政党使命。中国共产党是具有高度使命感的政党，担负着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历史使命，实现现代化，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是党重要的政治追求。西方“原发型”现代化通常由经济变革带动政治变革，而“后发型”现代化进程中通常是政治变革成为主导力量，政治变革引发其他领域的变革。我国的现代化是典型的“后发型”现代化，中国共产党成为现代化进程中的支撑力量。党通过革命产生现代主权国家，培育现代政治体系，通过国家权威进行经济和社会的现代化改造，驱动国家现代化进程。“中国的发展需要政党，需要政党这个现代性的政治组织，从而在中国古老而散沙化的社会组织中组织出一个能够整合中国社会，主导这个中国社会发展的核心力量和支撑力量。”^①“后发型”现代化的现实、政党驱动现代化进程的使命决定了中国共产党具有强化组织力的天然需求。

二是政党起源。由于路径依赖的影响，政党起源对政党政治发展的影响具有根源性、锁定性，政党很难摆脱其起源“基因”的影响。“政党的诸组织特征更多地依赖其历史，即，依赖于组织是如何起源、如何巩固的，胜于依赖其他因素。”^②法国政治学者迪韦尔热根据政党起源将政党区分为“内生党”和“外生党”。“内生党”是起源于现存政治体制内，从立法者本身活动中逐渐形成的政党，如英国托利党和辉格党。“外生党”产生在立法机关之外，或者是产生的国家并不存在议会等代议机构，难以在现存政治体制内行使政党权利。^③从政党起源分析，中国共产党属于典型的“外生党”。其建党时，国家处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转型萌发期，处于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状态，国家不存在民主代议机构，党不存在从代议机构产生的可能。国共两党合作破裂之后，中国共产党难以正常行使政党权利，被迫走上了武装夺取革命政权的道路，采用了保密性和纪律性极高的革命党模式。“在中国，离开了武装斗争，就没有无产阶级的地位，就没有人民的地位，就没有共产党的地位，就没有革命的胜利。”^④武装斗争的革命党、外生党的历史起源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不得不建设成为一个高度统一、组织严密的政党。

三是政党组织形态。美国学者基希海默尔等人认为，政党发展演变经历了四

① 林尚立：《政治建设与国家成长》，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2008年版，第32页。

② [意] 安格鲁·帕尼比昂科：《政党：组织与权力》，周建勇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8页。

③ 参见王长江：《政党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5～27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10页。

种组织形态,即精英型政党、大众型政党、全方位型政党、卡特尔型政党。精英型政党主要由权贵组成,是精英群体不同派系斗争的产物,不依赖组织动员和民众支持,组织化程度不高。大众型政党是伴随工业扩大化生产发展,发动民众而建立庞大的组织,政党组织化程度高。全方位型政党为了最大限度争取选票弱化政党意识形态和利益代表,弱化政党组织与党员关系。卡特尔型政党积极融入国家,政党成员倾向于向公职化方向发展,政党组织功能出现萎缩。^① 中国共产党是典型的马克思主义大众型政党,政党发展依赖民众的动员和支持。列宁的建党理论强调组织动员的重要性,“工人阶级的力量在于组织。不组织群众,无产阶级就一事无成。组织起来的无产阶级就无所不能”^②。亨廷顿认为政党的组织动员能力是政党强大的力量所在,“强大的政党要求有高水平的政治制度化和高水平的群众支持,‘动员’和‘组织’,这两个共产党政治行动的孪生口号,精确地指明了增强政党力量之路”^③。中国共产党是大众型政党,组织和动员民众是政党产生、发展的力量源泉,政党的组织形态决定了中国共产党需要建设成为高度组织性的政党。

四是政党功能。政党通常具有利益表达、利益整合、政治录用、政治社会化等功能。在西方国家,政党活动主要围绕选举和获取国家政权展开,进入执政领域后,政党活动隐形化,政党功能范围有限。近代中国呈现出的是“党建国家”的政治发展逻辑,中国共产党通过革命斗争建立了新中国,构建了国家政治体系,并通过合法程序将党的组织体系与立法机关、行政机关、司法机关等实现同构,全方位领导国家事务。中国共产党拥有西方政党所不具备的领导功能,在国家和社会建设中,党承担领导者和组织者的职责,是推动国家建设的驱动力量和支撑力量,党的建设不仅关系到党自身建设质量,更事关党所领导的社会主义事业的兴衰。党的功能广泛且影响深远,党需要不断强化自身建设,通过强有力的组织体系将党的领导贯彻到具体实践中,从而更好发挥党的领导和执政功能。

五是组织原则。目前各国政党实行的组织原则主要包括非集权制、分权制、民主制、民主集中制、个人集权制。非集权制是相对松散的组织模式,上级组织和下级组织没有隶属关系,上级组织并不享有比下级组织更多的权力,政党权力较为分散,以美国两党为代表。分权制强调分权,将权力分散在党员、基层党组织和地方组织等多元主体中,以绿党为代表。民主制是指在组织形式上采用代议制民主,党的重要决策尽可能在广泛党员的参与下进行,以社会民主党为代表。民主集中制的特点是在民主的基础上强调集中,强调下级对上级、全党对中央的服

① 参见李路曲:《论欧美政党组织形态和权力结构的变迁》,《政治学研究》2007年第4期;徐昕:《西方政党组织形态嬗变的背后——对“卡特尔”型政党组织形态的分析》,《江苏社会科学》2008年第3期。

② 《列宁全集》第14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21页。

③ [美]塞缪尔·P.亨廷顿:《变化社会中的政治秩序》,王冠华等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2008年版,第336页。

从。个人集权制的特点是党的领袖个人专权，以法西斯政党为典型。^① 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是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以俄为师，采用了列宁式民主集中制的组织原则，这也就决定了党需要建立高度一体化、纪律严整的组织体系，强有力的政党组织力与党的民主集中制原则相辅相成。

三、历史发展：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力建设经验

在革命、建设、改革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历经了从革命党、执政党、建设党的角色转变，党的组织力在不同历史时期呈现出强弱不同的态势，留下了宝贵的历史经验。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是“革命建党”时期，当时的主要任务是进行反帝反封建斗争，建立人民当家作主的民主政权。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建设从无到有，呈现出新建政党的勃勃生机。建党之初，中国共产党就注重加强党的组织建设。中共一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第一个纲领》对党的中央组织和地方组织的设置作了规定，确保党在诞生之初就有相对完备的组织设置。党的二大正式制定了自己的章程，在党的组织章程决议案中明确了党的组织与一般革命团体的区别，强调“党的内部必须有适应于革命的组织与训练”，“凡一个革命的党，若是缺少严密的集权的有纪律的组织与训练，那就只有革命的愿望便不能够有力量去做革命的运动”。^② 党的二大从内部党员管理和外部联系群众两个方面增强政党的组织力。党的四大通过了《对于组织问题之决议案》，指出组织问题为党生存和发展的一个最重要的问题，如果不加强党的组织建设，放松了对党员干部工作的指导，则党绝不能前进。^③ 建党早期阶段，严酷的政治生存环境对党的组织力的考验是空前的，关系到党的生死存亡。中国共产党的组织力建设在这一时期无疑取得了巨大的成绩。在对内维度上，党成功确立了自己的纲领、政治路线，明确了自己的政治目标，供给了中国社会急需的意识形态，建立了党的各级组织，构建了有效社会动员的政党结构，在与其他政治力量的对比中展示出强大的政党力量和组织优势。在对外维度上，党创建了纪律严明、服从党的领导的军队。中国共产党成功通过其价值观念、组织机制将不同社会人群尤其是农民群体紧紧团结在自己周围，成功地解决了以往政治力量遇到的难以团结社会力量的政治难题。强有力的组织建设使中国共产党顺利成为革命时期的领导力量。

社会主义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的主要任务是围绕社会主义改造，加快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这一时期是“运动建党”时期，党在组织力建设方面取

^① 参见王长江：《政党论》，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65～69页。

^② 李君如主编：《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2页。

^③ 参见李君如主编：《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44页。

得了宝贵的经验，同时也伴随着艰难曲折，政党组织力起伏变化。随着和平时期的来临，中国共产党成为执政党，党员人数和党组织数量在这一时期迅速增长，确保党员和党组织的质量、党员干部领导适应现代化建设的需要成为这一时期政党组织力的关键。新中国成立之初，国家政治体制逐步成型。党的建设方面，1949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了《关于在中央人民政府内组织中国共产党委员会的决定》，党在政府机构内建立了系统的党组织，在保证国家机关行使行政权力的同时也确保了中国共产党的执政地位和领导地位。1951年，为解决党内出现的官僚主义、命令主义、腐化堕落等问题，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用三年时间开展整党运动，着重通过思想教育和组织整顿，保持党的纯洁性和战斗力。^①在新中国成立之初的一段时间里，党在增强政党组织方面的举措比较有效。党积极健全党组织、强化对党员的教育管理，紧密团结群众进行现代化建设，政党组织力建设适应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需要。但后续随着整风运动和反右倾斗争扩大化，以及后来将社会主要矛盾误判为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矛盾、社会主义道路和资本主义道路的矛盾，国家发展方向出现偏差，对党的建设产生了严重影响。随着“文化大革命”的全面爆发，全国除人民军队外，各级党组织陷入瘫痪或半瘫痪状态，集军、干、群为一体的“革命委员会”成为特殊时期的领导机构。党组织的瘫痪无序导致党员权利难以得到保障，党内政治生活严重不正常，政党组织力降至历史低点，党的建设面临重大挫折和挑战。这一时期的历史教训是沉痛而复杂的，这些问题的出现与党忽视国家社会发展的现实需求，没有及时转换革命思维，党与国家的关系以全能政治、运动政治、人治政治体现，片面以党的“硬控制”强化组织力有密切关系。

改革开放时期，中国共产党步入“制度建党”时期。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迎来了思想解放，党的建设出现重大转折，从加强党的领导必须改善党的领导这一命题出发，党在加强和改善自身建设方面进行了大胆的探索和研究，在对内对外两个向度上党的组织力明显增强。1980年，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通过了《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对党组织和党员的政治行为进行了系统具体的规范，确保党内政治生活合理化、制度化。同年，邓小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的讲话，指出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组织制度带有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要改革党和国家领导制度中权力过分集中、党政不分、以党代政等问题。随后大力推动党和国家领导制度改革，推出了领导干部退休、“四化”、选举、考核等根本性的改革措施。1982年，党的十二大讨论通过了新党章。新党章清除了以往党章中的“左”的错误，正确论述了党的性质和指导思想，正确定位了社会主义初级阶段我国社会的主要矛盾和

^① 参见李君如主编：《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上册，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89～210页。

党的总任务，引导全党逐步走上了“依章治党”的健康发展道路。^①这一阶段，中国共产党注重归纳总结政党成长、发展、演变规律，将政党建设引导到科学化、规范化轨道上来。在对内维度上，依靠改革和制度建设的双轮驱动，党逐步健全党内法规，恢复并注重保障党员权利、规范党内政治，对党员和党组织的管理步入制度化轨道。在对外维度上，党积极探索从改善党的领导到加强党的领导的方法，在国家治理中准确把握国际发展趋势，有效实施对外开放战略，国内经济保持高速增长，社会主义现代建设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展现了良好的执政成绩。中国是后发的现代化国家，其内在社会力量无法自动聚合形成支撑力量，而外在压力需要国家快速实现现代化转型的目标。内外双重压力，意味着中国的现代化发展需要政党的有效领导和组织力量支撑。在系统考察了中国现代化的历史进程后，罗兹曼在评价中国现代化时指出：“假如说有一个特征是今日中国现代化的格局特别地不同于其他国家的话，那就是它的组织能力。”^②

综上，在革命、建设、改革不同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经历了革命建党、运动建党、制度建党不同历史时期的变革，党的组织力经历高潮、曲折、重建的艰难探索过程。从历史发展可见，组织力是政党建设成效的风向标，尊重政党发展规律，积极回应国家社会发展的政治需求，党的组织力就呈现坚强有力的态势；忽视政党发展规律，无视国家社会发展的政治需求，党的组织力就呈现弱化分化趋势。

四、回应需求：中国共产党组织力的提升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发展有不发展的问题，而发展起来后出现的问题并不比发展起来前少，甚至更多更复杂了。”^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民众的经济、政治、社会诉求日趋多元、升级变化，发展中不平衡、不协调、不可持续的问题突出，国家治理的复杂性、难度增加。新的挑战面前，中国共产党需要坚持以政党治理引领国家治理的发展逻辑，坚持以增强党的内部治理能力来增强党的对内组织力，坚持以提升党引领国家治理能力来增强党的对外组织力，在对内对外双重维度上增强党的组织力。

（一）加强党的建设和内部治理，增强党的对内组织力

1. 坚持以增强政治性为组织力提升的价值指引

政党的根本属性是政治性，政党要加强自身建设必须首要讲政治、抓政治，

^① 参见李君如主编：《中国共产党建设史》下册，福建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363～381页。

^② [美] 吉尔伯特·罗兹曼：《中国的现代化》，国家社科基金《比较现代化》课题组译，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年版，第458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82页。

确保政党属性不变色。“一个政党，就是围绕自己的政治纲领、按照自己的政治路线、为实现自己的政治目标而组织起来的政治集团。不讲政治，离开了自己的政治纲领、政治路线、政治目标，也就不成其为一个政党了。”^① 政治建设在中国共产党建设中居于统领地位，党的组织路线服务党的政治路线。新时代增强党组织力必须牢牢把握增强党的政治性这一根本价值指向，确保全党坚持正确政治方向，坚守政治立场，严守政治纪律和政治规矩，以党的政治建设成效确保全党团结统一、坚强有力。

2. 坚持以强有力的组织体系为组织力提升的核心

中国共产党已经建成涵盖中央组织、地方组织和基层党组织的三层组织体系，但党的组织体系中部分党组织功能弱化、虚化、边缘化的问题没有得到彻底有效解决。加强党的组织体系建设必须首先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坚决做到“两个维护”，凝聚全党思想共识和统一行动意志。地方党组织认真执行党中央决策部署，全力确保党的决策部署贯彻落实，打破地方利益壁垒，破除政策“中梗阻”，保证全党步伐协调一致。基层党组织明确职能定位，结合行业、领域特点将党的建设与中心工作紧密融合，解决基层党组织低效、失效甚至无效的顽疾，努力提升基层党组织建设质量。

3. 坚持以建强组织细胞为组织力提升的基础

党员是党组织的基础细胞，也是群众接触最直接、最能直观反映党的形象的群体。在党员队伍不断扩大的同时，党员队伍质量提升问题也日益凸显。党员在质量上不提升，单是数量增加，非但无益，反而使党的组织更加松懈。^② 这需要严格党员发展标准，坚持政治标准、思想标准，杜绝入党动机不纯的人员加入党组织。加强对党员的日常管理、监督，增强党员意识，让党员的身份立起来，以党员群体的实际行动赢得民众的信任。

4. 坚持以提升党员干部素质为组织力提升的关键

党员领导干部是党组织中的关键少数，承担着各行业领域统筹、决策的重要职责。提升党员干部能力素质必须紧抓“高素质”和“专业化”两个关键，在干部成长培养、选拔、管理、使用工作的各个环节从严要求，突出工作实绩导向，在经济社会发展一线发现锤炼干部，锻造对党忠诚、勇于担当的高素质干部队伍。

5. 坚持以完善党建制度为组织力提升的根本

党的制度建设能够管根本、利长远。中国共产党高度重视制度建设。党内已初步构建以党章为根本遵循、以民主集中制为根本原则的制度体系。在今后的制

^① 《江泽民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60页。

^② 参见中共中央组织部、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央档案馆编：《中国共产党组织史资料》第8卷，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版，第68～72页。

度建设中，要将提升制度建设质量作为着力点，既加强党内实体性法规建设又注重程序性法规建设，既注重单一法规又注重党内法规之间的协调统一，既注重建立党内法规又注重党内制度的执行，构建更加科学系统的党内制度体系。

（二）提升党引领国家治理的能力，增强党的对外组织力

1. 坚持提升党组织引领治理的能力

党组织引领治理的能力，是指以党组织为核心，引导、动员、带领多元主体共同参与提升治理效果的能力。中国的国家治理不是奉行西方无中心治理，而是强调党的领导地位的治理，需要发挥党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主导作用。中国共产党在国家治理中的核心作用体现为“整合了社会，即党通过其组织网络、意识形态等，把整个社会整合为一个有机整体；提供了领导，即党成为现代化的领导核心和指导力量，成功推进了中国社会的进步和发展；保证了发展，即党通过政策供给、人才队伍、制度建设等有效保证了社会变革和发展”^①。政党建设与国家治理是联系在一起的，质量强党需要置换为国家治理效果。但在治理实践中，存在部分党组织治理角色转型迟缓、利益整合能力弱化、政策供给能力不足、动员组织行动滞后的突出问题。提升党组织的治理能力要求党组织能够确保对大局、地方性的路线政策进行科学领导、科学决策，提高政策供给和有效决策能力。基层党组织要能够结合行业特点明确治理功能定位，明确治理目标要求，综合协调多元主体参与治理，注重把党员组织起来、人才凝聚起来、群众动员起来。只有党组织引领治理的能力增强，党的建设成效转换为实际的治理效果，党执政的合法性和有效性才会随之巩固和增强。

2. 提高党组织聚合社会力量的能力

政党的组织力量主要体现为三个方面，一是对党员的组织，二是对社会的组织，三是对执政的组织。^② 相对于政党对党员和执政的组织，政党对社会的组织是其组织力的外部检验，也是政党有效执政的前提和基础。政党要实现对社会的有效组织，有两个基本途径：一是扩大政党组织规模，扩容政党成员；二是加强社会联络，扩大党的外围组织，使政党的组织属性日益社会化。前一条路径发展空间有限。国家发展实践也证明，社会发展的多元需求仅靠政治体系的单一供给无法满足。罗斯的社会控制论认为：“社会组织、社会规范是社会控制的重要方面。发达的社会组织能够起到民众与政府的中介和桥梁作用，可以协调不同层次、不同群体之间的利益冲突。”^③ 中共十八届三中全会提出：“坚持系统治理，加强党委领导，发挥政府主导作用，鼓励和支持社会各方面参与，实现政府治理

^① 林尚立：《中国共产党与国家建设》，天津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6页。

^② 参见林尚立：《执政的逻辑：政党、国家和社会》，《复旦政治学评论》第3辑，上海世纪出版集团、上海辞书出版社2005年版，第7页。

^③ [美] 爱德华·罗斯：《社会控制》，秦志勇、毛永政等译，华夏出版社1989年版，第143页。

和社会自我调节、居民自治良性互动。”^① 因此，政党对社会的有效组织需要加强社会联络，扩大外围组织。党要更多地借助“嵌入”在各类社会组织、人民团体、自组织中的党组织，以国家整体价值追求凝聚思想共识，让社团组织更多发挥了解民意、沟通民意的桥梁纽带作用，党组织重视民意聚合，积极承担化解冲突、维护公益等功能，以沟通、协调、化解的成效将民众紧密团结起来。

3. 坚持服务型党组织建设

马克思创建共产党之际就宣告共产党不具有阶级私利，共产党将为人民谋幸福、为人民服务作为政党宗旨。党成立、发展、壮大的历程也清晰表明，民众的支持和信任是政党存续的根本。在国家快速转型、社会多元分化、利益诉求多元的背景下，各级党组织需要加强服务功能，有效回应民众诉求。这方面，新加坡人民行动党给出较好示范。尽管存在多党竞争，新加坡人民行动党能够长期保持执政地位，其中非常重要的原因就在于人民行动党自成立以来就有一套紧密联系服务群众的机制。为了争取人民的支持，党组织成员时刻注意以身作则、为民服务。选民最终也选择了能够替他们解决问题、办实事的人民行动党。^② 在服务型党组织建设中，要积极借鉴国内外服务型政党建设的成功经验，积极推广地方探索的较为成熟的经验，调研民众所思、所想、所困，推广“一站式服务”“党群服务站”“党员爱心岗”等贴近民众需求的服务项目，在地方重大项目推进中注重克服企业、行政系统条块分割，难以有效协调的问题，组建区域化、楼宇化、相互依赖型党建网络，真正让党组织成为民众值得信赖和依靠的暖心组织。

政党组织力是政党研究的新兴领域，也是需要更多研究者深入挖掘的领域。对于政党而言，政党组织力是政党发展壮大的关键要素。中国共产党在百余年历史征程中积累了组织力建设的宝贵经验，也留下了需要反思总结的历史教训。新的历史阶段，中国共产党面临增强组织力的新时代命题，挑战来自内外不同层面，需要坚持以政党治理引领国家治理的发展逻辑，从内外双重维度持续增强党的组织能力，从而持续焕发生机活力。

^① 《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深化改革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人民日报》2013年11月16日。

^② 参见孙景峰：《人民行动党的自我更新与执政》，《东南亚》2005年第4期；李路曲：《新加坡政治发展模式比较研究》，《社会主义研究》2008年第1期；孙景峰：《基层组织与新加坡人民行动党执政地位的延续》，《河南师范大学学报》2011年第1期。

The Multi-dimension of CPC's Organizational Strength: Connotations, Party's Needs, Historical Logic and Promotion Paths

Liu Hua

Abstract: CPC's organizational strength refers to an overall ability of the Party to gather multiple forces for internal and external governance. It reflects in CPC's carrying out activities internally and conducting national governance externally, based on the Party's mission and its organizational resources. The significant factors, such as the Party's mission, origin, function, organizational form and principle, determine the inexorable requirement for the Party to enhance its organizational strength. The Party has gone through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of building itself through revolution, movement and system. And its organizational strength has experienced a difficult exploration process from climax, twists and turns to reconstruction. The Party needs to adhere to the development logic of leading the national governance by the party governance. It should insist on strengthening the Party's internal governance capacity to enhance its internal organizational strength, and improving the Party's ability to lead national governance to enhance its external organizational strength.

Keywords: Organizational Strength; Organizational Construction; Country Governance; Institutional Party Building

[责任编辑：焦佩]

“二七”纪念中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研究*

——以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中央机关报纪念文本为中心

卢 鹏 俞祖华**

【摘 要】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了“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概念，构建了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话语。作为中国共产党的机关报，《向导》《红色中华》和《新中华报》分别在建党初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延安时期发挥了宣传作用，传播了伟大的“二七”精神，在不同历史时期，完成了特定的历史使命。《向导》的“二七”纪念体现着“二七”精神与伟大建党精神的内在一致性，《红色中华》的“二七”纪念体现着“二七”精神与苏区精神的内在一致性，《新中华报》的“二七”纪念体现着“二七”精神与延安精神的内在一致性。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中共中央机关报；“二七”纪念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在长期奋斗中构建起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①。这一精神谱系，为立党兴党强党提供了丰厚的精神滋养。“二七”运动是中国共产党成立初期领导的一次史无前例的反帝反封建的工人革命运动，展示出了中国工人阶级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和反帝反封建的革命彻底性，标志着中国工人阶级第一次以独立的姿态登上政治舞台，在中国工运史及人民革命史上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目前，学界对“二七”纪念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中共早期领导人对“二七”纪念的著述，以及当代中国革命与“二七”这一政治符号的联系方面。^②本文以建党初期、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和延安时期为中心，以当时的中共中央机关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学术社团主题学术活动项目“文本、诠释与传播：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话语研究（1921—2021）”（20STA032）、国家社会科学基金社科学术社团主题学术活动项目“传承与创新：百年来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1921—2021）”（21STA011）的阶段性成果。

** 卢鹏，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共党史；俞祖华，历史学博士，鲁东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近现代思想史。

①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

② 参见李良明、黄飞：《中共早期领导人与大革命失败前的“二七”纪念》，《中共党史研究》2013年第11期；刘莉：《政治符合与社会动员：“二七”纪念与近代中国革命》，《民国研究》2017年第1期。

报《向导》《红色中华》和《新中华报》发表的“二七”纪念文本为考察对象，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视域下探究“二七”精神与伟大建党精神、苏区精神和延安精神的内在一致性。通过对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共中央机关报纪念文本的研究，以期对新时代开展中国特色的纪念活动、加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宣传有所启发。

一、《向导》“二七”纪念对“二七”精神与伟大建党精神内在一致性的体现

“坚持真理、坚守理想，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不怕牺牲、英勇斗争，对党忠诚、不负人民”^①的伟大建党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其他精神产生与发展的“母体”，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总源泉”。中国共产党成立后不久便领导了“二七”运动。大革命时期，作为中共中央机关报的《向导》每年都刊载“二七”纪念的内容。分析这些纪念文本，可以看出“二七”精神与伟大建党精神具有内在一致性。

（一）强调“坚定信念”

《向导》“二七”纪念系列文本所强调的“坚定信念”，与伟大建党精神中的“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相契合。“京汉铁路工人为了在郑州开总工会成立会被军警强迫解散，这明明是不许国民享有宪法上集会结社的自由权利了”^②，“‘保护劳工’的军阀便不惜自揭假面具，破坏约法赋与的集会结社自由权，便不惜血肉横飞惨杀赤手空拳以争自由的劳动者”^③。当京汉铁路工人“有机会可以得到一点自由，可以从此争得一点应享的权利”之时，吴佩孚等反动军阀对铁路工人进行了屠杀，争来的集会结社自由“一转眼间又被人夺去，怎由得他们不狂争疯斗”，由此京汉铁路工人发出了“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的口号，与反动军阀展开猛烈斗争。^④同时，中共也指出了反动军阀屠杀京汉铁路工人，“其意义不仅是屠杀罢工的工人，实是屠杀我争自由的人民，屠杀为全国人民争自由的先锋军”^⑤，反动军阀不仅是“工人阶级的敌人”，亦是“全国争自由的人民的敌人”^⑥，民主自由是世界历史进入现代以来世界人民共同的价值趋向，因而也是被封建势力压迫的中国人民所需的。此次京汉铁路工人罢工，不单是为了工人单独的经济利益，亦是为了全国人民对民主自由的向往，其后工人始终高举“为自

① 习近平：《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日报》2021年7月2日。

② 陈独秀：《为自由而战！》，《向导》1923年第19期。

③ 《中国共产党为吴佩孚惨杀京汉路工告工人阶级与国民》，《向导》1923年第20期。

④ 彭述之：《二七斗争之意义与教训》，《向导》1925年第101期。

⑤ 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二七大屠杀的经过》，《向导》1923年第20期。

⑥ 《中国共产党为吴佩孚惨杀京汉路工告工人阶级与国民》，《向导》1923年第20期。

由而战，为人权而战”的旗帜对反动势力进行伟大斗争。《向导》在纪念“二七”三周年时指出，第二次全国铁路工人代表大会在1925年召开，工人能“以艰苦奋斗之结果能在两年前惨遭巨变之同地同日召集全国代表盛会”^①，是“二七”罢工发生后两年中工人始终坚定“为自由而战”信念的结果，虽然工人的自由还没完全取得，但也初步标志着工人已有组织及集会的自由。1925年的“二七”纪念日，“是全国铁路工人大结合的日子”^②，是“中国铁路工会运动的兴盛”^③的日子，同时第二次全国铁路代表大会也通过了“继续‘二七’为争自由的运动”^④的政治主张，始终抱定为自由、人权而战的信念。因此，中共借助《向导》传播“二七”工人始终坚定“为自由而战”的理想信念，彰显了理想信念作为精神上“钙”的作用，以此凸显“坚持真理、坚守理想”的建党精神，使民众更加深刻地理解“自由是我们的生活必需品，不是可有可无的奢侈品”，动员全国人民“坚持真理、坚守理想”，始终抱定“为自由而战”的信念，实现打倒封建军阀，完成大革命的政治诉求。

（二）强调“勇于担当、不辱使命”

《向导》“二七”纪念系列文本所强调的“勇于担当、不辱使命”，与伟大建党精神中的“践行初心、担当使命”相契合。“二七”大罢工发生时，京汉铁路的工人们“代表全国工人阶级站在革命战线之最猛进的地位”^⑤。1925年2月7日，《向导》刊载了陈独秀的“二七”纪念文章，指出“中国工人备受外国帝国主义者及国内军阀资本家三层压迫”，“工人群众的思想与行动终究是革命的，不是妥协的”，工人阶级是“富于集合力及决战力者”，是“最革命的阶级”，是反对封建军阀的主力军、先锋军。^⑥此外，陈独秀还指出了客观基础上工人阶级是最革命的力量，“帝国主义者在中国沿江沿海之运输机在他们的手里，国内军阀的兵队及军用品运输机的手里，大的工商都市大的矿区生产机关交通机关也都在他们手里”，因而“他们起来革命，足以使全社会震动”，“中国国民革命运动，若没有工人阶级有力的参加奋斗，决没有得到胜利的可能”，只有工人“才足以制敌人的死命”，因此中国工人需承担起大革命领导者的角色，勇于斗争、敢于斗争。^⑦“二七”运动后的历史证明，中国的工人不辜负历史赋予的光荣使命、担当起历史赋予的重要角色，发起组织工会的民主运动、争取权利的罢工运动，足以见得在“商人学生的斗争力疲弱下去的时候，独有工人阶级继续着革命

① 《中国共产党祝全国铁路总工会代表大会》，《向导》1925年第101期。

② 瞿秋白：《一九二三年之二七与一九二五之二七》，《向导》1925年第101期。

③ 罗章龙：《“二七”三周年纪念日追溯一年来中国铁路工会运动的发展》，《向导》1926年第145期。

④ 罗章龙：《“二七”三周年纪念日追溯一年来中国铁路工会运动的发展》，《向导》1926年第145期。

⑤ 彭述之：《二七斗争之意义与教训》，《向导》1925年第101期。

⑥ 参见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工人的力量》，《向导》1925年第101期。

⑦ 陈独秀：《中国国民革命运动中工人的力量》，《向导》1925年第101期。

的斗争，反对各国帝国主义，反对军阀资本家”^①。“二七”罢工后，工人运动在各地“仍旧继续不断的向前推行”，并且“中国工人阶级的觉悟越发增高，全国工人阶级的团结力日益增进”^②。中共通过《向导》指出，“担负中国一切革命事业——由民族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的只有中国的工人阶级”^③，“不但是一阶级的阶级斗争而且是中国民族的民族斗争里的先锋”^④，工人阶级在“二七”及之后的斗争中，始终承担着领导民族革命运动的任务，为工人自身及全国民众的权利不断进行经济和政治斗争，凸显了工人勇于担当、不辱使命的精神，动员工人及共产党员践行“反军阀、争自由”的初心，担当起领导民族革命运动的重任，带领广大民众对反动军阀展开持续斗争，取得国民大革命的胜利。

（三）强调“舍生取义、视死如归”

《向导》“二七”纪念系列文本所强调的“舍生取义、视死如归”，与伟大建党精神中的“不怕牺牲、英勇斗争”相契合。1925年2月7日，彭述之指出，“二七”斗争充分地表现了中国工人阶级“伟大的牺牲精神”^⑤。1926年2月10日，瞿秋白在纪念“二七”时发表了为烈士举行追悼会的文章，指出“美帝国主义者走狗吴佩孚等施行‘二七’屠杀，大欲恐吓工人群众，扑灭他们的革命运动”，“二七”牺牲者的血是为“中国工人阶级而流的”，也是为“中国民族而流的”，是为“全人类的解放而死的”，证明了工人阶级誓死捍卫民主自由的决心和勇气。同时，他还说明反动军阀“这一残杀的创痛警醒了中国最革命的阶级”——工人阶级，“使他们如潮水一般涌入国民革命的队伍”，使国民革命“得着了强有力的新力军”，“找着了自已最勇猛最坚决奋斗，最先牺牲的先锋队”，“二七”工人的血不但没有让工人运动就此沉寂，反而使他们更加觉悟、更加坚定了将斗争进行到底的决心，同时“使国民运动，学生运动，农民运动随着最先发难最先牺牲的‘二七’屠杀中之工人”，“勇猛的向前奋斗，万流汇合地形成中国革命史上空前的五卅民族解放革命”，“二七”工人的血也流淌在五卅运动中。^⑥1927年2月7日，陈独秀也发表“二七”纪念文章，指出“二七”是“中国工人阶级开始和军阀血战之第一幕”，“中国铁路工人的赤血流遍了沿京汉路二千余里”，^⑦凸显了“二七”工人舍生忘死、不怕牺牲的精神。^⑧此外，“二七”罢工后“胶济路总工会领袖李慰农、伦克忠，青岛公民报记者胡信之，

① 瞿秋白：《一九二三年之二七与一九二五之二七》，《向导》1925年第101期。

② 瞿秋白：《一九二三年之二七与一九二五之二七》，《向导》1925年第101期。

③ 彭述之：《二七斗争之意义与教训》，《向导》1925年第101期。

④ 瞿秋白：《一九二三年之二七与一九二五之二七》，《向导》1925年第101期。

⑤ 彭述之：《二七斗争之意义与教训》，《向导》1925年第101期。

⑥ 瞿秋白：《中国职工运动战士大追悼周之意义》，《向导》1926年第145期。

⑦ 陈独秀：《“二七”纪念日敬告铁路工友》，《向导》1927年第187期。

⑧ 陈独秀：《“二七”纪念日敬告铁路工友》，《向导》1927年第187期。

正太路总工会秘书高克谦,京汉路郑州工会会员韩玉山,津浦路浦江工会委员长张振成”都在与封建军阀的斗争中牺牲了,他们“都是在战争中牺牲了他们的生命为阶级争斗的殉难者”,“在这许多争斗史中实为多数忠勇奋斗的劳动战士碧血所渲染”,^①由此证明了一个道理:“工人阶级的自由要用自己的血去换来”^②。《向导》通过“二七”纪念,指出工人阶级“像冲锋的战士一样,虽然在前线上一批一批的倒下来,可是后阵还一批一批的前进,不到打破敌人的营垒不止”^③,凸显了工人舍生忘死、视死如归的牺牲精神,动员工人阶级以及广大民众抱定甘愿为革命牺牲的精神,为革命流尽最后一滴血。

(四) 强调“立党为公、为民奋斗”

《向导》“二七”纪念系列文本所强调的“立党为公、为民奋斗”与伟大建党精神中的“对党忠诚、不负人民”相契合。“二七”运动是“中国共产党登上中国政治舞台后独立领导的第一次工人运动”,在斗争中共产党员“始终把为争取工人阶级的自由和利益作为斗争的根本目的”。^④1926年2月10日,《向导》刊载了瞿秋白纪念“二七”的文章,指出在“二七”斗争发生后,在沙面罢工、上海日商纱厂罢工、青岛纱厂罢工中,为工人运动而牺牲的“有姓名的共产党员已经有六七人”,“共产党是为工人阶级而死”。^⑤中共借助“二七”纪念,向民众说明了一个道理:“惟有共产党是真正保护劳工为劳工阶级利益而奋斗的党”^⑥。中国共产党是马克思主义政党,没有自己任何特殊的利益,这是由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性质和宗旨决定的,因此它能始终代表最广大人民的利益,以“紧急时刻、党员先上”要求自己,唯有共产党人能为党、为工人、为人民付出一切。《向导》对“二七”的纪念,正是为动员广大党员承继“二七”斗争中共产党人为党、为人民牺牲的精神,“与革命的先锋工人联成统一的战线”,“与他们诚恳的握手”,并且随时要为解放工人及全国人民的事业奉献一切,“担起国民革命的大事业”,“促进国民革命的发展”,取得国民大革命的成功。^⑦

二、《红色中华》“二七”纪念对“二七”精神与苏区精神内在一致性的体现

苏区精神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在苏维埃革命时期的发展,体现了革命根

① 罗章龙:《“二七”三周年纪念日追溯一年来中国铁路工会运动的发展》,《向导》1926年第145期。

② 瞿秋白:《中国职工运动战士大追悼周之意义》,《向导》1926年第145期。

③ 瞿秋白:《中国职工运动战士大追悼周之意义》,《向导》1926年第145期。

④ 李红霞、杨波:《新时代“二七精神”的传承和研究》,《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21年第4期。

⑤ 陈独秀:《“二七”纪念日敬告铁路工友》,《向导》1927年第187期。

⑥ 《中国共产党为吴佩孚惨杀京汉路工告工人阶级与国民》,《向导》1923年第20期。

⑦ 为人:《为“二七”纪念告国人》,《向导》1924年第53、54期。

根据地军民对“二七”精神的继承与发扬。土地革命战争时期，赣南闽西革命根据地在党的领导下逐渐发展成为中央苏区，这是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创建全国性的红色政权的尝试。“在革命根据地的创建和发展中，在建立红色政权、探索革命道路的实践中，无数革命先辈用鲜血和生命铸就了以坚定信念、求真务实、一心为民、清正廉洁、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等为主要内涵的苏区精神。”^①其与伟大建党精神中的“坚持真理”“坚守理想”“不负人民”“不怕牺牲”一脉相承。土地革命战争时期，《红色中华》在1931～1936年作为党的机关报，通过纪念“二七”来展现苏区精神。

（一）强调“坚持真理、坚定理想”

《红色中华》“二七”纪念系列文本所强调的“坚持真理、坚定理想”与苏区精神“坚定信念”相契合。1932年2月3日，《红色中华》刊登了项英纪念“二七”的文章，指出了京汉铁路总罢工命令下达后，“长二千余里之路线，二万余工人之众”，一致响应罢工，“不前不后，在一个时间内一致行动”，充分证明了“二七”工人靠坚定的“为自由而战、争人权而战”的信念，靠坚持民主自由的真理，能够在总工会罢工命令下达时，“全体都动员起来，好像一支有训练的军队作战时一样”。^②1936年2月6日，雷经天在纪念“二七”时指出，总工会罢工命令下达后，反动军阀迫令共产党员林祥谦下复工命令，但林祥谦“誓死不受屈服”，发出了“头可断，复工的命令不可下”的壮语，“军阀萧耀南即将林施两同志在江岸车站杀戮示众”。^③“二七”罢工是铁路工人为了争取自己的权利和自由发动的，领导罢工的党员和工人领袖始终坚定争取自由权利的理想信念，在反对军阀的残酷镇压和各种威逼利诱面前，林祥谦、施洋等共产党员宁死不下复工命令，靠的就是对实现民主自由的坚定理想以及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坚定信念，最终“他们用自己的生命践行了对广大工友的誓言，用牺牲的方式向反动军阀宣告了对党和革命事业的绝对忠诚，用鲜血和生命诠释了什么是听党话、跟党走，用实际行动表达了追求真理的坚定决心”^④。因此，中共借助“二七”纪念，动员全国工人及一切劳苦群众始终坚定“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的信念，“站在一条战线上”，“一致向帝国主义国民党这个共同的仇敌奋斗”，从而挽救“中国民族的危机”，“将工人阶级从失业、饥饿与奴役的情况下，解放出来”^⑤，实现人民解放、民族独立。^⑥

① 《苏区精神要永远铭记、世代传承》，《人民日报》2021年7月26日。

② 项英：《“二七”事略》，《红色中华》1932年2月3日。

③ 雷经天：《“二七”纪念事略》，《红色中华》1936年2月6日。

④ 李红霞、杨波：《新时代“二七精神”的传承和研究》，《中共郑州市委党校学报》2021年第4期。

⑤ 中华总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为援助开滦总罢工宣言》，《红色中华》1934年2月9日。

⑥ 参见中华总工会：《中华全国总工会为援助开滦总罢工宣言》，《红色中华》1934年2月9日。

（二）强调“实事求是、立足当下”

《红色中华》“二七”纪念系列文本所强调的“实事求是、立足当下”与苏区精神的“求真务实”相契合。中共借助《红色中华》纪念“二七”，分析当前局势、总结经验教训，从当下实际出发，指明了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斗争路线：“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的领导”^①。1933年2月7日，在纪念“二七”时，《红色中华》发表社论，指出“二七”罢工不仅警醒了全国的工人和劳苦大众，而且展现了“中国无产阶级的领导作用”，当前在中国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广大劳苦群众，“已经创立了自己的苏维埃政权，推翻了豪绅地主资产阶级与帝国主义的统治，解放了自己”，“苏维埃政权获得了光荣的胜利”，由此证明“中国革命只有在无产阶级的领导之下，高擎着广州公社所揭起的苏维埃巨纛，坚决勇敢的奋进，才能获得最后的胜利，才能将广大的劳苦群众由贫困、饥饿、失业、死亡中解放出来”。^②中共总结以往经验教训，从实际出发，指出了一条能够通往最终胜利的道路。此外，中共还通过“二七”纪念指出了当前形势下的主要任务，“大规模的激烈残酷的决战，已迫在眼前——粉碎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大举进攻，实现一省或数省革命的首先胜利，是目前最紧急的战斗任务”，“在急剧开展的战争面前，需要我们以更大的努力来为巩固和加强无产阶级的领导而斗争”，“这是胜利决战的必要条件”。^③因此，中共通过“二七”纪念，总结了以往经验教训，分析了目前局势，从当下的中国实际条件出发，指出没有坚强的无产阶级领导，中国革命不可能获得完全胜利，必须加强和巩固无产阶级在中国革命中的领导地位，从而诠释了“求真务实”的苏区精神。

（三）强调“甘于奉献、敢于斗争”

《红色中华》“二七”纪念系列文本所强调的“甘于奉献、敢于斗争”与苏区精神的“艰苦奋斗、争创一流、无私奉献”相契合。1932年2月3日，《红色中华》刊载了项英纪念“二七”的文章，指出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开始从各地组织工会，来反抗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来为本身利益而斗争”，“二七”是京汉铁路工人“为反对军阀争工会自由，举行总同盟罢工，惨遭军阀吴佩孚屠杀的大流血纪念日”。^④“二七”工人阶级为谋求解放、争取自由展现了甘于奉献、敢于斗争的奋斗精神，“二七”运动爆发后，“军阀罪恶完全暴露于全国民众之前，打倒军阀之声浪，遍及全国，使中国革命运动在无产阶级伟大的英勇斗争与牺牲之下，开展了新的发展局势，推动了一九二五——一九二七

① 《纪念“二七”与我们的中心任务》，《红色中华》1933年2月7日。

② 《纪念“二七”与我们的中心任务》，《红色中华》1933年2月7日。

③ 《纪念“二七”与我们的中心任务》，《红色中华》1933年2月7日。

④ 项英：《“二七”事略》，《红色中华》1932年2月3日。

年大革命的高潮，所以‘二七’伟大的英勇斗争，是开辟了中国革命新的发展道路”^①，“二七”的英勇斗争精神鼓舞了全国民众积极开展斗争的热情。1936年2月6日，雷经天在纪念“二七”时指出，“中国无产阶级以其英勇的奋斗，领导了中国革命的发展”，所以在今天“应该加紧开展抗日反卖国贼的革命战争，加紧我们先烈所流血奋斗得来的工会的工作，加强无产阶级在革命中的领导权，为抗日讨卖国贼的胜利，为中国工人阶级的彻底解放而奋斗”。^②因此，《红色中华》通过纪念“二七”，传播“二七”甘于奉献、敢于斗争的牺牲精神，以此来号召工人及民众英勇的向国民党反动派展开斗争，赢得自身最后的解放。1933年2月6日，《红色中华》报道了南阳“二七”纪念大会上工人“自动报名当红军”^③的盛况；1933年2月10日，介绍了“长汀工人热烈加入红军十天内扩大百八十余名”^④的场景，呼吁工人加入红军，向反动派开展武装斗争；1933年2月16日，《红色中华》报道了会昌各区纪念“二七”的盛况，同时“由县工联代表号召工人纪念‘二七’当红军去，加强红军中无产阶级的领导”^⑤；1933年2月10日，《红色中华》在纪念“二七”时指出，“成千成万劳苦群众的心坎中，燃烧着革命的热血，随时都准备着到前方去，配合红军作战，将自己的一切，奉献给革命战争，粉碎敌人对中央苏区的大举进攻”^⑥，同时指出：“只有在苏维埃的政权下，才能从层层压迫下解放出来，只有苏维埃才是我们解放唯一的旗帜。”^⑦中共利用“二七”纪念宣传“二七”无私无畏、勇往直前的奋斗精神，号召各地工人及民众加入红军，为保卫苏区、打倒反动政府而艰苦奋斗，“使工人阶级成为扩大红军参加革命战争的中心力量”，动员“全中国群众自动武装起来，打倒投降帝国主义的国民党各派政府，夺取国民党军阀资产阶级的武装，直接对日作战，赶走日美及一切帝国主义出中国”。^⑧

三、《新中华报》“二七”纪念对“二七”精神与延安精神内在一致性的体现

延安精神“传承中国共产党伟大建党精神，赓续共产党人红色基因和精神血脉”，“是镶嵌在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上的精神宝石”。^⑨1937年，因建立抗日民

① 项英：《“二七”事略》，《红色中华》1932年2月3日。

② 雷经天：《“二七”纪念事略》，《红色中华》1936年2月6日。

③ 《南阳六十一人自动报名当红军》，《红色中华》1933年2月16日。

④ 《工友们！到红军中去！》，《红色中华》1933年2月10日。

⑤ 飘梨：《会昌示威群众二千余，二十八人当场入红军》，《红色中华》1933年2月16日。

⑥ 《“二七”纪念盛况》，《红色中华》1933年2月10日。

⑦ 《罢工工友热烈拥护红军！》，《红色中华》1933年2月10日。

⑧ 周恩来：《今年的“二七”纪念与中国工人阶级的中心任务》，《红色中华》1932年2月3日。

⑨ 吴照峰：《论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中的延安精神》，《中国延安干部学院学报》2021年第4期。

族统一战线的需要,《红色中华》更名为《新中华报》,同时作为陕甘宁边区的机关报。全面抗战时期,延安作为党领导人民进行抗战的革命根据地,在这里形成了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核心的延安精神。其与伟大建党精神中的“坚持真理”“英勇斗争”“不负人民”一脉相承、守正创新。延安时期,《新中华报》通过刊载中共重要领导人讲话等形式纪念“二七”,宣传“二七”精神,从而使全国民众在中国革命最艰难的时刻始终坚持共产党的领导、始终坚持抗战,号召全党始终从中国实际出发,始终坚定为人民谋解放的根本初心。

(一) 强调“坚定信念、听党指挥”

《新中华报》“二七”纪念系列文本所强调的“坚定信念、听党指挥”与延安精神的“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相契合。1940年2月28日,《新中华报》刊载了邓发在“二七”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他指出,共产党领导下的京汉路总工会下达“总同盟罢工的命令”时,“全路工人一致响应”,表明了工人对坚持共产党领导的自觉,表现出“二七”罢工时“中国工人阶级已获得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围绕在中国共产党的周围”。^①1941年2月9日,邓发在“二七”十八周年纪念大会上指出,“二七”罢工至今十八年来,中国工人阶级在中共的带领下,始终高举“二七”这面鲜明的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旗帜,同时指出中共“在坚持中国革命斗争的道路上,曾经历了种种的曲折艰难,因而曾积累了丰富的革命斗争的经验”,“不论在思想上、政治上、组织上”“都经历了无数的锻炼”,因而工人阶级在代表自身利益的政党——中国共产党的指引下“团结了自己,团结了农民,团结了小资产阶级,团结了知识分子,团结了一切革命人民,目前正向着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道路前进”,由此中国共产党“已成为今日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中坚力量,唯一的指导力量”。^②1941年2月9日,邓发在纪念“二七”时指出,全面抗战以来,“不避一切艰险危难深入敌后坚持抗战的,在广大华北与大江南北展开敌后游击战争的,为国家民族收复了广大失地的,为驱逐日寇出中国与建设新中国而创造了许多抗日民主根据地的”,正是“中国工人阶级的优秀子弟——中国共产党与八路军新四军”,^③只有中国共产党才是真正代表工人阶级及广大人民群众利益的政党,能真正为工人阶级、为中华民族的解放奋斗到底的政党。工人阶级从“二七”奋斗到现在,在抗日民主的陕甘宁边区有“我们党的坚强和正确的领导”,在边区工人群众“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一切民主

① 《邓发同志在“二七”纪念大会上的报告》,《新中华报》1940年2月28日。

② 邓发:《发挥“二七”精神反对反共投降亲日派》,《新中华报》1941年2月9日。

③ 邓发:《发挥“二七”精神反对反共投降亲日派》,《新中华报》1941年2月9日。

自由”，能够用自己的笔写自己的言论，用自己的手排自己的文章，用自己的劳动印刷自己的刊物，把自己的刊物自由地散播到边区工人的手里，实际证明无产阶级只有在共产党领导的政权中才能真正得到自由和解放。^① 1939年2月7日，《新中华报》刊载了张浩纪念“二七”的文章，文章指出：“中国工人阶级只有在他自己的政党领导之下，才能获得最后的解放，只有共产党在长期的，艰难困苦的过程中，始终是与我们的工人阶级在一道儿祸福与共的推着社会的车轮前进。”^② 1940年2月28日，陈云在纪念“二七”时指出，“帮助工人阶级在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提高自己的只有在共产党八路军新四军所到的地方”^③。历史和现实充分证明：“要使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能够彻底完成，中华民族能得到彻底解放，中国工人阶级能获得最后的解放，则必须拥护中国共产党。”^④ 综上所述，在全面抗战语境下，中共借助《新中华报》利用“二七”纪念传播“二七”工人“坚持党的领导”、听党指挥、坚定实现民主自由的信念，从而“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指出工人阶级只有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才能真正实现“二七”所提出“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的口号，争取抗战的最终胜利，实现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真正得到最后的解放与自由，“中国工人阶级如果离开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就无法发挥先进阶级之领导”^⑤作用。

（二）强调“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

《新中华报》“二七”纪念系列文本所强调的“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与延安精神的“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相契合。1941年2月9日《新中华报》刊载了邓发在“二七”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他指出，京汉路工人斗争失败后，“工人采取了暂时退却的政策，自动于二月九日宣布恢复工作，下令复工”，但复工“并不是屈服”，因为“当时环境异常恶劣”且“处在军阀的残酷压迫下”，因此“不得不采取了暂时退却政策”，这是工人在开展斗争过程中所运用的“灵活策略”，是根据实际情况和历史条件所作出的正确判断，^⑥为“保存元气，以备报复”，“只好暂时忍痛复工”。^⑦因此，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利用媒体宣传“二七”“从实际出发”的精神，号召全党将马列主义同中国革命具体实践和中国国情相结合，避免教条主义、本本主义，确立符合中国实际的政策、方针，引领抗日战争走向胜利。

① 参见《朱宝庭同志在“二七”大会上的讲话》，《新中华报》1940年2月28日。

② 张浩：《“二七”与抗战》，《新中华报》1939年2月7日。

③ 《陈云同志纪念“二七”的讲话》，《新中华报》1940年2月28日。

④ 邓发：《发挥“二七”精神 反对反共投降亲日派》，《新中华报》1941年2月9日。

⑤ 《邓发同志在“二七”纪念大会上的报告》，《新中华报》1940年2月28日。

⑥ 参见《邓发同志在“二七”纪念大会上的报告》，《新中华报》1940年2月28日。

⑦ 《邓发同志在“二七”纪念大会上的报告》，《新中华报》1940年2月28日。

（三）强调“患难与共、忠诚为民”

《新中华报》“二七”纪念系列文本所强调的“患难与共、忠诚为民”与延安精神的“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相契合。邓发在纪念“二七”运动时指出，这一运动是“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发展起来的”，京汉路总工会也是“在中共直接领导之下组织和发展起来的”，“京汉路总工会开始组织时中共领导者李大钊和邓中夏等在京汉铁路工人中即进行工作”。^① 1940年2月28日，《新中华报》刊载了邓发在“二七”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他指出，“二七”时共产党员李大钊、邓中夏、施洋等同志不但“致力于中国工人运动及无产阶级事业”，而且“为中国工人阶级的解放事业而牺牲了”，他们是“中国革命知识分子的模范”。^② “二七”运动中英勇奋斗、牺牲流血的，也正是领导“二七”运动的共产党员林祥谦，证明中国共产党在“二七”时就已经和工人阶级站在一起，为争取工人阶级的权利而奋斗。之后领导五卅运动、领导香港海员大罢工、组织上海总工会和发动上海三次工人起义、领导广州起义以及在一二·八事变中领导工人坚持斗争和抗战，也证明中国共产党始终和工人阶级站在一起，为工人阶级流血牺牲，带领工人阶级争取民主自由。1940年2月28日，吴玉章在纪念“二七”十七周年时指出，“共产党是工人阶级的先锋队”，“每个党员应该把工人的工作看得比任何工作更重要”。^③ 全面抗战时期，中共借《新中华报》来宣传“党为工人阶级无私奉献的精神”，始终与工人阶级及民众站在一起，没有任何自己的利益，不代表任何集团，呼吁广大党员在抗战的艰难时刻，继续秉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始终以工人阶级及民众的解放为根本出发点和落脚点。

（四）强调“顽强拼搏、百折不挠”

《新中华报》“二七”纪念系列文本所强调的“顽强拼搏、百折不挠”与延安精神的“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相契合。京汉路总工会成立大会被吴佩孚捣毁后，带领京汉路工人进行斗争的中国共产党员和工人代表没有选择后退，他们“对当时情况表示异常愤慨”^④，并不断带领工人对封建军阀展开斗争。即便是遭到军警联合镇压，“先进的京汉路工人”也提出了“为自由而战，为人权而战”的口号，并“向吴佩孚及京汉路局提出五项要求”，随即“宣布罢工”，来进行抗争。^⑤ 于是反动军阀为镇压工人运动制造了震惊全国的二七惨案，在二七惨案中，“中国工人阶级表示英勇战斗而至死不渝之精神，用自己的鲜血写成那种惊

① 参见《邓发同志在“二七”纪念大会上的报告》，《新中华报》1940年2月28日。

② 《邓发同志在“二七”纪念大会上的报告》，《新中华报》1940年2月28日。

③ 《吴玉章同志在“二七”纪念大会上讲话》，《新中华报》1940年2月28日。

④ 《邓发同志在“二七”纪念大会上的报告》，《新中华报》1940年2月28日。

⑤ 《邓发同志在“二七”纪念大会上的报告》，《新中华报》1940年2月28日。

天地泣鬼神的光辉历史”，“中国工人阶级所进行的斗争，仍英勇坚决的”。^① 1940年2月28日，《新中华报》刊载了陈云在“二七”纪念大会上的讲话，指出中国工人阶级虽生活在极为困难的条件下，但“仍旧在英勇的参加抗战”，“沦陷区工人，不断与日本帝国主义斗争，靠近沦陷区的‘战区工人’则直接参战，帮助抗战军队”，“大后方的工人首先是运输邮电工人在敌人枪林弹雨，飞机大炮之下，格外努力的工作使抗战军队无论在运输及后方供给上得了莫大的帮助”。^② 全面抗战时期，工人“为了抗战的需要”，为了“抗战建国”，“在敌机残酷的轰炸下，他们也没有停止过工作”，并且“自愿跑到这儿住窑洞吃小米”，还“屡次要求减低工资捐助抗战”，“忠实于民族和阶级解放的事业”。^③ 抗战进入相持阶段后，亲日派“向各根据地实行军事进攻，并想以经济物质的封锁来窒息各根据地坚持敌后抗战的军民，而且在大后方各地，正致力于肃清共产党与抗日分子的工作”，中共借此传播“二七”斗争精神，呼吁工人及民众继承“二七”斗争精神实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通过“学习和提高技术”、“高度的发扬劳动热忱”和“掀起生产竞赛的热潮”来“提高生产效率”，“以走向自足自给”，以便“动员工人及全国人士一致起来制止内战，坚持抗战”。^④ 综上，在顽固派阴谋发动反共内战的危急局势下，中共利用“二七”纪念突出工人阶级百折不挠、顽强拼搏的精神，体现“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动员工人和边区民众通过加强生产、自力更生，突破亲日派对边区的封锁，并通过艰苦奋斗来支援抗战，赢得抗战的胜利。

四、结语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是“党领导人民在不同历史时期，为了完成特定的历史使命，以历史时期、历史事件或代表人物命名，由一个个具体精神样本连串而成、呈现出承前启后继往开来演进姿态的动态开放之精神集成”，是“在党的壮阔历史中锻造出来的，是共产党人理想追求和崇高品质的集中体现，过去、现在、将来都是我们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不断前进的精神动力”。^⑤ 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始终重视借助党报党刊来进行纪念活动，刊登纪念文章，根据各个时期不同的政治诉求，构建符合各个时期历史现状的纪念话语，传播革命精神，建构革命记忆，弘扬革命文化。纪念活动不仅可以揭示革命人物精神品格、提升革命

① 《邓发同志在“二七”纪念大会上的报告》，《新中华报》1940年2月28日。

② 《陈云同志纪念“二七”的讲话》，《新中华报》1940年2月28日。

③ 季凯：《抗战文化的星芒边区印刷厂》，《新中华报》1939年11月3日。

④ 《中国工人阶级当前的任务》，《新中华报》1941年4月17日。

⑤ 高振岗、王廷栋：《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构筑的逻辑理路、共性特征及经验总结》，《理论学刊》2022年第4期。

事件精神内涵、彰显中共的精神风貌、积淀党史文化的精神坐标,更是建构党史文化的重要途径,为党史文化、党史观和大历史观的生成提供了丰富历史资源,通过纪念活动而形成的时间谱系、行为方式、记忆载体、意义体系、精神坐标,都是党史文化的有机组成部分。因此,通过纪念活动,可以沟通历史与现实,更能唤起人们对以往革命事件的共鸣,更好地理解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价值内涵,使精神谱系深深铭记于心,推动以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传承和传播。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进入新发展阶段,面临着新形势新任务新状况,因而需要这一精神谱系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提供强大的精神动力和历史自觉。

2020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在湖南考察时指出,要“讲好红色故事,搞好红色教育,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①。改革开放后,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取得了历史性成就,社会发生了历史性变革,但无论我们走得有多远,都不能忘记来时的路,不能忘记百余年来党带领人民奋斗的历史,红色血脉不能断,红色基因不能变。但是红色基因只能通过教育来传承,要想将红色基因继承好、传承好、弘扬好,必须加强和创新红色教育。纪念活动表达了对历史的尊重和缅怀,叙述了历史事实,强化了人们对历史的记忆,纪念日更是人类历史长河中的显性文化,是人类维护、传承自身文化传统的重大创造,成为连接历史、现实、未来的媒介。在新时代,通过对重大革命事件进行纪念来揭示纪念对象的当代价值、现实意义,利用纪念日开展新时代具有中国特色的纪念活动,既强化了历史记忆、增强了情感认同,也传达出符合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某种理念的价值所在,也是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应有之义。

The Study on the Spiritual Pedigree of CPC in the Commemoration of the “February 7th”

—Centered on the Commemorative Text of CPC Central Organ Newspaper During the New Democratic Revolution

Lu Peng Yu Zuhua

Abstract: General Secretary Xi Jinping put forward the concept of “the spiritual pedigree of the Chinese Communists” and constructed the discourse of the spiritual

^① 孙敏坚、颜石敦:《共产党人和老百姓共用一条被子的感情,永远不能变》,《湖南日报》2020年9月19日。

pedigre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Guide”, “Red China” and “New China News”, respectively as the Party’s organ newspapers in the early days of the founding of the Party, the period of the Agrarian Revolutionary War and the Yan’an period, played their role in propaganda, spread the great “27” spirit, and also built a spiritual pedigree in line with the characteristics of the times. In different historical periods, they completed the specific historical missions. The “27” commemoration in “Guide” reflected the internal consistency between the “27” spirit and the great spirit of building the Party; the “27” commemoration in “Red China” reflected the internal consistency between the “27” spirit and Chinese Soviet Areas Spirit; the “27” commemoration in “New China News” reflected the internal consistency between the “27” spirit and the Yan’an spirit.

Keywords: Chinese Communists’ Spiritual Pedigree; CPC’s Central Organ Newspaper; “February 7th” Commemoration

[责任编辑：鲁法芹]

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的人民性论析^{*}

江 峰 朱梦露^{**}

【摘 要】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的人民性在新时代得到了具体、生动的诠释。人民主体性的尊重与高扬、为民目标的全面彰显、民生关怀一如既往的体现、人民根本的牢牢把握、人民情怀的心灵映照，都充分突出了这一基因的人民性本质。事实上，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的人民性贯通于人民美好生活的谋划之中，落实于治国理政的大政方针之中，集纳于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之中，凝聚于推动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动力之中，渗透于国计民生的具体事项之中，实现了新时代演绎；不止于此，在“两个大局”之下，在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在“两个共同体”的构建中，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的人民性还在不断强化、续写和拓展，实现着新境界演进，其新时代演绎为新境界演进提供了坚实的人民性基础，新境界演进为新时代演绎拓展了更为丰富的内容、更为宽广的人民性境域。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人民性；红色基因

在新时代党的一系列重要文献中，“人民”二字夯实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理论基础，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展示了中国共产党的作风、气派和生命力，展现了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格魅力和思想情怀。实质上，新时代党的一系列重要文献传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赓续革命文化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蕴含人民性的宝贵红色基因，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当代彰显。解读人民性红色基因的密码，厘析人民性红色基因的新时代演绎理路，揭示人民性红色基因的新境界演进逻辑，将有利于我们深刻领悟唯物史观的哲学智慧，牢记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彰显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本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大别山红色文化传承与发展研究”（项目编号：19BKS112）阶段性研究成果。

^{**} 江峰，湖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哲学、马克思主义理论与红色文化；朱梦露，湖北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质和精髓，从而使新时代的奋斗实践获得正确的方向引领。

一、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人民性的丰富本体内蕴

一般地，红色基因有狭义和广义之分。狭义的红色基因即中国红色基因，广义的红色基因即共产主义红色基因。简明地说，“所谓红色基因，就是指一种具有高尚的共产主义理想信念、道德情操、意志品质、精神风貌等等独特遗传密码的优秀基因”^①。红色基因以为人民牺牲奉献的铁血意志和血染风采为“本色”，具有鲜明的“红色”特征，又以马克思主义为血脉，扎根于中华民族精神沃土，凝结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灵魂深处，与中国的“红色”象征意蕴、党旗国旗的底色内在地一致。正是其中突出的人民性，规定了红色基因特质的内核元素。早在马克思主义创始之时，原生态的红色基因就内在地蕴含突出人民的现实幸福、探索全人类解放之路、追求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人民性基因密码；中国化马克思主义者不断丰富人民性的红色基因密码，把人民性这一红色基因密码续写进中国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历史浩卷。而新时代党的重要文献关于人民性的论说及其在治国理政中的践履，更是促使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的人民性得以适时顺势地演绎、演进。

（一）“以人民为中心”：人民主体性的尊重与高扬

马克思主义哲学总结吸收人类以往哲学的精华，建立起科学的唯物史观，强调人民群众创造历史，并且把观照人民主体性与关怀民生融入原生态、演进态的红色基因之中，形成了唯物史观的优秀文化血脉，凝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性红色基因密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充分肯定了人民的主体地位。作为马克思主义创始人，马克思、恩格斯对人民主体地位予以反复强调。例如，马克思在《〈黑格尔法哲学批判〉导言》中，就从哲学的高度观照人民主体性，指出：“哲学把无产阶级当做自己的物质武器，同样，无产阶级也把哲学当做自己的精神武器；思想的闪电一旦彻底击中这块素朴的人民园地，德国人就会解放成为人。”^②他还不断地探索实现人民现实幸福的全人类解放之路。中国革命先辈接续、演绎马克思主义的人民性，使人民主体地位得到了不断的彰显。毛泽东曾指出，“单是物质的优势，不能算是真正的优势，而只有人心加物质的总和，只有掌握物质的人们”^③，才能是真正的优势。正是看到了人民群众创造历史的决定性力量，充分发挥了人民的主体性，中国人民战胜一切敌人的信心才能更加坚定，从而夺

① 江峰：《论马克思书信中的红色基因及其中国化演进》，《江汉论坛》2018年第10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7～18页。

③ 《毛泽东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70页。

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全面胜利，建立了新中国。我国是工人阶级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的社会主义国家，国家一切权力属于人民，人民主体地位更是在国家性质中得到了凸显。在新的历史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提出“以人民为中心”，尊重与高扬人民主体性，一方面，从中华民族的发展、中华文明的创造、中华民族精神的培育以及中华民族走向富强的伟大飞跃等不同维度，肯定人民主体性的作用，指出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人民群众是真正的英雄；另一方面，反复论说强调我们党必须始终立足于人民这一根本立场，把为人民谋幸福作为根本使命，坚持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习近平总书记告诫党员干部必须贯彻群众路线，尊重人民的主体地位和首创精神，始终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凝聚起众志成城的磅礴力量，团结带领人民共同创造历史伟业。“这是尊重历史规律的必然选择，是共产党人不忘初心、牢记使命的自觉担当。”^①由此，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的人民性更为突出。

（二）“让全体中国人都过上更好的日子”：宏伟而朴素的为民目标

为人民谋幸福始终是马克思主义者终身的奋斗目标，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也是中国共产党的人民性红色基因生成、演绎和演进的内在要求。马克思从少年时即立志选择为全人类幸福而工作的职业，此后在宗教批判中，又特别突出人民的现实幸福，他指出：“废除作为人民的虚幻幸福的宗教，就是要求人民的现实幸福。要求抛弃关于人民处境的幻觉，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觉的处境。”^②在新时代，中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现在要求着力解决的不再是以前“有没有”的问题，而是“好不好”的问题。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从二〇二〇年到二〇三五年基本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从二〇三五年到本世纪中叶把我国建成富强民主文明和谐美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③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的目标很宏伟，但也很朴素，归根结底就是让全体中国人都过上更好的日子。”^④“很宏伟”是说“让全体中国人都过上更好的日子”这一目标宏大高远。要在十四亿多人口大国实现这一目标，绝非一蹴而就的事情，而是一项伟大的系统工程，需要付出巨大代价；“很朴素”是说“让全体中国人都过上更好的日子”这一目标简单朴实，不是一句空话，而是一句实实在在的话，是要面向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世界，把全人类的解放、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宏伟目标转换为具体实在的奋斗目标，落实到朴素的为民实处。这些关于为民目标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36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页。

③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4页。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34页。

的具体阐释和话语表达，都闪烁着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的人民性特有的朴实无华和辩证智慧。

（三）“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位置”：一如既往的民生关怀

在马克思主义所孕育的红色基因中，有一种纯洁高尚的内生情愫，那就是民生关怀。实质上，正是在民生关怀的问题导向和情感激励下，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的人民性才能够因时顺势地生成、演绎和演进。而丰富这种民生关怀的基因内生情愫，就意味着必须时时刻刻把人民群众装在心里，把人民群众的利益置于首位，真正做到全心全意地为人民谋幸福，努力实现宏伟而朴素的为民奋斗目标。1944年，毛泽东在《坚持为人民服务》的军队讲话中就曾指出：“与人民利益适合的东西，我们要坚持下去，与人民利益矛盾的东西，我们要努力改掉，这样我们就能无敌于天下。”^① 强调每一个指战员、炊事员、饲养员，都是为人民服务的。在新的历史时期，在完成全面建成小康社会、迈向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全新语境下，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告诫干部党员始终要把人民放在心中最高的位置，指出“以百姓心为心，与人民同呼吸、共命运、心连心，是党的初心，也是党的恒心”^②，并重申“把人民拥护不拥护、赞成不赞成、高兴不高兴、答应不答应作为衡量一切工作得失的根本标准”^③。由此促使民生关怀的人民性红色基因一如既往地渗透到一系列人民论说的字里行间，落实到各种具体的治国理政实践活动中。

（四）“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抓住强党兴国的根本

中国共产党是以马克思主义为理论基础的伟大政党，是为了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前赴后继地奋斗的伟大政党。“我们党来自人民、植根人民、服务人民，一旦脱离群众，就会失去生命力。”^④ 毋庸置疑，人民性构成中国共产党“初心”和“使命”的党性内质，其强大的红色基因中蕴含丰富的人民性元素。实质上，人民性也正是中国共产党充满生机活力的根本所在。因此，中国共产党必须坚持立足人民的立场，始终保持为民的纯洁党性。邓小平在强调党必须接受人民群众监督时指出：“只要党和党员不脱离群众，只要党和党员接受监督，只要党和党员虚心学习，只要党和党员不断地进行工作，进行思想政治工作，我们党就一定能同过去领导革命取得胜利一样，顺利地领导国家建设。”^⑤ 围绕“人民”二字，习近平总书记对我们党执政的根本予以了深刻的阐释和显扬。一

①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10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38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42页。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51页。

⑤ 《邓小平文选》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274页。

是进一步明确了我们党执政应为什么人、应靠什么人。“我们党来自于人民，为人民而生，因人民而兴，必须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斗。”^① 二是进一步明确了党性和人民性的辩证关系。他强调：“党性寓于人民性之中，没有脱离人民性的党性，也没有脱离党性的人民性。”^② 三是进一步明确了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是什么。他指出：“人民是我们党执政的最大底气，是我们共和国的坚实根基，是我们强党兴国的根本所在。”^③ 抓住了这个根本，才能确保党永远年轻，确保党的事业不断走向成功。四是进一步明确了我们党除了代表人民利益之外没有自己的特殊利益。“我们永远是劳动人民的普通一员，必须保持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④ 这一系列相关阐述都抓住了强党兴国的根本，不断地强化了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的人民性特质。

（五）“我将无我，不负人民”：凝结在灵魂深处的人民情怀

在为全人类解放和幸福而奋斗的伟大征程中，中国共产党人骨子里都渗透着人民性的红色基因。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人民英勇奋斗，无数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抛头颅、洒热血，以深厚的人民情怀，不断地叙写、演绎、强化红色基因的人民性，坚定崇高的为民信仰，映现出优秀的为民品质，铸造了高尚的为民人格。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人更注重与人民群众息息相通，不辱为民使命。习近平总书记郑重承诺：“我将无我，不负人民。我愿意做到一个‘无我’的状态，为中国的发展奉献自己。”^⑤ 这样高扬“人民”二字的话语，朴实而坚毅，正是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的人民性在新时代的演绎、演进和自然显现，从中可以感受到中国共产党人的宏大格局和非凡气度。可以说，对人民的深厚情怀，已经牢固地凝结在中国共产党人的灵魂深处，闪烁着中国共产党人的人性光辉。

二、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人民性的新时代演绎

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人民性的“演绎”，意指传承、接续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的人民性，重在培根固本，激发这一红色基因的活性，使之能够在各项事业的发展中得到体现，发挥根本性的基因密码效能。从新时代党的一系列重要文献中可以发现，中国共产党人十分重视在当今的社会主义实践中演绎红色基因的人民性。事实上，这些重要文献中所阐扬的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的人民性，在新时代有着极为生动而又具体的实践呈现。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37页。

② 习近平：《论坚持党对一切工作的领导》，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128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37页。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37页。

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44页。

（一）贯通于人民美好生活的谋划之中

在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更加注重谋划人民的美好生活愿景，为人民美好生活规划宏伟目标。民族复兴，国家富强，人民幸福——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的提出，本来就是以人民为出发点和落脚点，为人民谋幸福，把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作为奋斗目标，这也正是对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的根本和精髓的充分彰显。具有伟大梦想精神的中国人民，形成了不断追求美好生活的理念，秉持着天下为公的情怀，拥有勇于追求梦想的执着精神。近代以来，中国人民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梦想，进行了180多年的持续奋斗。“今天，中国人民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更有信心和能力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①新时代，党的一系列重要文献都自然而然地将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的人民性贯通于对人民美好生活的谋划之中。

（二）落实于治国理政的大政方针之中

将对红色基因的人民性叙写、演绎落实到治国理政的大政方针之中，也是中国共产党人一再要求和践行的。“民心是最大的政治。”^②在谈论各项制度和政策的制定及执行、完善党和国家机构职能体系时，中国共产党人特别注重坚守人民立场，例如注重发挥人民政协专门协商机构作用、完善其制度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新的时代条件下，必须增进全国各族人民的大团结，调动所有积极因素，加强思想政治引领，广泛凝聚共识，以推动各项事业继续前进，“广大政协委员要坚持为国履职、为民尽责的情怀，把事业放在心上，把责任扛在肩上，认真履行委员职责”^③。这些都表明其人民论说正是以唯物史观为基础，充分认识到了人民群众是历史的创造者，充分认识到人民群众是决定党和国家前途命运的根本力量，因而是从实际出发对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的人民性传承、接续和演绎。

（三）集纳于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之中

坚持党的领导，强调党要管党，从严治党，通过加强党建将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的人民性元素集纳于党员干部的党性修养之中，也是新时代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基因在实践中得以接续和演绎的重中之重。习近平总书记语重心长地告诫全体党员干部：“我们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追求老百姓的幸福。路很长，我们肩负的责任很重，这方面不能有一劳永逸、可以歇歇脚的思想。唯有坚定不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42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37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98页。

移、坚忍不拔、坚持不懈，才能无愧于时代、不负人民。”^①由此阐明了作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前路漫长，责任重大，因而不可懈怠；作为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党，要无愧于时代、不负人民，努力促使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的人民性元素深深地融入全体党员的党性教育和修养之中。

（四）凝聚于推动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动力之中

中国共产党人探寻全人类的解放和幸福之路，历来都重视人类反贫困的理论建构和实践探索。因而，反贫困实质上是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的人民性生成、演绎和演进的内在逻辑。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人民按照党中央的重大部署和安排，全面打响脱贫攻坚战，取得了决定性胜利，取得了历史性成就。“坚持群众主体，激发内生动力”^②，作为脱贫攻坚的重要成功经验表明，群众动力正是脱贫攻坚的基础。而建设中国式现代化，必须坚持依靠人民群众。只有充分调动人民群众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才能催生建设中国式现代化的巨大内生动力；在新的历史时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是一项伟大而艰巨的事业，前途光明，任重道远。”^③只有激发人民力量，才能顺利实现这一宏伟目标。这些都将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的人民性元素凝聚到了推动和拓展中国式现代化的内生动力之中。

（五）渗透于国计民生的具体事项之中

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的人民性总需要透过国计民生的具体事项展现出来。细节决定成败，尊重人民，热爱人民，忠于人民，一切为了人民，一切依靠人民，这些往往要从国计民生的诸多细节中得到验证。为此，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党员、干部初心变没变、使命记得牢不牢，要由群众来评价、由实践来检验。”^④民生无小事，“要抓住人民最关心最直接最现实的利益问题，把人民群众的小事当作我们的大事，从人民群众关心的事情做起，从让人民满意的事情抓起”^⑤，正是把人民放在心中的最高位置，习近平总书记时时关心困难群众，要求高度重视困难群众的帮扶救助工作；特别关注就业问题，要求加强全方位就业服务；十分重视社会保障，要求加快建成多层次社会保障体系；要求从不同层次加强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尤其是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他踏遍祖国大地，了解人民疾苦，倾听人民呼声，把对人民的大爱写进祖国的山山水水，“让全体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36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52页。

③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6页。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37页。

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35页。

中国人民和中华儿女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共享幸福和荣光!”^①

三、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人民性的新境界演进

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人民性的“演进”意指强化、推衍这一红色基因，在对之培根固本基础上，适时顺势地增添其基因活性，使之适应新的政治生态环境并得到不断进化，更好地发挥其根本性的基因密码效能。从党的一系列重要文献和新时代十年实践中，可以发现，在新的历史语境下，中国共产党人十分重视与时俱进地强化、积聚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的人民性，使其不断演进，进入一个新境界。

（一）基于“两个大局”的适应性强化

由于注重吸纳新的时代元素，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的人民性更具活性。“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进，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深入发展，国际力量对比深刻调整，我国发展面临新的战略机遇。”^② 面对“两个大局”，我们必须坚持胸怀天下。“中国共产党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党，也是为人类谋进步、为世界谋大同的党。”^③ 在“两个大局”下，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的人民性对新时代新要求的适应性已得到不断强化。例如，为了应对波谲云诡的国际形势、复杂敏感的周边环境、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稳定任务，我们坚持底线思维，着力防范化解重大风险，提出“下大气力解决好人民群众切身利益问题”，“不断增加人民群众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④。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的人民性还将进一步得到适应性强化。例如，我们党还要以更为宽广的视野、宏大的气度，扩展为人民服务的境域，不断拓展深察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世界眼光，以问题为导向，不仅注重“我们要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所想、所盼、所急”^⑤，为中国人民谋福祉，而且积极回应各国人民的普遍关切，为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提供中国智慧，作出中国贡献，由此促使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的人民性在新的历史语境下进一步得到发展演进。

（二）基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的续写

在党的一系列重要文献的人民性论说中，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的人民性也将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142页。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6页。

③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21页。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21页。

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59～360页。

基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奋斗目标得到不断的续写。“从十九大到二十大，是‘两个一百年’奋斗目标的历史交汇期。我们既要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又要乘势而上开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向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进军。”^①党的二十大报告基于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鲜明地彰显了“人民”二字。它指出：“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是当代中国共产党人的庄严历史责任。”^②而开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境界，必须坚持人民至上。要求站稳人民立场不动摇，聆听人民的呼声以把握人民的愿望，尊重人民创造、集中人民智慧而辟其理论创新的不竭源泉，“形成为人民所喜爱、所认同、所拥有的理论，使之成为指导人民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③。由此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的人民性厚植于马克思主义理论创新之中并得到不断续写，成为指导人民认识世界、改造世界的强大思想武器。

（三）基于“两个共同体”的新境界拓展

在新的历史时期，中国共产党特别重视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各族人民亲如一家，是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必定要实现的根本保证。”^④他突出“人民”二字，要求“我们要全面贯彻党的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坚持共同团结奋斗、共同繁荣发展”^⑤，从构建中华民族共同体这个层域，实现了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人民性的新境界拓展。面对日益复杂的国际国内环境，习近平总书记倡导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并对其内蕴进行了阐释，正是着眼于更为宽广的“人民”境域，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与人类命运共同体之间，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的人民性合乎逻辑地实现了境域的融合和境界的提升。一方面，“两个共同体”都蕴含着中国共产党人具有人民性的独特红色基因密码，都将人民置于至高无上的地位，其人民性的政治价值取向高度一致，人民性的境域相互融通；另一方面，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的人民性在中华民族共同体中得到了生成性的续写和基础性的夯实，其存在境域和价值效应又在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得到衍扩与放大，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更高的境域，拓展了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人民性的新境界。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2页。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8页。

③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9页。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99页。

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99页。

四、结语

在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下，追溯中国共产党诞生、发展的历程，可以发现，以“人民”为轴心，有一条人民性的红色基因生成、接续、叙写、演绎和演进的历史逻辑主线贯穿其中。感悟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的人民性，即可明确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的人民性决定着中国共产党的为民本色；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的人民性充满生机活力，在新时代叙写演绎、多维演进，不断臻于新境界，其新时代演绎为新境界演进提供了坚实的人民性基础，新境界演进为新时代演绎拓展了更为丰富的内容、更为宽广的人民性境域。保持、维护和世代传承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的人民性，是培根固本的基因工程。这一基因工程，事关中国共产党永葆青春、人民江山永不变色。因而，就此而言，需要时刻清晰突出三条线，即道德线、警示线、标高线。道德线是指每一个党员都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自觉涵养和守正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的人民性，使之渗透于灵魂深处，构成自我道德品质的内核，闪耀党性人格的光辉；警示线是指每一个党员都要时时反省自己是否保持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的人民性，并以此警示自我，绝不能越过党员底线；标高线是指每一个党员都要保持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的人民性，确立以人民为中心、为人民美好生活而奋斗终生的价值目标，以高标准严格要求自己，形成可对标发挥党员先锋模范作用的行为准线。由于中国共产党红色基因的人民性是适应实践的发展不断演进的，因而对它的理解和把握仍需要放大世界眼光、深化认识层次、拓展认知视界，对它存在的本体形态，也还有待于从核心元素汇聚、价值体系完善、现代数字赋能、话语系统优化等多个维度、多个层面予以与时俱进的深入探究和反思。

Study on People's Natur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Red Gene

Jiang Feng Zhu Menglu

Abstract: The people's nature of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s red gene has been concretely and vividly interpreted in the new era. The respect and exaltation of the people's subjectivity, the comprehensive manifestation of the goal of serving the people, the manifestation of people's livelihood concerns as always, the firm grasp of the people's fundamentals, and the reflection of the people's sentiments all fully highlight the

people's nature of this gene. As a matter of fact, the people's nature of CPC's red gene has been incorporated into the planning of a better life for the people,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general policy of governance, the cultivation of Party members and cadres, the internal impetus to promote and expand Chinese-style modernization, and the permeation of specific matters relating to national development and people's livelihood, and has been interpreted in a new era. Under the "overall situation", on the new journey of comprehensively building a socialist modern state, and in the construction of the "Two Communities", the people's nature of CPC's red gene has been continuously strengthened, renewed and expanded, and a new realm of evolution has been achieved. The new era's interpretation provides a solid foundation for the new era's evolution, which expands the richer content and wider realm of people's identity for the new era's interpretation.

Key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People's Nature; Red Gene

[责任编辑: 于少青]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基本特征

石 然 朱梦竹*

【摘 要】爱国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主旋律，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无不体现出最深沉、最持久、最坚定的爱国主义。团结奋斗是中国共产党精神谱系的永恒课题。团结奋斗铸就了团结的中国共产党，凝聚起改造世界、振兴中华的强大的力量。人民性、时代性、国际性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演进的走向，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发展中不断增强。

【关键词】精神谱系；爱国主义；团结奋斗；逻辑演进

中国共产党人在一百多年来的接续奋斗中铸就了数不胜数的伟大精神，仅在第一批纳入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伟大精神就有 46 种之多。中国共产党人的精神谱系以爱国主义为主旋律，以团结奋斗为永恒课题，以人民性、时代性、国际性为演进走向，有自身的内在逻辑和演进规律。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深远地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进程。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还将书写精神谱系新篇章。

一、爱国主义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主旋律

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是中国共产党人的初心和使命，这个初心使命，是中国共产党永久奋斗的不竭动力。中国共产党各个时期的一切决策和行动，都是为了实践这个初心使命。五四爱国运动彰显了具有共产主义思想的知识分子想要改变国家命运的强烈愿望，也彰显了工人阶级在爱国主义运动中的伟大力量。恩格斯指出：“一般说来，所有的工业工人都被卷入了反对资本和资

* 石然，法学博士，杭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朱梦竹，杭州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产阶级的各种斗争；他们一致认为，他们是‘工人’……他们构成了同一切有产阶级相对立的、有自己的利益和原则、有自己的世界观的独立的阶级，在他们身上蕴蓄着民族的力量和推进民族发展的才能。”^① 践行初心、担当使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对国家深沉的热爱，正是这强烈的爱国主义精神使中国共产党应运而生，伟大建党精神也由此升腾。一百多年来，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中国人民进行的一切奋斗、一切牺牲、一切创造，归结起来就是一个主题：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伟大的事业铸就伟大的精神，伟大的精神推进伟大的事业。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征程中，中国共产党人的爱国主义精神必然延续不息。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闯出了中国人民求得解放的正确道路，铸就了井冈山精神；中国共产党创建了工农民主专政的红色政权，劳动群众在中国共产党创建的根据地第一次当家作主，党在根据地时期一心为改善人民生活艰苦工作，铸就了苏区精神；中国共产党把全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根本利益看得高于一切，为了救国救民，不怕任何艰难险阻，不惜付出一切牺牲，同人民群众同生死、共患难，奇迹般地进行了二万五千里长征，铸就了长征精神；中国共产党坚定毕生为革命事业奋斗的信念，独立自主地运用马克思主义解决中国实际问题，闯出一条救国救民的道路，在探索中国革命道路中从幼稚走向成熟中铸就了遵义会议精神；在陕甘宁边区，中国共产党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对人民无限挚爱，铸就了延安精神；中国共产党在攸关民族生死存亡的抗日战争中作为中流砥柱，始终视死如归、宁死不屈、不畏强暴、血战到底，铸就了抗战精神；在重庆工作的中国共产党人为创建新中国英勇抗争甚至视死如归，铸就了红岩精神；解放战争即将胜利时中国共产党人为新中国的创立和发展谦虚谨慎、艰苦奋斗，铸就了西柏坡精神；刘志丹、谢子长、习仲勋等陕西共产党人在创建西北革命根据地过程中为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不怕牺牲、顽强拼搏，铸就了照金精神；东北抗联战士为抗击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英勇顽强、不怕牺牲，表现出高尚的爱国情操，铸就了东北抗联精神；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南泥湾为坚持抗战自力更生、艰苦奋斗，改善群众生活，铸就了南泥湾精神；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在太行边区不怕牺牲、不畏艰险，抗击侵略者，为边区人民无私奉献，铸就了太行精神；中国共产党人在大别山斗争极其困难的情况下，为人民解放勇当先锋，铸就了大别山精神。这无一不是对爱国主义的深刻诠释。此外，沂蒙精神、老区精神、张思德精神，也无不彰显了中国中国共产党人对人民的赤子之心般的挚爱。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些精神史诗，是为改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历史命运二十八年浴血奋战的精神动力，无不体现出中国共产党人最深沉、最持久、最坚强的爱国主义。正如李大钊所说：“在共产主义宣传的影响下，中国无产阶级开始懂得了谁是他们受苦受难的罪魁，谁是他们的敌人；它开始意识到自己在中国民族革命和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475页。

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中的责任；它懂得了中国的民族革命必须取得有利于世界革命的胜利。中国无产阶级还懂得为了取得中国民族革命的胜利，工人们应当紧密地组织起来，并且成为革命的中心。”^①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建立了社会主义基本制度，投入热火朝天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在抗美援朝战争中，中国人民志愿军为了祖国和民族的尊严奋不顾身，为完成祖国和人民赋予的使命慷慨奉献自己一切，打败了武装到牙齿的美帝国主义，铸就了抗美援朝精神；在国外已经取得杰出成就的科学家，怀着对新中国的无限热爱，响应党和国家召唤，义无反顾地投入“两弹一星”研制工作，同广大干部、工人、解放军指战员一起无私奉献、艰苦奋斗，铸就了“两弹一星”精神；雷锋怀着对党、祖国、人民的满腔热爱，把有限的生命投入到无限的为人民服务中，铸就了雷锋精神；党的县委书记焦裕禄牢记党的初心使命，在极为艰苦的条件下竭尽全力为人民群众作贡献，铸就了焦裕禄精神；以王进喜为代表的石油工人怀着“为祖国献石油”的信念艰苦创业、无私奉献，付出了极大的个人牺牲，铸就了大庆精神；中国共产党人为了改变人民群众艰难困苦的生活状况，带领人民修筑全长 1500 公里、参与修建人数近 10 万人、耗时近 10 年的红旗渠，带领人民用汗水、鲜血和生命把“北大荒”变成了“北大仓”，带领人民克服重重困难改变了塞罕坝沙漠荒原，铸就了大庆精神、红旗渠精神、塞罕坝精神；11 万人的筑路大军在“人类生命禁区”修筑“两路”，结束了“世界屋脊”没有公路的历史，为中华民族团结和祖国边疆发展作出巨大贡献，铸就了“两路”精神；以中国人民解放军十八军为主力的军民为解放西藏百万农奴、开荒生产、民主改革和自卫反击作出巨大贡献，铸就了老西藏精神；上海交通大学师生为了新中国大规模工业建设需要，舍弃优越的生活条件，搬迁到西安艰苦创业，铸就了西迁精神；王杰牢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宗旨，以“一不怕苦，二不怕死”的精神担当起社会主义建设重任，不惜自我牺牲，铸就了王杰精神。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些精神史诗，有的体现了保卫祖国江山的壮怀激烈，有的体现了建设祖国家园的勤恳奋斗，有的体现了热爱祖国人民的赤胆忠心，而其精神内核都是爱国主义。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为了给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开启了改革开放伟大征程，铸就了改革开放精神和特区精神；为了保证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抗击百年不遇的洪涝灾害，抗击突如其来的“非典”疫情，抗击极为惨重的地震灾害，确保山河无恙、人民康宁，铸就了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抗震救灾精神；中国航天人特别能吃苦、特别能战斗、特别能攻关、特别能奉献，取得了让全世界中华儿女倍感骄傲和自豪的一系列重大

^① 《李大钊全集》第 5 卷，人民出版社 2013 年版，第 41～42 页。

成就，铸就了载人航天精神；劳动模范爱岗敬业，为人民群众默默奉献，铸就了劳模精神；青藏铁路的建设者挑战极限、勇创一流，为祖国的雪域高原实现现代化发展和中华民族共同体紧密团结作出重大贡献，铸就了青藏铁路精神；中国女排胸怀祖国至上的信念顽强拼搏、永不言败，为祖国挣得了无数荣誉，铸就了女排精神。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些精神史诗，是爱国主义在新时期的彰显，正是在这些精神史诗，使中国的综合国力、中国人民的精神面貌焕然一新。

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伟大成就，以更为强大的精神力量使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呈现出不可逆转的趋势。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赢得了脱贫攻坚战的伟大胜利，中华民族完全摆脱了绝对贫困，铸就了脱贫攻坚精神；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救国同心抗击疫情，舍生忘死确保十四亿多人民生命安全，铸就了抗疫精神；中国共产党领导干部以“三牛”精神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中国科学家群体为祖国强大人民幸福勇攀高峰、甘为人梯，铸就了科学家精神；中国企业家以爱国情怀承担国家使命、社会责任，铸就了企业家精神；“嫦娥”号系列任务的圆满成功实现了中国人梦寐以求的探月梦想，铸就了探月精神；北斗中国航天人以祖国利益高于一切的使命担当，汇聚中国智慧研发北斗导航系统，铸就了北斗精神；中国人民在实现自身发展的同时，坚持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作贡献，中国的国际地位前所未有地提高，铸就了丝路精神。中国共产党人的这些精神史诗，推进了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中华民族以更加昂扬的姿态走近世界舞台中央。这些精神史诗无一不是爱国主义在新时代的升腾。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历史赋予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伟大而艰巨的使命，时代召唤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谱写壮丽而崭新的篇章。我国工人阶级和广大劳动群众一定要以国家主人翁姿态，积极投身经济社会发展的火热实践，为共同创造我们的幸福生活和美好未来作出新的贡献。”^①

二、团结奋斗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永恒课题

中国共产党人并非为自己谋求政治利益的“政客”，中国共产党也并非为某些特定阶层谋求政治权力的政治集团。共产党人的使命，是通过革命使劳动人民掌握国家政权，进而建设劳动人民当家做主的社会主义社会，为实现共产主义不断创造条件。无产阶级和人类的解放不可能自发实现，只有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人民不懈奋斗才能实现。而正是在深重的压迫和剥削下，无产阶级被锻造成具有彻底革命性的阶级，能够为自己和人类改变命运进行艰苦卓绝的斗争。近代以来，在顽固而又强大的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的反动统治下，中国人民

^① 习近平：《在庆祝“五一”国际劳动节暨表彰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3页。

和中华民族生活在水深火热中。要改变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的悲惨命运，实现国家富强、民族振兴、人民幸福，只能长期坚持艰苦卓绝的伟大斗争。中华民族自古以来就是有着伟大斗争精神的民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自古就明白，世界上没有坐享其成的好事，要幸福就要奋斗。”^①近代以来，先进的中国人为改变中华民族命运而进行的斗争从来没有停止过。中国人民面对前所未有的苦难从未屈服，而是进行了一场场百折不挠、气壮山河的斗争，谱写了壮丽史诗。但是，不触动封建根基的自强主义、改良主义、旧式农民战争、资产阶级革命派的种种方案都没有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中国人民仍然生活在苦难悲惨之中。历史的重任就这样交给了中国工人阶级及其政党——中国共产党。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之日起就确立以实现社会主义、共产主义奋斗目标，义无反顾地肩负起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重任。实现中国共产党的最高理想和最终目标需要几代、十几代甚至几十代人的接续奋斗；中国共产党每个阶段的具体任务也异常艰巨，只有经过艰苦卓绝的奋斗能完成。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极其凶残的敌人，它们严重阻碍中国社会进步，给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带来了深重的灾难。推翻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这“三座大山”绝非短时间内可以完成，需要极为艰苦、浴血奋战的长时间革命斗争。当然，也正是这三重压迫，使中国无产阶级被锻造成具有坚定革命性的阶级，也正是中国无产阶级的优秀品质确保了它能够领导中国革命取得最终胜利。正如毛泽东指出：“中国无产阶级身受三种压迫（帝国主义的压迫、资产阶级的压迫、封建势力的压迫），而这些压迫的严重性和残酷性，是世界各民族中少见的；因此，他们在革命斗争中，比任何别的阶级来得坚决和彻底。在殖民地半殖民地的中国，没有欧洲那样的社会改良主义的经济基础，所以除极少数的工贼之外，整个阶级都是最革命的。”^②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者在艰巨卓绝的斗争中成立了中国共产党，造就了开天辟地的大事件，又在28年的浴血奋战中完成了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共产党人在北伐战争中就担当排头兵，经过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才取得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胜利，实现了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的奋斗不可能一帆风顺，而是必然要经过艰难困苦甚至暂时的失败。毛泽东指出：“斗争，失败，再斗争，再失败，再斗争，直至胜利——这就是人民的逻辑，他们也是决不会违背这个逻辑的。这是马克思主义的又一条定律。俄国人民的革命曾经是依照了这条定律，中国人民的革命也是依照这条定律。”^③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形成的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

① 习近平：《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44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87页。

议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红岩精神、西柏坡精神、照金精神、东北抗联精神、南泥湾精神、太行精神、大别山精神、沂蒙精神、老区精神、张思德精神，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的精神。

中国革命胜利前夕，毛泽东同志告诫全党：“夺取全国胜利，这只是万里长征走完了第一步。如果这一步也值得骄傲，那是比较渺小的，更值得骄傲的还在后头。在过了几十年之后来看中国人民民主革命的胜利，就会使人们感觉那好像只是一出长剧的一个短小的序幕。剧是必须从序幕开始的，但序幕还不是高潮。中国的革命是伟大的，但革命以后的路程更长，工作更伟大，更艰苦。这一点现在就必须向党内讲明白，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谦虚、谨慎、不骄、不躁的作风，务必使同志们继续地保持艰苦奋斗的作风。”^①中国共产党人清醒地认识到，中国革命虽然胜利了，但要想在“一穷二白”的基础上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依然任重道远，必须勤恳建设锦绣河山，长期继续艰苦奋斗。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中国共产党人铸就了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大庆精神、红旗渠精神、北大荒精神、塞罕坝精神、“两路”精神、老西藏精神、西迁精神、王杰精神。这些精神既包括英雄集体，又包括英雄个人，涵盖了工业、农业、科学、教育、国防各个领域，无不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艰苦奋斗的精神。艰苦奋斗是我们党“建党几十年来最好时期的传统”^②，也是新的历史条件下必须坚持的伟大精神。邓小平指出：“中国搞四个现代化，要老老实实地艰苦创业。我们穷，底子薄，教育、科学、文化都落后，这就决定了我们还要有一个艰苦奋斗的过程。”^③艰苦创业作为实现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基本立足点，写入了党在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的基本路线。改革开放精神、特区精神正是在艰苦奋斗条件下形成的；载人航天精神、劳模精神、青藏铁路精神、女排精神体现了新时期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群众在各行各业中建设国家的伟大奋斗；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抗震救灾精神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带领人民对重大自然灾害和公共卫生事件的艰苦斗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尽管我们比历史上任何时期都更接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但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并不是敲锣打鼓、轻轻松松就能实现的，同样需要艰苦卓绝的奋斗。2016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指出：“实现伟大的理想，没有平坦的大道可走。夺取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新进展，夺取推进党的建设新的伟大工程新成效，夺取具有许多新的历史特点的伟大斗争新胜利，我们还有许多‘雪山’、‘草地’需要跨越，还有许多‘娄山关’、‘腊子口’需要征服，一切贪图安逸、不愿继续艰苦奋斗的想法都是要不得的，一切骄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38～1439页。

②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9页。

③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257页。

傲自满、不愿继续开拓前进的想法都是要不得的。”^① 2019年5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进一步指出：“今天，我们的生活条件好了，但奋斗精神一点都不能少，中国青年永久奋斗的好传统一点都不能丢。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新征程上，必然会有艰巨繁重的任务，必然会有艰难险阻甚至惊涛骇浪，特别需要我们发扬艰苦奋斗精神。”^② 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在艰苦奋斗经历了摆脱贫困、抗击疫情这些伟大斗争，“三牛”精神、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探月精神、北斗精神、丝路精神正是干部群众在新时代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奋斗中凝聚而成的宝贵精神财富。事实雄辩地证明，“社会主义是干出来的”，“新时代是干出来的”，“幸福是奋斗出来的”！

工人阶级的奋斗并非个人的单打独斗，也并非简单的个人“自我实现”。团结奋斗是工人阶级的存在方式，团结是工人阶级与其他阶级奋斗方式的显著区别。工人阶级的团结精神是由他们的生产生活方式决定的。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工人有时也得到胜利，但这种胜利只是暂时的。他们斗争的真正成果并不是直接取得的成功，而是工人的越来越扩大的联合。这种联合由于大工业所造成的日益发达的交通工具而得到发展，这种交通工具把各地的工人彼此联系起来。”^③ 近代中国工人阶级由于分布集中，更具团结精神。不仅如此，中华民族也具有伟大团结精神的光荣传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人民从亲身经历中深刻认识到，团结就是力量，团结才能前进，一个四分五裂的国家不可能发展进步。”^④ 中国共产党人继承了中华民族伟大团结精神的优良传统，发扬了工人积极的团结奋斗精神，不仅铸就了团结的中国共产党、团结的工人阶级，而且还团结起亿万中国人民，最终凝聚起改造世界、振兴中华的强大的力量。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民主团结的遵义会议精神使中国共产党形成了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一代领导集体，中国革命的胜利获得了根本保证。依靠群众求胜利的井冈山精神，一心为民的苏区精神，紧紧依靠人民群众、同人民群众生死相依的长征精神，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延安精神、张思德精神，全民族抵抗日寇的抗战精神，与人民群众生死相依的老区精神，依靠群众、团结统一的西柏坡精神，都是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奋斗的体现。统一战线是新民主主义革命的重要法宝，团结一切可以团结的力量是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的宝贵经验。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抗美援朝精神、“两弹一星”精神、大庆精神、红旗渠精神、北大荒精神、塞罕坝精神、老西藏精神无不彰显了团结协作的伟大力量；“两路”精神彰显了军民团结、民族团结的崇高精神品质。改革开放的历史，就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和团结全国各族人民奋斗的历史。邓小平指出：“我认

① 习近平：《在纪念红军长征胜利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1页。

② 习近平：《在纪念五四运动10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9年版，第9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09页。

④ 习近平：《在第十三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5页。

为,最重要的是人的团结,要团结就要有共同的理想和坚定的信念。我们过去几十年艰苦奋斗,就是靠用坚定的信念把人民团结起来,为人民自己的利益而奋斗。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凝聚力。没有这样的信念,就没有一切。我们共产党人的最高理想是实现共产主义,在不同历史阶段又有代表那个阶段最广大人民利益的奋斗纲领。因此我们才能够团结和动员最广大的人民群众,叫做万众一心。”^①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靠理想和纪律让全国人民团结起来十分重要,否则党和国家事业就不能获得保证。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抗震救灾精神无不彰显了万众一心、众志成城的强大力量;载人航天精神、青藏铁路精神、女排精神无不彰显了团结协作的崇高精神。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中国共产党先后形成了以邓小平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二代领导集体、以江泽民同志为核心的党的第三代领导集体和以胡锦涛为总书记的党中央,团结和谐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和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不断前进。

三、人民性、时代性、国际性是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演进走向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演进历程,是人民性不断增强的进程。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演进历程,充分体现了党和人民群众不断融为一体的发展趋势。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人民性,体现为一切奋斗为了人民、一切奋斗依靠人民、一切奋斗服务人民、一切奋斗彰显人民的主体性。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人民性,是马克思主义指导思想的要求。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是人民的理论,第一次创立了人民实现自身解放的思想体系。马克思主义博大精深,归根到底就是一句话,为人类求解放。在马克思之前,社会上占统治地位的理论都是为统治阶级服务的。马克思主义第一次站在人民的立场探求人类自由解放的道路,以科学的理论为最终建立一个没有压迫、没有剥削、人人平等、人人自由的理想社会指明了方向。”^②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人民性,也是无产阶级阶级属性的必然彰显。无产阶级除了全人类的利益没有本阶级特殊的利益,无产阶级只有解放全人类才能解放自己。这一切充分表明:“人民,只有人民,才是创造世界历史的动力。”^③

新民主主义时期,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人民性主要体现为为人民群众奋斗、依靠人民群众奋斗、为人民群众服务。在新民主主义革命各个时期,中国共产党人为人民群众求解放而奋斗。井冈山精神、苏区精神、长征精神、遵义会议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红岩精神、西柏坡精神等就是中国共产党在土地革

① 《邓小平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90页。

② 习近平:《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31页。

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时期为人民群众求解放而铸就的伟大精神。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还充分发挥群众路线这一最大政治优势，把人民群众组织起来推进革命胜利。列宁指出：“把千百万劳动群众组织起来，这是革命最有利的条件，这是革命取得胜利的最深的泉源。”^①井冈山精神、长征精神、延安精神、抗战精神、西柏坡精神就是依靠群众求胜利的精神典范。正是如此，中国共产党人的革命行动，已经不仅仅是本党、本阶级的革命行动，而是以劳动群众为主体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革命行动。在军队人数、武器装备等方面，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力量远不如日本帝国主义和国民党顽固派，但中国共产党赢得了亿万群众的支持。越来越多的人民群众组织起来支持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武装斗争，也正是如此，反动派陷入了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的革命必然胜利。正如列宁所说：“没有千百万觉悟群众的革命行动，没有群众汹涌澎湃的英勇气概……是不可能消灭专制制度的。”^②中国共产党局部执政的各个时期，共产党员践行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宗旨，完全彻底地为人民利益工作。苏区精神、延安精神、张思德精神都是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诠释。毛泽东指出：“真正的铜墙铁壁是什么？是群众，是千百万真心实意地拥护革命的群众。这是真正的铜墙铁壁，什么力量也打不破的，完全打不破的。”^③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特别是在党局部执政的时期和地域，中国共产党同人民群众水乳交融、生死相依、命运与共，已经在精神谱系中获得了充分体现。列宁指出：“无产阶级政党的义不容辞的责任就是和群众在一起。”^④南泥湾精神就是党和人民群众一起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写照。太行精神、沂蒙精神、老区精神都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武装力量与人民群众鱼水情深。正如毛泽东所说：“我们共产党人好比种子，人民好比土地。我们到了一个地方，就要同那里的人民结合起来，在人民中间生根、开花。”^⑤

新中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人民成为国家的主人，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人民性主要体现为共产党员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和人民群众以主人翁姿态建设社会主义。毛泽东指出：“我们一切工作干部，不论职位高低，都是人民的勤务员，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是为人民服务。”^⑥焦裕禄和雷锋是共产党领导干部和普通共产党员为人民服务的精神楷模，焦裕禄精神和雷锋精神久经传承、永不过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要做焦裕禄式的干部，也要让雷锋精神世代传扬。习近平总书记自己就是始终身体力行焦裕禄精神的领导干

①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709页。

② 《列宁全集》第17卷，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151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39页。

④ 《列宁全集》第32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28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162页。

⑥ 《毛泽东文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243页。

部。他指出：“我当知青、上大学、参军入伍、当干部，我心中一直有焦裕禄同志的形象，见贤思齐，总是把他当作榜样对照自己。焦裕禄同志始终是我的榜样。”^① 不仅如此，他还强调每一名党员要向雷锋学习，不仅要学习雷锋精神，而且要学习雷锋的做法：“雷锋是时代的楷模，雷锋精神是永恒的。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更多时代楷模。我们既要学习雷锋的精神，也要学习雷锋的做法，把崇高理想信念和道德品质追求转化为具体行动，体现在平凡的工作生活中，作出自己应有的贡献，把雷锋精神代代传承下去。”^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脱贫攻坚精神、“三牛”精神，都体现了甘愿为人民服务的共产党员的精神本色。

人民群众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下以主人翁姿态建设社会主义的精神，是新中国成立和社会主义制度建立后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主要内容。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历史活动是群众的活动，随着历史活动的深入，必将是群众队伍的扩大。”^③ 在社会主义社会，人民群众成为主人翁，以前所未有的积极性、主动性、创造性投入到建设中。正如列宁所说：“社会主义不是少数人，不是一个党所能实施的。只有千百万人学会亲自做这件事的时候，他们才能实施社会主义。”^④ 在列宁看来，生机勃勃的创造性的社会主义是人民群众自己创立的。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两弹一星”精神、大庆精神、红旗渠精神、北大荒精神、塞罕坝精神、西迁精神，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建设新时期的抗洪精神、抗击“非典”精神、抗震救灾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劳模精神、青藏铁路精神、女排精神，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抗疫精神、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探月精神、北斗精神等，都体现了各行各业人民群众建设社会主义的伟大精神力量。当然，没有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和组织，没有中国共产党员发挥先锋模范和中流砥柱作用，人民群众的精神力量也不可能得到展现。列宁指出：“不吸引更多的人民阶层参加社会建设，不激发一直沉睡的广大群众的积极性，就谈不上什么革命的改革。”^⑤ 改革开放精神、特区精神、企业家精神，正是各阶层人民群众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精神表征，也体现了中国共产党忠实代表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我们深深知道，每个人的力量是有限的，但只要我们万众一心、众志成城，就没有克服不了的困难；每个人的工作时间是有限的，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是无限的。责任重于泰山，事业任重道远。我们一定要始终与人民心心相印、与人民同甘共苦、与人民团结奋

① 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29页。

② 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3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87页。

④ 《列宁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64页。

⑤ 《列宁全集》第34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41～142页。

斗，夙夜在公，勤勉工作，努力向历史、向人民交出一份合格的答卷。”^①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演进充分证明，人民是中国共产党的根基、血脉和力量。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早已融为一体，任何想把中国共产党同中国人民分割开来、对立起来的企图，都是绝不会得逞的。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演进历程，是不断彰显时代性的历史进程。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一个时代有一个时代的主题，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②中国共产党的精神谱系之所以能够世代传承，是因为中国共产党能够运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解读时代、引领时代，不断解答时代课题，不断完成时代使命。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战争与革命是时代主题，党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官僚资本主义，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创造根本社会条件。中国共产党人义无反顾地投入革命战争，在28年的浴血奋战中，可以查到姓名的牺牲的革命者有380多万。也就是说，在这期间，平均每天有370名革命者牺牲。毛泽东指出：“中国人民正在受难，我们有责任解救他们，我们要努力奋斗。要奋斗就会有牺牲，死人的事是经常发生的。但是我们想到人民的利益，想到大多数人民的痛苦，我们为人民而死，就是死得其所。”^③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铸就的长征精神、抗战精神、红岩精神、照金精神、东北抗联精神、太行精神、老区精神等，都体现了中国共产党人为了人民不惜牺牲一切的伟大精神。正是因为中国共产党具有这样的精神，中国革命才能取得胜利。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面对两极格局的严峻国际形势，中国共产党承担起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推进社会主义建设的艰巨任务，自力更生、艰苦奋斗。这一时期的“两弹一星”精神、焦裕禄精神、大庆精神、红旗渠精神、北大荒精神、塞罕坝精神、“两路”精神、老西藏精神、西迁精神、王杰精神，无一不是艰苦奋斗精神的体现。其中，“两弹一星”精神、大庆精神、红旗渠精神等还充分彰显了自力更生精神。没有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的艰苦奋斗、自力更生，中国共产党就无法取得独创性理论成果和巨大成就，也就无法为新时期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提供宝贵经验、理论准备、物质基础。

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和平与发展成为时代主题，中国共产党面临着解放和发展社会生产力，使人民摆脱贫困、尽快富裕起来的历史任务。邓小平指出：“在党内和人民群众中，肯动脑筋、肯想问题的人愈多，对我们的事业就愈有利。干革命、搞建设，都要有一批勇于思考、勇于探索、勇于创新的闯将。没有这样一大批闯将，我们就无法摆脱贫穷落后的状况，就无法赶上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5页。

^②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233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05页。

更谈不到超过国际先进水平。”^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改革创新成为时代精神,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成为新时代最显著的标志。改革开放精神、特区精神、载人航天精神、劳模精神、青藏铁路精神中,包含着科技创新、体制创新、理论创新、文化创新等诸多方面,这都是创新精神的集中体现。江泽民指出:“创新是一个民族进步的灵魂,是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不竭动力,也是一个政党永葆生机的源泉。”^②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的发展表明,中国共产党是与时俱进、开拓创新的政党。正是中国共产党人与时俱进的创新精神,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了充满新的活力的体制保证和快速发展的物质条件。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世界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入关键时期。中国共产党面临着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这一历史任务。中国梦是新时代最重要的精神标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梦归根到底是人民的梦,必须紧紧依靠人民来实现,必须不断为人民造福。”^③脱贫攻坚精神就是中国共产党在新时代为人民造福的重大创举。中国梦不仅是国家的梦、民族的梦,而且是每个中国人的梦。他强调:“我们每个人都为实现自己梦想的努力就拥有广阔的空间。生活在我们伟大祖国和伟大时代的中国人民,共同享有人生出彩的机会,共同享有梦想成真的机会,共同享有同祖国和时代一起成长与进步的机会。”^④科学家精神、企业家精神、探月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既有宏大叙事,又有微小叙事,无不体现出新时代各行各业中国人对梦想的执着追求,无不体现出每一个中国人在追求自我实现的同时为国家富强、民族振兴做贡献,无不体现出新时代国家梦、民族梦、个人梦的有机统一。对此,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处在这样一个伟大时代,我们倍感自信自豪,同时也深感责任重大。我们要拿出勇气、拿出干劲,在一代一代中国共产党人团结带领人民创造的历史伟业的基础上,创造出无愧于时代的业绩,大踏步走向充满希望的未来。”^⑤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演进历程,同时也是国际性不断增强的历史进程。马克思主义政党的最高理想和国际主义精神决定了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具有国际性特质。中国共产党领导人民取得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实现国家富强和人民共同富裕,本身就是中国共产党为世界作出的贡献。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愈发展,其中的国际性蕴含愈明显。

① 《邓小平文选》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43页。

② 《江泽民文选》第3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486页。

③ 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5页。

④ 习近平:《在第十二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一次会议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4~5页。

⑤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中央“不忘初心、牢记使命”主题教育领导小组办公室编:《习近平关于“不忘初心、牢记使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9年版,第235页。

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在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主要内容中，国际性并不是直接显现出来的。但是，在这些精神的推动下，中国共产党人改变了占世界四分之一人口的人民的悲惨命运，便不能不具有国际意义。特别突出的是，中国人民的抗日战争是世界人民反法西斯战争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共产党人在抗日战争中发挥了中流砥柱作用。毛泽东在评价抗日战争时期的中国共产党人的爱国主义时就指出：“中国共产党人必须将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结合起来。我们是国际主义者，我们又是爱国主义者，我们的口号是为保卫祖国反对侵略者而战。”“中国胜利了，侵略中国的帝国主义者被打倒了，同时也就是帮助了外国的人民。”^① 不仅如此，中国共产党人还支持了西班牙人民的反法西斯战争，在参加国际纵队志愿军中，有 100 多名中国人，其中多半是共产党员。周恩来、朱德和彭德怀送了一面锦旗给参加国际纵队的中国志愿军战士，上面写着：“中国人民联合起来，打倒人类公敌法西斯蒂！”

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具有越来越多的国际性成分。抗美援朝精神就深刻蕴含着为人类和平与正义事业而奋斗的国际主义精神。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亚洲乃至世界的战略格局得到深刻塑造，全世界被压迫民族和人民争取民族独立和人民解放的正义事业受到极大鼓舞，有力推动了世界和平与人类进步事业。它用铁一般的事实告诉世人，任何一个国家、任何一支军队，不论多么强大，如果站在世界发展潮流的对立面，恃强凌弱、倒行逆施、侵略扩张，必然会碰得头破血流。这一战，再次证明正义必定战胜强权，和平发展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② 新时期改革开放精神包含互利合作、命运与共的重要理念，充分体现了中国的发展离不开世界、世界的发展离不开中国。“为世界谋大同”与“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一起，构成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精髓。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抗疫精神、企业家精神、探月精神、新时代北斗精神和丝路精神，充分展现了坚持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时代国际主义精神，充分表明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进程中中国将会为世界作出越来越大的贡献。

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的国际性，由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的“隐形蕴含”，到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时期抗美援朝精神的直接表征、改革开放精神在新时期的引领性表征，再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多种精神的多发性表征，充分表明中国共产党不仅是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为中华民族谋复兴的马克思主义政党，而且也是为人类进步作贡献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指出：“在无产

① 《毛泽东选集》第 2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520、521 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74 页。

者不同的民族的斗争中，共产党人强调和坚持整个无产阶级共同的不分民族的利益。”^①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世界历史的思想……我们要站在世界历史的高度审视当今世界发展趋势和面临的重大问题，坚持和平发展道路，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不断拓展同世界各国的合作，积极参与全球治理，在更多领域、更高层面上实现合作共赢、共同发展，不依附别人、更不掠夺别人，同各国人民一道努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把世界建设得更加美好。”^②

Basic Features of Chinese Communists’ Spiritual Pedigree

Shi Ran Zhu Mengzhu

Abstract: Patriotism is the main theme of Chinese Communists’ spiritual pedigree, and Chinese Communists’ spiritual pedigree invariably reflects the deepest, most enduring and strongest patriotism. Unity and struggle is the eternal subject of Chinese Communists’ spiritual pedigree. The unity and struggle have forged the united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which is a powerful force for transforming the world and revitalising China. Peoplehood, modernity and internationality are the evolutionary direction of Chinese Communists’ spiritual pedigree, which is constantly enhanced in th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Communists’ spiritual pedigree.

Keywords: Spiritual Pedigree; Patriotism; United Struggle; Logical Evolution

[责任编辑：闫惠惠]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13页。

^② 习近平：《在马克思诞辰200周年纪念大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22～23页。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及其实践^{*}

杨戏戏^{**}

【摘要】20世纪二三十年代，资产阶级对无产阶级的剥削从经济领域扩展到文化领域，与资产阶级争夺文化领导权变得日益重要。在这样的时代境遇下，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应运而生，并对当时及后世马克思主义政党深化对无产阶级文化及文化领导权的认识产生重要而深远影响。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对资产阶级文化的考察与批判，构建了一个包括文化霸权思想、文化政治化思想等在内的社会主义文化框架，并以此为理论依据进行了一系列社会文化实践，如建立广泛的文化组织与社团组织、保护知识产权与兴办报刊等。一方面，其文化思想与实践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无产阶级意识的塑造、工人阶级的团结及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建立；另一方面，由于其理论的折中性与空想性，其实践效果大打折扣。

【关键词】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文化领导权；无产阶级文化；折中性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大多生活在技术革命给人类社会带来飞速发展的时代。一方面，技术革命提高了社会生产力，推动了社会经济发展，创造了大量社会财富，人民日常生活、交通、卫生、教育等都得到了一定的改善，文化艺术与科学领域也发生了巨大的变化，导致人们在思考、判断、情感和认知能力等方面发生转变；另一方面，技术革命推动资本主义发展，随之而来的是整个西方世界的社会政治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资本主义越来越将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纳入其控制范围，形成了基于资产阶级思想的资本主义精英文化，人民群众深受资产阶级文化的压迫与控制。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诞生的，他们批判资本主义对文化的垄断，批判资产阶级通过文化对无产阶级文化的剥夺，追求真正的属于无产阶级大众的、平等的、民主的文化。基于这一文化思想，奥地利马克

^{*} 本文受到中央高校基本科研业务费专项资金资助（ZY2327）。

^{**} 杨戏戏，北京化工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国外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意识形态、马克思主义基本理论。

思主义者进行了一系列实践活动，使社会主义思想深入人心，无产阶级意识进一步增强。

一、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主要内容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对资本主义文化进行分析，提出建立无产阶级文化，以此来遏制资本主义文化对无产阶级的荼毒，努力打造马克思主义文化阵地，牢牢掌握文化领导权，将文化作为一项政治事务，高度重视文化对人的思想的塑造作用，实现文化知识民主化让工人阶级能够平等享有知识的权利，使马克思主义文化深入人心，塑造无产阶级意识。

（一）文化霸权思想

列宁曾撰写多篇文章指出，工人阶级政党要将“进行最广泛的政治鼓动，以及组织全面的政治揭露”^①作为自己的重要任务，主张党员干部“应当既以理论家的身份，又以宣传员的身份，既以鼓动员的身份，又以组织者的身份‘到居民的一切阶级中去’”^②，强调要加强对民众进行宣传教育，积极发动民众，将革命的领导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而不是拱手让于资产阶级。这一观点被西方马克思主义者葛兰西加以丰富拓展并形成了系统的文化霸权理论。葛兰西强调文化霸权是一种建立在公众普遍同意基础上的统治形式。在获取政权之前，社会政党或组织就要牢牢掌握领导权，而这个领导权实际上是对意识形态话语权的掌控。这种话语权意味着一个阶级不仅在经济领域而且在所有社会、政治和意识形态领域占据优势，并因此能够说服其他阶级以有利于其自身优势的方式看待世界。在一些学者看来，葛兰西所指的话语权往往处于一种不稳定的、暂时的平衡状态，不可能长久，^③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却认为这种不稳定的状态给无产阶级争夺意识形态领导权创造了机会。因而，他们对当时资产阶级主导的所谓“高雅文化世界”与被认为是“野蛮的、未开化的”大众文化世界对立的文化霸权范式提出挑战，并试图通过改变传统革命方式在这种不稳定的（政治）平衡中建立“无产阶级文化霸权”观念，“当今世界，艺术和科学的实践主要掌握在无产阶级的反对者手中。就目前而言，如若使用传统手段和形式，无产阶级则很少有可能获得在科学或艺术创造性的领域工作的机会”^④。

①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62页。

② 《列宁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66页。

③ Norman Fairclough, *Critical Discourse Analysis. The Critical Study of Language*, London: Longman, 1995, p. 76.

④ Otto Neurath, "Personal Life and Class Struggle", in M. Neurath, R. S. Cohen, eds., *Empiricism and Sociology. Vienna Circle Collection*, Vol 1, Springer, Dordrecht, p. 258.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在资产阶级文化霸权的影响下,阶级社会出现巨大的分裂,这种分裂不仅涉及经济层面的诸如贫富差距等巨大鸿沟,而且也体现在文化领域出现的巨大裂隙。文化是劳动人民创造的精神财富,文化成果应该属于每个劳动人民,然而,资产阶级社会的文化却是少数资产阶级的专有特权,他们不仅占有劳动人民的文化成果,还通过对文化进行垄断剥夺底层民众享受文化所带来的精神愉悦的权利,使文化变成其实行政治镇压的工具,并通过文化手段对劳动人民进行政治“洗脑”,逐渐使人民群众在思想上对其制度、价值观产生认同,从而丧失反抗意识。因而,资产阶级社会的文化发生分裂,成为资产阶级统治人民的工具,走向了人民的反面。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认为,要实现社会民主化,就必须克服这种文化分裂。埃德加·兹尔塞尔认为要克服这种文化分裂,建立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式的文化霸权,就要解构当时资本主义统治下的霸权主义的精英主义文化。因而他主张平等主义,反对一分为二的文化对立模式,即他所说的“天才和大众各占一半”^①的文化模式,强调文化资源的公平分配与平等享有性。为此,他对现代文化生活中存在的个人崇拜和对大众贬低的普遍现象予以强烈抨击,鼓励人民群众追求文化娱乐生活,强调要赋予人民群众接受文化教育并保持个体独特性的权利。奥托·鲍威尔也根据自己的研究提出了自己对构建无产阶级文化霸权的见解。在鲍威尔看来,个体始终是一个相互依存的存在,单个个体可能并没有完全意识到他者在文化环境中的这种嵌入性。大多数人都在自己对文化的理解范围内行动,认为文化是持久的、永恒的,他们并不能认识资产阶级社会文化的本身属性,更不可能认识到建立在一定文化基础之上的国民性不是一成不变的。鲍威尔认为,通过创新文化教育可以实现文化转变,而实现文化转变也就能克服这种文化分裂。这种创新的文化教育是属于无产阶级的文化教育,因而转变后的文化应该代表无产阶级,是无产阶级文化。

此外,在无产阶级文化范式构成上,奥托·鲍威尔指出,每个国家都有其历史上出现的文化规范,这些规范倾向于向前继承前一历史阶段的思想观点。因而,哈布斯堡王朝文化范式也影响了要新建立的奥地利无产阶级文化的文化规范。考虑到奥地利与德国文化传统的历史渊源,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与其他文化传统相比,古典德国文化具有某种优越性,奥地利工人阶级要学习德国优秀文化来塑造工人品格,进而建立无产阶级文化规范,“工人们尤其必须适应德国学术、德国哲学、德国诗歌和德国艺术,仅仅因为它们是有史以来最好的作品,奥地利工人需要成为‘优秀的德国人’”^②,以此形成无产阶级文化霸权。

^① Edgar Zilsel, *Die Geniereligion. Ein kritischer Versuch über das moderne Persönlichkeitsideal, mit einer historischen Begründung*, Frankfurt am Main: Suhrkamp Verlag, 1990, p. 100.

^② Otto Bauer, “Deutschtum und Sozialdemokratie”, in Otto Bauer, ed., *Werkausgabe Band I*, Wien: Europa Verlag, 1975, pp. 32-34.

（二）文化政治化

在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理论中，文化因素与政治社会因素往往紧密地交织在一起。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不仅把生产解释为社会政治生活的一部分，而且把消费解释为社会政治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试图通过分析生产过程本身与普通人的闲暇娱乐时间来解释工人阶级的政治行动。1929年，在维也纳学派宣言中，奥托·纽拉特强调建立科学的新世界观，主张将文化、哲学与政治结合起来，强调对工人进行教育以及文化宣传的重要性，指出无产阶级掌握社会管理的能力及阶级意识的提高对无产阶级运动的成功有着重要作用，对科学教育的尊重也有利于无产阶级统一战线的实现^①。这是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文化政治化主张的正式宣言。尽管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承认生产力发展对文化的作用，但是他们强烈反对第二国际内部庸俗经济学家们的粗暴而简单的经济决定论。他们着眼于文化实践的社会条件和物质条件，认为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被划分为不同阶级，不同阶级文化势必会因所代表的阶级立场不同而产生文化冲突，进而指出文化也具有阶级性。

纽拉特认为，没有经济秩序的根本改变，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思想、感情和生活，就没有社会主义的民主，“无产阶级胜利以后，要发展教育和艺术供今天仍然没有接受过教育和艺术的人平等享有”^②。因而在其文化思想中，我们能看到很多社会主义改革的方案，这些改革方案很好地将文化思想与政治实践结合起来，使文化与政治实现良好互动。同其他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一样，纽拉特的目标是在资产阶级文化遗产之外创造一种普遍的无产阶级文化。在纽拉特看来，工人阶级发展了自己的文化，这种文化与团结工人阶级和争取物质改善的斗争密切相关。文化不是马克思主义教育者必须“灌输”给工人阶级的东西，工人阶级的生活方式、组织业余时间的方式、与自然的关系以及与社会的关系都可以被视为文化的一种表达。^③也就是说，他认为文化代表着一个社会阶层的全部生活方式。对此，他将“一致性”作为其文化思想中的一个关键术语。他认为，习俗的一致性问题的社会学结构中起着决定性的作用，在人类社会，生产方式、社会结构和意识形态始终是一致的。他承认经济条件在历史进程中是一种推动力量，但也同其他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观点一致地反对当时一些庸俗马克思主义者的庸俗经济决定论。他认为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技术、宗教和文化习俗相一致，对人类的生活至关重要。因此，即使是文化也必须在连贯性理论的背景下去研究。

① 参见〔澳〕尼尔·德·马奇、〔美〕克劳福德·古德温：《两难之境：艺术与经济的利害关系》，王晓丹译，中国青年出版社2014年版，第431页。

② Otto Neurath, "Personal Life and Class Struggle", in M. Neurath, R. S. Cohen, eds., *Empiricism and Sociology. Vienna Circle Collection*, Vol 1, Springer, Dordrecht, p. 258.

③ Otto Neurath, *Lebensgestaltung und Klassenkampf*, Berlin: Laub, 1928, p. 297.

他举例说明了这种一致性：如果一个画家生在一个前途未卜的国家而画了一幅充满希望的画，人们可能会倾向于把这解释为他在生活中被否定的东西通过艺术展现出来；但是，如果一个画家生在一个发展前景良好的国家，那他的画作就会被理所当然地认为是对现实的真实反映。^①

此外，他极力倡导文化知识民主化，强调要为所有以某种方式参与有意识地重新塑造生活的人的日常生活设计知识工具。^② 在其理论中，知识民主化就是通过避免使用晦涩的学术语言，充分考虑工人阶级思想文化水平，用简单易懂的方式（如图像语言、举办成人及工人教育活动等）来实现知识普及化。在他看来，实现知识的民主化是建立和推进民主的必要因素，是文化政治化的必然选择。他指出，对于一个民主社会来说，拥有一种共同语言的共同文化知识至关重要。为此，他创造了名为“图像统计学”的教学方法，即以经过特殊设计的统一图像来取代文字，形成一种普遍而简单易懂的语言，以让即使文化水平很低的人也能迅速获得知识，这种方法最后被国际采纳并发展为国际通用图形符号系统 (ISOTYPE)。通过这种方法，他认为能够实现知识普及化，进而实现无产阶级文化普及化，最后必然能够突破文化、社会和语言障碍，实现世界主义、国际主义，最终形成世界公民意识。当然，文化知识民主化并不是对所有文化知识不加区分的进行宣传与普及，对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而言，他们更强调的是普及那些有利于增强工人阶级意识的文化知识，而对于束缚工人阶级思想解放的资产阶级文化知识则要拒斥、批判。

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的实践模式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根据其文化思想，强调要对人民进行全方位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帮助其树立社会主义价值观。因而，他们支持并创立了以社会主义精神为指导，对人民尤其是年轻人进行身心教育的教育组织或社团组织。同时，改革教育制度、建立职工再教育机制，普及教育和民间艺术发展。注重工人阶级精神生活，在满足工人阶级基本生活需要的同时关注其文化需求，鼓励科学和文化艺术发展，推动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发展。

（一）建立广泛的文化组织与社团组织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将文化活动看作其践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进行社会主义改革的重要事项。为了让包括青年在内的所有人都能够受到社会主义

^① Otto Neurath, *Empirical Sociology*, Vienna Circle Collection, Vol. 1, 1973, p. 385.

^② Otto Neurath, "Wissenschaftliche Weltauffassung: Der Wiener Kreis [The Scientific Conception of the World: The Vienna Circle]", in M. Neurath, R. S. Cohen, eds., *Empiricism and Sociology. Vienna Circle Collection*, Vol. 1, Springer, Dordrecht, p. 305.

文化熏陶,参与各种文化活动,以增强其阶级意识、社会主义意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主持成立了多个文化组织,构建了相对庞大的文化组织网络。到1932年,维也纳就拥有超过40个文化组织,这些组织下设多个分支机构,辐射范围可至维也纳偏远乡村,注册会员约40万人,规模之大,令人惊叹。这些组织始终遵循三个原则:(1)要把最好的精英/资产阶级文化供工人阶级享有,加强无产阶级联合;(2)打造集体文化而不是个人文化;(3)捍卫共和国的民主制度,反对资产阶级剥削。这使文化组织的目标更加明确:以传播无产阶级文化、集体主义文化摒弃资产阶级个人主义文化为己任,倡导文化知识民主化。这些组织承担着全社会文化教育启蒙的任务,通过组织有关当代政治、社会主义运动、历史、宗教、人文学科、教育、文化和性等主题的讲座、舞台剧等丰富多彩的活动,传播社会主义思想。依托这些文化组织,讲座作为司空见惯的活动融入人们的日常生活中,整个维也纳举办讲座频繁程度时至今日仍令人惊叹。据统计,维也纳讲座次数从1924年的3000次增加到1932年的6500次。讲座主题包括当代政治、社会主义运动、历史、宗教、文学、教育等,内容十分丰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试图通过组织主题丰富多样的系列讲座来吸引听众,普及现代科学文化知识,传播社会主义思想。这样,这些文化组织满足了维也纳人民的文化需求,是兼具艺术与文化传播的高水平的组织,使维也纳的良好文化体验成为当时除苏联以外的社会主义政党所独有的,营造了良好的社会主义文化氛围,推动了维也纳文化教育发展,为工人阶级提供了广泛的良好文化教育。

此外,除了建立上述针对所有工人阶级的文化组织外,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还针对工人阶级后代教育问题,创办专门的青年社团组织。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通过调查发现,绝大部分维也纳青年活动场所有限,大部分青年将街头巷尾作为活动的秘密基地,大部分奥地利青年的社会化都是在这里完成的。流浪于街头的青年,缺乏家庭教育、社会教育给予的正确价值引导,很容易走上犯罪之路。青年聚集的街道也被人们视为犯罪的象征。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认为不能把青年堕落、犯罪的原因仅仅归于街道,而应该看到街道成为青年堕落场所的根源仍旧是资本主义的剥削。在资本主义统治下,工人普遍受到严酷盘剥,生活贫穷,生存空间被严重压缩,工人阶级外出工作频率极高,离婚率也居高不下,长期工作中的剥削压迫投射到家庭中来,形成父母对子女专制的威权主义。因而,无序的工人家庭不能被赋予养育未来有秩序的社会主义者的重任。^①青年在家庭中缺乏足够安全稳定的成长空间,迫使其逃离家庭寻求虽脏乱但具有足够自由空间的街道为其主要活动场所。为解决此问题,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国家要承担起引导青年社会化的职责,弥补家庭教育与社会教育的缺失,为青年提供自由的活动空

^① Helmut Gruber, *Red Vienna: Experiment in Working Class Cul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65.

间、与朋辈之间的交流的场所以及纯净的社会化场地。为此，他们认为可以成立青年社团组织，为年轻人提供与同辈共同学习成长的环境，加强对青年的管理与教化。

针对6~10岁儿童成立“儿童之友”协会。该协会最主要的功能就是取代工人阶级子女“街头社会化”的各种不良的教育设施及项目，发展儿童慈善、儿童保育与儿童福利事业，组织工人阶级子女到免费的课外活动中心学习并对其进行社会主义教育，避免其因父母忙碌无法照看而在放学后不得不在街头流浪的情况发生。据统计，到1929年，该组织有100540名儿童成员。针对10~14岁儿童，他们成立名为“红色猎鹰”的组织，该组织旨在帮助儿童磨砺坚强意志，提供身体上、心理上及精神上的支持，组织内部纪律严明，定期进行严格训练，包括体育训练、党性教育培训等，被认为是培养马克思主义者的童子军组织。到1932年，该组织在维也纳共吸纳了6000名成员。^①针对14~21岁的年轻人，成立“社会主义工人青年”组织，活动集中体现在体育和教育上。早在1923年，该组织就有38000人，到1932年，组织成员已达105000人。组织内部经常召开研讨会，举办课程培训，青年可以对时事政治进行自由讨论，组织章程由青年制定，并可民主选举产生主席、委员等领导层成员，具有一定的民主性、组织性，在支持工人阶级青年争取社会权利的斗争中发挥了重要领导作用。这些组织很好地解决了青年社会化问题，帮助年轻人体验良好的同辈情谊，也为他们提供了认识社会主义的重要平台。

（二）保护知识产权与兴办报刊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认为，实现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必须充分发挥书籍、报刊等传播媒介的作用，为此他们通过制定法律推动新闻出版自由、保护知识产权、创办种类众多的报刊并在工人住宅区开设书店等措施来实现这一目标。

长久以来，奥地利新闻出版业受到哈布斯堡王朝严格的审查制度的侵扰，新闻出版不自由成为困扰知识分子的难题。加之当时图书盗版情况十分猖獗，很多作家的知识产权得不到应有的法律保护，一些奥地利作家往往被迫选择在能够对其作品版权予以充分保护的国家出版书籍，有些奥地利作家甚至长期旅居国外或加入其他国家国籍，这就造成文化财产及人才严重外流，奥地利国内文化氛围显得死气沉沉。当代历史学家卡尔·容克就曾指出，文化知识产权缺乏法律保护是一场灾难。^②盗版的盛行、出版的不自由破坏了公平原则，更是对其劳动成果的不尊重，是劣币驱逐良币的行径，不应该出现在一个致力于建立社会主义新秩序

^① Helmut Gruber, *Red Vienna: Experiment in Working Class Cul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166.

^② Katrin Kohl, Ritchie Robertson, eds., *A History of Austrian Literature 1918-2000*, Camden House, 2006, p. 77.

的国家。因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掌权后颁布了新闻出版自由与知识产权保护法，鼓励并支持新闻出版业，极大地振兴了奥地利出版事业，增强了奥地利知识分子信心。1901年，第一家工人阶级书店在工人聚居区成立，此后随着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管辖范围的不断扩大，工人阶级书店更成为每个社区的标配。工人阶级书店的成立不仅为工人阶级提供了阅读的机会，同时也极大鼓励了工人阶级作家进行有关社会主义文化的创作。

此外，为了进一步传播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创办了各种各样的报刊。据统计，到1930年，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工会和合作社共出版了127种报纸和期刊，总印数为316.1万份，其中包括7种日报、68种专业期刊（针对租户、消费者、禁酒主义者、干部、其他人士、妇女和对文化感兴趣的人等的专业期刊）和52种工会周刊。^①这些刊物有些比较专业，但大部分贴近人民生活，生动、通俗，内容丰富且抓住了人们的兴趣点，兼具娱乐性与教育性。例如，1927年，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创办了《克莱恩报》，该报偏向一种更活泼、更流行的写作风格，多刊登奇闻轶事，并辅以大量图片以增添娱乐性与教育性吸引更多读者，致力于帮助工人摆脱资产阶级反动报刊的思想毒害。到1931年，该报的发行量已达17.3万份，到1931年增加到20万份。在专业性出版物中，最成功的是《未满足之报》，该报创刊于1926年，是专门为女性创办的报纸，旨在吸引女性入党。该报内容符合女性实际需求，以传播社会主义为价值理念、以宣扬新时代独立女性观念为己任，设置供女性发声的专栏，刊登介绍现代家居用品、健康、美容、服装和烹饪小贴士，连载具有社会主义色彩的小说等，有时也会刊登女性读者来信或讲座、选举等信息，试图将女性从家务劳动中解放出来，鼓励其积极参与政治等。到1931年，该报发行量达到154600份，为妇女解放争取自身权利作出了巨大贡献。^②

此外，为了进一步了解工人阶级阅读习惯，使党刊更能满足读者需求，提高党刊质量，他们对工人阅读习惯进行了定期调查。在被调查的工厂女工中，48.2%的人阅读《克莱娜·布拉特》杂志，28.8%的人阅读《阿贝特》杂志；21.4%的人阅读《每周新闻》。另外一项针对14~19岁的皮革工人学徒的调查显示，80%的人有每天阅读报纸的习惯，其中阅读《工人报》的占30.7%。^③1933年，维也纳进行的一项调查表明，《维也纳日报》读者有三分之一是工人。20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维也纳社会民主党党员购买主要理论刊物《理论报》的

① Helmut Gruber, *Red Vienna: Experiment in Working Class Cul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87.

② Helmut Gruber, *Red Vienna: Experiment in Working Class Cul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88.

③ Helmut Gruber, *Red Vienna: Experiment in Working Class Cul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89.

人数大约是八分之一。^①经过多次调查，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对这些结果表示满意，认为无论如何都应该对此调查保持乐观态度，因为这是为了客观了解青年工人在塑造未来文化工作方向方面所做的努力，是取得社会主义改革胜利的一步。

三、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与实践简评

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是西方较早认识到资本主义文化出现分裂现象的流派，他们看到了资产阶级文化对无产阶级的控制与压迫，提出要发展无产阶级文化，与资产阶级争夺文化领导权，并将文化与政治因素挂钩，竭力实现知识民主化，消解当前文化分裂状况，这是非常值得肯定的，一些观点在今天看来仍具有现实意义。但对于一些理论主张，奥地利马克思主义内部并没有达成一致意见，也没有厘清马克思主义文化的真正内涵，导致对资本主义文化的一些分析及观点往往前后矛盾，同时对文化作用过高估计与文化思想中包含的折中性，也给其后来的社会实践造成了一定的困扰。

此外，由于当时奥地利民族分裂，包括鲍威尔在内的大部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都希望实现民族团结、国家统一，加之本身就具有德国文化传统，奥地利也一直想要重新加入大德意志同盟，在这种境遇下，他们对德国文化极尽推崇。当然，其本意或许只是强调学习德国优秀传统文化而非吸收所有连同糟粕在内的封建的或资产阶级的文化，但这也凸显了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具有民族主义倾向，其主张建立的无产阶级文化霸权思想掺杂着对德国文化的崇拜因素，并没有将马克思主义文化放在无产阶级文化建构的首位，展现了其局限性。而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霸权本质上是将文化作为文学、哲学和艺术的审美霸权。他们从阶级、政治权力、人民群众的日常生活特别是工人阶级的生活出发来分析文化。他们联系本国国情，在马克思主义指导下，发展出一种社会主义的文化观念，把文化场域解释为政治斗争场，把阶级文化解释为研究的目标和政治变化的因素并将文化民主化理念转化为实践行动。例如，马克斯·阿德勒就曾强调社会主义教育应该方向性明确，即通过建立社会主义意识达到压倒资本主义的目的，社会主义导向是两种社会对立的关键，明确表明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教育的社会主义属性。在这种观念的指导下，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构建起了一种文化唯物主义理论范式，涵盖社会文化的方方面面，进而形成了针对整个社会意识形态层面的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文化霸权理论。

思想理论上的模糊性导致实际操作中存在种种问题。在实际操作中，奥地利马克思主义文化思想又带有明显的空想性，因为在资本主义经济基础建立起来的

^① Helmut Gruber, *Red Vienna: Experiment in Working Class Culture*,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91, p. 88.

文化必定带有资产阶级的思想烙印。正如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之前分析的那样,资本主义社会文化出现分裂,如果不打破旧机器,实际上是无法真正解决文化分裂问题的,这也使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思想带有明显的折中性。这种折中性体现在对资本主义文化的态度上,对资本主义的温和态度与模棱两可造成奥地利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思想自相矛盾。例如,在关于流行文化的讨论中,一方面,他们认为流行文化是大众思想的一种真实表达,是一种反精英主义的政治抵抗形式,是批判性思维的宝库,应该予以支持;另一方面,他们又谴责以被动消费文化产品为特征的流行文化是资本主义思想的潜在动因,在他们看来,流行文化操纵了工人阶级的思想,使他们无法认识到自己的社会和经济状况,是资产阶级用来破坏无产阶级意识的工具,要对流行文化予以批判。这种前后矛盾的观点,也造成奥地利马克思主义阵营在文化问题上的讨论出现了很大的分歧,不利于无产阶级文化的形成。

与此同时,在实践中采取的方式方法不恰当,也阻碍了无产阶级文化的形成。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通过成立各种文化组织、举办丰富多样的讲座、创办报刊、推动新闻出版自由、保护知识产权等措施促进社会主义文化在整个社会的传播,但在一些具体措施上存在方法粗暴、一刀切、论证不足等问题,导致一些措施效果欠佳,甚至出现浪费人力、物力、财力的现象,引发部分民怨。尽管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在如何更好地宣传马克思主义与社会主义价值观、提高工人文化水平、增强工人意识方面有自己的设想,例如他们通过积极掌握新闻舆论主动权争取文化领导权,利用报刊书籍等媒介传播无产阶级文化思想与社会主义价值观具有创新性与进步性,但依靠大量发行报刊以数量取胜并不能真正收到预期的效果,反而增加了工人阶级的负担。大量报刊涌入致使工人阶级往往还没有来得及看就已经被丢进垃圾桶,同时一些刊物在语言上也没有做到通俗化,晦涩、艰深的语言使原本文化水平较低的工人无法对其产生兴趣,使得宣传效果大打折扣,文化实践并未达到预期效果。

但无论如何,奥地利马克思主义者努力发展马克思主义文化并试图将其理论付诸实践,与资产阶级争夺文化领导权,建立无产阶级文化霸权的态度及精神值得我们学习。其部分理论虽存在一定争议,但在今天看来仍有可取之处。对文化霸权思想的分析,对文化断裂危害的揭露,以及其提出文化政治化,强调文化知识民主化,致力于工人阶级内部文化知识的普及等,对当前我们应对资本主义文化及意识形态渗透有着特殊的借鉴意义。

Austrian Marxist Cultural Thought and Its Practice

Yang Xixi

Abstract: In the 1920s and 1930s, the bourgeois exploitation of the proletariat expanded from the economic field to the cultural field, and it became increasingly important to compete with the bourgeoisie for cultural leadership. Under such circumstances, Austrian Marxist cultural thought emerged at the historic moment, and had an important and far-reaching impact on the then and later Marxist parties' deepening understanding of proletarian culture and cultural leadership. Austrian Marxists, through their investigation and criticism of bourgeois culture, constructed a socialist cultural framework including cultural hegemony and cultural politicization, and carried out a series of social and cultural practices based on this theory, such as establishing a wide range of cultural organizations and mass organizations, protect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rights and establishing newspapers and periodicals. On the one hand, the cultural thought and practice are beneficial to the shaping of proletarian consciousness, the unity of the working class and the establishment of proletarian cultural leadership to a certain extent. But on the other hand, due to the compromise and visionary nature of his theory, the practical effect is greatly reduced.

Keywords: Austro-Marxism; Cultural Leadership; Proletarian Culture; Compromise

[责任编辑: 焦佩]

文化帝国主义数字殖民的危机表征及应对路径^{*}

李明哲 高福进^{**}

【摘要】文化帝国主义的数字出场，乃是垄断资本络续反噬全球文明的霸权缩影。在资本增殖与权力扩张双重逻辑宰制下，文化帝国主义意图迈入数字垄断阶段，其真实目的是要借助数字技术重塑西方文化模式的移植外衣和生成场域，在数字媒介的单向统摄中实现数字资本的价值增殖，这引发了一系列全球文明的新殖民危机。在文化主权层面，突破现实时空壁垒的西方意识形态霸权络续噬食着其他文明的价值取向、话语权威甚至文化根基；在文化产业层面，畸变的数字文化生产在智能仿真和算法推荐的符号编码下加速了文化主体的异化状态；在文化外交层面，资本与权力联动下的文化帝国主义政策和发展动向窒碍着中国的数字文明建设。在构筑文化安全的数字屏障过程中，中国既需要完善数字空间治理体系，建构良善数字业态，更要实现数字命运共同体的价值复归，祛除文化帝国主义数字殖民的全球威势。

【关键词】文化帝国主义；数字殖民；数字技术；文化安全

历史地看，文化帝国主义是垄断资本主义霸权表征和殖民范式转向的必然结局。马克思指出：“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①帝国主义殖民霸权表露初期，依附经济盘剥、政治统制、军事威压，体现了马克思所阐述的“在一切地点把生产变成由资本进行的生产”^②。二战后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旧式殖民体系分崩离析，为延续在世界权力格局中的霸主地位，需要渐进完成硬实力压制向软权力控制的蜕变，“尽管传统历史和政治观念中的帝国主义和殖民地都已不复

^{*}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红色礼仪源流研究”（22&ZD240）、上海学校德育理论研究课题“高校思想政治工作中的文化自信研究”（2020-B-003）的阶段成果。

^{**} 李明哲，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上海交通大学伟大建党精神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高福进，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外文化史论、红色文化。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47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上，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391页。

存在，但它们又以另一种面具继续通过文化统治对他国或公民个人输送帝国主义意识形态”^①，其殖民形态映现为扭曲的价值观、领导权、话语权等文化样态，由此催生了文化帝国主义的理论议题和模式框架。

文化帝国主义理论较早可追溯至列宁经典帝国主义理论、葛兰西文化霸权理论、法兰克福学派批判理论以及法农后殖民理论等思想流派。但其基本范式的系统阐释肇始于赫伯特·席勒（Herbert Schiller），在《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一书中作者基于大量历史事实和数据剖析了文化帝国主义的实践样态，指出美国信息媒介在文化传播领域的权力控制以及传播联合体在支撑美国文化全球化扩张中的象征力量，作者进一步洞晓帝国主义文化殖民服从资本逻辑宰制，指出：“传播的目标（无论被当作什么）服从于接收设备的生产和销售。”^② 在1976年出版的《传播与文化控制》一书中，作者正式使用“文化帝国主义”的术语，厘析了全球文化互动过程中不平等和非对称结构，阐明文化帝国主义处心积虑“吸纳、强迫、贿赂”其他文明形态成为西方意识形态附庸，从而使其社会体制契合西方中心主义的价值推销体系。^③ 作为理论范式的概念延拓，西方学者驻足资本主义立场对这一理论作了不同程度的曲解和辩白，如萨义德、汤林森、福山、亨廷顿等人或从历史向度考察文化帝国主义的历史变迁和时代特征，或从共时向度偏重窥探文化帝国主义在不同场域、不同主体文化间的理论原像和内在逻辑，但源于世界观和方法论的阈限致使其理论充塞各类结构性内在矛盾。

跨入全球数字时代，在数字技术接续取得实质革新的进程中，文化作为一种渗透性因子和生长性要素，实现了与数字属性相耦合的新质态。列宁曾深刻指出：“我们已经看到，帝国主义最深厚的经济基础就是垄断。”^④ 文化帝国主义经由生产方式数字化转型、国际分工格局的数字重塑、世界市场的数字场域拓展等门径意图迈向数字垄断阶段，创设寄生性、剥削性、诱骗性的文化嫁接与价值渗透的数字生态机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⑤ 然而，综观文化帝国主义现有学术成果，数字殖民研究存在孱弱之处，亟待深透铺陈其数字霸权下的殖民机理、危机表征和纠治策略。

① Edward W. Said, *Culture and Imperialism*, 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94, p. 10.

② [美] 赫伯特·席勒：《大众传播与美利坚帝国》，刘晓红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20页。

③ Herbert I. Schiller, *Communication and Cultural Domination*, New York: International Arts and Sciences Press, 1976, p. 421.

④ 《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11页。

⑤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51页。

一、文化帝国主义数字殖民的内涵及作用机理

文化帝国主义的数字出场、异变乃至在全球肆虐，本质上是多元机制相互承袭、内嵌融通的驳杂结构。文化帝国主义依仗人工智能、大数据、区块链、物联网、5G/6G等数字技术精心构筑超时空的数字监控场域，伴随数字“全景监狱”与物理空间的畛域弥合，使得一批又一批的“数字住民”无息涌入，加之数字媒介霸权图景下可复制的文化扩散，由此实现了数字殖民的生态构拟。具言之，文化帝国主义数字殖民是指以美国为首的部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凭借数字技术和数据信息的垄断地位优势，对数字技术发展相对弱势的国家进行文化控制、文化渗透和文化产品输出，以维持全球文化生产与流通的不平等结构和西方文化的世界领先地位。在数字语境下，精准捕捉文化帝国主义殖民内在作用机理，从逻辑思维视角讲，有助于剖判其本质性规定，即它的数字存在状态；从问题意识视角讲，这是在追问数字时代资本逻辑宰制下的文化帝国主义殖民形态中萌发的，有助于厘析出一个概念体系和解释框架。

（一）殖民基石：资本规训下的数字垄断

数字技术在推动物质社会景观繁荣的表层下，也承载着来自资本逻辑的规训，作为人与人关系的深微映射，实质已将人类社会拖入文化危机的窠臼之中。列宁指出：“帝国主义的重要特点，是几个大国争夺霸权。”^①而进入数字化时代，由于网络外部性、技术不相容性、数据正反馈机制等迹象的存在，文化帝国主义国家的一些数字平台和数字企业逐步野蛮成长为“数字寡头”，通过不断取得技术自然垄断、数据资源垄断以及数字权力垄断的优势地位，形成了数字垄断的霸权局面。为达到文化同质和价值同化的深层目的，文化帝国主义一方面依托数字平台产权化、数据集纳潜匿化、流量锁定缜密化、算法推送精准化等行径捣毁世界其他文明的数字存在，另一方面以一种匡助姿态重建资本宰制的数字文明社会结构，赋权文明奴化体系合理性。

（二）殖民要素：数字藻饰的“文化样板”

文化帝国主义一贯虚设西方中心主义文化具有不可通约性、普遍适用性、超历史性，将特质化的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合理辩白为物质世界的本质映照，规定为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必须恪守的普遍理论准绳。马克思曾预言资本膨胀的全球化使“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

^① 《列宁全集》第27卷，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403页。

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①。然而，在畸变的西方文明景观中“每日每时都会有大量的差异被抹平”^②，世界文学异化为西方文学或是资本文学，通过鼓吹西方文明的历史绝对优越，赋予异质信徒扈从“西方样板”的文明归宿。数字技术重塑并藻饰了西方文化模式移植的合法外衣，为其突破畛域的体系性暴力逸散和潜密化柔性渗透注射“强心剂”，同时也赋能“文化工业”批量流通和克隆异化数字产品，在侵犯异质主体自由意志的过程中使其沦为数字生产的工具性奴隶，以此养护单极文化体系的病态社会。

（三）殖民场域：深嵌现实的数字公域

文化帝国主义的剥削和统治是“通过工具性的空间并在工具性的空间中得到维持的”^③。“任何技术都倾向于创造一个新的人类环境”^④，数字不仅创造空间，而且也在各个方面消蚀了空间窒碍，为西方空间意识形态的符号填充创造了契机。作为物理空间的扬弃，数字公域具有拟真性、嵌入性、控制性等特征，从而实践延拓了权力规训的统制畛域。事实上，它正是资本开辟的崭新版图，它的资本逻辑呈现为数字寡头控制诸多“数字住民”，猎取全球结构性控制权，获得完整的资本主义生产景观。可以确证的是，数字公域不再是传统意念里割裂于现实社会的“拟态摹本”，而是渐次完成了与物理空间的交汇、共生与合一，这意味着两维界域的感知、思维、活动在某种程度上实现了相互协调、相互渗透、相互映射，匿伏文化帝国主义对现实环境的“长臂管辖”危机。

（四）殖民手段：数字媒介的单向统摄

以数字技术为核心的互动传播媒介使西方资本势力的文化符号得以超越传统基于“原子”生态系统的物理畛域，推动交互渐进的文化被数字化的比特网笼盖。通过对数据资源和传播渠道的把控，发挥媒介作为文化塑造者的价值限定性功能，在晕轮效应、破窗效应、从众效应等的作用下，文化帝国主义将文化抽象概念和具体形态与数字产品或服务系缚，由此实行了数字拟态环境下的“媒介洗脑”，即“复写—强化—明确—再现”的单向渗透。数字媒介信息的接收者与发送者表面上是双向互动的关系，但由于数字领域的技术失衡、信息势差、话语权迥异等因素，信息接收者与发送者存在身份的落差，更多主体处于信息链底端，其在核心价值观、行为模式、德性伦理和文化形象活动等方面极易遭受数字媒介的价值规范和排斥功能钳制。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5页。

② 张康之：《为了人的共生共在》，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55页。

③ [法]亨利·勒菲弗：《空间与政治》，李春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36页。

④ [加]马歇尔·麦克卢汉：《理解媒介——论人的延伸》，何道宽译，商务印书馆2000年版，第37页。

（五）殖民实质：数字资本的价值增殖

文化帝国主义数字殖民的权力特质和逻辑所向使“资本瞳仁”始终全景窥伺“数字囚徒”，在消融西方资本主义以外的文明主体性的同时引致文化“贫血症”和文化流变征象。从本质寓目，资本是西方一切活动的首要前提，自然也是数字殖民的内生动力。作为资本逐利手段的扬弃和鼎新，数字资本具备“两个不变”，即资本的权力辖制没有变、资本的增殖内核没有变，印证了马克思强调的“物的世界的增值同人的世界的贬值成正比”^①。数字不过是将文化异质性入侵与再生产传化为资本积聚的中介工具。于是，数字意志替代主体意志，数字寡头希图妆饰为主体自由择选的本相，异质文化内在的批判维度和超越维度被逐渐溶解，造就了资本增殖的同质文明景观。更突出的是，它对主体的盘剥范畴由劳动时间延展至自由时间，从雇佣劳动异化为零薪劳动，促使人的生命向度沉沦在数字拜物教的囹圄中。

二、文化帝国主义数字殖民的危机表征

文化帝国主义依托数字技术赋能形成了一个互联互通的数字生态链条，然而“当技术成为物质生产的普遍形式时，它就制约着整个文化”^②。重塑形象后的文化帝国主义生发了更多元的殖民样态和更稠浊的腐蚀力。

（一）数字畛域急骤扩张挟带的西方意识形态蛀蚀文化主权

全息视界、拟态现实的新型数字技术宇宙正敛声息语地嵌套于物理世界，这不仅为提升资本主义文化主导权和话语权缔造了“真空地带”，而且也为西方意识形态的数字演绎突破了时空壁垒。数字场域空间巡视和信息监管的缺位，被当作“全球范本”的意识形态霸权有进一步“野蛮生长”的趋势。

首先，西方“普世价值观”的数字变种侵蚀其他文明的核心价值取向。部分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将所谓“普世价值”作为一种攫取全球文化霸权的意识形态工具，本质意图是“宣传并推动世界各文明采纳西方所谓的‘普世价值’，促使其他文明转型，最终实现一个拥有普世价值的大同世界”^③。数字赋权方式下的“普世价值”实现改头换面，不仅表现在它隐蔽性的外衣和光环，也伴随其西方精神卫道士和非西意志迷魂汤的痼疾恶化。一方面，“普世价值”打造了一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6页。

② [美] 赫伯特·马尔库塞：《单向度的人：发达工业社会意识形态研究》，刘继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年版，第142页。

③ 杨悦：《文化外交的学理分析与实践路径——“文明对话论”的视角》，《兰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1年第5期。

套契合数字场域特性的术语体系和网络议题，它强调“整个人类文明发展史中的某些重要价值体系是世界历史进程中所有民族共同创造的”^①，由此演化为基于西方价值幻象构拟的“普世自由”“普世文化”“普世理念”等术语陷阱，并通过数字化致密润饰为一整套网络议题，在人工智能画像和算法“精确捕捉”赋权下向不同语境的受众兜售；另一方面，“普世价值”往往装潢于数字衍生的智能化产品载体之上，从文化生产的数字走向来看，动态智能产品库日渐取代传统稳定的生产模式，智能化产品高效的信息传播能力将从机器视角建构所谓“普世价值”，民族的核心价值免疫系统在遭受数字自动化处理和机械化输出的框架窒碍，机器深度学习和程序设定的失控也在数字沃土持续爆发价值异化危机。

其次，民粹主义在数字空间的沉渣泛起湮灭了主流话语权威。伴随数字时代的场景应用，民粹主义依托数字技术作为新的话语宿主发酵演变。它以杂糅性的政治光谱、变幻性的群体认同、蛊惑性的价值判断为主要特性在网络空间制造舆论风波和话语藩篱，成为资本裹挟下肢解我国话语系统的工具性概念。其一，基于大数据的算法推荐系统强化群体“话语极化”。民粹主义者利用信息生发程序伪造、篡改、颠覆“现实剧本”，再借助算法超精准推送蓄意制造社会隐患和敌对人民的“他者”，借助数字化下的集体幻象为“同质化”的“数字住民”合理辩护，突破群体极端政治社会诉求的话语阈值。其二，人工智能仿真技术下的“变脸”戏法刻意制造话语偏差。民粹主义常常与极端民族主义、自由主义、民主社会主义等思潮相互策应，在数字技术供给的“面具”下乔装打扮，制造一整套仿真的西方“镜像话语”，使用户长期沉浸在同质类话语的“回音室”中，在“主流话语”与“镜像话语”负向背离的张力中偏离话语本性。其三，数字畛域的急剧扩张蚕食主流话语生存空间。智能化程序系统搭建的数字场域正在悄然消解传统意义的公共空间，民粹主义也经由数字技术完成了拟态化、代码化、数据化的身份转向，这将进一步阻碍话语内容的更始，使受众聚焦点限制在狭小且反动的“碎片话语”中，加剧主流话语的“缺位”。

最后，虚无主义企图建构的资本主义虚假的数字共同体势必消释其他民族文化根基。基于数字孪生、拟态现实、仿真环境等技术架构的数字社会图景深刻厘革了虚无主义的实践样态，使它的文化解构与价值剥离功能得以进一步延伸。“在马克思主义看来，虚无主义具有比较清晰的对于‘确定性’文化传统的否定性特征。”^②作为资本逻辑下的异化衍生物，它只对自己所推崇的理念、价值、文明、历史进程全面肯定，而绝对否定其他利益共同体的文化根基。在重构性、失真性、碎片化的数字帝国中，数字寡头凭仗对数字超级权力的宰制，极有可能

^① Samatov Shomat Berdievich et al., “Universal Values and Spiritual Growth in the Process of Globalization”, *ACADEMICA: An International Multidisciplinary Research Journal*, Vol. 11, Issue. 6, 2021, pp. 416-421.

^② 程馨莹：《虚无主义的三重否定性特征》，《思想教育研究》2020年第8期。

肢解主权国家确定性的文化根基。伴随“数字住民”的日益壮大,虚无主义与智能技术的耦合力图在拟态宇宙中建构一个虚假的数字共同体,以新的叙事手段赋予他们民族、文化、伦理、价值等具象化身份,从而将其抽离出原有的民族情感与历史记忆,以个体的集体失忆解构特质化的民族文化。当数字垄断同盟得以建立,赋权这一虚假的数字共同体以新的完整的历史叙事、情感记忆、身份认同将成为泯灭其他文明的重要门径。

(二) 数字文化工业加速文化主体的异化状态

从文化产业发展趋势来看,“文化产业数字化消费、数字化生产、数字化运营,是未来持续不变的主题”^①。然而,数字技术的赋能并非完全趋于良善,在革新文化产业体系的同时,也夹杂着某种扩张性权力的并发症。作为文化帝国主义的重要殖民范式,数字资本输出具有高度价值“涵化”倾向,媒介异化下的数字业态和其衍生的概念产品往往附着西方产业价值取向,以致文化内在意义断裂与价值失衡。

具言之,文化帝国主义数字生产链条的完竣倾轧了产品的文化意义,数字工具符号更在刻意营造同质化价值假象。在生产体系上,文化帝国主义凭仗数字智能垄断和平台资本剥削,已然建立起一整套契合数字生态成熟的文化产业运作体系和产品输出体系,使代码、程序、数据等具象化符号规定文化本体属性的异化,在推动人类向以文化产品数字生产与消费为主的智能社会迁徙进程中,植入西方意识形态的数字依托体系落成。在生产环境上,“资本总是在既定的具体场域中灵验有效……使它的所有者能够在所考虑的场域中对他人施加权力,运用影响”^②,洞察西方数字资本急剧膨胀建立的产业帝国,实质是利用数字技术的非理性价值建立能受其支配的文化输出环境,进而再生产西化意识形态和价值取向。同时,在产业数字交融与互渗的社会情境下,物理世界与虚拟空间的畛域弥合进一步增强了文化霸权的隐蔽性和蛊惑性。在生产内容上,智能性、交互性与多元性数字产品承载的是西方话语霸权和精神价值,数字媒介语境下的西方文化镜像营造的是一种畸形的、物欲的、快餐式的精神狂欢现象,这种虚假的“精神快感”会使人逐渐丧失对生存世界的反思维度、批判效度和超越向度,成为被统驭的“单向度的人”。

由于民族国家数字监管的“触手”难以覆盖,在算法精准推送的内容过滤机制下,受众的潜意识和精神自由长期被西方数字化产物宰制,极易在被动接受中出现“文化偏食”或产生“惯性依赖”。数字融合加速了文化身份的动态生产

①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中国文化产业年度报告(2022)〉发布:关注文化基因与中国道路》,2022年1月8日, http://creativity.china.com.cn/2022-01/08/content_41847162.htm。

② [法]皮埃尔·布迪厄、[美]华康德:《实践与反思:反思社会学导引》,李猛、李康译,中央编译出版社1998年版,第135~136页。

过程,也在解构主体特质化的身份认同感和归属感。在文化帝国主义构建的数字场域中,用户的共同身份沦为“芯片化的数字人”,将不得不遵从资本权力设定的数字规则宰制,在“程序员”操纵下无形且被迫接受“精神规训”,以致文化身份日趋同化和西化。而大数据画像信息精准“投食”的黑箱进一步消弭“数字参与者”的民族文化认同,这表现在标准化的西方文化编码借由算法匹配造成的“信息茧房”和“过滤气泡”,使主体长期浸没在相仿或重复的偏好文化世界中,在塑造对符号权力的权威和信任过程中渐进性地抵牾民族特质文化。需要指出的是,利用文化产品的形式价值、功能价值和逻辑价值,西方消费主义得以向用户拴套数字资本枷锁,挟制主体形成“数字拜物教”或“智能拜物教”的需求倾向。在落入资本剩余价值驱动的陷阱后,人也将异化为数字消费的“奴隶”。

(三) 数字霸权护持下的文化外交意图消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文化作为外交活动的基础要素,已然成为主权国家建构国家身份、塑造国际形象、推介优秀文化的重要手段。在西方中心主义的全球文明景观中,资本与权力的联动使数字技术丧失了本体价值维度,逐渐嬗变为实现资本主义文明使命的工具样态。文化帝国主义数字渗透和监控的畸形文明秩序引致文明互动异化为单向文化输出,数字硬实力裹挟下的文化帝国主义“柔性”外交成为宰制全球文明秩序、巩固其中心地位的异化手段。

数字时代文化帝国主义高度重视盟友协作推进意识形态渗透,其在全球公共场域中的数字权力异化性扩张进一步“掩饰了世界利益格局不平衡背后的垄断真相”^①。在美国拜登政府发布的《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中,有学者统计,“排名第一的关键词为 alliances”^②。美国一方面宣称将携手西方国家重振全球民主制度,在共同的民主价值观基石上开展数字层面的合作,另一方面又大肆渲染中国等国家利用数字工具监控其公民、操纵言论自由、策动网络入侵等虚假论调,强调共同应对数字技术“恶意操控”下的中国意识形态威胁。^③作为社会制度和意识形态的对立面,部分西方国家企图让“中国被民主、自由与开放的国际秩序所同化”^④,在数字硬实力同文化软权力的多方联结下,借由显性与隐性的数字媒介手段向中国输送西方意识形态成为惯常的做法,不仅操纵国际舆论为中国贴上“数字威胁论”“数字专制主义”“数字威权主义”等标签,更不择手段地拉帮结

① 孙冲亚:《数字帝国主义时代的文化安全风险及其应对》,《马克思主义研究》2021年第6期。

② 刘博怡:《拜登政府〈临时国家安全战略指南解读〉——基于话语分析的视角》,《情报杂志》2021年第9期。

③ Office of the Director of National Intelligence, “Annual Threat Assessment of the US Intelligence Community”, <https://www.dni.gov/files/ODNI/documents/assessments/ATA-2021-Unclassified-Report.pdf>.

④ The White House, “United States Strategic Approach to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 <https://gpa-mprod-mwp.s3.amazonaws.com/uploads/sites/23/2021/05/U.S.-Strategic-Approach-to-The-Peoples-Republic-of-China-Report-5.24v1.pdf>.

派,建立“反华同盟”,发布“互联网未来宣言”等小圈子帮规,企图拉拢盟国联合围猎其他国家,以维持数字场域内的单极文化向心力。

文化帝国主义固守零和博弈、文化霸权思维,其推崇的文化政策必然是附带圈层等级、文化排他与殖民掠夺的,物质主义与功利主义裹挟的部分西方国家只会构筑数字泛意识形态化的小院高墙。意识形态本质上是利益紧扣的价值主张,由于部分西方国家同我国在文化地位、文化价值、文化特性等方面存在不同,在话语权与主导权不平等的关系下,文化帝国主义为争夺数字霸权,禁止数字技术转移、撕毁数字合作条约、限制数据跨境流动等野蛮行径成为常态。另外,文化帝国主义在广泛培植智能化的意识形态代理人,依附虚实共生的数字场域缔造价值输送“温室”,在宰制数字信息实现独裁统治的同时委托资本集团势力及个体情报人员,以“清洁网络”等数字计划渐进性地推销文化殖民政策和掌控网络舆论。以跨国集团、媒体、水军、间谍、黑客为代表的代理数量庞大、领域广泛、隐蔽性强,具备高度的数字伪装能力和网络舆情引导力,意欲压制、操控和消解社会主义意识形态。

三、中国应对文化帝国主义数字殖民的现实路径

在“中心—边缘”文化圈层态势下的西方数字景观中,文化帝国主义夹带的意识形态风险和文化安全挑战长期存在。中国作为全球数字文明发展的重要“燃料剂”和“推进器”,在建构数字生态平衡、时空框架和媒介图景以维护国家文化安全的同时,也有能力为全球数字文明秩序“疏经通络”。

(一) 完善数字空间治理体系,形塑自主可控的数字主权屏障

作为国家权力在数字空间的逻辑延拓,数字主权是维护文化安全和发展利益的价值皈依。但主权的数字化也伴随主体与其他文明想象畛域的动态消融,提供了文化帝国主义利用数字秩序失衡进行大批量生产和熔接趋同性单质文化的可能,这使得民族共同体内群体身份认同和文化向心力弱化浪潮迭起。面对数字场域的文明失序失范风险,完善数字空间治理体系,实现数字管辖的自主可控是中国抑制文化帝国主义数字殖民的关键所在。

技术层面,需要领跑数字核心技术攻关和创新的“赛道”。意识形态数字渗透手段本质上是技术势差基础上“极易复制、存储、转移和使用的数据代码”^①,这就要求我们必须掌握数字核心技术底座架构的先发优势,修炼更高阶的数字智能。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关键领域、卡脖子的地方下大功夫,集合精锐力量,作出战略性安排,尽早取得突破,力争实现我国整体科技水平从跟跑向并

^① 刘杨钺、张旭:《政治秩序与网络空间国家主权的缘起》,《外交评论》2019年第1期。

行、领跑的战略性转变”^①。只有加快具有中国特色的数字技术攻关和创新，掌控数字技术发展话语权，才能在减削技术脱钩风险中化解文化霸权的数字辐射。

制度层面，需要强化数字制度体系的顶层设计和监管。一方面，数字场域边界的模糊性使得文化帝国主义宰制人工智能程序设定和算法模拟精准嵌入西方文化内核，由此需要构建数字信息审查和过滤制度、网络舆情监测和预警制度、隐私与数据安全制度、法治保障制度等立体化全方位的制度体系护航数字生态。另一方面，制度静态滞后和数字空间动态迁变二者间的矛盾要求人机交融共生，通过人类智能和人工智能的结合开展频繁性、普遍性的空间监管巡视来确保数字秩序平稳运行。

主体层面，需要建构权力主体与文化主体的数字景观。数字技术复建了意识形态生存空间和交往场域，因此必须坚持党对数字意识形态阵地的绝对领导，牢牢掌握数字关键节点和资源要素，形塑自主可控的数字主权屏障，进而有效维护中国的文化特性、文化地位与文化形象。在多元社会思潮博弈的数字生态系统内，更需要发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主导、价值引领作用，从而在重构主体的智能编码机制中凝聚中华民族文化共同体意识。

（二）回归数字良善向度，构建满足人需求的数字生产

数字生产催化了新的生产力革命，但作为人本质对象化的数字技术却趋于异化，即“数字成为主人”。现实系统性生存虚无加速了个体向“数字乌托邦”的集体迁徙行为，然而主体对数字的过度依赖也使之沦为“数字瘾君子”，甚至是数字奴隶。数字异化下的文化帝国主义生产不仅创造满足资本狂欢的数字内驱力，而且也在创造主体；不仅阻滞人类需求，而且也在泯灭人的自我同一性。从本体论审视，数字的逻辑原点是“人”，皈向是对人的终极关怀，是“要救人”^②。为此，需要发挥数字向善的基本维度，坚持数字生产回归人自身的终极指向。

首先，数字业态衍生须诉诸文化价值本体。文化帝国主义宰制的畸变数字业态“除了侵蚀人类的自我价值与就业价值，更可能侵蚀人的生命价值”^③。这本身负向背离文化价值本体——“人的存在和发展”。就发挥数字良善向度而言，一方面，坚持“本体思维”内嵌数字生产体系，避免落入资本增殖或权力扩张基本假设的圈套，尤其要扭转数字智能与人类智能割据局面，从而超越狭隘的工具主义或操作主义。另一方面，赋予数字“人性之善”及“文化之魂”，使数字的思想内核、人文印记、价值目标趋同于“人”，继而塑造基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248页。

^② [以色列] 尤瓦尔·赫拉利：《今日简史：人类命运大议题》，林俊宏译，中信出版集团2018年版，第294页。

^③ [英] 德里克·帕菲特：《理与人》，王新生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年版，第305页。

化的结构理论模型引导数字业态蝶变进程。

其次,数字生产环境应聚焦差异性的文化满足感。文化帝国主义力推数字生产环境最大化输出固有的单质文化模式,但伴随数字控制权易主同时辅助良性环境的调节,将回归多元文化创意主体持续供给优质文化内容的生态链。第一,推动算法和大数据的价值理性回归,从源头上撤废数字圈层分割,建构基于用户真实全面需求的差异性环境生产和信息传播;第二,钻探“精准推送”的反向路径,抑遏狭隘信息和偏激话语的滋长,同时运用反过滤机制实时分析用户文化数据,从而刺破“过滤气泡”;第三,在数字产品内容链和渠道链两端发力,利用其非线性链接延拓用户差异化、定制化、拟态化的文化环境体验和价值感知。

最后,数字生产内容当引导和培育理性文化需求。资本意志裹挟下的数字生产内容由于受众“自我意识消失,思想感情整齐划一倒向一边”^①,即单向度陷入庸俗功利的“娱乐至死”需求陷阱。为此,需要发挥数字工具重塑优势为受众呈现理性文化内容和文化符号,强化数字互动服务模型和用户画像科技钻研,科学划分内容圈层和领域,尤其要注重内嵌中华文化的优秀元素,提升主流文化持久“造血能力”,提供情感支撑和创造文化归属感。同时,提升个体的“数字素养”,将数字内容置于主体性之下审慎看待,使主体出离囿于资本狂欢框架和视野的消费“黑洞”,从而培育文化“调性”和审美旨趣,防范数字成瘾。

(三) 擘画文化外交新蓝图,彰显数字命运共同体的全球价值信条

文化帝国主义标榜的以数字合作共赢为虚假导向的文化外交,不仅难掩其数字殖民全球文明的深层次意图,更严重威胁以中国为代表的发展中国家的数字生态良性循环。在数字驱动和场景应用深入的全球背景下,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深度融入数字空间具有必要性和可行性。数字空间是全人类的共同家园,数字命运共同体是人类命运共同体在数字空间的诞生与演化,是其重要组成部分和具体体现,数字命运共同体在理念主张、基本原则、实践要求等方面与人类命运共同体既一脉相承,又充分展现了数字空间的特性和规律。同时,数字命运共同体的健康发展彰显了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旺盛生命力,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发展释放了共建潜力和数字催化活力,将会在数字时代建立更坚实的安全防线,达成更广泛的合作共识。因此,推动数字命运共同体框架内安全、包容、共建、共享的全球文明秩序重建,构筑全球数字治理合作新格局已然成为新时代文化外交的价值目标。

文化帝国主义缔造的数字生态体系内,数字资本与传统权力的交织持续合成和克隆文化极差结构,从而撑持和扩展“离线社会”的文化偏见。故此,需要祛除数字宰制下的西方文化神话,增强中华文化的镜像传播能力。一方面,“返

^① [法] 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杨献军译,台海出版社2019年版,第15页。

本开新”，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阐释框架、叙事体系、话语体系，实现中国故事的数字内嵌和镜像构造，“传播更多承载中华文化、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和文化产品”^①；另一方面，“创造转化”，充分利用全媒体传播闭环聚合各类文化资源，在文化传播机制方面进行数字创新、数字人才培育、数字文化资源库和平台搭建，延展中国文化镜像传播的数字通途。

数字命运共同体强调“做到发展共同推进、安全共同维护、治理共同参与、成果共同分享”^②，这预示着其将开启“核心价值—文明自觉—共同价值”引领下的数字合作新格局。随着多元文明主体价值取向、行为模型、利益观念等去中心化特征凸显，数字命运共同体俨然成为突破个体本位主义下西方文明筑壁数字牢笼的理念金钥匙。“和羹之美，在于合异。”（《三国志·夏侯玄传》）审视数字文明演进趋势，数字命运共同体将会重塑一个全新的数字文化疆域，它揭集了文化交往的本真样态，即基于不同文明交流互鉴的“数字世界主义”。由此，其将重构具有通约性和特质性的文化交流体系，各国也将借此主动调适文化外交政策，携手创造共同体内全球数字合作的新文化环境，重新建设数字文明“群芳竞艳”的百花园。

四、结语

党的二十大报告提出：“国家安全是民族复兴的根基。”^③ 在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新征程中，面对部分西方国家借助全球新一轮数字革命不断掠夺数据资源和谋求抢占数字技术制高点，以及企图改变数字领域的基本面貌和游戏规则的多重冲击，中国面临的文化安全风险将更加复杂。着眼于未来，我们不仅要“夯实内功”，构筑坚实的文化安全防护网，更要依据中国数字发展模式积极主动地参与全球数字化建设，推动构建数字命运共同体，在不同文明交流互鉴与合作共享的基础上维护中国的文化安全平衡态势。可以预见，随着未来中国在全球数字规则的制定和数字秩序的建构中发挥更大作用，中国的文化安全格局也将实现新的质的重塑，在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提供坚强的文化安全屏障的同时，也为人类数字文明的发展作出新的更大贡献。

①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 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推动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人民日报》2022年5月29日。

②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63页。

③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52页。

The Crisis Representation and Countermeasures of Cultural Imperialism's Digital Colonization

Li Mingzhe Gao Fujin

Abstract: The digital appearance of cultural imperialism is the epitome of hegemony in which monopoly capital continues to bite global civilization. Under the dual logic domination of capital proliferation and power expansion, cultural imperialism intends to step into the stage of digital monopoly. Its real purpose is to realize the value proliferation of digital capital in the one-way control of digital media with the help of digital reshaping of the transplanted coat and field of western cultural model, which has produced a series of new colonial crises of global civilization. At the level of cultural sovereignty, western ideological hegemony, which breaks through the barriers of time and space in reality, continues to eat the value orientation, discourse authority and even cultural foundation of other civilizations. At the level of cultural industry, distorted digital cultural production accelerates the alienation of cultural subjects under the symbol coding recommended by intelligent simulation and algorithm. At the level of cultural diplomacy, the policy and development trend of cultural imperialism under the linkage of capital and power stifle the order of digital civilization in China. In the process of building the digital barrier of cultural security, it is necessary to improve the digital space governance system for building a good digital format, and realize the value restoration of the digital destiny community and eliminate the global power of cultural imperialism digital colonization.

Keywords: Cultural Imperialism; Digital Colonization; Digital Technology; Cultural Security

[责任编辑: 于少青]

大数据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现实境遇及优化策略^{*}

樊瑞科 杜宝君^{**}

【摘要】大数据技术及其广泛应用正在成为影响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实效的重要技术变量与时空背景。大数据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面临利弊并存的现实境遇。从机遇来讲，大数据的思维方式、巨量规模、微粒特性、预测功能和实现手段为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创新、内涵丰富、精准传播、效能提升以及环介拓展具有正向效应。就挑战而言，数据至上思潮弱化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威属性，数据孤岛问题离散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数据伦理失范遮蔽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道义形象，数据资本逻辑挑战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人文精神，西方数据霸权加剧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风险，数据人技短板制约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动能。这就需要从培育数据素养、聚焦运作过程、重视载体建设、构建综治格局、捍卫数据主权和提升创新能力等维度探索大数据赋能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优化策略。

【关键词】大数据；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现实境遇；优化策略

当前，以海量数据的感知采集、储存管理和挖掘分析为特征的大数据技术及其广泛应用正在助推信息社会进入新阶段。面对大数据开启的重大时代转型，习近平总书记提出“谁掌握了大数据技术，谁就掌握了发展的资源和主动权”^①的

^{*} 本文系河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人工智能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SD2022059）、2020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大数据时代我国文化治理效能提升研究”（20BKS085）的阶段性成果。

^{**} 樊瑞科，法学博士，石家庄铁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杜宝君，石家庄铁道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科研助理，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科技创新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76页。

重要论断。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意识形态工作是为国家立心、为民族立魂的工作。”^①在大数据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这一“老话题”出现移动化、数据化、智能化、平台化等“新表征”。如何辨识大数据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机遇与挑战，并积极探索其优化策略便成为数智时代加强和改善党的意识形态工作的重要课题。

一、大数据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现实机遇

大数据有助于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新理念、新平台、新手段及新方式，对提升其建设实效发挥正向效应。

（一）大数据思维方式有助于创新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理念

大数据时代，人们的思维方式将会发生三大转变：由关注随机样本转为全样本分析，由追求精准效度转为乐于接受数据的纷繁复杂，由探求事物间的因果关系转为关注事物间的相关关系。^②这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理念创新提供了诸多启发。

首先，全样本分析有助于提升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整体性思维。从传统意义而言，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善于运用“解剖麻雀”式的小数据思维方式，但其也可能导致“一叶障目，不见泰山”。借助大数据技术，意识形态工作者通过分析大众在网络空间留下的数字足迹，洞悉不同群体乃至个人的心理特征、兴趣偏好、思想状态等，从而超越传统调查的样本局限和时空限制。大数据的全样本方式有利于意识形态工作者以全局化视角从海量数据中提取“为我所用”的有效信息，辨识主流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机遇挑战、影响因素和发展趋势等，以便于构筑全方位、宽领域、大融合的意识形态工作格局，不断增强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整体理念。其次，混杂性分析有助于提升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复杂性思维。受传统“灌输论”影响，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尚存在照本宣科、简单生硬等倾向，容易导致建设低效化问题。大数据时代，信息瞬息万变、类型千差万别、数据海量多元，更为彰显“不是精确性，而是混杂性”的思维方式。面对我国意识形态领域数据多元多样的新常态，采用“混杂性”分析方式有利于在坚持一元主导的同时包容多元，在更大范围内凝聚社会共识和实现大众的思想整合，不断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的凝聚力和引领力。最后，相关性分析有助于提升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系统性思维。“相关关系分析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43页。

^② 参见[英]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英]肯尼斯·库克耶：《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盛杨燕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29页。

本身意义重大,同时它也为研究因果关系奠定了基础。通过找出可能相关的事物,我们可以在此基础上进行进一步的因果关系分析,如果存在因果关系的话,我们再进行找出原因。”^①从静态结构而言,相关性分析有助于强化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实践要素构成的系统性审视。从动态运行而言,相关性分析有助于推进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从过去的事后被动应对向当下的事前主动预测的思维转型。

(二) 大数据巨量规模有助于丰富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时代内涵

大数据之“大”,不仅在于其数量规模之“大”,更在于其内蕴“大价值”、“大发展”和“大智慧”。大数据的巨量规模有助于丰富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时代内涵。

首先,大数据巨量规模凸显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数字化特征。在大数据时代,巨量化数据逐渐被视为信息社会的本质属性。然而,“数据的本质归根结蒂仍然是人的本质。无论是作为人类认识自然、社会的工具,还是作为人类认识自身的方法,数据终究都是对于现实物质的对象性反映”^②。就社会实践对意识形态建设的决定作用而言,大数据巨量规模有助于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理论创新与宣传普及,为丰富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时代内涵提供日益增多、愈显重要的数据资源。

其次,大数据巨量规模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创新提供数据资源。从经济上看,大数据的巨量规模有利于丰富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的时代内涵,尤其是赋予生产力理论、资源配置理论、生产社会化理论以及分配理论新内容。从政治上看,党和政府高度重视并发挥大数据巨量规模在推动政治民主化和国家治理现代化中的积极作用,从而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主义政治民主观、国家治理观、权力监督观等内容。大数据在助力我国经济政治变革创新的同时也必将赋予意识形态建设新内涵。

最后,大数据巨量规模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教普及提供数据支撑。一方面,大数据巨量规模赋能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宣教对象的“精准画像”。借助大数据技术对海量民生数据进行立体化感知和全方位采集,有助于深入了解社情民意、引领社会舆论,为优化改善意识形态的宣教模式,提升其时代化、科学化水平提供数据支撑。另一方面,大数据巨量规模为拓展和创新意识形态宣教普及的载体提供必要的的数据资源。在感知和获取巨量数据的基础上,通过对相关数据的分析挖掘与可视化呈现,促成意识形态宣教模式由“粗放型”向“精细化”

^① [英] 维克托·迈尔·舍恩伯格、[英] 肯尼斯·库克耶:《大数据时代:生活、工作与思维的大变革》,盛杨燕等译,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年版,第88页。

^② 吴朝文、任思奇、邓淑华:《马克思主义技术哲学视野下的大数据观探析》,《求实》2017年第7期。

的时代转型。

（三）大数据微粒特征有助于赋能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精准传播

大数据微粒特征是指在数字化生存的信息社会，大数据技术对社会解析的“颗粒度”^①越来越低，对社会状态的感知与把握愈发精准的时代特征。

首先，大数据微粒特征便于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受众的精准识别。大数据技术为意识形态传播受众的精准识别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当前，虚拟空间正在生成更为复杂多变的网络社群。例如，在以血缘、地缘、趣缘等为特征的圈层传播中，网络意见领袖发挥着至关重要的核心作用。大数据微粒特征有助于在对传播受众进行精准感知和识别的基础上形成更具个性化、针对性的引领策略，提升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的精准度。

其次，大数据微粒特征便于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内容的精准供给。在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技术的广泛应用将产生“比你更了解你”的神奇效果。大数据技术对人类社会的解析度和精确性越高，越便于我国主流意识形态传播内容的精准感知和有效提炼，其也成为提升我国主流意识形态有效传播的关键环节和实现主流意识形态社会认同的根本所系。因而，极具微粒特征的大数据成为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内容供给侧改革的新动能。

最后，大数据微粒特征便于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传播媒介的精准选用。伴随大数据技术与媒体的深度融合，意识形态传播媒介也开启了从“靠事实说话”的“内容为王”向“让数据驱动”的“流量至上”的时代转型。大数据微粒特征有助于我国主流媒体实时收集广泛受众的海量数据，针对千人千面的受众群体，精准选取与之匹配的传播内容与媒介，在寓教于乐中不断拓展主流意识形态传播范围，增强大众对主流意识形态的认同。

（四）大数据预测功能有助于提升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治理效能

“当今时代，社会思想观念和价值取向日趋活跃，主流的和非主流的同时并存，先进的和落后的相互交织，社会思潮纷纭激荡。”^② 大数据预测功能有助于为提升我国意识形态治理能力的协同性、预见性、前瞻性提供崭新的治理理念和技术支撑。

首先，大数据预测功能有助于提升我国意识形态治理能力的整体协同性。在某种程度上而言，我国意识形态治理长期存在“拍脑袋”决策的老问题与治理模式的“形式化”问题，从而制约意识形态治理效能提升。在大数据时代，基

^① 颗粒度指的是观察和测量单位的精确程度，类似于照相机的像素，颗粒度越低，精确度越高，能够看到的微观细节越多，能够观察和区分的维度也越多。

^②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159页。

于海量数据的不断涌现和大数据技术的迭代升级,大数据的预测能力获得极大提升,利用大数据在感知社情民意、舆情动态的基础上积极引领多样化社会思潮和价值理念也具有现实可行性。大数据预测功能有助于从创新治理理念、协同治理主体、提升治理技术等方面提升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治理效能。

其次,大数据预测功能有助于提升我国意识形态治理能力的主动预见性。过去,我国意识形态工作在理论创新和实践治理中长期存在“滞后性”倾向,极易激化社会矛盾、撕裂社会共识。大数据为科学研判和合理处理社会舆情、网络事件等提供了新的技术手段。通过应用大数据技术,对事关各类舆论的复杂变量进行实时监控,及时发现并处理海量的结构性和非结构性舆情风险数据,借助科学有效的信息疏导机制,有利于推动意识形态风险治理由“亡羊补牢”向“未雨绸缪”的模式转型,增强意识形态治理的预见性、主动性和科学性。

最后,大数据预测功能有助于提升我国意识形态治理能力的动态即时性。大数据的预测功能通过对海量数据的及时利用有助于充分发挥数据的最大价值性,从而提升我国意识形态治理实效。尤其是在网络意识形态治理中,大数据预测分析有助于实现网络舆情全过程的动态监测,依托智能感知设备和数据挖掘技术实时处理高速流转的巨量数据,把握网络舆情的生产源头、扩散规律与传播趋势,从而实现网络热点事件的实时跟踪监测,使网络舆情监测工作更具技术性、时效性、针对性。

(五) 大数据实现手段有利于拓展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方式

大数据技术嵌入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不是生硬拼装,而是需要有机互嵌。这就需要以各类数据库为依托、以算法技术为引擎、以人工智能为载体,发挥数据驱动的赋能作用,不断扩展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平台载体。

首先,数据库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信息化载体。在大数据时代,数据库技术的广泛应用极大地提高了数据管理的效率,同时也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平台建设提供了更先进的技术动能和更广泛的载体支撑。一方面,借助数据库在数据存储、搜集和查询中的技术优势,可满足意识形态建设对数据资源的庞大需求和实时更新;另一方面,借助数据库在数据分析和应用中的技术优势,可实现数字资源的结构化、条理化 and 可视化,进而为意识形态工作提供更先进的技术服务。

其次,算法技术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技术支撑。在大数据时代,海量数据本身无法实现主动发声,算法技术成为将数据从生产要素转化为技术赋能的关键所在。对于意识形态建设而言,“大数据时代的算法技术快速发展,改变互联网信息传播方式,影响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分布格局和延伸领域”^①。以

^① 陈联俊:《算法技术影响网络空间意识形态安全探析》,《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研究》2021年第8期。

智能媒体为例,基于算法技术的信息分发模式有效解决了信息与人的精准匹配问题,实现了由传者主导向受众本位信息传送方式的新变革,其对于破解意识形态传播困境、扩大传播受众、丰富传播内容、提升传播技能、拓展传播载体等带来了新机遇。

最后,人工智能为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提供智慧服务。人工智能作为大数据发展的新阶段,其“被用来广泛采集用户信息、分析用户特征,以此为基础判断、干预甚至操控社会问题与社会现象”,^①同时也成为赋能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新动力。人工智能使传播权力去中心化特征更为凸显,传播载体和方式更加多元,传播体验更为良好。主流媒体积极利用人工智能技术,通过开发智能写稿机器人、创设虚拟主播等方式,有效提高和扩大了信息的生成效率与传播范围,提高了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精度和效度。

二、大数据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严峻挑战

“在我们这个时代,每一种事物好像都包含有自己的反面。”^②科技的“双刃剑”效应告诉我们,大数据在赋能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同时也使其面临严峻挑战。

(一) 数据至上思潮弱化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威属性

从意识形态视角而言,大数据凭借巨大魔力和神奇力量正在催生一种“数据至上”的社会思潮。这一思潮将数据视为识别事物的唯一标识,将数据视为评判事物价值的至上原则,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权威属性和主导地位提出了严峻挑战。

一方面,数据至上思潮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政治权威提出挑战。大数据时代,数据已然成为信息社会的生产要素和战略资源,然而“现有大数据企业多数为外资控股或具有外资背景,民族企业尤其是国有企业稀缺,国有资本在这一领域不仅不占主体地位,而且缺乏必要的控制力”^③。私营资本、外资企业等非公经济形式对我国大数据产业的资本操控极有可能演变为严峻的经济和政治风险,进而消解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政治权威。另一方面,数据至上思潮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理论权威产生负面影响。从理论维度来看,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鲜明的人民性、科学性、实践性等特征,具有掌握群众的理论权威。可是,数据至上思潮导致数据主义的泛滥,即“所有决策都应

① 杨爱华:《人工智能中的意识形态风险与应对》,《求索》2021年第1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80页。

③ 杨莘:《透析国家安全视野中的大数据发展问题》,《国家治理》2016年第37期。

当逐渐摒弃经验与直觉，并加大对数据与分析的倚重”^①，单纯的数据分析将减弱我国意识形态建设以理服人、以情感人的传统优势，降低意识形态工作应有的人情温度。“数据至上”“流量为王”成为全社会信奉的畸形价值观后，由此诱发的“群魔乱舞”的网络乱象便成为影响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理论权威的数字噪声。

（二）数据孤岛问题离散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

大数据时代的“数据孤岛”不仅指政府或者企业由于各种原因数据无法共享的老问题，也包括不同社会群体乃至普通个体在数据洪流冲击下形成的社群区隔、观点极端等新情况，其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提出了新挑战。

一方面，政府的数据孤岛问题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整合功能提出新挑战。当下，我国政务数据开放程度尚有待提升，加之“数据基础不牢、数据管理不规范、数据安全威胁等”，数据孤岛问题更为突出。政务数据孤岛问题已成为影响大数据在国家治理中发挥整合、分析与应用功能的主要梗阻，制约大数据提升国家治理效能，影响廉洁型、服务型、创新型政府创建，不利于政府良好形象塑造，进而削弱了主流意识形态的社会认同。“在政府数据开放价值创造过程中，由于缺乏强制或激励等措施促使个体为实现集体利益而行动，因此理性的个体会优先考虑自身利益，从而有可能出现行为不当。这会对信任、价值观、满意度等产生负面影响，引起连锁反应，出现价值共同破坏。”^② 综上，政务数据孤岛问题导致价值共识不断被消解，进而影响主流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另一方面，非政府主体的数据孤岛问题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整合功能提出新挑战。“非政府主体”泛指除政府主体之外的其他社会主体，例如企业组织、社会群体、公民个体等，其基于各自不同的利益考量也容易催生数据孤岛问题。例如，掌握海量数据的企业主体凭借垄断地位侵犯消费者合法权益、干扰市场秩序，甚至威胁国家数据安全，导致主流意识形态整合能力受限。此外，美国学者桑斯坦认为，伴随数字时代个性化信息服务的兴起，将会形成信息茧房，即“我们只听我们选择的东西和愉悦我们的东西”^③。信息茧房导致受众倾向于选择接受相同或者类似的信息和社群，逐渐形成信息窄化和群体极化的“回音室效应”，极可能在不同受众之间筑起信息和观念的隔离墙，使得社会共识难以形成，进而弱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整合功能。

① [美] 史蒂夫·洛尔：《大数据主义》，胡小锐、朱胜超译，中信出版集团2015年版，第93～94页。

② 韩啸、陈亮：《政府数据开放价值创造缘何失败？——基于价值共同破坏视角的新解释》，《公共管理评论》2021年第3期。

③ [美] 凯斯·R. 桑斯坦：《信息乌托邦：众人如何生产知识》，毕竞悦译，法律出版社2008年版，第8页。

（三）数据伦理失范遮蔽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道义形象

数据伦理失范是大数据技术风险中的一个突出问题，主要包括“透明人”主体危机、价值迷失乱象以及数据鸿沟。数据伦理失范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崇高形象构成了严重冲击，遮蔽了其道义形象。

首先，“透明人”主体危机遮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人学色彩。追求人的解放和幸福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崇高理想和道义基础。在万物皆数的大数据时代，人的主体地位遭到严峻冲击，正在从有血有肉的“有机人”向数据化的“透明人”转变。在数字化生存的时代境遇中，人的各种信息都可以通过数据的形式被记录、储存、分析和应用，由此引发的隐私泄露、大数据杀熟、数据歧视等问题层出不穷。大数据技术从为人服务的新工具异化为操控人、奴役人的数字型杀伤武器，进而遮蔽了主流意识形态的人学色彩。

其次，价值迷失乱象解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核心角色。从哲学层面而言，大数据思维是后现代主义思潮在数字化时代的新表征。以反对理性权威和宏大叙事的后现代主义具有强烈的去中心、多元化、碎片化的解构色彩。“后现代主义的去中心化思维为大数据的多元化数据思维提供了哲学基础，大数据的多样性数据策略是后现代主义去中心化的技术相应。”^①特别是在5G、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人工智能等新技术赋能下，“全媒体不断发展，出现了全程媒体、全息媒体、全员媒体、全效媒体，信息无处不在、无所不及、无人不用，导致舆论生态、媒体格局、传播方式发生深刻变化，新闻舆论工作面临新的挑战”^②。“众神狂欢”的舆论生态对“以人为本”的主流意识形态道义形象造成冲击。

最后，数据鸿沟问题弱化了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公正形象。“‘道义’主要是道德上的公正，即公平正义。”^③对公平正义的追求是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应有之义。数据鸿沟引发的社会信息化失衡问题，即大数据及相关基础设施、大数据技术应用能力、大数据核心素养等在城乡、区域、阶层等不同社会群体中的发展差距，进一步加剧了信息时代社会不公的问题。这一问题极有可能进一步放大社会信息化进程中的马太效应，加剧社会群体的固化、分化和极化，遮蔽主流意识形态的道义形象。

（四）数据资本逻辑挑战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人文精神

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具有强烈的人文精神和深刻的人文关怀。数据资本作为一种新型权力，不仅加剧了大数据工具理性倾向，导致了数字劳动异化问题和

① 王英：《从后现代主义、后工业社会到大数据时代》，《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7年第3期。

② 习近平：《论党的宣传思想工作》，中央文献出版社2020年版，第354页。

③ 江畅：《核心价值观的合理性与道义性社会认同》，《中国社会科学》2018年第4期。

平台霸权现象,对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人文精神构成挑战。

首先,数据资本逻辑增强了大数据工具理性倾向。在大数据时代,万事万物无时无刻不被泛在网络所链接,大数据通过隐形渗透和有机嵌入的方式进入社会生活,其工具理性逐渐被放大进而获得了对人的操控和支配权力。“让数据发声、由数据决策”的认知模式和实践建构开始成为人们认识与改造世界的新途径,并逐渐形成了优化资源配置、改善民生福祉以及提升公共治理效能的认识论基础。

其次,数据资本逻辑带来了“数字劳动”异化问题。数据资本逻辑,即数据进行资本化运动从而生成数据资本权力的过程。在大数据时代,人们创造、使用的数字技术及从事的数字劳动,正在演变成外在的异己力量来支配人、奴役人,从而使人成为数据网络技术链条上的节点。

最后,数据资本逻辑导致了“平台霸权”现象。当前,平台巨头凭借其软硬件的绝对优势将本应开放共享的网络空间打造成大型“数据采矿场”,不断扩充“数据领地”和进行“圈数运动”,通过对用户生成的海量数据进行全方位采集、分析和应用,将数据由本应服务人的便捷载体变成了操纵、剥削人的残酷工具,减弱了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人文关怀,解构了其人文精神属性。

(五) 西方数据霸权增加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安全风险

在大数据时代,大数据成为国际竞争和大国博弈的新焦点。以美国为代表的西方国家凭借先发优势和雄厚实力,催生出新的霸权形式,即数据霸权。这对我国的数据主权和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严峻挑战。

一方面,西方在大数据及相关设施的技术霸权削弱了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的技术保障。美国凭借强大的技术霸权,将大数据的美国标准泛化为世界标准,对他国的网络安全和数据主权构成严峻的威胁。同时,“在技术统治的基础上,各种非经济的上层建筑也体现出跨国垄断集团的价值取向”^①。美国的技术霸权还表现在对我国相关企业进行无理打压、肆意发动贸易战、技术战等,试图通过“数字技术政治化”^②阻止我国信息产业发展和“数字中国”战略的顺利实施,掣肘我国维护网络意识形态安全的技术能力。另一方面,西方政府与平台巨头的合谋放大了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安全风险。平台是一种以控制和提取数据为核心的新型商业模式和公司类型。有关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在全球市值最高的前十家公司中,除沙特阿美(排名第三)和我国台湾地区的台积电(排名第十)外,其他八家均为美国的平台巨头,“美国政府情报部门通过加深与这些互联网行业垄断资本巨头的合作,在培育海外市场消费群体和消费习惯的过程

^① 杜娟:《透视帝国主义在互联网时代的新变化》,《马克思主义研究》2018年第7期。

^② “数字技术政治化”是将数字技术与大国战略竞争、制度及价值观差异挂钩,是技术优势垄断者阻碍后发者采取的一种策略。

中，潜移默化地改变这些人群的政治价值观。同时，利用植入产品之中的后门，窃取用户的大量隐私，用以为美国政府服务”^①。事实表明，中国是美国的重点“照顾对象”，西方政权与垄断资本的合谋对我国网络意识形态安全构成严峻挑战。

（六）数据人技短板制约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动能

我国大数据发展面临人才短缺和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双重制约。数据人技短板不仅是限制我国大数据技术研发和广泛应用的两大命门，而且也成为大数据时代制约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动能的突出问题。

一方面，大数据人才供给不足弱化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动能。当前，大数据人才主要流向 IT、智能制造、商业咨询、金融服务等高薪行业。党政机关特别是意识形态部门，在薪酬待遇、职业前景等方面并没有绝对优势，对相关人才吸引力不足。另外，我国意识形态队伍大多数是哲学社会科学的学科背景，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和宣教工作，对信息技术尤其是前沿技术缺少前瞻性的关注和主动性的应用，在利用大数据进行意识形态建设时存在本领恐慌与能力不足的问题。另一方面，大数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限制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建设动能。当前，我国在大数据的底层架构、核心算法、数据库以及平台系统、现实应用等层面与发达国家相比存在较大差距。大数据核心技术受制于人的困境加剧了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应对西方意识形态渗透的难度，增加了我国意识形态安全风险。特别是西方国家凭借技术和平台优势，在大数据时代搞“和平演变”和“颜色革命”，企图操控市场和主导价值观，更应该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

三、大数据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优化策略

针对大数据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面临的严峻挑战，积极探索大数据赋能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优化策略便成为一项重要的时代课题。

（一）提升大数据赋能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主体能力

利用大数据加强和改善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需要以提升数据素养为抓手，解决意识形态工作者意识不强和本领不足的问题。

首先，树立意识形态工作者的大数据意识。这就要求：意识形态工作者应主动拥抱大数据时代。意识形态工作者应积极拥抱大数据，尝试应用大数据，将海量数据视为实现意识形态工作内涵式发展的重要战略资源，借助以推崇客观精

^① 李艳艳：《美国互联网政治意识形态输出战略与应对》，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8 年版，第 68 页。

准、理性逻辑为核心的数据文化推动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改革创新。意识形态工作者要高度重视大数据价值。意识形态工作者应重视对相关数据的分析挖掘,通过对网民“数字痕迹”的预测研判,利用大数据技术分析其思想动向并及时解决倾向性问题。意识形态工作者要主动了解大数据常识,让意识形态工作者都成为大数据专家是不现实的要求,但应支持和鼓励其了解大数据常识、大数据工作原理和运作流程,熟悉大数据的典型应用,能看懂其分析结果,将大数据视为做好意识形态工作的新利器。

其次,增强意识形态工作者的大数据思维。这就要求:一要提升整体思维。意识形态工作者要注重运用大数据技术对网络数据进行分析,避免“只谋一域,不重整体”,进而更加全面、准确感知社会民意与洞悉舆情走向。二要树立相关思维。相比于“出现问题—逻辑分析—找出因果关系—提出解决方案”的传统理念,大数据开创了一种“搜集数据—量化分析—找出相互关系—提出优化方案”的思维模式。大数据时代,意识形态工作者应在坚持因果思维传统的同时,积极培育以经济高效为特征的相关性思维。三要增强底线思维。意识形态工作者应善于利用大数据预测性功能及时精准感知意识形态风险源,对可能出现的意识形态问题进行前瞻分析和及时干预,守住意识形态安全底线。四要养成共享思维。意识形态工作者应破除门户之见,在发挥各自优势的基础上形成意识形态工作的创新合力。

最后,锻造意识形态工作者的大数据能力。这就要求:一方面,要锻造数据鉴别能力。意识形态工作者要树立正确的大数据观,力避落入“数据至上”的陷阱,对大数据不盲从、不迷信,坚持从现实问题出发,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为指导,针对意识形态工作的现实需要,有规划、有选择、有侧重地对海量异质数据进行科学利用,提升数据分析质量,提高数据鉴别能力和批判意识。另一方面,要锻造数据应用能力。大数据的价值在于通过大数据技术从纷繁复杂的海量数据中发现隐匿其间的规模性认识。这就要求意识形态工作者掌握一些常用的代表性的数据采集获取、存储管理和分析应用的技术方法,增强意识形态工作的时代性、科学性和实效性。

(二) 优化大数据赋能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实现机制

利用大数据加强和改善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需要关注大数据运作机制,通过优化大数据获取、分析与输出等环节提升意识形态建设实效。

首先,在大数据获取中优化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内容供给。大数据获取是指利用大数据感知采集技术对各种数据库、智能设备、网站及客户端等进行数据实时采集及预处理。党和政府应通过加强制定政策、健全法规等方式不断提升意识形态相关数据的开放度,加强数据的增值开发和创新利用。同时,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和规制大数据及其相关产业的发展取向,打破技术和资本勾

连而形成的“数据宰制”倾向等,从而使大数据真正反映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承载其现实需求和精神期待,为加强意识形态内容供给提供海量翔实的数据资源。此外,在数据获取的同时还需通过数据清洗、数据脱敏等预处理来降低数据噪声,减少国家数据安全、个人数据隐私等各类应用风险和潜在隐患,增强大数据的真实性、可用性和针对性。

其次,在大数据分析中凸显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价值导向。在大数据分析中,算法是将数据提升为知识和智慧的关键所在。大数据赋能意识形态建设必须规范算法的价值导向。这就要求:一是在算法设计编制的初始阶段就应体现主流意识形态的价值引领,通过对技术精英和商业领袖的价值观教育、提高负载主流价值观数据的变量权重等方式加以调适。二是在算法的数据喂食阶段,将主流意识形态的引领和规范贯穿于数据选取、挖掘、清洗、析出的全过程,使数据再造尽可能彰显真实客观、健康向上、正向审美的价值取向。三是在算法的核审阶段,通过人机结合的方式,尽可能屏蔽、淘汰那些标题耸人、内容空虚等垃圾数据,强化对正向信息的推荐权重。四是优化调控智能推送的技术手段,通过实行实名认证制度,开发儿童模式或者青少年模式、时长限定模式、防沉迷系统等,有效破解算法价值偏差问题。

最后,在大数据输出中丰富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呈现方式。大数据输出是指大数据应用场景和展示方式,可视化和可视分析技术是其核心内容。意识形态建设应主动寻求与可视化技术和可视分析的有机融合。这就要求:一要提升意识形态的理论内涵和文化品格,这是根本。主流意识形态必须紧跟时代潮流、观照大众生活,不断增强其人民性、时代性、实践性,为可视化呈现提供原始内容。二要强化队伍建设和培育公众素养,这是保障。意识形态工作者要提升政治站位和政治觉悟,在树立和提升视觉化传播理念和技能上下功夫。此外,通过学校教育、大众媒体、专题培训、组织竞赛、参观考察等方式,提升公众对可视化呈现的辩证度,助力其对主流意识形态主动接受和积极认同。三要创新意识形态呈现方式,这是关键。数据可视化多以图形、表格、视频等方式进行常规呈现,且可借助虚拟现实、增强现实、混合现实等实现方式创新。这对意识形态工作而言,无疑有助于提升表现力和传播效果,借助这种隐形传播方式能够更好地强化受众对传播内容的接受和认同。

(三) 拓展大数据赋能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渠道

在大数据时代,加强和改善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需要重视对数据化中介环节的创新性应用。

首先,重视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数据库建设。一方面,完善现有的意识形态数据库。从实际应用而言,许多现有专业数据库尚存在“不专业”现象,建议国家相关部门强化政策、财政、人才和技术支撑,推动意识形态工作者和数据

库专业人员通力合作，及时整合和吸纳相关理论内容和文献资源，不断丰富原有数据库的内容和优化其子库设计，不断改善用户体验，提高数据库利用率。另一方面，建立国家级的权威数据库。可考虑由中宣部牵头，联合中国社科院、中央党校、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国家图书馆、人民出版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相关单位，克服数据孤岛问题，发挥各自在意识形态数据库创建中的比较优势，通过公开招投标形式引入专业公司进行数据库的研发、运营和维护，在坚持公益属性的基础上兼顾商业化诉求，打造一个功能完善、资源丰富、功能完备、安全可靠的国家级意识形态数据库。

其次，优化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传播载体。基于海量数据与智能算法的双重加持，大数据时代传播的微型化、精准化、智能化特征更为明显。这就要求：一要推进传播微型化。在大数据时代，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可以借助以“三微一端”为代表的微型载体提升传播效果。二要提升传播的精准度。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要顺应大数据时代分众化、个性化、差异化的传播趋势，不断构建立体多样的现代传播体系，提升传播的精准度。三要提升传播的智能化水平。这就需要通过树立“关爱算法”的传播理念，改革体制机制、加大资金投入力度、充实专业队伍等助力主流媒体的智能化转型，在推动媒介融合中加强主流意识形态对算法推荐的引领和规范，平台媒体还应主动邀请党政机关入驻平台，优化算法推荐的权重配比等，以主流意识形态引导平台媒体健康发展，以平台媒体扩展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平台，在融合共赢中实现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有效传播。

最后，创新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言说方式。这就要求：一要推动官方话语大众化。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应密切关注受众切身感受和社会热点话题，不断创新话语叙事逻辑，多运用大众化语言风格和言说方式，促进官方话语由“高居庙堂”到“下接地气”的转变。二要推动政治话语学理化。这就需要将政治话语转化为学术话语，重视用学术话语讲清楚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逻辑、历史逻辑与价值宗旨等基本问题。三要推动传播话语时代化。网络语言以其诙谐幽默、时尚新颖等特征迎合了大众主体性的释放和狂欢化的表达需求，表现出强大的传播能力和社会动员潜力。“当代中国主流媒体和网络媒体应该及时跟进网民对网络语言的创造和使用，并通过灵活多变的语言形式不断将其转化为能够承载和宣传主流意识形态的语言形式。”^①

（四）形成大数据赋能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多元合力

大数据赋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是一个涉及面广、关联性强的系统工程，需要构建党委领导、政府管理、企业履责、公众参与的综合治理格局。

^① 樊瑞科：《大众文化视域下当代中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研究》，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172页。

首先,在大数据赋能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坚持党的方向引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最本质特征和最大优势。只有始终坚持党的集中统一领导,发挥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的引领作用,才能确保大数据赋能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正确方向。这就要求:一方面,党中央和地方各级党委应在大数据赋能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发挥顶层设计、整体谋划和统筹协调的领导核心作用;另一方面,党的领导需要党的组织来保证和推进,尤其要明确党委书记第一责任人的领导职责,培育“少数关键”的大数据思维和大数据能力。

其次,在大数据赋能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提升政府治理效能。这就要求:一要完善数据公开共享机制。考虑到意识形态工作的特殊性,可以通过在相关数据收集、使用、公布、审核、提取等流程中制定有针对性的规章制度,完善意识形态相关数据可信任、可验证、可溯源的具体机制,有效解决其在使用和管理过程中的规范性、科学性、安全性问题。还可通过算法技术对不同类型的数据进行不同规格的标注,对风险系数较低的意识形态数据尽可能公开共享,而对于涉及国家安全和公民权利等敏感数据,在遵守相关法规的基础上进行脱敏处理后再进行公开共享。二要健全舆论引导机制。我国政府可借助数字平台,拓宽干部群众网络沟通渠道,对网络舆情进行全天候、立体式和精准化的感知采集、分析研判,为意识形态决策提供数据支持和技术支撑。三要完善法治监管机制。应做好大数据和意识形态领域相关立法工作,提升法规的针对性和执行力。此外,就意识形态建设而言,政府应加强对互联网企业的监管,防止其在用户数据采集、存储、分析和应用中出现违法、违规、违德行为,维护国家信息安全、数据主权以及公民个体的合法权利。

再次,在大数据赋能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倡导企业自觉履责。这就要求:一方面,互联网企业应在维护数据安全和意识形态安全上承担主体责任。相关企业应以“不为恶”为底线,通过加强国际合作、增强合规意识,采用多种形式,在维护自身合法权益的同时维护国家安全和用户权益,始终坚持把不危害国家信息安全和数据主权以及意识形态安全作为企业运营的底线思维。另一方面,互联网企业应坚持经济效益与社会效益并重的基本原则。当前,数据至上、流量为王的极端倾向和资本逐利的本性相互交织,致使我国大数据发展面临数据垄断、数据歧视、数据侵权等有违公序良俗和人文伦理的风险挑战,互联网企业应以主流意识形态、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价值遵循,坚持“科技向善”^①的经营理念,在追求利润的同时自觉履行社会责任。

^① 企业科技向善是指企业主动地利用负责任的创新技术解决社会问题,把道德理念融入产品设计与科技应用中,为社会公共利益服务,追求社会服务效率提升和社会价值创造,在实现集体利益的过程中获得商业利润。

最后,在大数据赋能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中培育公民数据素养。在大数据赋能意识形态建设中,广大群众不是被动的客体,而是重要的主体力量。这就要求:一要提高公众数字化生存意识和能力。国家应制定相关政策,增加资金投入,纳入国民教育,进行专题培训,借助媒体宣传和倡导公民自学等方式综合施策,不断增强公众的数据思维、数据伦理和数据能力。二要提高公众媒介化生存意识和能力。在大数据时代,承载主流意识形态的数据正在向网络、云端和客户端转移,主流意识形态的传播环境更为复杂多变,对公众媒介素养提出了更高的要求,这就更需要公众提高主体自觉意识和信息辨别能力。三要提高公众过好意识形态生活的能力。个人只有通过社会教化与意识形态认同,才可能对以这种意识形态为指导思想的社会产生心理认同,进而过上正常的生活。这就需要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为培育公民理论思维提供丰富的理论资源,当前重点是引导公众对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学习和理解,帮助大众了解认识当前党和国家的大政方针。此外,还应采取多种方式和运用各类载体加强和提升主流意识形态的宣教效果,以喜闻乐见的方式推动理论大众化。

(五) 创设大数据赋能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安全环境

“在互联网这个战场上,我们能否顶得住、打得赢,直接关系我国意识形态安全和政权安全。”^① 大数据赋能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需要创设更安全的外部环境。

首先,在抵制西方大数据霸权行径中维护数据主权和意识形态安全。这就要求:一是在深刻剖析数字帝国主义的本质基础上辩证看待西方大数据技术及其应用。我们应通过提高风险防范意识、培育文化自觉自信、强化核心技术的创新和应用能力、扩展主流意识形态的数字阵地、建立健全网络预警应急机制等方式筑牢我国数据主权和意识形态安全的“隔离墙”。同时,面对大数据技术的全球应用和数据的跨境流通,我们应以开放包容的心态和借鉴创新的理念对待西方大数据技术及其应用,通过引进消化吸收再创新将其转化为维护我国数据主权和意识形态安全的新利器。二是在批判西方大数据工具主义倾向的基础上实现大数据价值理性的回归。西方政治精英、技术专家与金融资本的合谋使西方世界进入“数字帝国主义”新阶段,大数据技术的工具理性得以极度张扬,大数据技术成为垄断资本家谋取超额利润的新工具。这就需要发挥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理论批判和价值引领作用,对大数据技术进行价值理性和人文精神的赋权,从而克服西方大数据霸权对主流意识形态的消极影响。三是警惕西方大数据霸权借助文化形式对

^①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51页。

我国进行意识形态的隐形渗透。西方大数据霸权也体现为以信息产业、数字产品为载体的文化霸权。以推特、脸书等为代表的社交媒体便是西方世界向全球推销其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意识形态的超级平台。这就需要坚持以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深刻剖析西方文化霸权的历史渊源、宰制逻辑及其数字化趋势,科学解码大数据时代西方文化霸权的内在结构和外在表征,通过综合运用国家政策、法治手段、行业监管、技术工具等防范化解其给我国数据主权和意识形态安全带来的风险隐患。

其次,在引领大数据治理体系变革中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国际话语权。针对当今世界信息化、数字化、智能化的时代转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大国网络安全博弈,不单是技术博弈,还是理念博弈、话语权博弈。”^①在全球大数据“西强东弱”整体格局中,西方在大数据的跨境流动、技术标准、伦理主张、政府治理、国际合作等诸多领域依然具有强大的话语权。因此,积极引领大数据治理体系变革,提升我国在大数据国际治理体系中的话语权,成为确保我国大数据国家战略顺利实施的重要保障。这就需要我们从小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高度,积极参与并主动引领全球大数据治理体系的变革,通过提出中国方案、倡导国际合作、主导规则制定等坚决反对数据霸权、抵制和消除“数据鸿沟”,使其真正体现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国际互联网治理体系“四项原则”“五点主张”,构建互利共赢的大数据治理人类命运共同体。

最后,在利用大数据讲好中国故事中优化主流意识形态的对外传播。这就要求:一是扩展我国主流意识形态对外传播的媒介载体。大数据时代,信息生成与传播更为迅捷,针对西方媒体抹黑、丑化、妖魔化中国的伎俩,我国媒体尤其中央媒体应在对外传播中承担重要职责,通过打造“外宣旗舰媒体”,提高涉华信息的供给能力,主动进行设置议程和及时发声,提升我国主流意识形态的国际话语权。同时,主流媒体应加快媒介融合步伐,发挥传统媒体“内容为王”与新型媒体“流量优先”的综合优势,通过“自建模式”和“借船出海”策略拓展主流意识形态国际传播的媒介载体。二是以大数据赋能我国文化产业发展,丰富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对外传播的文化载体。我国数字文化产业应在数据挖掘、自然语言处理、核心算法、计算机视觉、人工智能、AR/VR等核心技术上抢占先机,增强在国际市场的竞争力和提升防范化解意识形态风险的技术能力。还应鼓励和支持我国数字文化产业聚焦中国特色、中国风格和中国气派的内容生产和对外传播,加强对外话语体系供给,发挥主流意识形态对外传播的内容优势。此外,我国数字文化产品要想赢得海外消费者的喜爱和认同,还应尽量贴近所在国的历史传统、风俗习惯、生活方式等,减少异质文化之间的隔膜,增强其接受度和用户黏性。

^① 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习近平关于网络强国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160页。

（六）补齐大数据赋能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人技短板

大数据赋能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需要加快解决专业人才短缺与核心技术受制于人两大难题，为提升意识形态建设实效提供坚实的人才保障和技术支撑。

首先，促进大数据赋能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复合人才培养。利用大数据加强和改善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尤其需要既具备大数据技能又熟谙意识形态建设的复合型人才。这就要求：一要培养和壮大大数据专业人才队伍，扩大大数据赋能主流意识形态建设的人才储备。针对我国大数据人才尤其是高级人才奇缺的现状，要加大相关人才的培养力度，通过整合高校、企业和社会资源探索多层次、多类型的专业人才培养模式。二要着力培养适应我国意识形态建设的专兼结合的大数据人才队伍。这就需要通过加强意识形态工作者的学习培训，提升其大数据素养和技能。建议在党校、行政学院、干部学院等党政培训机构开设相关专题研修班，支持和鼓励熟悉量化研究和统计分析或者对大数据感兴趣的意识形态工作者继续深造，选拔和培养以青年群体为主力军的“网络红人”和“意见领袖”，提升主流意识形态在虚拟空间的辐射力和引领力。以“大宣传”理念为引领，在各级党委领导下，建立意识形态部门与党政相关部门、科研院所、大数据企业等机构的协调机制，构建社会舆情监测、网络热点抓取、媒体导向引领等方面的合作模式，发挥不同人才的互补优势，构建大数据时代的“大宣传”格局。

其次，加强大数据赋能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基础设施建设。实施“数字中国”战略是我国新基建的重要内容，其能够为大数据赋能意识形态建设提供必要的软硬件支撑。这就要求：一要加强意识形态相关数据的“云服务”。我国意识形态相关部门应在确认安全的前提下将相关数据上传“云端”，通过相关数据的开放共享，借助大数据技术实现其开发利用价值最大化。二要推进泛在网络建设，拓展意识形态建设的虚拟空间。在大数据时代，以“5C+5A”^①为特征的泛在网络蓬勃发展。意识形态工作应顺应这一趋势，不断提升网络思维和网络服务能力。三要借助人工智能提升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实效。当前，新一代人工智能成为推动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新动能。从优化意识形态工作的视角而言，需要党和国家制定实施人工智能的国家战略、产业规划和法律法规，引领人工智能“技术向善”的价值取向，借助制度、技术、监管等措施规避人工智能的技术风险，培育意识形态工作者人工智能思维和能力，进而引导其树立

^① 5C是指融合（convergence）、内容（contents）、计算（computing）、通信（communication）和连接（connectivity）；5A是指任意时间（anytime）、任意地点（anywhere）、任意服务（any service）、任意网络（any network）和任意对象（any object）。

“人技协同、人机合一”的新理念，从而推动人工智能与意识形态工作有机融合。四要加快区块链核心技术攻关，提升技术赋能意识形态建设的水平。这就需要通过着力解决区块链中的分布式账本、加密算法、智能合约、共识机制等核心技术难题，不断提升意识形态工作的预测力、安全性和共识度。

最后，聚焦大数据赋能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核心技术创新。智能算法、基础理论、分析框架、软件系统等构成大数据的核心技术。本文认为，针对大数据技术领域“卡脖子”困境，尤其需要充分发挥新型举国体制的制度优势。这就要求：一是在攻克大数据核心技术难关中，党和国家要通过政策规划、人才队伍、课题立项、资金投入等举措制定解决路线、明确公关方向和提供综合保障。相关高校和科研院所应从本单位的研究基础和特征出发，充分发挥自身优势，集中力量攻克特定的技术难关。作为市场主体，相关企业也是大数据核心技术研发和产业化的核心力量。它们在提升自身研发实力的同时，也要树立“产学研”相结合的思维，积极将新技术新产品进行现实应用，并在应用中进一步验证和改进。党和国家应支持相关企业整合利用国内外技术、人才和专利等资源，加快大数据技术研发和产品创新，形成一批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综合型和专业型龙头企业。国家还应通过各种方式积极引导社会资本和社会资金向大数据核心技术倾斜，为攻坚克难提供必要的资金保障。二是通过政策、资金、财税等方式引导大数据技术及其应用的上下游企业，组建大数据技术与产业联盟，打造完善的产业链、价值链和生态链，也是科技创新新型举国体制的内在要求。通过形成攻克核心技术难关的强大合力，有效解决大数据赋能意识形态建设的“阿喀琉斯之踵”。

总之，辩证认识大数据赋能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利弊，并在此基础上积极探索其优化策略将有助于增强与提升我国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建设的时代感、创新性、信息化程度，为加强和改善数智时代党的意识形态工作提供理论参考、智力支持和技术服务。

The Realistic Situation and Optimization Strategy of Chinese Socialist Ideology Construction in the Era of Big Data

Fan Ruike Du Baojun

Abstract: Big data technology and its wide application are becoming an important technical variable and time-space background affecting the effectiveness of China's socialist ideology construction. In the era of big data, China's socialist ideology

construction is faced with both advantages and disadvantage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opportunities, big data's mode of thinking, massive scale, particulates' characteristics, prediction function and implementation means have positive effects on promoting theoretical innovation, rich connotation, accurate dissemination, efficiency improvement and intermedia expansion of China's socialist ideology construction. In terms of challenges, the trend of data supremacy weakens the authoritative attribute of Chinese socialist ideology, the problem of data island discredits its integration function, the anomic data ethics overshadows its moral image, the logic of data capital challenges its humanistic spirit, the western data hegemony aggravates its security risks and the weak board of data human skills restricts its construction momentum.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explore the optimization strategy of big data enabling Chinese socialist ideology construction by cultivating data literacy, focusing on operation process, attaching importance to carrier construction, constructing comprehensive governance pattern, safeguarding data sovereignty and improving innovation ability.

Keywords: Big Data; Socialist Ideology; Realistic Situation; Optimization Strategy

[责任编辑: 闫惠惠]

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方法论^{*}

许秀娜^{**}

【摘要】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方法大致包括阐释方法、系统方法、抽象与具体方法、历史辩证法和实践方法。阐释方法以文化自觉为前提，以现实问题为导向赋予传统范畴新的时代内容。系统方法将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作为整体、动态的系统。抽象与具体方法将传统文化中具有普遍性的内容进行抽象，采用改造内容形式而赋予时代内涵的抽象继承法，同时将传统文化中普遍性的内容与社会相结合。历史辩证法包含正确处理扬弃与继承、传统与现代化、传统与创造等多重辩证关系。实践方法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重要方法。阐释方法、系统方法、抽象与具体方法、历史辩证法、实践方法等构成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多元方法论，为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具体实践提供了方法论启迪。

【关键词】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方法论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度重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是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源泉”^①，是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重要资源，强调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坚持“古为今用、洋为中用，去粗取精、去伪存真”^②，“要处理好继承和创造性发展的关系，重点做好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③。如何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重要课题。探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方法论，对进一步总结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经验，深化对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规律的认识，以及进行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实践都具有重要意义。

^{*} 本文系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青年项目“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华民族形象建构研究”（2021YJC710078）的阶段性成果。

^{**} 许秀娜，哲学博士，广东外语外贸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文化哲学。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十八大以来重要文献选编》（中），中央文献出版社 2016 年版，第 135 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56 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64 页。

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阐释方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历史上有着丰富的章句、注释、诠释的传统，并且通过经文注释的哲学诠释建构哲学体系，如王弼的《老子注》、郭象的《庄子注》、朱熹的《四书章句集注》等。学界认为对传统文化经典文本的诠释和解读主要有三种路向，即古文经学的语言—历史—名物训诂解释、今文经学的政治—哲学—经世致用解释与宋学的哲学—伦理—形上义理解释。^①从诠释更注重历史的文本还是当下的自我表达，可以分为“六经注我”和“我注六经”两种定向，冯友兰先生提出“照着讲”与“接着讲”两种诠释定向。新时代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不能仅仅复归于经典文本诠释，但是需要借鉴敬重传统的思路，以文化自觉为前提理解自身文化传统，以现实问题为导向对传统文化进行阐释，并以教育宣传普及等方法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大众化。

（一）以文化自觉为前提理解民族文化传统

文化自觉涉及对自身文化传统的理解，既不同于全盘西化也不同于复归传统，而是指生活在一定文化中的人对本民族文化的自知之明，同时在此基础上了解其他文明及其与自身文化的关系，这种文化自觉是创造性转化的前提和基础。在新的历史条件和文化背景下，面对信息化和经济全球化等时代条件，面对世界各国多元文化的冲击，文化自觉是实现自身文化创新以及与世界多元文化协调共处的前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政治社会层面的治国理政经验、历史文化层面的民族文化认同、美感经验层面的中华美学精神、人伦道德层面的中华传统美德等。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要讲清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历史渊源、发展脉络、基本走向，讲清楚中华文化的独特创造、价值理念、鲜明特色，增强文化自信和价值观自信”^②的重要论断就蕴含着高度的文化自觉。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首先需要尊重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挖掘其中具有价值的文化基因。文化基因是类比于生物学遗传因子的概念，文化基因携带着文化留存、发展的信息，生物学里的种子是生命的基础，文化基因也是文化延续、发展的基础，是文化传统的根。通过对民族历史和传统的“文化自觉”，进一步阐明传统文化的基本概念、核心价值、重要范畴和历史脉络，有助于厘清传统文化的文化基因。

（二）以现实问题为导向赋予传统范畴以时代内容

伽达默尔所代表的诠释学理论为哲学诠释提供了理论支撑。通过文本诠释建

^① 参见平飞：《中国哲学创造性转化的路径》，《河北学刊》2005年第5期。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总书记重要讲话文章选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120页。

构诠释学范式,理解文本的意义与理解文本的真理性主张相关,首先要明确文本可能回答的问题,作为文本的诠释者要设法理解文本试图回答的问题,理解作为文本出发点的“前见”和意义视阈,能在多大程度上理解文本取决于诠释者的意义视阈与文本的意义视阈之间的“视阈融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需要理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意义视阈,同时要以现实问题为导向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找到回应时代诉求的文化资源,实现历史与现实的“视阈融合”。“只有聆听时代的声音,回应时代的呼唤,认真研究解决重大而紧迫的问题,才能真正把握住历史脉络、找到发展规律,推动理论创新。”^①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可以为新时代的治国理政和道德建设提供借鉴,“包括儒家思想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藏着解决当代人类面临的难题的重要启示”^②。习近平总书记注重发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资源解决当今社会面临的现实问题、疑难问题,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主张社会主义文艺要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汲取古代法制精华推进全面依法治国,借鉴古代廉政文化推进反腐倡廉建设,通过对传统生态伦理思想的创造性转化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赋予古代丝绸之路以全新的时代内涵提出共建“一带一路”倡议,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义利观”“以邻为伴”“亲诚惠容”等理念构建正确义利观、人类命运共同体和新型大国关系,通过以现实问题为导向赋予传统范畴新的内涵。

(三) 以教育、宣传、传播普及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众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众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重要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使中华民族最基本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与现代社会相协调,以人们喜闻乐见、具有广泛参与性的方式推广开来,把跨越时空、超越国度、富有永恒魅力、具有当代价值的文化精神弘扬起来。”^③ 首先,普及化的工作与高深的研究并重,二者辩证统一。“文化普及是无法离开高深研究的,后者是前者的源头活水。”^④ 重视经典古籍的整理,经典古籍的整理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创新的源头活水。通过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加强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通过大学中开设国学专业培养传承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人才,以及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贯穿于高等教育、基础教育之中,在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正确理解基础上进行阐释,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众化的前提。其次,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宣传普及。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加大正面宣传力度,以人们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推广普及,通过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等方式传承传统美德,

① 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4页。

②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6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61页。

④ 《余英时文集》第7卷,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292页。

通过影视作品、文学作品等多种方式实现传统文化与现实文化的融通,进而促进“以文化人”时代任务的实现。再次,以现代表达形式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话语体系。注重以现代语言进行话语转换,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大众化,创新新媒体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播与荷载。最后,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对外传播,促进东西方文明的交流互鉴,“提高对外文化交流水平,完善人文交流机制,创新人文交流方式,综合运用大众传播、群体传播、人际传播等多种方式展示中华文化魅力”^①。

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系统方法

系统方法从普遍联系和整体性方面将事物作为有机的系统,并注重考察系统与要素的内在联系。“系统观是辩证唯物主义世界观和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② 系统观点、系统方法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许多著作中都有体现,马克思的《资本论》是运用系统方法剖析资本主义社会的重要著作,恩格斯的《自然辩证法》运用系统观考察自然界的联系。系统观点和动态观点是系统方法的基本观点,系统观点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作为一个整体或系统来考察,既注重系统内部组成部分的联系,也注重传统文化与外来文化、传统文化与现实文化的关系,在动态观点的层面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作为一个开放的动态系统,从文化发展观的层面考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方法。

(一) 立足整体、统筹全局:构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制度机制

系统方法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作为一个由各要素组成的有机整体来对待。在传统社会中,儒家思想落实为社会制度安排,社会制度规范体系的兴衰与儒家文化传统的传承密切相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民族文化的延续载体、民族精神的象征和民族价值观的源泉,其身份和功能在传统社会是靠私塾、书院、官学和官府的提倡维系的,这种维系系统在现代社会已不复存在。伴随中国现代化进程的是传统社会制度体系与文化传统的断裂,因此需要构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制度机制,在制度建构的基础上奠定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的社会根基。系统方法按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系统性将其放在系统的形式中加以考察,遵循发现问题、确立目标、进行系统综合以制定目标、对方案进行系统分析以做出分析评价的流程,具有代表性的是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于2017年印发《关于实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发展工程的意见》,主张

^①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4年版,第104页。

^② 魏宏森:《系统科学方法论导论》,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21页。

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构建中华文化课程和教材体系、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国民教育和文化创造、加强文物保护和文化遗产传承保护、加强对传统文学艺术的扶持。

（二）使整体与部分辩证统一：处理好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各文化要素的关系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系统方法要求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容、结构、功能、历史发展，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现实文化、外来文化的内外部联系等方面，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进行综合的系统的考察。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需要具有世界性眼光，将民族元素与世界文化相融通，以开放融合的文化发展观促进东西方文化交流互鉴。习近平总书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纳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发展过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以发展现实文化。传统与创造是辩证统一的关系，传统文化是创造性转化的基础，同时创造性转化通过不断的创造赋予传统文化以生命力，使传统文化与现代化、全球化相适应，同时汲取革命文化、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益滋养，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不断延续、发展。文化作为上层建筑的一部分，由经济基础决定，人们在追求美好生活的过程中会产生对艺术、文化等精神建设资源的需要，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民族文化资源可以涵养人们的美好生活。

（三）从动态系统观的视角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作为动态过程

动态系统观不仅要求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作为有机整体来对待，而且要求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作为动态过程，以文化发展规律指导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同时在这一过程中总结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文化发展规律。中华文明是轴心时代唯一延续至今而没有中断的文明。中华文化在历史长河中的延续是一个不断适应新形势、不断吸收新思想的发展过程，这促使中华文明能保持生命力、不为时代淘汰而不断丰富发展。以发展的观点看待传统与创造的关系，将继承传统与文化的创造相结合，在继承传统中强调文化的延续性，在文化的创造中赋予传统文化以生命力。

三、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抽象与具体方法

马克思《资本论》在对资本主义社会经济规律的分析中应用抽象与具体相结合的方法，“从具体上升到抽象、再从抽象上升到具体”，将商品作为资本主义社会经济的细胞形式，抽象的一般人类劳动体现商品的价值属性，劳动力作为商品构成新价值的来源，剩余劳动构成剩余价值和利润的来源。传统文化具有普遍性和时代性，二者相辅相成，通过抽象与具体相结合的方法可以对传统文化中

具有普遍性的内容进行归纳抽象，对传统文化中具有时代性的内容进行整理改造，对传统文化的文化基因、思想理念、道德规范、精神标识等进行抽象，并与现实文化、现代社会进行具体的结合。

（一）抽象出能代表文化价值系统内核的文化基因

文化传统的重建首先需要尊重本民族的文化传统，挖掘其中具有价值的文化基因。儒家以“仁”为核心价值观，以“仁”为出发点构建人性论，将复归人性之“仁”作为修养工夫。以“孝”为逻辑起点外推于“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践行“亲亲、仁民、爱物”的人伦之理。“忠”“恕”“孝”“悌”“仁”“义”“礼”“智”“信”等都是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范畴，这些代表文化价值系统内核的文化基因在当今社会仍然具有时代价值，可以通过抽象继承法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二）改造传统核心价值观的内容形式并赋予其时代内涵

传统文化中的一些核心价值，如“忠”在传统社会讲求效忠君主，其所包含的内容在现代社会已经不合时宜了，但是“忠”作为传统文化的核心价值理念仍然具有时代意义，在新时代我们仍然可以忠于祖国、忠于人民、忠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事业。又如，儒家思想体系以“孝”为基础，以“孝”为最原始的基点，在此基础上建立“亲亲、仁民、爱物”的儒道精神，“孝”作为传统社会广为推崇的价值理念，其内容如“割肉侍亲”“埋儿供母”等都违反当今法律和道德规范。再如，“三年无改于父之道”等也已不具有普适价值。但是“孝”作为一种抽象价值理念仍然值得继承，应以符合时代要求的内容、形式来继承孝亲精神，弘扬中华家庭美德。通过继承抽象的价值理念、改造内容形式而赋予新的时代内涵这种抽象继承法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具有重要的时代意义。

（三）传统文化中普遍性的内容与现代社会相结合

从抽象上升到具体是抽象与具体相统一方法的第二个阶段。这里的具体已不再是关于整体的混沌表象，而是具有许多规定的综合性和多样性的统一，是在抽象基础上的思维综合，抽象的规定形成作为总体的具体的再现。传统文化中具有普遍性的内容如文化基因、道德规范、审美风范等需要与现代社会相结合。传统文化的文化基因与当代文化相适应，从而构建新时代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创造当代中国文化的创新成果，将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发展现实文化相统一，“让中华民族文化基因在广大青少年心中生根发芽”^①。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与新时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24页。

代的思想道德建设相结合,汲取传统道德规范和价值体系的思想道德资源,促进道德意愿、道德情感的形成,培育正确的道德判断和道德责任意识;弘扬中华传统美德促进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使传统美德成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牢固根基,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与新时代的文艺工作相结合,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涵养文艺创作、展现中华审美风范。

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历史辩证法

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以巨大的历史感作为基础,与传统文化的历史发展密切相关,在新时代文化建设的背景下对传统文化资源进行创造性转化,本身体现了历史过程中文化发展的内在规律。这种规律的呈现体现了深刻的辩证方法和辩证思维,体现了唯物主义历史观与辩证方法的结合。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辩证方法既包含对传统文化的肯定理解也包含对传统文化的否定理解,将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作为文化发展的不断运动过程,包含正确处理传统与现代、扬弃与继承、传统与创造等多重辩证关系。

(一) 以辩证取舍的矛盾论处理好扬弃与创新的关系

矛盾论是辩证法的灵魂,辩证法从事物的内部矛盾来把握其运动变化。辩证法体现了矛盾双方的对立与统一。传统文化具有普遍性和时代性,二者对立统一。从时代性来看,传统文化所包含的为古代等级社会服务的内容已明显过时;从普遍性来看,传统文化所蕴含的认识自然、处理人际关系、人与自然关系以及治国理政等方面的内容,仍然具有现代意义,值得深入挖掘、阐发、创造性发展。作为文化方针的创造性转化体现为对传统文化中具有普遍性的内容进行继承、发展,习近平总书记主张对传统文化“超越时空、跨越国界、具有永恒价值”的内容进行弘扬发展。传统文化自身包含矛盾的两重性。传统文化作为一个整体包含对立统一的两面,既蕴含有助于治国理政、道德建设、解决当今问题的启迪,也蕴含不利于现代化的内容,应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继承其民族性的精华,古为今用、洋为中用,辩证取舍、推陈出新,“以古人之规矩,开自己之生面”。扬弃与创新的辩证统一体现文化发展中的否定之否定,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是文化的螺旋式发展,沿着螺旋式上升的曲线在原有文化积累的基础上创新发展。

(二) 以与时迁移的发展观处理好传统与现代化的关系

辩证法把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看作一个发展的过程。文化发展有两种形式:破旧立新和推陈出新。破旧立新是在批判传统的基础上除旧布新。面对西方文化的强烈冲击以及中国近代丧权辱国的现实,兴起了彻底反传统的文化运动,体现

了对西方文化的客观体认与对中国文化自我反省的文化自觉。近代史上激烈的全面反传统的文化倾向虽然对于破除封建旧传统的残余具有历史语境下的时代意义,但不利于整个文化传统的继承、改造、创新和发展。推陈出新是在继承旧传统的基础上发展新的思想与文化,与当今创造性转化、创新性发展的文化方针相契合,适应新时代社会主义文化建设的需要。实际上传统与现代化之间是辩证关系,现代化是在传统基础上的推陈出新,现代化的基础并不是一无所有的空无,而是依附于文化固有的传统。“现代化与传统,应当是彼此互相定位的关系,而不是互相抗拒的关系。”^①而中国传统文化中蕴含有助于现代化的思想资源,通过挖掘这些思想资源不仅有助于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而且也有助于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

(三) 以辩证统一的历史观处理好继承与发展的关系

在马克思看来,历史与逻辑是辩证统一的,思想史与思想规律具有一致性。在传统文化的演变过程中涌现出很多有创造性的思想,如先秦诸子、两汉经学、魏晋玄学、隋唐佛学、宋明理学等,这些思想作为当时最有创造性的思想,客观上促进了中华文化的繁荣发展,也体现着文化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通过对历史上具体时代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思想史的研究,可以发现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前提、条件、原因、方法和规律,在总结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规律的基础上促进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在中华文化发展史上,作为佛教中国化的代表,隋唐佛学继承印度佛学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资源形成华严宗、天台宗、法华宗、禅宗等具有中国特色的佛教宗派;宋明理学和陆王心学融合传统儒学思想资源借鉴外来佛学思想形成独具特色的儒学思想体系。这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历史经验,对于探讨新时代中华优秀文化创造性转化的文化发展规律,以及对于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马克思主义融合、融通形成人类文明新形态,都可以提供思想史和方法论的启迪。

五、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实践方法

随着科举制度的废除和辛亥革命推翻帝制,与传统文化相关的国家制度、典章、社会礼俗和个人行为规范等建制都迅速崩溃。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发挥自身价值,重在如何融入“日用常行”与“生活日用”,如何激活其蕴含的道德修养的精神资源。习近平总书记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实践的论述为我们探讨方法论问题提供了启发,实践方法也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重要方法。

^① 《徐复观文集》第1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208页。

（一）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实现创造性转化的实践方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仅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肥沃土壤、思想资源和源头活水，而且也蕴含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精神要素。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核心内容的儒释道之学是中国传统价值观的文化载体和文化认同的对象。习近平总书记认为，绵延数千年的中华文明具有独特的价值体系和百姓日用而不知的价值观，“深入挖掘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讲仁爱、重民本、守诚信、崇正义、尚和合、求大同的时代价值”^①，并结合当今社会进行诠释和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思想精华和道德精髓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头活水，习近平总书记将“大学之道，在明明德”的“德”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相关联，“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②，认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也是一种“德”，体现为个人的德、国家的德和社会的德，“中国古代历来讲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从某种角度看，格物致知、诚意正心、修身是个人层面的要求，齐家是社会层面的要求，治国平天下是国家层面的要求”^③。通过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传统文化中的“德”范畴相关联，进而实现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贯通，使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成为涵养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源泉，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认同增强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观认同，增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价值观自信和生命力。

（二）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民众日常生活实现创造性转化的实践方法

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民众日常生活的实践方法体现在不同方面，促进了民众对传统美德的认同和践行。首先，借鉴古代心性修养资源促进公民道德建设。习近平总书记经常引用传统文化中的名言典故来诠释崇德修身的认识论与方法论，如引用“见善如不及，见不善如探汤”“见贤思齐焉，见不贤而内自省也”^④等名言来说明趋善避恶、择善而从的重要性，引用“吾日三省吾身”“莫见乎隐，莫显乎微，故君子慎其独也”^⑤来说明修身的自省与慎独的方法，引用“观于明镜，则疵瑕不滞于躯；听于直言，则过行不累乎身”^⑥来说明立德修身中批评与自我批评的方法。其次，继承传统家风家训文化促进家庭文明建设。习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64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68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69页。

④ 人民日报评论部：《习近平用典》，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年版，第85、89页。

⑤ 人民日报评论部：《习近平用典》，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年版，第87、97页。

⑥ 人民日报评论部：《习近平用典》，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年版，第91页。

近平总书记引用“爱子，教之以义方”^①来说明家教的重要性，倡导借鉴诸葛亮《诫子书》《颜氏家训》《朱子家训》等培育优良家风。最后，借鉴传统生态伦理思想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绿色发展理念汲取了传统生态智慧中“天人合一”的生态整体观、“参赞化育”的绿色发展方式、“见素抱朴”的绿色生活方式。

（三）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融入党的建设实现创造性转化的实践方法

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战略部署汲取了古代廉政文化的精华。习近平总书记对传统官德思想、传统巡视制度、古代礼法并用的治吏之道等结合新时代的文化背景进行了创造性转化。首先，“用权讲官德”体现对传统官德思想的创造性转化。习近平总书记在不同场合多次引用传统文化中的名言警句强调官德建设的重要性，认为领导干部应通过慎独、慎初、慎微、自省、自重、自警、批评与自我批评等廉洁自律，他强调领导干部要“多读书修政德”^②，通过学习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进而以学修身，树立正确的价值观。“我们的文化传统中包含了丰富的廉政文化理念和文化实践。要修炼道德操守，提升从政道德境界，最好的途径就是加强学习，读书修德，并知行合一，付诸实践。”^③其次，借鉴古代廉政文化推进反腐倡廉建设。“研究我国反腐倡廉历史，了解我国古代廉政文化，考察我国历史上反腐倡廉的成败得失，可以给人以深刻启迪，有利于我们运用历史智慧推进反腐倡廉建设。”^④最后，党内巡视制度体现对传统制度资源的创造性转化。巡视监督作为从严治党利器和党内监督的战略性制度安排，与传统巡视制度在结构上具有契合性，借鉴传统巡视制度的合理性因素有助于推进新时代党内巡视制度化、规范化。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方法是多元立体的，阐释方法、系统方法、抽象与具体方法、历史辩证法、实践方法构成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多元方法论，为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的具体实践提供了方法论启迪。

① 人民日报评论部：《习近平用典》第2辑，人民日报出版社2018年版，第91页。

② 人民日报评论部：《习近平用典》，人民日报出版社2015年版，第51页。

③ 习近平：《之江新语》，浙江人民出版社2017年版，第175页。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390页。

The Methodology of 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Culture in a Creative Way in the New Era

Xu Xiuna

Abstract: Explanation method of 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culture in a creative way in the new era roughly include interpretive methods, systematic methods, abstract and concrete methods, historical dialectics and practical methods. The interpretation method takes cultural consciousness as the premise, and takes practical problems as the guidance to endow the traditional category with new era content. The system method regards 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culture in a creative way as a dynamic, overall system. The abstract and concrete method abstracts the universality from traditional culture, employing abstract inherited method of rebuilding form and content to imbue it with a new life, combining the universality of traditional culture with modern society. The historical dialectics of 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culture in a creative way involves multiple dialectical relations, such as tradition and modernity, sublation and inheritance, development and reformation. Practical method is another important method of 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culture in a creative way. The multi-dimensional methodology of 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culture in a creative way may be constituted by explanation method, system method, abstract and concrete method, historical dialectics and practical method, which would enlighten our exploration in the concrete practice about the methodology of transforming traditional culture in a creative way.

Keywords: Traditional Culture; Transform in a Creative Way; Methodology

[责任编辑:李谷悦]

“两个结合”视域下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和儒家生态思想比较研究

刘红梅 吴 苇*

【摘 要】生态文明建设是关乎中华民族永续发展的根本大计。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和儒家生态思想虽在哲学依据、实践取向以及追求目标上具有契合融通之处，但因所处时代和文化地域的不同，在产生背景、实施途径等方面存在诸多差异。本文在“两个结合”的新视域下，结合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时代要求，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和儒家生态思想之契合性、差异性进行比较研究，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现实性、原则和实施路径，希冀从一个侧面为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以及推动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加丰富的理论借鉴、学理支撑和实践支持。

【关键词】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儒家生态思想；两个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阐释中国道路，需要自主性、独创性的中国理论，作为中国理论的两大重要来源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内在关系如何？如何在二者互融共促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本土化的深度发展？这已成为近年来学界无法绕过的重大理论命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明确提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用马克思主义观察时代、把握时代、引领时代，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①第二个结合的创造性表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作为独立的要素凸显出来，成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叙事的逻辑起点，不仅极大

* 刘红梅，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硕士研究生导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哲学；吴苇，合肥工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马克思主义理论专业 2020 级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与中国哲学。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4 卷，外文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10 页。

深化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内涵,为深入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作出了方向性指引,而且也为新时代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两创”指明了理论原则和现实路径。站在历史的高度,在“两个结合”的视角下,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和儒家生态思想的契合性、差异性进行比较性研究,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进程中的时代任务和必要环节,亦是实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的有效途径,更可为当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提供更加丰富的理论支撑和实践支持。

一、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和儒家生态思想之契合性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既是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根本原则,也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和儒家生态思想的共同理想。在这一共同理想的指引下,产生于不同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和儒家生态思想在生态诉求方面有着高度的契合性,其内在地体现在哲学依据、实践取向以及追求目标上。

(一) 哲学依据:人与自然和谐一体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还是儒家生态思想,都强调人与自然相互依存、相互影响。一方面,自然界养育了人类,人类的生存发展离不开自然界。“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是在自己所处的环境中并且和这个环境一起发展起来的。”^①在这里,恩格斯不仅指出人类社会是自然界的一部分,还强调自然界的先在性。在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中,自然界产生于人类社会之前,人类社会在自然界的基础上产生,并由自在形式发展到自为形式。即便人类社会已经发展到自为形式的高级形态,其生存发展仍不能脱离自然界。“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②在这个不断交互的过程中,自然界不仅为人类提供所必需的物质资料和自然资源,还为人类提供了促进其发展的精神食粮。“植物、动物……是人的精神的无机界,是人必须事先进行加工以便享用和消化的精神食粮。”^③因而,没有自然界人的精神意识就失去了产生来源,人与动物也就没有区别。基于此,马克思指出人靠自然界生活,人的生存和发展都无法脱离自然界。

儒家生态思想对自然界存在价值的肯定主要体现在对天和天命的敬畏上。儒家思想的源头《周易》曰:“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周易·序卦》)这里指出了天地、万物以及人类的先后关系,强调天地是万物、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8~39页。

②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52页。

③ 马克思:《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52页。

人类产生的根本。以此为理论前提，孔子曰：“天何言哉？四时行焉，百物生焉，天何言哉？”（《论语·阳货》）“君子有三畏，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论语·季氏》）孔子不仅将“天”视为四时万物之根源，更将“畏天命”置于君子三畏之首，可见其对自然的敬畏和天命的信仰。同样，先秦儒学集大成者荀子也强调天的重要性，指出天地是万物的本原，并发出“无天地，恶生”的感叹。在儒家这里，显然有着明确的以天地为本的生态道德意识。

另一方面，人类在自然面前不是无能为力的，而是可以充分发挥自身的能动性认识、改造自然。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指出，作为主体的人，能够充分发挥自身的主观能动性对自然进行合乎目的性的改造，把自在的自然改造成人化的自然，从而为自身的生存与发展提供物质资料。除此之外，人类对自然进行合乎目的性的改造使“地球的表面、气候、植物界、动物界以及人本身都发生了无限的变化”^①，在变化的过程中，人类通过实践活动赋予自然界新的价值和尺度，不断实现人与自然之间的物质能量交换，最终使人类社会得以延续和发展。

儒家生态思想以“天人合一”为核心，既重视敬畏天命，也极为关注人的价值。《尚书》中“惟人，万物之灵”不仅强调天地的化育作用，而且将人放在万物之灵的位置上。在此基础上，荀子主张充分发挥人的主体能动性，提出“制天命而用之”“应时而使之”的自然观。“天行有常，不为尧存，不为桀亡。”（《荀子·天论》）荀子眼中的“天”是有其恒常运行规律的天，因而“制天命而用之”中的“制”绝不是控制之义，而是在顺应尊重的基础上加以改造利用。那如何实施改造利用呢？荀子在《王制》篇里给出了回答：“故养长时，则六畜育；杀生时，则草木殖。”（《荀子·王制》）也就是说，天之道虽不因人的意志而改变，但人完全可以利用自身的智慧与实践，做到饲养、砍伐适时，既保证人类从自然界中获取足够的生活资源，又能够使自然界不断再生繁殖，实现人与自然的良性互动。

可见，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和儒家生态思想既肯定自然界的价值，亦强调人的主体性功用的发挥，彰显人与自然是和谐共生、共荣共存的统一整体。

（二）实践取向：因循自然规律

肯定人在自然中的主体性价值和功用，并不意味着人在自然中可以肆意妄为，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和儒家生态思想皆强调人作为主体具备认识自然和改造自然的能力，但必须以遵循自然的客观规律为不变之前提。

人类的生存发展不能脱离自然界。人类通过劳动从大自然获取必需的物质资料，并在此基础上加以改造利用，实现自身的发展。但是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并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922页。

不是没有标准的,否则“没有自然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①。然而,随着工业革命的深入推进和生产力的快速发展,人类不断加大对自然资源的掠取力度,最终导致人与自然的平衡被打破。恩格斯曾公开警告人类:“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人类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对我们进行报复。”^②在这里,恩格斯同样强调了人类对自然界的改造和利用必须以自然规律为依据,绝不能凌驾于大自然之上,否则就会遭到自然界的报复。由此,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指出,人类在改造自然的活动中必须尊重自然,必须切记整个人类社会是属于自然界并且是作为自然界的一部分存在。

儒家生态思想敬畏自然,其生态践行中便产生了“取予有度”“取物以时”“节用爱人”的实践原则。自然万物各有其生长规律,亦有其生长时令,依循自然界的生态演化法则顺其道而行,才能使自然万物相继而生,生生不息。孔子言“钓而不纲,弋不射宿”(《论语·述而》),否则就会“获罪于天,无所祷也”(《论语·八佾》)。这是从天的角度对人们进行劝诫,不要大网捕捞鱼类,不射杀归巢夜宿之飞鸟,其反映的不仅是儒家由人推广到鱼鸟的仁爱之情,更体现的是对天命的敬畏、对生态规律的遵循,强调对自然资源从量上不可过度索取,在时间上也要有时节性的适度把握。曾子从“孝”的层面继承和发挥了这一生态思想,提出应“草木以时伐”“禽兽以时杀”,人类对“草木”和“禽兽”的砍伐、猎杀必须建立在遵循时令规律的基础上,绝不能随心所欲地对自然资源进行攫取和掠夺,否则等同于违背了孝道。如此把生态实践上升到孝的高度,肯定的是人类之外的有情、无情生命在自然界中的生存价值,既从生态角度拓展了儒家孝的内涵,又给予天地万物以深切的生态伦理关怀。孟子则从统治之道入手,指出应根据谷物、林木以及鱼鳖的生长特点合理开采捕捞,“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王道之始也”(《孟子·梁惠王上》)。强调君王只有在遵循自然界的生存法则下合理利用自然资源,人民才能安居乐业、国家才能长治久安。到荀子这里,更是将儒家生态思想具体化和制度化,指出要实现“圣王之制”,就必须“不夭其生”,“不绝其长”,爱护自然界万事万物,使世间万事万物能够各得其所,从而“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

在尊重自然规律、因循自然规律的实践取向方面,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和儒家生态思想虽有古今、中西话语表达的不同,但皆强调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并节约资源,维护生态平衡,保持生态可持续发展。在人与自然关系的处理上,同样体现了理性的生态智慧和丰富深刻的生态伦理意蕴。

(三) 追求目标: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

无论是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论述的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理想,还是儒家生态思想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58页。

^② 恩格斯:《自然辩证法》,人民出版社2018年版,第313页。

阐述的“大同社会”理想，都力求实现人与人、自然以及社会的和谐统一，建构以人为本的和谐社会。

马克思和恩格斯虽未直接提出“生态文明”这一概念，但在其关于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构想中却饱含对资本主义的批判、对工业文明的反思和超越。在共产主义社会中，增加社会的公共财富、满足社会成员的合理需要是其生产的目的。而在资本主义社会中，其生产目的则是通过最大限度占有工人的剩余价值，实现利润最大化。资本家为了牟取暴利，不仅延长工人的劳动时间、增加其绝对剩余价值，而且通过提高劳动生产率、进行扩大再生产，增加相对剩余价值。机器化生产产生的污染物毫无节制地向自然界排放，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同时，资本主义的盲目生产带来的资源浪费，也进一步加剧经济和生态的双重危机，造成资本主义与生态环境之间难以调和的矛盾。与资本主义生产的反生态性不同，共产主义社会在促进生产力发展时，充分关注对环境的影响，注重保护“自然生产力”，维护自然生态平衡，促进人、自然和社会协调发展。由此可见，共产主义的生产方式是“亲和的”，因而只有在共产主义社会才能达到人与人、人与自然的真正和解。

中华大地上土生土长的儒家文化，追求的目标是内圣而外王，通过施行仁政来达到天人合一、天下为公的理想状态。其所提出的“大同社会”理想虽具有一定的抽象模糊性，但却饱含儒者对人与人、人与社会以及人与万物和谐共生的向往和憧憬。孔子首次描绘了大同社会：“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是谓大同。”（《礼记·礼运》）同样，孟子所述的理想社会也是百姓衣食富足的和谐社会：“颁白者不负戴于道路矣。七十者衣帛食肉，黎民不饥不寒。”（《孟子·梁惠王上》）不难看出，在儒家崇高的理想社会中，百姓安居乐业、和睦互助，货尽其用，人尽其力，社会安定。个体生存的需要、安全和爱的需要，以及更高层次的自我发展和自我实现的需要皆能得以满足。

儒家所述的理想社会，虽未直接涉及生态方面的内容，却蕴含着深刻的生态向度。人类对大自然进行过度索取和掠夺，不仅是为了解决生存温饱问题，更多是满足自身泛滥的欲望。孔子和孟子设想的“天下为公”的理想社会，是一个国家富裕强盛、百姓有德有爱的社会，每个人各尽所能、人格完善，人与人之间平等互助，社会和谐完满，人与自然的关系不是对立而是和谐合一。人人皆有“讲信修睦”的道德修持和自觉践行，在“万物并育而不相害”前提下节制用度和友善关爱，实现的才是真正意义上的人与自然平等的新型生态伦理关系。

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以批判资本主义为基础，提出建立共产主义社会的伟大理想，目的就是消灭剥削和压迫，实现人与人、人与自然以及人与社会的和解。儒家则把对自然界的尊重和个体对自身道德修养的追求有机融合，从而推动“大同社会”生态理想的实现。从所追求的理想目标及理想社会的共同特征来

看,两种生态思想具有高度的契合之处。

总的来说,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和儒家生态思想在哲学依据、实践取向以及追求目标上具有高度的契合性,体现出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融通在理论层面的现实性和实践层面的可操作性,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内在有机结合提供了可能。

二、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和儒家生态思想之差异性

虽然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和儒家生态思想在诸多方面有耦合之处,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发源于西方,儒家生态思想则是在我国本土产生和发展起来的,二者之间的差异亦是非常明显的,主要体现在产生背景、实施途径两大方面。

(一) 产生背景之差异:“现实需求”与“直观体悟”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的产生具有鲜明的社会现实性——揭露资本主义的严重弊端。马克思、恩格斯虽未直接提出生态文明这一概念,却早已开始关注资本主义工业化导致的环境恶化问题,并在《资本论》《自然辩证法》等著作中针对环境污染、人类如何对待自然等问题做出了阐释。

19世纪中后期,随着第二次工业革命的逐步推进,电气、化工等新兴工业部门不断兴起。生产方式的革新带来了生产力的快速发展,庞大的机器夜以继日地排放浓烟和化工污水,对空气和河流造成了严重的污染。曼彻斯特浓烟滚滚,污水横流,工人的生存条件和生活环境遭到严重破坏,但资本家为了最大限度地牟取暴利,无视这些产生的废气废水,无视工人的生活环境。正如马克思所言:“450万人的粪便,就没有什么好的处理方法,只好花很多钱用来污染泰晤士河。”^①由此看出,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为了实现机器化大生产牟取暴利,已经完全忽视对泰晤士河的保护,甚至花钱直接将污染物排入水源。这引起了当时正在关注工人运动的马克思和恩格斯的注意,他们指出:“在这个阶段上产生出来的生产力和交往手段在现存关系下只能造成灾难。”^②通过对资本主义社会内在弊端的分析,更进一步看到,资本家为提高生产力实现利润最大化,不仅剥削无产阶级的劳动力,还对工人生存的社会环境和自然环境造成严重破坏。

显然,马克思和恩格斯关于生态方面的阐述是在批判资本主义的背景下提出的,主要是为了控诉资产阶级对工人阶级的剥削和压迫。这种来自经济生产和生存环境两方面的剥削压迫进一步加深了两阶级之间的矛盾,从而也更加证明只有消灭资产阶级、实现共产主义,才能最终改变工人阶级被剥削的局面,才能真正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70页。

解决生态环境污染这一问题。

思想文化的发展往往与自然地理环境密切相关。独特的地理位置、广阔的地域以及相对封闭的地理环境造就了不同于海洋文明的农耕文明。农耕文明产生于人类早期阶段,是指古代劳动者在从事农业生产过程中形成的一种适应农业生产和生活需要的文明形态,这种文明形态的产生发展不仅使古代劳动者获得了生产资料,还形成了相应的道德伦理和文化思想。儒家生态思想既然产生于中国古代农耕社会,就不可避免地受到中华农业文明独特的自然地理环境和思想文化的影响。由于地理位置和劳动生产工具的限制,土地的开发和利用需要借助大量人力,由此人与人之间形成了以血缘、地缘为纽带的生产关系和生产方式。在这种生产方式下,人们逐渐形成了“家给人足,比邻敦睦”的传统社会经济秩序,这种对和谐的向往和追求也在儒家生态思想中得以深刻凸显。

儒家以“仁”为核心展开其理论体系,其生态思想不仅强调爱人,更推而广之,把人类的仁爱拓展至仁爱万物、仁爱自然,所谓“亲亲而仁民,仁民而爱物”(《孟子·尽心上》)。而以天人合一为宇宙观,古人更以切身体验感知个体与自然的一体性关系。北宋理学家程颢即以“万物一体”来论仁:“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莫非己也。认得为己,何所不至?”(《二程遗书》)心学集大成者王阳明则进一步将“万物一体”阐发为“仁”之流行境界:“仁者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使有一物失所,便是吾仁有未尽处。”(《传习录·门人陆澄录》)可见,理学家“万物一体”之观念是对先秦“天人合一”理念的张扬和发展,彰显了人与万物自然之间同源、同构和同体的本质关系。如此,吾人在保持与自然和谐共生的基础上方能实现“有其治”,乃至最终达至“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中和”境界,也是人类期望的生态至境。

(二) 实施途径之差异:“制度变革”与“正己修身”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和儒家生态思想虽在生态理想方面有高度的契合性,但因文化背景的不同、世界观的差异性,二者在建构生态理想社会的实施途径上侧重点也有所不同。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认为,资本主义社会制度的弊端是生态环境恶化的根源。在资本主义社会,资本家为牟取暴利,通过加强对工人劳动力的剥削来获取剩余价值,并将这些剩余价值转化为资本。资本不断刺激着资本家加大对自然界攫取的力度,而这势必导致生态环境被破坏,最终形成恶性循环。同时,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金融的加速扩张,资本家为实现利润最大化随意投资和无序生产的现象越来越严重。由于缺乏政府的统一调配,仅靠市场自身的调节并不能解决这些问题,资本主义社会生产社会化与生产资料资本主义私有制这一基本矛盾长期运动的结果就是频繁发生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在这一过程中,资本家无节制地开发、生产、排放,进一步加剧了生态环境的恶化。

因此,要真正解决环境恶化等生态问题,关键就在于消灭剥削、变革现存不合理的社会制度。只有建立共产主义社会,才能最终解决环境污染等一系列生态问题。“这种共产主义……它是人和自然界之间、人和人之间的矛盾的真正解决。”^①只有在未来理想的社会中,资本主义被消灭,不合理的社会制度被革新,人的本质力量才得以实现全面而自由的发展。因而,“只有实现共产主义社会,才能从根本上避免资本主义社会无政府生产和剩余价值的追逐导致生态危机的发生”^②。

与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以变革社会制度为解决途径不同的是,儒家生态思想解决问题的理路则是以提高个体内在的道德修养为起点和入手之处。孟子曰:“有大人者,正己而物正者也。”(《孟子·尽心上》)“大人”即是圣人,圣人首先是正己,而后才能导化天下万事万物各得其正。显然,在儒家看来,世间万物虽有现象上的差别,在体性上却平等如一,人、天、地是一个紧密联系、不可分割的整体,人不应仅仅把大自然外化为人类社会获取物质资料的工具、手段或对象,而应通过心性的修养唤醒自身的道德自律感,以内在的修养净化体认与自然的一体性,进而扩大到爱人、爱物、爱众生、爱自然。

而个体如何端正自己的身心呢?《大学》明确给出了心性修养的次第:“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礼记·大学》)经历格物、致知、诚意、正心的心性修养过程,就能使“天地万物为一体”的仁德得以恢复和显现。同时,儒家特别强调这种仁德是每个人内心本自具足的,王阳明说:“大人之能以天地万物为一体也,其心之仁本若是。”(《大学问》)其“良知学”更指出,“人胸中各有个圣人”,只要致良知,“人人皆可成尧舜”。这种人所固有的仁爱之心,如能得以开发并发扬光大,再由己推人、由人推及至宇宙万物,即达至张载《西铭》中所言“民胞物与”的境界。如此,人与自然和谐一体、互动共生,人与自然的矛盾冲突也就不复存在。可见,儒家生态思想从修养心性入手,既提升了个体的生命境界,又以“视天下无一物非我”的自觉守护着生命一体意义上的自然。在儒家生态观的视野下,人和自然的生态和谐与个体身心和谐的生态建设紧密相连并引以为前提和基础。

总而言之,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和儒家生态思想在产生背景和实施途径上的差异,展现的是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各自的思想特质,也体现了二者进一步交融共促的必要性。一方面,马克思主义不是教条,而是发展中的与时俱进的理论,只有联系本国具体实际,与本土文化深层相融,才能实现新的理论飞跃,发挥其思想伟力和指导作用;另一方面,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融入新时代,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85页。

② 娄金洋:《马克思恩格斯生态危机思想研究》,《生产力研究》2012年第11期。

就必须与时代先进文化相结合、与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相结合,实现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而成为促进民族复兴的伟大精神力量。

三、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和儒家生态思想比较的现实意义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过程,就是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互动交融、共促共进、互相成就的过程。对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和儒家生态思想进行比较性研究,探索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必要性、现实性、原则和实施路径,在当代有着诸多意义。

(一) 有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百余年历程,是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中国具体实际虽包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过程更多地体现为与中国革命、建设、改革开放具体实践的结合,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经历了一个认识不断提升和跃进的过程。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的讲话中强调:“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①国家领导人出现在儒家学术研讨会上并发表长篇演讲,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给予了重新定位和充分肯定,标志着在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程中,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认识与实践迈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2021年,在“七一”重要讲话中,习近平总书记在阐述“必须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②时,又首次提出“两个结合”。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再次强调理论创新要坚持“两个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

“两个结合”的重要论断是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百年探索经验的历史性总结,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新发展的内在机理和思想演进的深层逻辑,开辟了中国共产党理论创新的新境界。而“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创造性表述,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从“中国具体实际”中独立出来,不仅彰显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新时代的独特意义和价值,亦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内涵的深度和广度,为新时代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指明了确切的方向和路径。从发展趋势来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进一步深化必然是文化核心哲学层面的互动共促、深度有机融合,一方面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实现中华优秀

^①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3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9页。

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另一方面通过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括中国哲学的继承与发展,打造具有中国特色、中国风格、中国气派的马克思主义。

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有着突出的时代价值和意义。一百多年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不断地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理论资源和独特的经验智慧。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既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成果,也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时代成果。以儒家生态思想为例,其主张的“天人合一”“万物一体”“仁民爱物”等生态伦理的核心思想在当代得到了有效继承和阐扬。党的十九大报告正式提出“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这一思想,并将其作为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的理论依据;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习近平主席首次提出要“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①,深刻强调人类应深怀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助力形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新格局。

马克思主义生态观与儒家生态思想的融通互补,实现儒家生态智慧在当代的借鉴、继承和发展,可谓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时代任务和必要环节,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提供丰富的思想源泉。

(二) 有利于促进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

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精神命脉,其在当代的继承和发扬,就是在守住中华文化本根、传承中华文化优质基因的基础上,适应现代社会的文化需求,进行新时代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从生态角度看,“两个结合”背景下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亦是在马克思主义的指引下多途径展开的。

首先,在推进生态文明建设进程中,充分挖掘并阐发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蕴含的解决当代生态难题的思想资源。例如,“节用而爱人,使民以时”的可持续发展观、“无平不陂,无往不复”的辩证智慧以及“大道之行,天下为公”的哲学理想等。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在多次重要讲话中引用“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呼吁各国人民树立“天下一家”观念,秉持求同存异、开放包容的胸怀,共同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而努力。而“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等理念的提出,则是将儒家生态思想的理论核心——“天人合一”融入现代生态文明的生动体现。

其次,在与马克思主义的结合中不断丰富创新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由于受到古代农业背景和政治体制的制约,儒家思想不可避免地具有历史性特征,需要进行现代性转化和发展。例如,儒家关于义利关系的表述“君子喻

^① 习近平:《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在“领导人气候峰会”上的讲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报》2021年第13期。

于义”“小人喻以利”，表明了其主张重义轻利、先义后利的义利观，但在当代以国家利益为核心的全球生态建设格局中，这种义利观具有一定局限性，需要加以发展和创新。当代中国生态文明建设的发展路径，就是立足于儒家义利观不断发展创新，最终形成了“以义为先，义利兼顾”的正确义利观。“在全球生态文明建设的国际博弈中，中国的生态建设和发展不以损害其他国家的利益为代价，但中国也决不放弃本国的正当权益。”^①面对生态环境问题的挑战，中国始终坚持国家利益和国际道义的统一，积极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国际交流，以实际行动积极履约，加深不同文明之间的相互理解和彼此认同，谋求共赢发展，为应对全球性挑战贡献中国智慧和方案。

需要强调的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必须经历现代化性转化和发展，“两创”过程中亦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来鉴别、传承和发展传统文化，从而帮助更加客观、理性、中正地对待传统文化。同时，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互动共促、有机相融，也有利于更好地激活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基因，使其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迸发出强大的生命力，发挥其应有的新时代价值。

（三）有利于推动当代生态文明建设

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推进，我国日益重视对生态环境的保护。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以前所未有的力度抓生态文明建设，我国生态环境保护发生历史性变化。理论上，生态文明建设已成为当前学界的研究热点，各类研究成果层出不穷，尤其是关于我国生态文明建设的战略举措和实践探索的相关研究可谓系统丰富。各界学者从不同角度对生态文明内涵以及如何建设生态文明展开探索与研究，产出了较为丰硕的生态文明理论成果。“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创新性观点的提出，更为生态文明建设理论与实践的研究提供了新的视角，也带来了博大而精深的传统生态理论与实践的智慧资源。

实际上，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有关人与自然关系问题的认识皆极为深刻，我国社会主义生态文明观本质上即是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天人合一”思想为核心，并在进一步运用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批判继承西方生态哲学的基础上逐步形成的。可以说，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向纵深发展，必然是在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和儒家生态思想的互动交融中进行的。

首先，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创造性地解决当代社会发展实践中的重大问题。在当代，我国的经济已经进入新阶段——高质量发展阶段，维持生态环境保护与经济发展的有机平衡可谓重中之重。习近平总书记将“两山论”这一理论上升到国家现代化

^① 冯留建、孙海星：《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对儒家生态文化的继承与创新》，《毛泽东研究》2021年第4期。

发展的战略层面,提出“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生产力、改善环境就是发展生产力”^①的发展理念;《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更是强调:绝不以牺牲环境为代价换取一时的经济增长。我国对生态问题的重视,表明生态环境与社会和个人的发展息息相关,为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提供了根本遵循。

其次,要从儒家生态理论中挖掘和阐发思想精华,为推动我国当代生态文明建设提供科学的理论支撑和实践借鉴,为构建和谐美好社会指明科学路向。例如,马克思主义的核心价值观——人本主义,和儒家强调的“以民为本”在价值取向上可谓高度契合。在推进当代生态文明建设中,中国共产党人将这两种观念融合起来,始终把“人民”二字放在心上。坚持人民至上的价值取向,恪守“良好生态环境是最普惠的民生福祉”^②重要原则,并真正落实到我国当代生态文明建设的行动中去,做到生态惠民、生态利民。将保护生态环境和增进民生福祉结合起来,有利于立足当代实际情况推进生态文明建设,并在此基础上提升人民生活的幸福感,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追求,推动构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

最后,就全社会的生态教育来看,深刻体认并汲取儒家“万物一体”“民胞物与”的高度生态智慧,可有效激发公民生态道德情感,并提供正确处理自身和自然的关系的行为准则。儒家生态思想中,“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传习录·答聂文蔚书》)明确指出世间万事万物是一个紧密联系的整体,强调人、人类社会与自然界是和谐共进、休戚与共的关系。对儒家生态智慧的借鉴,可以帮助当代人认识到生态文明建设同自身利益息息相关,从而激发并长养内在“仁民爱物”的生态道德情怀,培养对自然的敬畏之心、感恩之心,进而提升自身的现代生态文明素养。与此同时,以知行合一落实生态道德实践的养成,将生态道德理念外化为生态道德行为。作为社会的一员,每个人自觉将生态智慧融入自身的实际生活和工作中,在身心和谐建设中积极践行生态文明建设的基本要求,争做生态文明建设的倡导者和践行者,推动构建资源节约型社会。这其实是一个自利且利他、利社会的统一过程,也是个体、社会与自然的全方位生态建设。

四、结语

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实践、科学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新时代生态文明建设应当坚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同时也应充分挖掘儒家生态思想中蕴含的生态理念,实现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和儒家生态思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209页。

^② 中共中央宣传部编:《习近平总书记系列重要讲话读本》,人民出版社、学习出版社2014年版,第121页。

想的有机融合。当然，在“两个结合”新视域下对二者的比较不是为了区分孰优孰劣，而是立足我国生态环境持续改善但生态环境保护任重道远的治理局面，继续发扬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并充分挖掘儒家生态思想中蕴含的生态理念，探索马克思主义生态观和儒家生态思想如何更好地融合和发展，从而推进当代社会主义生态文明建设，并在此基础上为探索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现实性提供理论借鉴与实践支撑。

Comparative Study of Marxist Ecological View and Confucian Ecological Thought Under the New Perspective of “Two Combinations”

Liu Hongmei Wu Wei

Abstract: The construction of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is a fundamental strategy for the sustainable development of the Chinese nation. Although the Marxist ecological view and Confucian ecological thought are compatible in terms of philosophical basis, practical orientation and pursuit of goals, due to the different times and cultural regions, there are many differences in backgrounds and ways to implement etc. Under the new perspective of “Two Combinations”, combining with the requirements of the times of contemporary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construction, this paper makes a comparative study of the fit and difference between Marxist ecological view and Confucian ecological thought, explores the reality, principles and implementation paths of the combination of Marxism and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hoping to provides richer theoretical reference, academic and practical support for boosting the Chinese era of Marxism, facilitating the creative transformation and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and promoting the construction of socialist ecological civilization from another side.

Keywords: Marxist Ecological View; Confucian Ecological Thought; Two Combinations; Sinicization of Marxism; Chinese Excellent Traditional Culture

[责任编辑：李谷悦]

“中国道路”的哲学阐释

——基于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思想的双重视域

汪进超*

【摘要】在新的历史阶段，对“中国道路”的思考和探索是重要的时代课题。因此，有必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和中国思想的观照下对“中国道路”进行解读。“中国”是一个有别于“民族国家”意义上“文化—历史—政治”的概念。其道路的开展首先在于中国之“道”与中国之“路”的统一。而中国之为中国，正在于其道路的“通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中国道路的当下形态，探索和实践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就是实践中国道路的通贯。这一通贯是当下与传统和未来的通贯，是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思想和其他哲学的通贯，是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的通贯，更是人与人、人与物、人与天地的通贯。

【关键词】中国道路；中华文明；中国思想；马克思主义

引言

随着中国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不断深入，对于“中国道路”的思考与辨析也日益成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研究的题中应有之义。围绕中国道路的理论基础、文化渊源、历史底蕴、现实根柢，以及中国道路对于中国与世界、当下与未来的意义等方面的讨论层出不穷。2007 年，甘阳提出中国道路应是中国儒家传统与新中国成立至改革开放三十年间形成的以“平等”为中心的观念传统和改革开放后形成的以“市场”为核心的价值传统的统一，从思想和社会结构上

* 汪进超，同济大学人文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儒家思想与古典诗学。

探讨了中国道路的哲学内涵。^① 2009年,王庆五明确辨析了“中国道路”、“中国模式”和“中国经验”三个概念,指出:“‘中国道路’是近代120年来,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后,历经旧民主主义革命、新民主主义革命到社会主义革命、建设和改革,探索在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发展中大国,如何实现民族解放、摆脱贫困,加快实现现代化,巩固和发展社会主义的道路。”^② 党的十八大以来,关于“中国道路”的讨论更加热烈。贺新元《辩证思维下“中国道路”解读》、姜加林《世界视角下的中国道路》、张天勇《从马克思主义世界历史理论看中国道路》、吴晓明《马克思的现实观与中国道路》、徐勇《历史延续视角下的中国道路》等文章分别在不同的理论背景和研究视域下对“中国道路”进行了解读,丰富了这一概念的理论外延。李健《“中国道路”的全面内涵及其经验总结》、韩庆祥《论中国道路及其本源意义》等文章则对“中国道路”的理论内涵进行了较为全面的解读。可以看出,在多元而深入的讨论中,中国道路的内涵和外延也逐渐明晰起来。但正如有论者指出,关于“中国道路”的逻辑起点,学术界一直存在着以新中国成立为起点和以改革开放为起点的分歧。^③ 非独如此,在“文化自信”的呼吁下,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传统思想的角度解读中国道路,进而发掘中国道路深厚的文明基因与思想内涵的研究却稍显不足。基于此,本文尝试在“过去—当下—未来”的历时维度和“个人—国家—世界—自然”的共时维度上理解中国道路,在中国之“道”(形而上的发展规律)和中国之“路”(现实的发展轨迹)的辩证统一中理解中国道路,思考中华文明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内在联系以及中国道路的“贯通”。

中国道路是千百年来中华民族所走过的生存之路、发展之路和自强之路,包含一代又一代中华儿女的思考与实践。在某种程度上,道路不仅是历史的存在,而且意味着当下的实践与未来。因此,可以说中国道路的存在与展开亦即每一个历史时刻的人所经历的包括民族血脉的延继、中华文明的赓续和对美好明天的不懈追求等活动在内的实践历程。自黄帝、尧、舜以来,中国道路已有数千年的发展历史,其间虽灾害频现,战火时燃,江山数易其主,天下几成“危巢”,但“斯文”未尝丧坠,“中国不绝若线”^④。中国道路在风雨飘摇中延续至今,并且也仍将在中华民族的共同努力下不断地向未来延展,这便是中国道路的品格。

当然,除不断延展之特征外,崎岖不平 and 若隐若现也是道路的一种表现形态。这一形态落实到中国的现实中,便是中华民族和中华文明所遭遇的一次又一次的险阻与困厄,其中尤值得关注的当属近代中国经历的“数千年未有之大变局”。鸦片战争以来,列强入侵并瓜分中国,皇权专制体系崩解,以农业为主的

① 参见甘阳:《中国道路:三十年与六十年》,《读书》2007年第6期。

② 王庆五:《中国道路、中国模式与中国经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研究》2009年第3期。

③ 参见张明:《大历史观与中国道路的哲学审思》,《哲学研究》2022年第5期。

④ (汉)何休注,(唐)徐彦疏:《春秋公羊传注疏》,上海古籍出版社2015年版,第391~392页。

经济结构亦开始向以工业化为主的经济结构转变……在外来的刺激下，中国人民开始了一系列救亡图存、自强求富的思考和探索。在以“洋务运动”为代表的经济改革和以“百日维新”为代表的政治运动的尝试失败之后，人们开始关注思想文化层面的改造。以“新文化运动”为起点，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猛烈地批判中国的传统思想与文化，同时大力宣传以“德先生”和“赛先生”为代表的西方思想。总而言之，中国道路在此时呈现出“山重水复疑无路”的特征，国人在这种看似绝望的境地中通过不同的方式进行探索，以求穿过黑暗，重新走向光明。历史的发展既有偶然性，也有必然性。在世界舞台的风云变幻与时代的激荡中，在无数仁人志士不懈的求索中，中国道路终于又迎来了“柳暗花明又一村”——俄国十月革命一声炮响，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马克思主义哲学虽然与大多数西方哲学一样，同为“西学东渐”浪潮中的一员，但它因其深刻的现实性和独特的实践品格而彰显了自身。一方面，马克思主义哲学深刻地揭示了社会的根本矛盾，将西方近代工业化的本质展现出来，因而极力主张反对剥削压迫，反对工业发展对人的“异化”，追求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以及共产主义社会的形态。另一方面，中国早期共产党人在接受马克思主义哲学之初，就坚持不懈地以“实事求是”的态度对其进行中国化的适应与改造。他们在以马克思主义哲学为指导的前提下，深入而具体地分析了中国的历史和当时的社会现实，经过数十年艰苦奋斗，最终使这一产生于西方的伟大思想在世界的东方结出了丰硕的革命果实——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这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胜利，也是以中国共产党为代表的广大无产阶级的胜利，还是中国道路的一次富有创造性的突破。历史经验深刻表明，只有将马克思主义深深地植根于中国现实，亦即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才能在中国复杂的社会环境中发挥其效用。新民主主义革命至今，中国道路的开展即体现为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指导下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不断丰富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不断完善。因此，在当下“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代”“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等语境下思考“中国道路”，就意味着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视域下，在中华文明的“底色”上，继续彰显其自我特征，深入探究其哲学意蕴，并在此基础上观照与实践中国的传统、当下与未来的通贯。

一、何为“中国道路”？

通过上文的论述可以看出，中国道路是一个历时性的、持续性的存在。数千年来，中华儿女用自强不息的精神和“天人合一”的智慧走出的生存、发展与自强之路，可被理解为广义上的中国道路，它是中国人民过去走过的“路”、当下走着的“路”和未来将走之“路”的总和。可以说，中国道路因中华儿女的世代延续而保持其历时的开放性特征。而中国共产党人所引领的以马克思主义为

理论指导的追求人民民主与共和的道路，则是中国道路在当前特定的历史时期所表现出的形态，亦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因此，理解当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必须将其纳入有着悠久传统和中华文明特征的“过去—当下—未来”维度上的中国道路，以承继悠久的传统，保持中华文明的连续性。同样，当谈到中国道路，也必须着眼于当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以深刻感受其社会现实性。概言之，二者虽有广义、狭义之别，但根本上却是一体的，其间保持着一种“普遍”与“特殊”的关系。以下将在中国固有的哲学话语体系下，简要地分析“中国道路”的哲学内蕴。

（一）中国之为“中国”

在通过语言和文字进行交流的过程中，人们往往会将注意力置于陌生的或非常用的概念上，这当然有助于其接收信息、拓展知识。但不可否认的是，那些惯用的普遍到人们会不自觉地忽略其存在的词语也同样有着丰富的信息。那些惯用词在一种语言产生之初就已被广泛使用，因此在某种程度上，它们内在地包含着使用这一语言的族群的最早的文化信息。只是随着长久地、高频率地使用，这些词语的内蕴在一定程度上被消解和“磨损”了。“中国”一词便是如此。

据目前已知的文献及出土材料，“中国”一词最早见于1963年在陕西宝鸡发现的铜器“何尊”铭文中。据考证，该铜器当为西周成王五年所铸。^①其铭文中“武王既克大邑商，则廷告于天曰：余其宅兹中国，自之乂民”的表述，大意乃是周人克商之后，希望选择当时“天下四方的中心地区，也就是伊、洛之间洛邑”^②。由此可见，当时所谓的“中国”，是一个空间方位以及战略意义上的称名。先秦时期，人们观念中所能够认知的疆域被称为“天下”，即所谓“普天之下，莫非王土”之义。而“国”则仅是分封制度中的“城邦”或某一诸侯所属封地。因而当时的“中国”即意为“位于天下中心的城邦”。这当然与后世熟知的“中国”的内涵大不相同，但无论如何，这一出土铭文的面世，对于理解“中国”这一概念有着一定的启示意义——它其中所包含的“天下之中”的观念在人们所认知的疆域范围不断扩大的情况下仍然有所保存。及至春秋时期，周天子所属领地周边的“犬戎”“楚蛮”等部族经常来犯，这种频繁的战事接触使周人愈发清晰地感受到自身与周围部族在语言、文化和习俗等方面的不同。因而在“天下之中”的认知基础上，周人又以其引以为豪却又日趋衰落的“礼乐文明”为标志，将天下分为“中国”与“夷狄”。北方为“狄”，南方为“蛮”，东方为“夷”，西方为“戎”，具体表述见于《礼记·王制》：

中国戎夷五方之民，皆有性也，不可推移。东方曰夷，被发文身，有不

① 参见何幼琦：《关于〈何尊〉的年代问题》，《中原文物》1983年第4期。

② 马承源：《何尊铭文初释》，《文物》1976年第1期。

火食者矣。南方曰蛮，雕题交趾，有不火食者矣。西方曰戎，被发衣皮，有不粒食者矣。北方曰狄，衣羽毛穴居，有不粒食者矣。

由上文可见，在周人观念中，东、西、南、北四方所居之民皆有其“野蛮”与“原始”之处，如“披发”“不火食”等鲜异于以礼乐文明为核心的诸夏。因而，此时的“中国”一方面有空间方位层面的意义，一方面又具有明显的“礼乐文明”色彩。在后世的历史进程中，“礼乐文明”的标志性意义逐渐超越了前者，如韩愈曾在《原道》中言：“孔子之作《春秋》也，诸侯用夷礼则夷之，夷而进于中国则中国之。”（《韩昌黎文集·原道》）可见“中国”与“夷狄”在后人的阐释体系中逐渐演变为两个“流动性”的概念。中国、夷狄并非确定不变的身份标志，而是通过对周代礼乐文明的体认来确定的。亲近礼乐，则为中国；摒弃礼乐，则是夷狄。其间并不存在严格的地域、血缘、种族等因素的限制。宋代以前，“中国”主要是作为一个以“礼乐文明”为核心标志，具有一定程度的空间方位意义的历史概念和文化概念而被理解的。正因如此，蒙古人和满洲人入主中原之后，虽于政治、军事方面对“汉人”多有防范，但在文化上却都毫不例外地以儒家礼乐文明作为立国之本。这便是中国之为“文化中国”的重要表征。

当然，正如葛兆光所说，除“文化中国”之外，还应从“历史”和“政治”的角度理解“中国”。政治中国是指历史上某一家某一姓的“政府”在“东亚”这片土地上，在长江、黄河流域的统治活动；而历史中国则是数千年来的不同王朝统辖的空间方位，它的具体疆域范围是会随着王朝的兴替发生改变的。^①

总而言之，面对“中国”这一概念时，绝不可简单地从西方语境中的“nation-state”即“民族国家”的角度去理解。在悠久的历史文明和政治实践的基础上，“中国”已然成为一个“文化—历史—政治”三位一体的综合性范畴。

（二）中国道路

对“中国”这一概念的辨析，有助于深入理解“中国道路”的内涵。传统的“中国”，是一个有着几千年历史，以黄河流域和长江流域为主要活动区域，经历了多次政权兴替，形成了卓有影响的汉、唐等王朝的存在，而究其根本，则皆以形成于周代的礼乐文明为核心标志。至于当代“中国”，则具体指“中华人民共和国”。传统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根源，而中华人民共和国则是传统中国的当下存在。二者共同构成了“中国”的“过去—当下”维度。需要注意的是，“中国”并非一个既定不变的概念，它仍有着不断丰富和发展自我的可能性和动力。就目前而言，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在马克思主义和中国特色社

^① 参见葛兆光：《宅兹中国——重建有关“中国”的历史论述》，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31～33页。

会主义的指引下，在全体中国人民的不懈努力下，“中国”正在坚定地朝向未来迈进。因此，理解“中国道路”，就必须首先在“传统—当下—未来”的维度上理解“中国”，继承传统，立足当下，放眼未来。

同样，作为一个常见而易被忽略的词语，“道路”的内涵也有详细分辨的必要。首先需要明确的是，“道路”一词主要含有形而上和形而下两层含义，形而下的“道路”即两地之间供人马车辆行驶的通道，它是有实体的、感官可见的存在；而其形而上的含义则主要偏指于人的成长或事物发展所遵循的途径，它既是主体在实践过程中所依据的规律，也是主体在实践过程中所创造出的“轨迹”。就此而言，中国道路即是中国人民在发展进程中所依循的规律和实践轨迹。如此一来，便可将“道路”具体区分为“道”和“路”。中国之“道”主要指代中国的发展规律，而中国之“路”则是中国在既往实践和当下探索中所形成的具有鲜明特色的发展轨迹。

中国古代有着不少关于“道”的话语，如“人能弘道”“道不远人”“率性之谓道”“道可道，非常道”等。这些关于“道”的表述体现了古人对于自然和社会规律的一种形而上的认知，即万事万物之“所以然”和“所当然”。换言之，“道”所关涉的是事物为何如此以及应当怎样的问题。大体而言，中国之道主要体现为“天人合一”“中和之为美”“阴阳和谐”“仁义礼智信”等思想。这些思想经由古人不断阐释和运用，已经深深地“镂刻”于中国人的心理结构中，成为一种“集体无意识”。这种“集体无意识”总是会或多或少地对中国人的实践方式产生影响。也就是说，这种产生于族群内部的类似于“集体无意识”的中国之道会对中国之路的具体开展产生重要影响。正如心理学家荣格所说：

每当集体无意识变成一种活生生的经验，并且影响到一个时代的自觉意识观念，这一事件就是一种创造性行动，它对于每个生活在那个时代的人，就都具有重大意义。^①

因此可以说，中国之道这一“集体无意识”深刻影响到中国人的生活方式和发展路径，亦即影响其对中国之路的选择。大体而言，中国之道的影响下的中国之路主要体现为“国家大一统模式”“以文化认同塑造民族认同”“礼法并行”“先进型政治团体”等。这些发展模式并不会随着皇权社会的结束而立即消亡，而是作为一种更为隐性的“经验”，影响着中国当下的道路选择。同样，进入“中华人民共和国”时期后，传统的中国“道—路”仍然发挥着“集体无意识”和“经验借鉴”的重要作用，最终在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共同努力下开拓出新的“中国道路”，亦即当下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下面就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传统思想的关联进行简要论述。

^① [瑞士] 荣格：《心理学与文学》，冯川、苏克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7年版，第138页。

二、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道路

马克思与恩格斯以德国古典哲学和古希腊哲学为其根柢，以敏锐的洞察力对资本主义的弊端进行批判，关注无产阶级利益，思考社会发展规律，探索人类命运的未来，这就使得其学说有着深刻的批判性和实践性。中国以马克思主义作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指导思想，有其现实性和必然性。有些观点认为产生于西方的“非主流”思想并不能在中国这个有着悠久历史和复杂社会情况的国家取得成功。但历史经验已经深刻地表明，“东海西海，心理攸同”。无论是马克思主义哲学，还是中国古典思想，抑或是其他民族的哲学，只要是伟大的思想，其终极追求必然是关注和思考人类的历史、当下和未来的。因此，在避免“教条主义”式的生搬硬套的前提下，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基本内涵和中国道路的展开非但不存在矛盾，反而存在很多根本上的契合之处。

（一）人的存在方式

马克思主义哲学首要关注的是“人”的存在方式问题，关于这一问题的讨论紧紧地嵌刻于马克思主义哲学关于社会和历史的相关论述中，成为其核心要义。正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主义宣言》中指出：“代替那存在着阶级和阶级对立的资产阶级旧社会的，将是这样一个联合体，在那里，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①这一表述包含了个人的自由发展和“联合体”中所有人的自由发展以及“联合体”取代资产阶级旧社会等重要命题，其中最为核心的部分当属“每个人的自由发展”。关于这一点，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有更为具体的描述：

……在共产主义社会里，任何人都没有特殊的活动范围，而是都可以在任何部门内发展，社会调节着整个生产，因而使我有可能随自己的兴趣今天干这事，明天干那事，上午打猎，下午捕鱼，傍晚从事畜牧，晚饭后从事批判，这样就不会使我老是一个猎人、渔夫、牧人或批判者。^②

可以看出，个人自由实现发展是在社会调节整个生产的背景下，每个人都能够从自己的兴趣和意愿出发去从事劳动，“能够完全自由地发展和发挥他的全部才能和力量”^③，摆脱工业化对人的异化，将个人的发展融入整个社会的发展中，并同其互为前提。这种自由发展的存在方式是对于“人”之为人的本质规定，只有达到这一形态，社会中的每一个人才能实现由“必然王国”向“自由王国”的飞跃。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422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6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02页。

“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不仅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内在要求，也应当是或必然是所有哲学的终极追求。在古老的中国哲学那里也同样有着关于人的存在方式的论述。《中庸》中有“率性之谓道”的表述，后人解释曰：“人、物各循其性之自然，则其日用事物之间，莫不各有当行之路，是则所谓道也。”^①其中，“各循其性之自然”便是要求人依照其本性而存在。《论语》中的“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等也都表达了“自我”的建立与成就他人的关系。进一步地，儒家思想中的“致中和”观念更是以“每个人都作为一个不违反其本性的存在”的要求来构建社会秩序。“致”即“推致”之义，“致中和”即意味着将“率性”的要求推扩开来，使其成为社会中所有人的存在方式，进而让社会成为一个人人“自由发展”的整体。虽然这一思想在某种程度上还保留了一定的“等级”差异，但就其核心内涵而言，中国传统思想中人的理想存在方式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相关表述并无根本抵牾。

（二）理想的社会形态

当然，深刻的批判性和现实性内在地规定了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追求“人的自由发展”时将其视野一方面深入生产力和生产资料的关系中，另一方面扩展到世界范围内的无产阶级与资产阶级的矛盾中。因此，马克思和恩格斯指出，只有在大工业生产阶段，以生产资料国有化为标志的社会主义社会全面建立之后，才能为人的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提供必要的物质保障和社会基础。^②正如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一文中写道：

一旦社会占有了生产资料，商品生产就将被消除，而产品对生产者的统治也将随之消除。社会生产内部的无政府状态将为有计划的自觉的组织所代替。个体生存斗争停止了。于是，人在一定意义上才最终地脱离了动物界，从动物的生存条件进入真正人的生存条件。……只是从这时起，人们才完全自觉地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只是从这时起，由于人们使之起作用的社会原因才大部分并且越来越多地达到他们所预期的结果。^③

因此，社会占有生产资料是实现社会共产主义的重要保证，在这样的社会中，人摆脱了商品的奴役，开始以自觉的意识成为独立而自由的存在，参与社会实践并积极创造历史。可见，每个人自由而全面的发展是共产主义社会的内在标志，而共产主义社会的实现又是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必要条件。这就要求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对社会进行深刻分析的基础上，提出社会的理想形态以及如何实现这一理想形态的方法。其中，“阶级革命”“无产阶级解放和专政”“科学共产主

① 朱熹：《四书章句集注》，中华书局2016年版，第17页。

② 参见《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302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9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00页。

义”等论述具有强烈的现实指导意义。

揆诸中国传统，也可看到先贤们心中的理想社会形态——“大同”。在《礼记·礼运》中，“大同”理想被作为儒家对社会形态的终极追求。其具体表述为：

大道之行也，天下为公，选贤与能，讲信修睦。故人不独亲其亲，不独子其子，使老有所终，壮有所用，幼有所长，矜、寡、孤、独、废疾者皆有所养，男有分，女有归。货恶其弃于地也，不必藏于己；力恶其不出于身也，不必为己。是故谋闭而不兴，盗窃乱贼而不作，故外户而不闭，是谓大同。

在这个社会形态中，天下成为公共的天下，人人都能够发挥其才智并实现其价值；弱势群体能够得到很好的安排和帮助，作奸犯科之事也不再发生。虽然不可以之完全比之于共产主义的社会形态，但二者在对理想社会的构建以及对理想社会形态中人的存在方式的认知上都有一定的相似性。因此可以说，当前以共产主义为理想的社会主义道路与中国传统的理想社会之间并不存在根本矛盾。

基于以上论述，大致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传统中国之道的契合。近代以来，中国共产党人积极地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传统和现实相结合，带领中国人民开辟了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道路，这条道路便是中国道路的当下形态。但“路漫漫其修远兮”，道路之为道路，正在于道路之朝向远方的无限延展。如何让中国道路沿着固有的历史脉络，顺着当下的现实向未来不断展开，是当前中国面临的主要课题。

三、中国道路的通贯

中国的发展，中国道路的选择，绝不是一个既定的过去式，而应当是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指导的，建立在以现实问题为导向，以发展实践为动力、以古今中外思想为理论借鉴基础上的未完成的“进行时”。因此，思考中国道路，就是思考“历时”维度上的中国传统、当下与未来，也是思考“共时”维度上的中国与世界各国之关系，甚至还可以说是思考中国与自然之间的关系。中国道路的通贯，就是“中国”在不同维度上与其他存在之间建立联系并和谐并存。《说文解字》云：“中，下上通也。”^① 中国之“中”的深层内涵或许就藏在“通”这个字中。人与自然的关系、中国与世界的关系、当下中国与历史的关系，无不都指向“通”。“通”即处理好以上种种关系，在与不同对象的通贯中确立自身。因而，“通”即“中”，即中国之“中”，是中国道路的内在要求。

^①（汉）许慎撰，（清）段玉裁注：《说文解字注》，浙江古籍出版社 2006 年版，第 20 页。

“历时”维度上，关于中国传统、当下与未来之间的关系，上文已多有论述。大体而言，中国道路的开展，必须建立在对优秀历史文明成果继承和转化的基础上，将其不断地与时代主题相结合，着眼于当下问题的解决，在脚踏实地的努力中走向人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未来。正如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十九届四中全会上强调：“一个国家治理体系与能力与这个国家的历史传承和传统文化密切相关，解决中国的问题只能在中国大地上探寻适合自己的道路和办法。”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哲学作为实践的哲学，当然能为共产党人提供理论依据，但中国问题的解决只能在中国自身历史经验和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在中国当下的国情中实事求是、灵活运作，才能坚定而平稳地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

“共时”维度上，中国在坚持走自己道路的同时，总是会受到以其他意识形态为主导的国家的猜忌甚或是“诬陷”。他们坚信“修昔底德陷阱”的存在，认为中国发展强大之后就会走上霸权主义的侵略扩张之路。这其实是对中国人民和中国道路的极大误解。马克思主义哲学中联系的观点、世界共产主义的观点，以及中国传统思想中的“天下”观念与“和合”思想都强调族群间和平相处。而且，中国几千年来历史也表明，中国自古以来就致力于在本国发展的基础上维持周边和平。新中国成立后，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的基础上同大多数国家建立了良好的外交关系。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领导集体积极倡导“合作共赢”的外交模式，追求中国与世界其他各国之间的和平相处与共同发展，“一带一路”倡议的提出和实践正是中国和平发展的重要体现。而“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的提出，更是表明了中国深刻认识到世界各国人民的命运“休戚与共”的关系。以上理论与现实无不表明，中国道路的通贯，不仅在于本国传统、当下与未来的通贯，而且也在于中国与世界其他各国之间的关系的的确立，以及中国与世界各国和平共处、共谋发展、共同追求理想的社会形态与人的自由存在的实现。

值得注意的是，“人类命运共同体”不仅着眼于人与人、国与国之间的关系，还包含人与自然应当如何相处的问题。随着现代工业过度发展，自然生态问题也随之显现：城市雾霾、全球变暖以及由此引发的冰川融化、海平面上升等问题，工业垃圾、生活垃圾逐渐增多……凡此种种，无不对人类的生活质量乃至生存问题构成严峻威胁。20世纪末签署的《京都协议书》以及2016年签署的《巴黎协定》，皆表明了世界大多数国家对环境污染问题十分重视，以及对美好生存环境的追求。20世纪80年代，中国政府就已经把环境保护确定为基本国策，强调在追求经济高速发展的同时兼顾环境保护。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更是在新的历史阶段提出“生态文明建设”的命题，将生态发展内化于中华文明伟大复兴的时代进程中，同时也内化于中国道路的展开中。一方面，这是马克思主义哲学生态观的内在要求。马克思指出：“人靠自然界生活。这就是说，自然界是人为了不致死亡而必须与之处于持续不断的交互作用过程的、人的身体。所

谓人的肉体生活和精神生活同自然界相联系，不外是说自然界同自身相联系，因为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①可见，自然在马克思那里不但是人的实践对象，而且也被理解为人的生活资料的来源，即自然为人类提供了其所赖以生存的物质基础。故而人在改造自然的过程中，也要同时将自己内置于其中，与之和谐相处。另一方面，生态文明建设的提出也是中国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的当代体现。老子主张“万物作焉而不辞”（《老子·第二章》），认为人不应过度妨碍万物之生长。孟子也建议国家应该采取“数罟不入洿池”“斧斤以时入山林”（《孟子·梁惠王上》）等措施，在取万物以自给的同时保持其生长，此即早期的可持续发展理念。在儒家思想中，人的最高境界是“赞天地之化育”。《中庸》曰：“唯天下至诚，为能尽其性；能尽其性，则能尽人之性；能尽人之性，则能尽物之性，能尽物之性，则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可以赞天地之化育，则可以与天地参矣。”（《中庸·第十二章》）“赞天地之化育”即是要求人在自我修养的同时，尽己所能地“赞助”天地万物的生长，使万物生生不息，与人一起，共同构成天地之间的生命存在，共同构建“天地位焉，万物育焉”的自然图景。可见中国传统思想中历来就有人与自然万物和谐共处的思想——仁者与天地万物为一体（程颢语）^②。由此而言，“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内蕴便得以彰显：人类与自然万物皆生于天地间，不仅人与人的命运紧紧相连，人与万物也同样休戚与共。故而在生态文明的层面上，人类命运共同体即是包括人与物在内的“天地万物”的命运共同体。这就是人与自然维度上的中国道路的通贯。

四、结语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辨析了“亡国”与“亡天下”的区别，并指出：“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矣。”（《日知录·正始》）梁启超将其概括为“天下兴亡，匹夫有责”。其中的“天下”，实际上就是一个包含了悠久的历史脉络、辉煌灿烂的中华文明、以“仁”“义”为核心的传统思想、独具特色的政治实践以及由这片土地上世代生活着的广大人民创造的伟大历史等要素在内的“文化中国”。毫无疑问，对“文化中国”的守护，亦即对中华文明的传承、发展、弘扬和实践，是每一位中华儿女的责任。党的十八大报告提出“三个自信”，其中就包括“道路自信”。而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坚持不忘初心、继续前进，就要坚持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自信、理论自信、制度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党的基本路线不动摇，不断把中国特

^①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55～56页。

^② （南宋）叶采集解：《近思录集解》，中华书局2017年版，第17页。

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推向前进。”^①“三个自信”到“四个自信”的转化，表明中国共产党明确肯定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意义。可以说，无论是道路、制度还是理论，都必须以文化这一更为深层的内容为基础。因此，当下中国道路的展开也必须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为根基，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不断中国化的过程中展开其自身。正如有论者指出：“道路自信必须以文化自信为基础，否则道路自信就会因缺少灵魂而成为无源之水、无本之木。”^②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0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又一次强调：“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③可以说，这条独具特色的中国道路“是在对中华民族5000多年悠久文明的传承中走出来的”^④。因此，坚持道路自信，就必须有充分的文化自信；而充分的文化自信，又能够为道路自信提供“精气神”，注入源源不断的精神动力。在经历了近百年的文化上的自我否定与自我怀疑，以及各种文明的与思想的学习与转化后，当下中国需要重新在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重指引下，重新探索与总结具有中国特色的“文化自我”，或曰“文化本体”。有了“自我”，才能更明确地“自尊”与“自信”，从而实现“文化自觉”。

要言之，中国作为一个“文化-历史-政治”的存在，其过去的发展之路、当下的探索实践和未来的文明理想共同构成独特的中国道路。从哲学的角度而言，中国之“中”即通贯之义。“通贯”即建立联系并处理好这种联系。因此，走好中国道路的关键就在于认识并实现其“通贯”。中国道路的通贯是一种全面的通贯——中国之“道”与中国之“路”的通贯，是中国的传统、当下与未来的通贯，是中国思想与马克思主义以及西方思想的通贯，是中华文明与人类文明的通贯，是人与人、人与物、人与天地之间的通贯……道路的本质要求就是通贯，因而中国的发展就是处理好这种全面的通贯。实现了这一“通贯”，“中国道路”便能不断地向远方和未来延伸。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6页。

② 罗建华：《从“三个自信”到“四个自信”：习近平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思考与定位》，《求实》2017年第5期。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10页。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1卷，外文出版社2018年版，第39～40页。

Philosophical Interpretation of“China Road”

—In the View of Marxist Philosophy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Thought

Wang Jinchao

Abstract: In the new historical stage, the thinking and exploration of “China Road” is an important topic of the time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interpret the “China Road” in the reference of Marxist philosophy and Chinese Thought. “China” is a concept of “culture-history-politic”, which is different from “nation-state”. The development of its road first lies in the unity of Chinese Tao and Chinese Road. What makes China be China lies in the “connection” of the roads. The path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the present form of China Road. Exploring and practicing the road of socialism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is practicing the connection with Chinese Tao and Road. It is the connection of the present, the tradition and the future. It is the connection of Marxist philosophy and Chinese traditional thought and other philosophies. It is the connection of China and other countries in the world. Furthermore, the connection is the link of human and human, human and things, human and nature.

Keywords: China Road; Chinese Civilization; Chinese Thought; Marxism

[责任编辑: 李谷悦]

从新民主主义文化看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 “第二个结合”^{*}

郭 娟^{**}

【摘 要】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具有中国特色的革命道路，形成了具备民族特色的新民主主义文化。新民主主义文化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有机结合，既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也展现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民族性。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结合”，需要从新民主主义文化中汲取养分滋养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创新与创造。

【关键词】文化；新民主主义；传统；马克思主义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这一重要论断，是习近平总书记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 100 周年大会上提出的。党的二十大继续深化对“两个结合”的再认识，将其作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规律性认识写入党章，并明确强调：“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必须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只有植根本国、本民族历史文化沃土，马克思主义真理之树才能根深叶茂。”^①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继“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之后对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命题的理论创新和突破。虽然“第二个结合”是第一次被明确提出，但早在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结合就有了理论和实践上的发展，集中体现在新民主主义文化上。

^{*} 本文系 2022 年济宁市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两个结合”的逻辑关系研究”（项目编号：22JSGX119）的阶段成果。

^{**} 郭娟，中共济宁市委党校讲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中共党史等。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24 页。

一、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丰富内涵

19世纪初,诞生于欧洲大陆的马克思主义传入中国,俄国十月革命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得到广泛传播。关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毛泽东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28周年大会上发表的《论人民民主专政》的讲话中有一句经典表述:“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①在中国的仁人志士和先进知识分子的推动下,马克思主义与中国的工人运动相结合,在历史发展的合力下,中国共产党诞生了,这是开天辟地的大事变。中国共产党创立之后,一直在寻找马克思主义与中国革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有效路径,但由于各种主客观原因在革命的过程中犯了左或右的错误,主要源于对马克思主义的教条化,没有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和民族化。1938年10月,毛泽东在《论新阶段》中指出:“马克思主义必须通过民族形式才能实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使之在每一表现中带着中国的特性,即是说,按照中国的特点去应用它。”^②所谓“民族形式”,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产生的新的文化样态,这一新的文化样态既能充分彰显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又能以其鲜活的民族特色为大众所喜闻乐见。在这一思想的基础上,中国共产党人既克服了“五四”时期激进派对传统文化的历史虚无主义,也克服了保守派对传统文化的不分良莠的拿来主义,进而提出了新民主主义文化观。

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经典表述集中体现在毛泽东在1940年发表的《新民主主义论》一文中,这篇文章对新民主主义文化进行了较为系统的阐述。其中,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内涵,“所谓新民主主义的文化,一句话,就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③。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内容,“现阶段上中国新的国民文化的内容,既不是资产阶级的文化专制主义,又不是单纯的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而是以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文化思想为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新民主主义”^④,即新民主主义的。关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特征,“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文化,就是人民大众反帝反封建的文化,就是新民主主义的文化,就是中华民族的新文化”^⑤,即民族的、科学的、大众的。新民主主义文化首先是“民族的”,其次是“科学的”,最后是“大众的”,这也饱含深刻的逻辑关系,发展新民主主义文化,核心就是要不忘本来、吸收外来、服务大众。

①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建党以来重要文献选编》第15册,中央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651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98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6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709页。

二、新民主主义文化对“第二个结合”的体现

（一）民族性：吸收传统文化的精华

新民主主义文化首先是民族的，这是对新文化运动以来中西文化观反思的结果。1840年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文化上也经历了一个从一元的封建文化向多元的文化样态转变的过程。在多元文化的嬗变过程中，中国的仁人志士和先进的知识分子对中西方文化的选择也经历了一个由盲从到理性的过程。新文化运动时期，在经历了对西方器物、制度学习的失败后，先进的知识分子转向对西方文化的学习。为什么要学习西方的文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将近代中国的落后挨打归结于中国文化的失败。为了救亡图存和思想启蒙，新文化运动时期激进的知识分子对传统文化进行了彻底的否定和抨击，高举科学与民主的大旗要求重建中国文化。不能否认新文化运动对中国的革命和变革起到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但是其对传统文化的态度却值得商榷。1915年12月15日，陈独秀在《新青年》发表专论《东西民族根本思想之差异》，系统全面地阐释了他的中西文化观。他将进化论作为东西方文化研究的基础，以论辩的形式比较了东西方民族在根本思想上的不同。他将西强东弱的原因归结为“西洋民族以战争为本位”与“东洋民族以安息为本位”的民族性的差异，并表示“但能肖其万一，爱和平尚安息雍容文雅的东洋民族，何至处于今日被征服之地位？”^①他还指出：“忠孝者，宗法社会封建时代之道德，半开化东洋民族一贯之精神也。”这种忠孝道德造成四大恶果，要改变种种恶劣现象就要“以个人本位主义，易家庭本位主义”。^②陈独秀对中西文化的比较，以尖锐的话语在民众的思想启蒙过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但对传统文化也存在偏激的倾向。这种对立的中西文化观在新文化运动时期的知识分子中并不占少数，由此看来五四运动后思想启蒙只是刚刚开始，文化重建也任重道远。

五四运动中激进反传统的文化观，为中国共产党人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提供了深刻的启示。中共早期创始人张申府先生在反思中提出，五四运动的两大口号是“打倒孔家店”和“科学与民主”，现在要变一下，变成“打倒孔家店”，“救出孔夫子”，“科学与民主”，“首先要自主”。^③所以，中国共产党人要建设新民主主义文化，要建设中华民族的新文化，就要敢于并善于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汲取精华。1938年，毛泽东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命题中明确指出：“今天

① 《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5页。

② 《陈独秀著作选》第1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年版，第166页。

③ 《张申府文集》，河北人民出版社2005年版，第190页。

的中国是历史的中国的一个发展；我们是马克思主义的历史主义者，我们不应当隔断历史。从孔夫子到孙中山，我们应当给以总结，承继这一份珍贵的遗产。”^① 不同于五四时期对传统文化的彻底否定，新民主主义文化观认为：“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② 而对待外国文化，则不能再搞全盘西化，要“以我为主”，“洋为中用”。所以，新民主主义文化首先是民族的，只有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新民主主义文化才不会显得单薄，才会有厚重的文化底蕴。

（二）科学性：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

新民主主义文化是由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作为无产阶级最强有力的理论武器，马克思主义在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的形成过程中发挥了指导思想的作用。马克思、恩格斯没有对文化进行过专门的论述，但他们的文化观内含于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中。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中指出，社会意识形态作为上层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它的产生、发展都不能只从它本身得到说明，而“必须从物质生活的矛盾中，从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之间的现存冲突中去解释”^③。按照马克思的观点，一切观念的东西都不是凭空产生的，它其实是物质生产生活方式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并受到物质生产生活方式的制约。所以，在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的关系中，是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上层建筑随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发生或快或慢的变化。上层建筑中政治、法律等制度形式的部门会随经济基础的变化而发生较快的变化，而哲学、宗教、艺术等社会意识形态的部门则不会随经济基础的变动发生较快的转变，而是要经过非常缓慢的适应过程。文化作为上层建筑中社会意识形态的一种形式，因其具备很强的隐蔽性，所以在适应经济基础的过程中呈现出较为缓慢且复杂的变化。马克思、恩格斯还对文化发展与物质生产的不平衡性进行了深入分析，恩格斯在致施米特的信中提出：“经济上落后的国家在哲学上仍然能够演奏第一小提琴。”^④ 为什么物质和文化的发展会具备不平衡性？他又继续阐释道：“每一个时代的哲学作为分工的一个特定的领域，都具有由它的先驱传给它而它便由此出发的特定的思想材料作为前提。”^⑤ 这就论证了以哲学为代表的社会意识形态具备历史继承性，文化的不平衡性与哲学的不平衡性有很大的相似性，从文化的历史继承性出发就能解释落后国家拥有先进的文化的原因。马克思、恩格斯在文化领域的建树绝不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53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708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592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12页。

⑤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612页。

仅限于此，但由此可以看出马克思主义文化观是唯物史观视域下开放的文化观。

新民主主义文化观继承了马克思主义文化观的科学性，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进一步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文化思想，对文化和政治、经济的辩证统一关系进行了系统的阐释，他指出：“一定的文化（当作观念形态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给予伟大影响和作用于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而经济是基础，政治则是经济的集中的表现。”^①他继承了马克思恩格斯关于文化的基本思想，在文化、政治和经济的关系中，明确文化作为一种观念，既是政治和经济的反映，又反作用于政治和经济。而文化作为一种社会意识形态，在阶级社会中又具备阶级属性，一定的文化总是从属于一定的阶级，并为一定阶级的政治和经济服务。新民主主义文化是无产阶级领导的人民大众的反帝反封建的文化，无产阶级的文化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阶级属性，也是马克思主义文化的阶级属性。在新民主主义革命中，新民主主义文化承担的历史任务是反帝反封建，既要反对服务于旧社会、旧政治和旧经济的封建文化，还要反对服务于帝国主义政治和经济的文化，从而建立起为新政治和新经济服务的新文化。所以，新民主主义文化是科学的，“它是反对一切封建思想和迷信思想，主张实事求是，主张客观真理，主张理论和实践一致的”^②。为了体现新民主主义文化的科学性，就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扩大共产主义的宣传和教育，用马克思主义的思想文化去领导新民主主义社会的思想文化。

（三）兼容性：在实践中实现结合

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民族性与科学性在新民主主义的革命实践中实现有效结合。新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毛泽东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就积极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中国革命的具体实际相结合，走出了一条“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具有中国特色的新型革命道路。与此同时，中国共产党也充分汲取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养分，积极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形成了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实事求是”最早出自班固所著《汉书》，他在评价汉景帝之子刘德时写道：“（刘德）修学好古，实事求是。从民得善书，必为好写与之，留其真。”（《汉书》卷五十三《河间献王传》）原意是称颂刘德在搜集古典文献时求真务实的治学态度。在中国古代很长一段时间里，“实事求是”只是考据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而不是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哲学命题。但作为显学的儒学注重现实，主张经世致用、格物致知，这与实事求是所彰显的哲学道理具有相通性。南宋理学家朱熹、明末清初的王阳明、清初的顾炎武和清末的曾国藩，就在汉学与儒学的融合过程中，将“实事求是”与“即物穷理”统一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663～664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7页。

起来,赋予了“实事求是”哲学认识论方面的内涵。早年毛泽东在求学过程中深受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中国古代哲学的影响,王阳明、魏源、曾国藩、谭嗣同等人“经世致用”的湘学传统,更是对毛泽东哲学思想的形成产生了潜移默化的影响。

在中国革命道路的探索过程中,尤其是在反对主观主义的斗争中,毛泽东强调一切从实际出发,奠定了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基础。1930年,毛泽东发表《反对本本主义》一文,第一次明确提出思想路线的问题,强调“没有调查,没有发言权”,提出了中国共产党要“从斗争中创造新局面”的思想路线。^①1941年5月19日,毛泽东在延安干部会议上作了《改造我们的学习》的报告,第一次从哲学意义上对实事求是进行了科学的阐释并赋予其新的含义。“‘实事’就是客观存在着的一切事物,‘是’就是客观事物的内部联系,即规律性,‘求’就是我们去研究。我们要从国内外、省内外、县内外、区内外、区内的实际情况出发,从其中引出其固有的而不是臆造的规律性,即找出周围事变的内部联系,作为我们行动的向导。”^②毛泽东采用“实事求是”这一古代成语,吸收它朴素合理的成分,运用马克思主义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原理,对其做出科学的阐释,赋予其崭新的内涵,既具有民族特色,又体现普遍真理,使其成为党的思想路线的核心内容。除此之外,毛泽东的哲学思想、军事思想也都融合了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华,这既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创新与发展,也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创新与发展。

三、新民主主义文化对“第二个结合”的当代启迪

新民主主义文化作为一种过渡性的文化样态,在由新民主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中已经成功完成了它的历史使命。但正如马克思、恩格斯所认为的那样,文化具有历史继承性,新民主主义文化中所饱含的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以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传承性至今仍具有非常重要的现实意义。新时代,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尤其是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或许能从新民主主义文化中得到更多的启迪。

(一) 正确认识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论述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性质时阐述道:“当作国民文化的方针来说,居于指导地位的是共产主义的思想,并且我们应当努力在工人阶级中宣传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并适当地有步骤地用社会主义教育农民及

^① 参见《毛泽东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09、116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01页。

其他群众。”^①由此可见，在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以共产主义为远大理想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新民主主义文化的指导思想是马克思主义，这也是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过程中必须坚持的政治立场。近年来，随着“儒学热”、“国学热”以及“传统文化热”的兴起，正确处理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的关系，成为我们在推进“第二个结合”过程中必须厘清的一个重要问题。2014年9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上明确指出：“中国共产党人是马克思主义者，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但中国共产党人不是历史虚无主义者，也不是文化虚无主义者。我们从来认为，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必须同中国具体实际紧密结合起来，应该科学对待民族传统文化，科学对待世界各国文化，用人类创造的一切优秀思想文化成果武装自己。”^②所以，在推进“第二个结合”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之间是一种以前者为主的辩证统一关系，以发展马克思主义为中心，吸收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华来充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内涵。

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决定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个结合”的前进方向，要保证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结合中不走老路和邪路，就要坚持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一是坚持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中国的发展和实践证明，马克思主义是科学的学说，它揭示了人类社会发展的规律，虽然在某些具体表述上具有一定的历史局限性，但是它的基本原理是正确的，具有强大的生命力。马克思主义的科学学说不仅包括经典马克思主义作家的经典理论，还包括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系列理论成果，这是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根本指导。二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结合”，实际上是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一个基本要求，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和新民主主义文化都是社会主义文化在不同历史时期和社会阶段的一种表达。新时代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在对待传统文化的问题上，要坚持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进行辨别和甄选，把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结合起来，最终落脚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上来。

（二）客观评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作用

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发展，“首先改造了中国人的文化精神，使得在中国这块世界东方的广大土地上，进行了规模浩大的一次文化转型”，“改变了中国封建

^①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4页。

^② 习近平：《在纪念孔子诞辰2565周年国际学术研讨会暨国际儒学联合会第五届会员大会开幕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4年版，第13页。

时代的趋古文化模式,把几千年来中国人的趋古精神,变为一种前景精神,这种转变真是20世纪中国文化转型的基本内容”。^①在文化从传统向现代的转型过程中,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的碰撞交流会产生两种结果,一是外来文化转化为传统文化的内在力量,一是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融合为一种新的文化样态。新民主主义文化在形成和发展的过程中,就呈现出外来文化与传统文化成功融合的显著特征。新民主主义文化观彻底克服了近代以来的文化复古主义和历史虚无主义的文化观点,进一步改变了人们关于文化的错误认识和畸形心理。所以,客观评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发展作用,成为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第二个结合”的重要方面。

中国共产党人在评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方面始终是马克思主义者、历史唯物主义者。用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评价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要从对历史的评价和对传统文化的评价两个方面着手。一方面要正视历史、尊重历史,而不能隔断历史、虚无历史,承认中国历史发展的继承性和延续性。习近平总书记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我们党历来用历史唯物主义的立场观点方法看待中华民族历史,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经过几代学者接续努力,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等重大工程的研究成果,实证了我国百万年的人类史、一万年的文化史、五千多年的文明史。”^②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结合”,要深入了解中华五千多年文明史,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继续推进和不断深化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另一方面要辩证地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其一,充分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在历史和现实中的重要作用。从历史上看,包括儒家思想、法家思想和道家思想在内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积极成分,对维持社会稳定、协调社会关系以及促进生产发展发挥了积极作用,这是不容否认和忽视的。从现实中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道德观念、哲学思想和人文精神等,对当前我国的社会道德建设、治国理政以及推动经济社会发展都具有借鉴意义。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存在不少契合点。民本思想与群众史观的价值契合、知行合一与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实践契合、大同社会与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契合、天下为公情怀与解放全人类的使命契合等,这都为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结合”提供了重要内容。其二,要看到传统文化中的落后和消极因素。文化的发展存在超前性或滞后性,传统文化在今天余温仍存。要使马克思主义更具有民族特色,就要甄别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的精华和糟粕,取其精华、去其糟粕,尤其要坚决摒弃传统文化中存在的愚忠愚孝、三从四德、男尊女卑、“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一人得道,鸡犬升天”以及“刑不上大夫,礼

① 施有松:《中国现代三大伟人》,中国青年出版社1996年版,第214、216页。

② 《习近平在中共中央政治局第三十九次集体学习时强调:把中国文明历史研究引向深入 推动增强历史自觉坚定文化自信》,《人民日报》2022年5月29日。

不下庶民”的文化糟粕，认识其客观存在的局限性和落后因素，在此基础上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关系，这样才不会简单把二者对立起来，才能真正理解二者结合的可能性和必要性。

（三）深刻把握“大众的文化”的目标指向

“为什么人的问题，是一个根本的问题，原则的问题”^①，“大众的文化”回答了新民主主义文化的主体和目的。为了形成“大众的文化”，就需要发挥文化精英与人民大众的主体性作用。毛泽东强调：“一切进步的文化工作者，在抗日战争中，应有自己的文化军队，这个军队就是人民大众。革命的文化人而不接近民众，就是‘无兵司令’，它的火力就打不倒敌人。”^②新民主主义文化不否定文化精英的重要作用，但更重视人民大众这样一支文化军队，必须让文化精英走出“象牙塔”并与社会现实生活紧密联系起来，从而创作出更多人民大众喜闻乐见的新文化作品。近代以来，新文化运动对平民文学的肯定、20世纪40年代全国文艺大众化和民族化的讨论、解放区延安文艺座谈会形成的路线，都是要求文化精英坚持马克思主义的观点和方法，使其创作与社会现实紧密结合起来，从而实现文化的大众化发展。毛泽东曾提出，“要把教育革命干部的知识和教育革命大众的知识在程度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把提高和普及互相区别又互相联结起来”^③，要克服文化精英存在的各种“非人民大众非无产阶级的创作情绪”^④，使“文艺工作者的思想感情和工农兵大众的思想感情打成一片”^⑤。同时，在文化表现形式上，文化精英要向人民群众学习语言，从而使没有受过教育甚至不识字的人民大众也能学到先进的文化。发展大众文化，使之贯穿于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全过程，是新民主主义文化的出发点和落脚点，这也为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第二个结合”提供了目标指向。

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指出：“我们必须坚定历史自信、文化自信，坚持古为今用、推陈出新，把马克思主义思想精髓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精华贯通起来、同人民群众日用而不觉的共同价值观念融通起来……不断夯实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基础和群众基础。”^⑥新时代推进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依靠的力量是人民，最终也是为了人民，要让人民群众真正体悟到马克思主义的真理性、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独特性以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兼容性。马克思主义要求理论联系实际，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倡“经世致用”，二者

①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7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8页。

④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74页。

⑤ 《毛泽东选集》第3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851页。

⑥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18页。

都强调实践的重要性。由此可见，加强对马克思主义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研究，为的是在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程中更好地践行和应用，这就要求对马克思主义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宣传和讲授要更接地气、更贴近群众。对马克思主义的研究，要结合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结合中国的具体实际讲好中国故事，使马克思主义的理论研究和讲授更具中国味道；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研究和讲授，要从书斋中和课堂上真正走到群众和社会实践中去，“系统梳理传统文化资源，让收藏在故宫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文字都活起来”，“通过学校教育、理论研究、历史研究、影视作品、文学作品等多种方式，加强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教育，引导我国人民树立和坚持正确的历史观、民族观、国家观、文化观，增强做中国人的骨气和底气”^①，真正发挥以文化人、以文育人的作用。

The Second Combination of Marxism Sinicization Seen from the New Democratic Culture

Guo Juan

Abstract: The Chinese Communists insisted on combining the basic principles of Marxism with the concrete reality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 and with the excellen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during the New-democratic Revolution Period. At the same time,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led the people to develop a revolutionary path with Chinese characteristics and a new democratic culture with national characteristics. The New Democratic Culture has successfully realized the effective combination of Marxism and excellen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which manifests both the scientific nature of Marxism and the national nature of the excellent Chinese traditional culture. To promote the “Second Combination” of Marxism Sinicization in the new era, we must draw nutrients from the new democratic culture to nourish the theoretical innovation of Marxism Sinicization.

Keywords: Culture; New Democracy; Tradition; Marxism

[责任编辑：鲁法芹]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62 页。

新时代公安机关廉政风险防控的文化路径新探*

卢文忠**

【摘要】 廉政风险防控对于新时代我国坚持一体推进“三不腐”具有重要现实意义。公安机关廉政风险是诱发公安民警出现腐败行为的可能性因素，通过剖析近年来公安机关廉政风险的典型问题和内在机理，可以发现，廉政风险表征着来自亲密社会关系的具有腐败价值观的围猎者能够诱发执法者的腐败行为。从社会生态的宏观层面看，廉政不仅需要廉洁的权力运用，也需要廉洁的大众参与，不仅要防范公权力的变质，也需要防范围猎者的攻击；不仅需要反腐败斗争的制度约束，也需要廉洁价值观的文化引导。通过加强社会层面的廉洁文化建设和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来不断构筑“不想腐”的堤坝，这是新时代深化廉政研究、加强廉政建设、防控廉政风险的新思路和新视角之一。

【关键词】 公安机关；廉政风险；腐败；防控；文化路径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不敢腐的目标初步实现，不能腐的笼子越扎越牢，不想腐的堤坝正在构筑，反腐败斗争压倒性态势已经形成并巩固发展。”^① 坚持一体推进“三不腐”是新时代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以及保证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的必然选择和重大举措。其中，从思想文化层面加强廉政风险防控，把廉洁文化建设作为新时代反腐败斗争的重要基础，对于坚持一体推进“三不腐”尤其对于进一步构筑“不想腐”的堤坝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能够有效地发挥文化反腐的作用。“文化反腐则涉及从人们的认知、态度、价值等方面

* 本文系江苏警官学院“警察生态学研究”科研团队建设项目、广东省高等学校党的建设研究会2021年党建研究课题“新时代公安院校压实意识形态工作领导责任研究”（项目编号：2021BK045）阶段性成果。

** 卢文忠，广东警官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院长，副教授，公安廉政建设研究中心主任，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与公安思想政治工作。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6～7页。

进行反腐败,清除人们头脑深处的腐败思维。”^①那么,对于公安机关而言,作为党和人民手中的“刀把子”意义上的重要政府职能部门,为了切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职责使命、忠实履行打击违法犯罪和维护公共安全的职能,必须进一步加强廉政风险防控、推进廉洁文化建设、保证队伍清正清廉。

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深化标本兼治,推进反腐败国家立法,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增强不想腐的自觉。”^②2022年《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提出:“推动廉洁文化建设实起来、强起来,不断实现干部清正、政府清廉、政治清明、社会清朗。”据此,从社会生态的宏观层面看,廉政不仅需要廉洁的权力运用,也需要廉洁的大众参与,不仅要防范公权力的变质,也需要防范围猎者的攻击,不仅需要反腐败斗争的制度约束,也需要廉洁价值观的文化引导,这是深化廉政研究、加强廉政建设、防控廉政风险的一个新思路和新视角。因此,在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基础上,必须把建设廉洁的政治生态和建设廉洁的社会生态相结合,既要加强权力内部的廉洁文化建设,也要加强社会层面的廉洁文化建设,由此积极营造“社会清朗”的文化环境,在社会大众层面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在全社会增强廉洁价值观的文化影响力,从思想文化层面主动抵御和阻截各种诱发腐败行为的廉政风险,这是我国新时代推进党风廉政建设和反腐败斗争的重要社会基础和文化利器。从思想文化层面加强廉政风险防控,对于公安机关锻造新时代高素质过硬公安队伍,按照“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总要求坚持政治建警、全面从严治警、忠实履职尽责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公安机关廉政风险的典型问题

廉政就是廉洁从政,是政府工作人员履行职责的纪律要求和职业道德。对于公安机关而言,作为重要政府职能部门,其权力的运用在于打击违法犯罪、维护公共安全,廉政是公安机关忠实履职尽责的基本要求,也是人民警察职业道德的基本内容,还是新时代公安队伍坚持对党忠诚、服务人民、执法公正、纪律严明的基本体现。公安机关这一“刀把子”倘若在廉政风险上疏于防范、在廉政建设上有所松懈,将会比其他政府职能部门发生的腐败行为造成更为恶劣的影响。廉政的根本问题在于权力的运用是公正为民、依法履职还是以权谋私、徇私枉法?公安机关廉政风险防控的现实意义之一就是在腐败行为发生之前主动抵御和阻截各种诱发公安民警腐败行为的廉政风险,使公安民警在行政执法工作中坚持

^① 任建明、胡光飞:《文化反腐:历史反思、特点分析及手段策略》,《理论视野》2018年第9期。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69页。

公正为民、依法履职，防止其以权谋私、徇私枉法。^①

（一）廉政风险的典型案件

公安机关廉政风险是诱发公安民警出现腐败行为的可能性因素。这些可能性因素潜伏于公安机关内部和外部——内部的执法流程和监督机制等存在的薄弱环节、外部的社会环境和人际关系等带来的消极影响，二者共同构成了诱发公安民警腐败行为的廉政风险。在防控不力的条件下廉政风险就可能转化为腐败现象，从而严重破坏公安机关公正执法和损害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廉政风险成为分析腐败案件、推进反腐败斗争的一个重要内容和视角。近年来，广州增城公安局治安系统为重大涉赌团伙充当“保护伞”的腐败窝案、中山市公安系统“老虎机”腐败案、湖南省安乡县公安局“卖官局长”腐败窝案、福建省永春县公安局介福派出所三任所长“前腐后继”案、云南大理市公安局塌方式腐败案、江苏“政法虎”王立科腐败案、江西上饶和新余市公安局局长充当恶势力“保护伞”等贪污受贿的典型腐败案件，体现了被腐蚀的“刀把子”对社会和公安队伍造成的恶劣影响，暴露出公安民警腐败行为背后的廉政风险，凸显了廉政风险防控对于公安机关加强队伍建设、忠实履职尽责的重要性。

（二）廉政风险的典型特征

综观这些典型案件，虽然腐败的具体情节不尽相同，但无一例外都具有一个典型特征：来自亲密社会关系的廉政风险诱发了执法者的腐败行为。这一典型特征集中反映了作为执法者的公安民警卷入了“人情案”“关系网”“保护伞”等腐败关系之中，公安机关的权力在此变质，执法者对权力的运用不是公正为民而是以权谋私，公权力异化为私利心所操纵的工具。

从近年来的典型案件可以发现，这些执法者之所以以权谋私，除了权力内部执法流程和监督机制存在的薄弱环节造成了廉政风险，还有一只权力外部的“黑手”带来了廉政风险、诱发了腐败行为。这种外部的廉政风险会透过权力内部的薄弱环节干扰和破坏权力的合法运用，尤其是执法者价值观存在的薄弱环节更易于外部的廉政风险向权力内部传导。这只带有廉政风险的“黑手”，就是社会大众中以围猎者的姿态出现、与执法者具有亲密社会关系的图谋不轨的亲朋好友等，作为“黑手”的围猎者之“黑”的重要特点在于其价值观的扭曲。“从根本上来说，‘围猎者’的最终目的是‘猎权’而非‘猎人’，所看重的与青睐的是官员手中的权力。”^②对于围猎者而言，扭曲的价值观实际上是图谋不轨，即企

^① 参见杨菲菲：《公安机关执法规范化建设：让公平正义可触可感》，《中国人大》2020年第16期。

^② 洪汛：《甘于被围猎：一种新型腐败心理及其成因分析》，《广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年第2期。

图通过收买权力而谋取私利的腐败价值观,企图借助执法者的腐败来获取非法的私利。一旦执法者接受了围猎者的贿赂,甘于被围猎者围猎,就意味着执法者的价值观也一同扭曲,双方形成了所谓“互利”的腐败价值观。“黑手”的介入、价值观的扭曲对权力的合法运用起了不可忽视的干扰和破坏作用,腐败价值观一旦干扰乃至取代廉洁价值观,权力就可能被执法者滥用为充当“人情”“关系”的“保护伞”,公正为民、依法履职的权力运用变成了以权谋私、徇私枉法的权力滥用。

从上述贪污受贿的典型腐败案件可以看出,公安民警的腐败行为不仅源于执法者本身滥用权力,而且也源于围猎者收买权力——对权力的收买和对权力的滥用共同构成腐败案件发生的现实要素。换句话说,围猎者对权力的收买催化和助长了执法者对权力的滥用。因此,在坚持一体推进“三不腐”的过程中,对诱发腐败行为的廉政风险进行分析和防控,不仅要看到权力运行的问题,也要看到大众思想的问题,看到由图谋不轨的围猎者从外部给执法者带来的廉政风险。“在传统的研究中,往往将官员作为腐败研究的重心,‘只见官员不见大众’,将腐败动机从社会中抽离出来,而不考虑腐败的社会生态,这对于腐败研究而言有‘削足适履’之嫌。尽管腐败的根源从理论上说是权力的不受制约,但在现实中,是权力行使主客双方的互动共同完成了腐败行为。”^①对于执法者而言,围猎者可谓“来者不善”。当然,腐败归根到底是权力变质,来自运用权力的人即官员而不是大众。然而,从整个腐败过程来看,如果说腐败的官员是以权谋私,那么“来者不善”的大众则是借权谋私,所谓“不善”实际上是大众中的围猎者的腐败价值观——企图借官员之公权谋不法之私利,图谋不轨的大众主动地诱发腐败、参与腐败并与官员共同徇私枉法。就此而言,腐败反映了公安民警以权谋私和社会大众中的围猎者借权谋私的“互利”关系。那么,在廉政风险防控中绝不能忽视围猎者的思想和动机,具有腐败价值观的围猎者对权力的收买即行贿行为构成诱发执法者腐败行为的一大廉政风险,从外部催化和助长了执法者以权谋私、徇私枉法的腐败行为。这种廉政风险的产生具有一种特殊的内在机理。

二、公安机关廉政风险的内在机理

内在机理是某一社会问题得以发生的原因及其演变过程,是研究社会问题的一种深度视野。诱发腐败行为的廉政风险作为一种重要的社会问题,对其内在机理进行剖析有助于人们全面地把握腐败行为的发生原因及其演变过程并找出廉政风险的防控对策。公安机关廉政风险的内在机理揭示了公安民警在执法过程中引

^① 广东省纪检监察学会主编:《新时期广东腐败问题研究——多学科视角的分析》,中山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121页。

发腐败行为的风险源头及其演变过程。浙江嘉兴市公安局南湖分局廉政微电影《廉勘》所演绎的民警执法故事为我们研究公安机关廉政风险及其内在机理提供了一个经典的“理论模型”。这一“理论模型”通过特定的情景设置来模拟廉政风险诱发的腐败案件，揭示了公安民警在执法过程中所面对的源自外部的廉政风险。《廉勘》讲述了一名负责辖区治安的民警因购置学区房的经济问题受到妻子的强烈唆使以及受到在辖区从事非法经营活动的妻弟的行贿而险些充当“保护伞”的故事。这个故事生动具体地揭示了公安机关廉政风险的内在机理：“一切腐败行为的发生皆以公权力为前提、以私利心为动机。在某种程度上说，权力运行规范的失效（客观因素）与行为人私利之心的放纵扭曲（主观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正是大多数廉政风险生成的内在机理。”^①按照这一分析并结合上述贪污腐败的典型案件，从整个腐败过程的行为人及其价值观来看，廉政风险表征着与执法者有着亲密社会关系的具有腐败价值观的围猎者会诱发执法者的腐败行为，或者说，公安机关廉政风险表征着“（外部）围猎者——（腐败）价值观——（民警）执法者”之间相互作用、彼此苟合的腐败关系。

（一）围猎者是产生廉政风险的外部条件

最典型的围猎者是社会大众中具有强烈牟利欲望、与运用权力的执法者具有亲密社会关系并以牟取暴利为目的而企图对权力的合法运用进行干扰和破坏的人员。正是围猎者与执法者之间具有亲密的社会关系（或通过亲密的社会关系），才使得外部的廉政风险更易于向权力内部传导，围猎者能够借助亲密的社会关系对执法者实施行贿从而带来廉政风险、诱发腐败行为。《廉勘》中民警的妻弟正是这种围猎者的典型表现。也就是说，从上述典型案件来看，倘若没有围猎者的参与，执法者自身无法单独完成腐败行为，实施贿赂行为的围猎者无疑是引发腐败行为的不可忽视的主观条件之一。公安机关的腐败行为是执法者与围猎者共同参与、共同完成的。

（二）价值观是产生廉政风险的思想动机

无论执法者的以权谋私还是围猎者的借权谋私都离不开腐败价值观的驱使。腐败价值观的实质内容就是放纵扭曲的私利心，私利心一旦企图谋取那些必须通过权力滥用方可实现的一己私利就会转化为腐败价值观，认同腐败行为是创造价值、满足私欲的有效手段，是诱发廉政风险、出现腐败行为的思想要素，腐败行为实质上就是这种腐败价值观驱使下的以权谋私、徇私枉法。一方面，执法者在腐败价值观驱使下滥用权力。执法者形成以权谋私的腐败价值观并受到这种错误价值观的影响，尤其会利用执法流程和监督机制的薄弱环节或在自由裁量空间内

^① 李斌雄、黄红平：《科学化视野下的廉政风险防控管理机制建设》，《廉政文化研究》2012年第1期。

谋取私利。另一方面,围猎者在腐败价值观驱使下收买权力。围猎者形成借权谋私的腐败价值观并受到这种错误价值观的影响,企图通过收买和利用执法者的权力来谋取私利。从这一意义上说,这种以放纵扭曲的私利心为实质内容的腐败价值观构成执法者和围猎者共同完成腐败行为的思想基础和内在动机。也就是说,执法者对受贿行为的选择与围猎者对行贿行为的选择达成了腐败性的一致“认同”,即通过滥用权力来实现“互利”。上述典型案件无一不是民警和来自外部的“黑手”在腐败价值观驱使下共同完成的腐败行为,严重违背和损害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人民警察职业道德。

(三) 执法者是产生廉政风险的主观要素

公安机关的执法者掌握着打击违法犯罪、维护公共安全的权力。然而,权力是一把双刃剑,执法流程和监督机制等存在的薄弱环节是引发公安民警以权谋私、徇私枉法的直接风险,致使执法者有可能受到腐败价值观的驱使、甘于被围猎者围猎,同时也使围猎者有机会借执法者之权谋一己之私,打击违法犯罪、维护公共安全的“刀把子”就会被滥用为助长违法犯罪、破坏公共安全的“保护伞”。与此同时,“公安机关不同于一般行政机关,是国家的刑事司法和行政执法的中坚力量。因此,公安机关的廉政工作不同于一般国家机关的廉政工作,有着其特殊的规定和要求。由于公安机关在执法工作中有着一定的自由裁量空间,在行使过程中存在廉政风险的可能性”^①。这种权力执行过程中的自由裁量空间,成为围猎者诱发执法者与之形成腐败关系的一种重要风险。

总之,对廉政风险内在机理的分析,揭示了公安民警受到腐败价值观的驱使、受到具有亲密社会关系的围猎者的影响而以权谋私的错误倾向,来自权力外部的受私利心驱使的围猎者给权力的滥用制造了不可忽视的可能性。因此,研究廉政风险的直接意义就在于防范可能发生的腐败行为,是为了降廉政之风险,防腐败于未然。“廉政风险是可防范的,可以通过相应措施降低廉政风险,即降低腐败行为发生的可能性。”^②其中,从思想文化层面加强廉政风险防控,在社会层面加强廉洁文化建设,能发挥文化反腐的作用,有助于我国坚持一体推进“三不腐”。廉洁文化建设的直接目标就是积极引导包括执法者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树立廉洁价值观、抵制腐败价值观,使之自觉打消以权谋私、借权谋私的念头,是加强廉政风险防控的重要文化路径,能够有效地发挥文化反腐的作用,这对于公安机关切实履行党和人民赋予的新时代职责使命、忠实履行打击违法犯罪和维护公共安全的职能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① 蔡蓉英、刘会中:《公安机关廉政风险防范机制构建研究》,《湖南行政学院学报》2013年第1期。

② 郑洁、卢汉桥主编:《廉洁生态论》,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5年版,第325页。

三、公安机关风险防控的文化路径

通过对廉政风险的典型案件及其内在机理的分析,不难看到一个明显的事实,用俗话说就是“一个巴掌拍不响”。也就是说,执法者对权力的滥用不足以完全解释公安机关腐败行为的出现,也不应视为廉政风险防控的唯一方向。不可否认,执法者对权力的滥用是腐败案件发生的根本原因,廉政风险的要害在于公权力为私心所滥用、法为情所僭越,执法者以身试法、以权谋私、徇私枉法。然而,从上述典型案件来看,执法者所贪腐的并非个人之物而是他人之财,是接受了来自权力外部的亲密社会关系中的围猎者的行贿,“黑手”“人情”“关系”是执法者得以贪腐、“刀把子”沦为“保护伞”的外部条件。换句话说,倘若没有外部“黑手”的诱发和参与,执法者在一定程度上也会欲腐不能。同样,没有腐败价值观的驱使和影响,也不会诱发围猎者和执法者的共同腐败。“要持续保持高压态势,坚持无禁区、全覆盖、零容忍,坚持重遏制、强高压、长震慑,坚持受贿行贿一起查,坚决防止党内形成利益集团,坚决防范各种利益集团‘围猎’和绑架领导干部。”^①从根本意义上说,防控廉政风险,既要防权力内部之风险,也要防权力外部之风险,既要防民警之腐败,也要防“黑手”之腐败。新时代公安机关廉政风险防控的文化路径,就是要以社会生态的眼光看待廉政风险,坚持制度建设与文化建设相结合,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既要引导民警反对腐败价值观、树立廉洁价值观,也要引导大众反对腐败价值观、树立廉洁价值观。

(一) 用社会生态的眼光看待廉政风险

从上述典型案件来看,这里不妨归结为一个耐人寻味的问题:“到底谁在腐败?”毋庸置疑,首先是滥用权力的民警在腐败,其次是收买权力的“黑手”在诱发腐败并“积极”参与腐败。其中,以围猎者的姿态出场的“黑手”企图通过收买和利用执法者的权力来谋取那些必须通过权力的滥用方可实现的一己私利,掌握着打击违法犯罪权力的公安机关人员更是围猎者投机取巧、借权谋私的重要对象,围猎者由此从外部制造了诱发公安民警腐败行为的风险源头。从围猎者的层面来看,“事实上,许多人在对待腐败问题上采取的是典型的实用主义态度,即对妨害自己利益的腐败行为坚决反对,对事不关己的腐败行为保持沉默,对有利于自己的腐败行为则充分利用。这是与腐败的同流合污,对腐败的纵容利用”^②。如果说执法者单方面的腐败行为是对政治生态的破坏,那么由围猎者诱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97页。

^② 周围:《腐败成因:一种社会文化心理的视角》,《廉政文化研究》2015年第5期。

发并最终由执法者和围猎者共同完成的腐败行为是对社会生态的破坏。

从社会生态的宏观层面来看,具有腐败价值观的“黑手”对公安民警腐败行为的诱发和参与,实际上反映了大众生活中腐败文化对廉洁文化的消极影响。“我国事实上也形成一定程度的腐败文化。这种腐败文化从情感、观念、态度、价值观、行为方式等各个方面对社会的公平、正义、法治、廉政观念形成极大的消解、破坏作用。”^① 腐败文化充斥着以放纵扭曲的私利心为实质内容的腐败价值观,成为诱发和助长腐败行为的强大催化剂——既能污染政治生态也能污染社会生态。在这一意义上,廉政风险实质上是社会风险,大众生活中的腐败价值观、社会存在的腐败文化,在思想文化层面构成诱发公安民警腐败行为的社会风险,是对廉洁价值观以及对廉洁社会生态的严重侵蚀和破坏。因此,以社会生态的眼光看待腐败行为的产生更有助于我们深入分析廉政风险的内在机理,有助于我们认清产生廉政风险的文化因素,有助于我们全面地理解廉政风险的防控对策。

(二) 坚持制度建设与文化建设相结合

廉政风险防控的根本目的在于预防腐败,主动抵御和阻截各种诱发公安民警腐败的风险。廉政风险的防控过程必须坚持制度建设与文化建设相结合的原则,从制度层面扎牢执法者“不敢腐”“不能腐”的笼子,进而从思想文化层面上筑起“不想腐”的堤坝,收到“他律”和“自律”相互促进的廉洁效果。

一方面,从制度层面扎牢“不敢腐”“不能腐”的笼子是公安机关廉政风险防控的根本保障。“‘不能腐’是从预防的角度,在制度上不允许腐败者使用权力去腐败,使腐败者不能腐。如果以不能腐为治理目标来构建防范腐败的机制,意味着必须从深度预防、有效预防的视角进行制度设计,彻底阻断公职人员以权谋私的制度性渠道,让其失去贪腐的机会。”^② 新时代,公安机关必须加强政治建警,在加强法治公安建设的轨道上推进执法规范化建设,按照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法治要求不断健全内部的风险评估机制、风险预警机制、风险化解机制,尤其要对执法流程和监督机制薄弱环节关涉的风险点实施监测预警,“一旦发现风险,采用‘诫勉’‘问责’等方式,做到精准分析,科学预警,有效防控,尽早处理”^③。没有反腐制度建设的“他律”作用,廉洁文化建设就会失去牢固的支撑和保障,反腐制度建设为廉洁文化建设提供了根本保障和实践导向。

另一方面,在制度建设中发挥“他律”作用的同时,还需要在文化建设上

① 邓杰、胡廷松:《反腐败的逻辑与制度》,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08页。

② 袁峰:《当前中国的腐败治理机制——健全反腐败惩戒、防范和保障机制研究》,学林出版社2015年版,第44~45页。

③ 谭诗涯:《警察廉政风险防控机制研究》,《武警学院学报》2020年第5期。

发挥“自律”作用，在此有待明确认识两个问题：一是强化谁的自律？二是怎样强化自律？从上述对“到底谁在腐败？”这一问题的分析来看，“自律”的根本意义在于通过加强廉洁文化建设，积极引导包括执法者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树立廉洁价值观、抵制腐败价值观从而降低腐败行为出现的可能性。根据廉政风险内在机理的分析，公安民警的腐败行为是在腐败价值观的驱使、具有亲密社会关系的围猎者的诱发下产生的后果，以权谋私、借权谋私的私利心驱使着双方形成“互利”的腐败关系。那么，强化自律首先是强化公安民警的自律。“人民警察唯有树廉洁自律之心，才既能经得住工作的重压，又能挡得住社会上不良风气的诱惑；唯有拥有廉洁之心才能在工作中筑牢防腐防线，防患于未然。”^①“挡住社会上不良风气的诱惑”意味着强化自律还包括强化社会大众的自律。因此，为了有效防控廉政风险，必须使执法者和围猎者都“不想腐”，从思想文化上阻断“（外部）围猎者——（腐败）价值观——（民警）执法者”的中心环节——以放纵扭曲的私利心为实质内容的腐败价值观。这意味着，在反腐制度建设过程中，既要以廉洁文化来“化”可能污染权力内部的腐败文化，也要以廉洁文化来“化”可能污染权力外部即污染大众价值观的腐败文化，正如《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提出要“弘扬崇廉拒腐社会风尚”。“廉洁文化是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先进文化，它以鲜明的态度批判腐朽文化和腐朽思想，能够在社会上形成浓厚的廉洁氛围，有效地遏制腐败现象，从而能够为和谐社会的构建扫清精神文化方面的障碍。”^②因此，廉政风险防控的文化路径在于从社会生态的宏观层面培育廉洁价值观，加强廉洁文化建设和营造廉洁社会生态，从权力内部和权力外部共同推进“不想腐”，不断阻截和化解执法者与围猎者共同完成腐败行为的风险。

（三）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

为了从思想文化上阻断“（外部）围猎者——（腐败）价值观——（民警）执法者”的中心环节——以放纵扭曲的私利心为实质内容的腐败价值观，就必须为廉洁文化的建设创造先进的文化土壤，从而使廉洁文化能够不断融入可能受到腐败价值观污染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之中，以期收到全社会“不想腐”的文化反腐效果。《关于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意见》提出“以先进文化启智润心”，“用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培育为政清廉、秉公用权的文化土壤”的要求，其中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灵魂和精神是作为“最大公约数”“重要稳定器”“最大正能量”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具有为廉洁文化建设创造

^① 崔晖、王晓非：《中国古代政治伦理文化及其对“廉洁警队”建设的借鉴——以清廉文化为视角》，《北京警察学院学报》2014年第5期。

^② 邓学源：《廉洁文化的价值功能论析》，《厦门特区党校学报》2019年第2期。

文化土壤、使廉洁文化融入全社会的独特优势，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是加强廉洁文化建设的深层基础和强大动力，有助于积极引导包括执法者在内的全体社会成员树立廉洁价值观、抵制腐败价值观从而降低腐败行为出现的可能性。

第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与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在根本意义上是一致的，能对公安机关的廉洁文化建设发挥引领和涵养的积极效用。人民警察坚持“忠诚、为民、公正、廉洁”的核心价值观，在履行自身职责使命过程中展现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重要内涵，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公安民警忠实履职尽责的根本价值导向，是新时代公安机关坚持政治建警、全面从严治警的重要思想基础，是新时代文化育警的重要内容。“要坚持以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引领警察文化建设，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涵养人民警察核心价值观，逐步将其固化于制、内化于心、外践于行。”^①

第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本质上是反对包括腐败价值观在内的一切腐朽落后观念的“最大正能量”。具体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蕴含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中崇尚廉洁、秉持公义的积极内涵，而且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中“公正”“法治”的内涵就是对腐败的抵制和批判，是对廉政的认可和支持。“加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建设，扫清社会主义事业深度发展的思想障碍，特别是腐败的思想，这就为当前中国治理腐败，加强廉政文化建设提供了重要的思想保障。”^②在全社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有助于广泛引导人们抵制和批判腐败价值观，反对以权谋私和借权谋私，彰显廉洁从政、遵纪守法的重要性，降低与执法者具有亲密社会关系的人员变为围猎者的可能性，削弱其围猎执法者的念头，从思想文化层面不断化解诱发权力腐败的廉政风险。

第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凝聚社会共识、引领社会思潮的“最大公约数”，具有能够为社会大众所广泛认知和认同的独特优势。因此，为了创造廉洁文化建设先进的文化土壤，建设廉洁的社会生态，抵御和阻截来自权力外部的廉政风险，无疑需要在全社会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是指通过大众化的理论内容、大众化的传播手段、大众化的参与主体、大众化的运行机制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到人民群众的社会生活之中。”^③通过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尤其是推动公正、法治的价值观内涵大众化，引导社会大众通过认知和认同核心价值观的方式理解公正原则，树立法治思维，用公正和法治的立场看待政商关系、公私关系、情法关系，在核心价值观的涵养中积极认同廉洁文化，自觉遵纪守法，由此

① 张兆端：《中国警察文化四十年：继承、发展与创新》，《中国人民公安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8年第5期。

② 孙娜：《中国廉政文化建设的资源与路径研究》，同济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第269页。

③ 卢文忠：《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的实现路径研究》，《山东青年政治学院学报》2016年第6期。

营造廉洁的权力运用和廉洁的大众参与相统一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生态环境。这是一种深层次的廉政风险防控路径。“从深层次看，高效、系统的廉政建设能培育健康向上、富含公共理性、饱含公德精神的政治参与主体，能营造清明公正的政治生态环境，从而为政党治理锻造主体基础和生态支撑。”^①那么，对于作为“刀把子”的公安机关而言，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有助于从思想文化层面抵御和阻截来自社会大众的廉政风险，从外部降低公安民警卷入“人情案”“关系网”“保护伞”等腐败关系的可能性，有助于公安民警在行政执法工作中坚持公正为民、依法履职，自觉抵制企图利用执法流程和监督机制的薄弱环节或在自由裁量空间内谋取私利的错误价值观。这是廉政风险防控的长久之策，也是文化反腐的重要举措，是公安机关锻造新时代高素质过硬公安队伍的有利条件。

四、结语

综上所述，廉洁文化建设是我国坚持一体推进“三不腐”的重要文化支撑。廉洁文化建设是廉政风险防控的重要文化路径，不仅要使公安民警“不想腐”，不甘于被围猎，也要使社会大众“不想腐”、不企图去围猎。廉政风险防控的文化路径，既在于防执法者以权谋私的腐败价值观，也在于防围猎者借权谋私的腐败价值观，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来引领执法者和围猎者反对腐败价值观、树立廉洁价值观。“人无德不立，国无德不兴；没有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引领，人们就没有精神动力和前进方向。”^②在加强新时代廉洁文化建设的过程中，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大众化能成为廉洁文化不断贴近和融入大众生活的土壤，能够引导公安民警和社会大众反对腐败价值观和树立廉洁价值观。加强廉洁文化建设并非反腐斗争的权宜之计，而是新时代加强公民道德建设和提高全社会道德水平和建设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题中应有之义，是新时代公安机关在坚持政治建警过程中强化思政教育、涵养忠诚警魂、厚植公安文化、锻造过硬作风的重要支撑。^③而且，“不想腐”的社会大众反过来能够从外部增强公安机关权力规范运行的监督力量，诱发公安民警腐败行为的廉政风险由此能够转化为监督公安民警严格执法、公正为民的廉政动力。这是新时代降廉政之风险、防腐败于未然、铸廉洁之警魂的重要文化基础。

^① 陈朋：《中国共产党廉政建设的百年探索：三重逻辑的推进》，《南京社会科学》2021年第4期。

^② 江凌：《论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的逻辑内涵》，《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2021年第2期。

^③ 王禹淋、韩春梅：《新时代政治建警的基本内涵、价值意蕴与行动建构》，《中国人民警察大学学报》2022年第9期。

Cultural Path 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Integrity Risk in Police in the New Era

Lu Wenzhong

Abstract: The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integrity risks is of great practical significance for China to adhere to the principle of “Three Incorruptions” in the New Era. Integrity risk is a variety of possible factors that induce corruption among police. In recent years, the typical feature of corruption cases in police is that integrity risks induces the corrupt behavior of hunters in close social relations. From the macro level of social ecology, integrity requires not only the honest use of power, but the participation of honest people, not only guard against the deterioration of public power, but the attacks of hunters, not only the institutional restraint of anti-corruption struggle, but the cultural guidance of incorruptible values. By promoting the popularization of socialist core values and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a incorruptibility culture at the social level, we can constantly build dikes that “Do Not Want To Corrupt”. This is one of the new ideas and perspectives for deepening the study of integrity,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grity, and preventing and controlling the integrity risks in the New Era.

Keywords: Police; Integrity Risk; Corruption; Prevention and Control; Cultural Path

[责任编辑: 吴文新]

论新时代思想道德建设的着力点和主体向度

迟成勇^{*}

【摘要】加强诚信美德建设、生态道德建设与网络道德建设，是新时代思想道德建设的三大着力点。从道德主体看，公民是普遍性主体，领导干部和青少年，则是全国公民中的特殊性主体。加强官德建设和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是新时代思想道德建设的重点。新时代思想道德建设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把诚信美德建设、生态道德建设及网络道德建设，既要融入普遍性的公民道德建设中，也要融入特殊性的官德建设和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中，使其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全面提升全社会的思想道德水平和文明素养。

【关键词】诚信美德；生态道德；网络道德；官德；青少年思想道德

党的十八大以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发生变化，人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期盼在比较富裕的物质生活基础上过上更有德性的精神文化生活。因此，加强新时代思想道德建设既是建设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的内在需要，也是党带领人民创造美好生活的客观要求。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论述对我国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提出了许多新的有创见的解读，确立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的基本框架和实践路向，具有丰富的时代内涵和精神特质，为新时代思想道德建设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从现实的伦理关系审视，加强诚信美德建设、生态道德建设及网络道德建设是新时代思想道德建设的三大着力点。从道德主体审视，公民是新时代思想道德建设的普遍性主体，而党政干部、青少年则是全国公民中的特殊群体。从思想道德建设的着力点和主体向度之间的关系看，诚信美德建设、生态道德建设和网络道德建设作为三大着力点，无论是面向社会还是企事业单位，抑或是社会组织，最终只有落实到主体层面或公民层面才能取得实效。加强官德建设、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是新时代思想道德建设的重点。

^{*} 迟成勇，哲学博士，南京铁道职业技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道德哲学。

一、新时代思想道德建设的着力点

不同时代或同一时代的不同阶段，思想道德建设的着力点是不尽相同的。在当今信息化、网络化和智能化时代，以道德主体为轴心，大致需要处理三对关系：一是人与人、人与社会的关系；二是人与自然的关系；三是人与虚拟世界的关系。无疑，建构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伦理关系，需要讲以仁爱为核心、以诚信为重点的人伦道德；建构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需要讲以尊重自然、顺应自然和保护自然为核心理念的生态道德；建构人与虚拟世界的伦理关系，需要讲以诚信、安全、公开、公正为基本原则的网络道德。因此，新时代思想道德建设主要体现在加强诚信美德建设、生态道德建设及网络道德建设三个方面。

（一）推进诚信美德建设

诚信是中华民族的传统美德，也是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范畴，还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在公民个人层面的价值诉求。改革开放以来，我们确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但由于市场经济的功利性、竞争性等内在特质，再加上短时期内还没有形成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比较成熟的道德规范、法律规范的制约机制，在道德领域出现了诚信缺失或诚信危机现象，如政治领域的暗箱操作、虚报政绩，经济领域的假冒伪劣、坑蒙拐骗；文化领域的抄袭剽窃、学术造假，人际交往中的尔虞我诈、相互欺骗等。而且，在信息化和网络化时代，各种社会文化思潮的相互激荡，也带来了道德主体的道德观和价值观的多元化，社会生活中依然存在各种失信现象。2017 年 10 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提出“推进诚信建设”^①的时代命题。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为推进诚信美德建设提供了历史机遇。无疑，推进诚信美德建设是新时代思想道德建设的着力点之一。全面深化改革开放，完善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推动经济社会健康发展，呼唤推进诚信美德建设。

第一，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诚信美德教育。加强诚信美德建设是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内容。一是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根本和灵魂，其中蕴含着崇仁爱、重民本、守诚信、讲辩证、尚和合、求大同等优秀道德理念。推进诚信美德建设离不开对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继承和发展。二是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诚信美德教育。习近平总书记说：“核心价值观，其实就是一种德，既是个人的德，也是一种大德，就是国家的德、社会的德。国无德不兴，人无德不立。”^②又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 4 卷，外文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34 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168 页。

是当代中国精神的集中体现，是凝聚中国力量的思想道德基础。”^① 因此，只有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诚信美德教育，才能确保推进诚信美德建设的正确方向。加强诚信美德教育，把诚信美德从核心价值理念转化为人们的行为自觉，着力打造“诚信公民”“诚信企业”“诚信社会”“诚信政府”。

第二，诚信美德与社会主义法治相结合。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和经济社会的发展，特别是适应全面推进依法治国实践，传统诚信美德由过去的道德观、价值观身份逐渐上升到核心价值观和法治观的时代高度，进而使其同时具有道德观、核心价值观和法治观的意涵。将诚信美德建构为道德观、核心价值观与法治观的融合体，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是对中华传统诚信美德的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习近平总书记说：“要加强相关立法工作，明确对失德行为的惩戒措施。要依法加强对群众反映强烈的失德行为的整治。对突出的诚信缺失问题，既要抓紧建立覆盖全社会的征信系统，又要完善守法诚信褒奖机制和违法失信惩戒机制，使人不敢失信、不能失信。”^② 适应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把诚信美德建设贯穿于法治建设全过程，实现诚信美德法律化和制度化，从而极大拓展诚信美德建设的深度和广度。把诚信美德规范要求转化为具有刚性约束力的法律规范，为推进诚信美德建设提供法律保障。

第三，诚信美德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结合。中国古代哲人认为，诚信是宇宙天道的根本法则，也是社会价值体系和人伦道德的基础。突出强调推进诚信美德建设，无疑具有显著的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现实针对性。社会主义市场经济既是道德经济，也是法治经济、信用经济。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法治意识、契约精神、守约观念是现代经济活动的重要意识规范，也是信用经济、法治经济的重要要求。”^③ 建立和发展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客观上要求市场主体具备与其相适应的诚信美德。因此，批判继承中华传统诚信美德，剔除其与自然经济相适应的特质，吸收其“内诚于心”“外信于人”的精髓并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结合，使其彰显市场经济的精神品格。推进诚信美德建设必须立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实践。只有立足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推进诚信美德建设才能获得深厚的现实根基和丰厚的时代滋养。

第四，诚信美德建设制度化和长效化。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是时代发展的要求。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完善诚信建设长效机制”的要求。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弘扬诚信文化，健全诚信建设长效机制”^④ 的时代命题。推进诚信建设制度化，完善诚信建设长效机制，是推进国家治理体系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51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34～135页。

③ 习近平：《在企业家人座谈会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20年版，第7～8页。

④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45页。

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举措,也是实现以德治国与依法治国相结合的内在要求。具体而言,一是推进政务诚信建设。党员干部带头讲诚信,建设诚信政府,提高政府公信力。二是推进商务诚信建设。广大商务人员讲信用,促进商务活动的顺利进行,营造讲信用的商业风气。三是推进社会诚信建设。人们在日常的生活、学习和工作中,以诚待人,诚实做人,做到言必行、行必果,建构相互信任的人际关系,促进社会的和谐与稳定。四是推进司法公信建设。国家司法干部要公正办案,严格司法程序,规范司法行为,提高司法公信力,维护司法形象。其中,政务诚信和司法公信是诚信建设制度化的关键和核心,社会诚信和商务诚信是诚信制度建设的基础和重点。推进诚信建设不仅要制定科学合理的诚信规章制度,而且要建立和完善激励诚信、惩戒失信的长效机制。事实证明,只有将制度刚性约束与惩戒长效机制紧密结合起来,才有可能使诚信成为一股强大的正能量,促进社会发展和文明进步。

(二) 加强生态道德建设

生态道德作为一种新型道德形态,既反映着人与自然的伦理关系,也彰显着人与人、人与社会的伦理关系。它不仅是人类道德发展进步的必然产物,而且也是人类社会走向更高文明的显著标志。马克思、恩格斯指出,通过人类的对象化活动将人类自身的本质力量对象化,从而在自然界留下了人类的印记,使“自在自然”转化为“人化自然”。正是因为人类在自然面前具有主体性和能动性,故人类应该对自身行为后果承担起应有的道德责任,自觉而理性地控制人对自然的对象化活动,使人类实践能够促成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生态文明建设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和“四个全面”战略布局的重要内容。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必须牢固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站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高度谋划发展。”^①加强生态道德建设,是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的内在要求,也是新时代思想道德建设的着力点之一。走向社会主义生态文明新时代,建设美丽中国,呼唤加强生态道德建设。

第一,要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 系、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一是正确认识人与自然的关 系。马克思、恩格斯认为,自然界对人类而言具有先在性和基础性,这是建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关系的逻辑起点。习近平总书记说:“人与自然是生命共同体,人类必须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人类对大自然的伤害最终会伤及人类自身,这是无法抗拒的规律。”^②这一论断揭示了尊重自然规律与发挥人的主

^①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50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9页。

观能动性的辩证统一关系,为加强生态道德建设提供了理论前提。二是正确认识经济发展与生态环境的关系。“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实际上揭示了经济发展和生态环境保护、改善生态环境与发展生产力之间的内在关系。习近平总书记说:“绿水青山既是自然财富、生态财富,又是社会财富、经济财富。保护生态环境就是保护自然价值和增值自然资本,就是保护经济社会发展潜力和后劲,使绿水青山持续发挥生态效益和社会经济效益。”^①这一科学论断为建构经济社会发展与保护生态环境的良性互动格局,为加强生态道德建设提供了鲜明的价值导向。

第二,加强生态道德教育。一方面将生态道德教育贯穿于国民教育体系全过程和群众性精神文明建设创建活动中,另一方面要将生态道德理念融入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各领域的新闻媒体报道中,贯穿到娱乐、体育、购物、消费及广告等各类节目栏目中,让生态道德成为引领新时代创造美好生活的新风尚。由此培养公民的生态道德习惯,如垃圾分类处理、绿色消费及低碳出行等习惯,唤醒公民的生态道德意识,提升公民的生态道德修养。需要特别强调的是,对公民加强生态道德教育,在突出中国传统“天人合一”生态理念教育的同时,还需要学习借鉴西方伦理学的有益成果,如法国思想家施韦兹的敬畏生命生态伦理学、利奥波德的大地伦理学、辛格的解放动物伦理学、卡逊的尊重自然伦理学以及罗尔斯顿的环境伦理学等,以拓宽理论教育视野,帮助人们树立坚定的生态道德理念,养成良好的生态道德行为,从而不断增强人们生态环境保护的意识、责任感和使命感。

第三,加强生态道德建设与创造美好生活相结合。美好生活包括经济、政治、文化、社会、生态及安全等多方面的美好生活。拥有天蓝、地绿、水清的美好家园,是新时代每位中国人的价值期盼。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要建设的现代化是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既要创造更多的物质财富和精神财富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还要提供更多优质生态产品以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对优美生态环境的需要。加强生态道德建设,打造优美生态环境,这是不断满足人民对美好生活向往的重要内容和举措。我们要以习近平生态文明思想为指导,树立和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理念,把生态道德建设与创造美好生活相结合,充分发挥人民群众参与生态道德建设的积极性,把生态道德理念自觉融入创造美好生活实践,把建设美丽中国转化为全体人民的自觉行动,从而不断提升生态道德建设的实效性。打造优美生态环境,使人们在与自然的良性互动中感受自然美和人文美,提升对美好生活乃至生命价值的体验。

第四,加强生态道德建设与建章立制相结合。加强生态道德建设,固然需要通过思想道德教育途径来提高人们内在的道德自律,同时还需要外在强制的他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61页。

律,即建构外在的法律制度规范和约束体制机制。制度是治国安邦的根本。制度兴则国家兴,制度强则国家强,制度稳则国家稳。习近平总书记反复强调,制度是关乎党和国家事业发展的根本性、全局性、稳定性和长期性的问题。现实表明,保护生态环境必须依靠制度、依靠法治。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推动绿色发展,建设生态文明,重在建章立制,用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保护生态环境。”^①加强环保法律制度建设,健全和完善由污染防治法、资源保护法和生态保护法为主干的环保法律体系,为加强生态道德建设提供刚性的约束和不可碰触的高压线。制定完善的生态法律制度,从事前预防、事中规制到事后追责、修复,坚定做到有法可依、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生态法律制度明确了人们的生态权利和义务,为生态道德划定了底线。总之,不断推进生态道德建设,为建设美丽中国提供道德支撑和法律保障。

(三) 加强网络道德建设

事实上,网络空间是现实社会的延伸和拓展,是由物质技术建构的实在空间,其虚拟性、隐匿性、开放性、包容性等特征决定了需要有与其相适应的道德规约,需要道德主体的严格自律。网络空间打破了现实社会人际交往的时空限制,虽然属于“虚拟世界”,其实已经完全融入人们日常生活、学习和工作中,“互联网已经从外在的虚拟空间发展到虚拟空间与现实空间融合的人工自然,进入万物互联网的新时代”^②。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印发的《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明确把网络道德建设作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加强网络道德建设,既是推进网络空间治理的客观要求,也是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内在要求,还是新时代思想道德建设的着力点之一。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的快速发展呼唤网络道德建设。

第一,加强网络道德教育。网络是一把“双刃剑”,在给人类的生产、生活、学习及工作带来便利的同时,也给人类的伦理、情感、交往、隐私及安全等带来严峻的挑战。网络空间治理问题、网络道德问题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热点和难点问题。适应信息化、网络化和智能化的快速发展,加强网络道德教育,提升人们的网络道德素质和媒介素养,养成绿色上网、文明用网的行为习惯,已经成为全社会共同关注的话题。因此,我们应该把网络道德规范自觉地融入国民教育体系、思想政治工作及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中,不断增强人们的网络道德意识,强化人们的网络道德责任意识,倡导网络道德自律行为。由于青少年是网络世界的最大群体,因此加强网络道德教育的关键在于学校教育,着力构建学校、家庭和社会“三位一体”的教育格局,全方位、多层面地推进网络道德教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96页。

^② 李伦:《网络道德建设:从虚拟走向现实》,《道德与文明》2020年第1期。

育,不断增强青少年的网络道德意识,促使他们从他律走向自律,逐步养成绿色上网、文明上网的好习惯。

第二,培育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高度重视网络文明建设,作出“加强网络文明建设,发展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的战略部署。发展积极健康的网络文化,发挥以文化人的作用,是加强网络道德建设的重要内容和举措。习近平总书记说,我们要加强媒体融合发展和主流媒体建设,“形成网上网下同心圆,使全体人民在理想信念、价值理念、道德观念上紧紧团结在一起,让正能量更强劲、主旋律更高昂”,^①“以时代新风塑造和净化网络空间,共建网上美好精神家园”^②。我们要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统领网络文化建设,加快推进各类资源数据化、网络化、智能化传播和应用,加强重点理论网站、公众账号、客户端建设,建构网上理论传播矩阵,培育向上向善的网络文化,为广大网民特别是青少年营造一个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打造具有正能量的网络文化,唱响社会主义道德建设主旋律,确保网络道德建设的正确方向。

第三,网络道德建设与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事实表明,随着时代发展和社会进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展现出更加迷人的魅力和时代风采。互联网的发展虽然极大地改变了人们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工作方式、学习方式乃至思维方式,但事实证明传统与现代化并不是绝对对立的,而是有相通相融的因素,如“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勿以善小而不为,勿以恶小而为之”“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与人为善”“推己及人”“君子慎其独也”等,也是人们在虚拟世界中要坚守的伦理道德理念。以儒家伦理为主要内容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更加强道德主体的自觉性、能动性和自律性,从而有助于建构人与虚拟世界的良性互动关系。因此,要坚持守正创新原则,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并结合时代精神进行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为网络道德建设提供深厚的传统价值资源。

第四,网络道德建设与健全网络法规相结合。网络道德与网络是相互联系、相互渗透的。加强网络道德建设与健全网络法规相结合,是加强网络空间治理的内在要求。健全网络综合治理体系,推动形成良好网络生态,客观上需要同时推进道德治理和法律治理,把道德与法律的力量、法治和德治的功能有机结合起来,充分发挥法律的规范作用和道德的教化作用。营造风清气正的网络空间,建构亿万人民的网络精神家园,既需要伦理的支撑,更需要法治的保障。习近平总书记说:“网络空间不是‘法外之地’。网络空间是虚拟的,但运用网络空间的主体是现实的,大家都应该遵守法律,明确各方权利和义务。”^③把网络道德要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1年版,第317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319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534页。

求贯彻到法治建设中,以法治承载道德理念,道德才有可靠的制度支撑。坚持德治与法治相结合的治国方略,把网络道德要求融入网络法律建设中,把网络道德规范上升为网络法律规范,为网络道德建设提供法治保障。

二、新时代思想道德建设的主体向度

从思想道德建设的主体看,公民是普遍性主体,而领导干部和青少年,则是全国公民中的特殊性主体。领导干部是社会中的先进分子,其道德水准关系到社会道德的走向和社会风尚的清纯。青少年则是祖国的未来、民族的希望,其道德品质不仅关系到自身的健康成长,而且关系到国家的前途和民族的命运。因此,加强官德建设和青少年道德建设,是新时代思想道德建设的重点。

(一) 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内涵

公民是思想道德建设的主体。重视公民道德建设,是新中国成立以来我们党一以贯之的优良传统。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始终坚持“两个文明一起抓”的方针,高度重视思想道德建设。2013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山东考察时发表讲话,提出“必须加强全社会的思想道德建设”^①的命题。2015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对全国道德模范表彰活动作出的批示中又提出“要持续深化社会主义思想道德建设”^②的论断。党的十九大报告指出:“深入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③2019年9月,习近平总书记对全国道德模范表彰活动作出重要指示:“要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推进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品德建设……让社会主义道德的阳光温暖人间,让文明的雨露滋润社会,为奋进新时代、共筑中国梦提供强大精神力量和道德支撑。”^④党的二十大报告再次强调:“实施公民道德建设工程,弘扬中华传统美德,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推动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提高人民道德水准和文明素养。”^⑤由此形成党的十八大以来一以贯之的关于新时代思想道德建设的新思想新理念新论断。

①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37页。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社会主义文化建设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7年版,第146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4页。

④ 《习近平对全国道德模范表彰活动作出重要指示强调:深化群众性精神文明创建活动着力培养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人民日报》2019年9月6日。

⑤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44页。

深入推进公民道德建设工程，是新时代思想道德建设的应然要求。2019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颁布《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纲要》，总结了2001年中共中央印发《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我国公民道德建设的基本经验，坚持守正创新，赋予新时代的特征和内容，使我们党对公民道德建设基本规律的认识和把握达到了新的高度。《公民道德建设实施纲要》提出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理想信念为主线，以爱国主义教育为主题，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和个人品德建设为主要路径，以筑牢理想信念之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传承中华传统美德以及弘扬民族精神和时代精神为重点任务，以培养和造就担当民族复兴大任的时代新人为根本任务和时代使命；同时，还提出公民道德建设功能地位的新论断，即加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是推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的一项基础性、战略性工程。

在深刻剖析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中存在的诸如道德失范现象、道德观念模糊甚至缺失，造假欺诈、不讲信用的现象久治不绝等问题的基础上，明确提出公民道德体系是以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社会主义道德观、共产主义道德观为基本内容，以为人民服务为核心，以集体主义为原则，以“五爱”为基本要求的新时代社会主义道德体系；将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公民道德建设的全方位和全过程，以主流价值构建道德规范、强化道德认同、指引道德实践，引导人们明大德、守公德、严私德，保障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先进性和方向性。同时，提出实施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具有措施，即深化道德教育引导、推动道德实践养成、抓好网络空间道德建设以及发挥制度保障作用等，其中蕴含着坚持道德建设与道德治理并重、依法治国与以德治国相得益彰、公德与私德深度融合、现实社会道德治理与虚拟世界道德治理有机结合等，都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公民道德建设重要论述的理论坚守和实践运用，为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提供了理论指导和根本遵循。

（二）新时代官德建设

加强官德建设是全面从严治党的内在要求，也是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重点。党的十八大以来，全面从严治党取得了显著成就。但从领导干部违纪违法案件来看，腐败分子走上违法犯罪道路，大都是从道德品质上出问题开始的。因此，全面从严治党还要加强官德建设，提升领导干部的道德境界，真正做到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真正成为人民的公仆。官德是社会道德的标杆和风向标，具有价值导向作用。习近平总书记说：“道德高尚是领导干部做到清正廉洁的基础。”^①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391页。

又说：“以德修身、以德立威、以德服众，是干部成长成才的重要因素。”^①他还多次强调，“打铁还需自身硬”“正人先正己”，要求各级领导干部以身作则、率先垂范，发挥表率作用和带头作用。总之，加强官德建设，提升干部道德素质，具有重要的价值导向意义。提升党员干部的道德素质和道德境界，客观上要求加强官德建设。

第一，加强理想信念教育。理想信念教育是党的思想建设的战略任务。一百年来，无数共产党员为党和人民利益而英勇牺牲，支撑他们的就是“革命理想高于天”的精神力量。习近平总书记指出：“中国共产党的理想信念，就是马克思主义真理信仰，共产主义远大理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②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指出：“理想信念是共产党人精神上的‘钙’，共产党人如果没有理想信念，精神上就会‘缺钙’，就会得‘软骨病’，必然导致政治上变质、经济上贪婪、道德上堕落、生活上腐化。”^③事实上，党员干部队伍中存在的违法违纪问题或腐败问题，归根到底在于他们丢失了理想信念或理想信念不坚定，也就是“总开关”失灵的问题。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强调：“加强理想信念教育，引导全党牢记党的宗旨，解决好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这个总开关问题，自觉做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的坚定信仰者和忠实实践者。”^④新时代，要经受住“四大考验”，抵御住“四大危险”，党员干部更应该坚定理想信念，真正让理想信念成为自己心中的灯塔、凝聚精气的灵魂，进而积累起强大的精神力量。加强理想信念教育，是加强官德建设的核心内容。

第二，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崇高理想、坚定信念不会自发产生。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马克思主义奠定了共产党人坚定理想信念的理论基础。”^⑤马克思主义是我们立党立国的根本指导思想。背离或放弃马克思主义我们党就会失去灵魂、迷失方向。因此，帮助党员干部坚定理想信念，首先要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要求各级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必须系统地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学习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最新理论成果，把理想信念建立在对科学理论和历史规律的理性认同上。历史与现实证明，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归根到底是因为马克思主义行。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行，是因为我们党始终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使马克思主义在中华大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45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1年版，第505页。

③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31页。

④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65页。

⑤ 习近平：《论中国共产党历史》，中央文献出版社2021年版，第203页。

地上放射出灿烂的真理光芒。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要求党员干部做到真学真懂真信真用，从而才能确保党员干部对远大理想和奋斗目标的清醒认识和执着追求。加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是加强官德建设的思想基础。

第三，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时代思想道德建设的主题。“如果说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培育和践行是一项社会系统工程，那么，它首先应该从领导干部抓起。带头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领导干部不可推卸的道德责任。”^① 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时代官德建设的道德诉求。习近平总书记说：“广大党员、干部必须带头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用自己的模范行为和高尚人格感召群众、带动群众。”^② 现实表明，只有党员干部真正做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模范，讲党性、重品行、作表率，为民、务实、清廉，才能以人格力量感召人民群众、引领社会风尚。从全面从严治党看，加强官德建设就是把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融入党的政治建设、思想建设、组织建设、制度建设、作风建设、纪律建设和反腐倡廉的全过程，不断夯实党员干部廉洁从政的思想道德基础，筑牢拒腐防变的思想道德防线，促使党员干部成为讲道德、尊道德、守道德的社会楷模。

第四，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家庭是社会的细胞，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领导干部的家风，不仅关系自己的家庭，而且关系党风政风。良好的家教家风既是砥砺品行的“磨刀石”，又是抵御贪污腐败的“防火墙”。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加强家庭家教家风建设”^③，要求各级领导干部要带头抓好家教家风建设，把家教家风建设作为领导干部作风建设的重要内容来抓。习近平总书记说：“每一位领导干部都要把家风建设摆在重要位置，廉洁修身、廉洁齐家，在管好自己的同时，严格要求配偶、子女和身边工作人员。”^④ 领导干部带头建设良好家风，不仅有助于家庭和顺美满、文明幸福，而且有助于严于律己、廉洁从政。习近平总书记又说：“各级领导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要继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继承和弘扬革命前辈的红色家风，向焦裕禄、谷文昌、杨善洲等同志学习，做好家风建设的表率，把修身、齐家落到实处。”^⑤ 党员干部要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和革命文化中汲取精神养分和伦理智慧，建设好家庭、培育好家风、维护好家教，在提升自己道德修养和为官境界的同时为建设社会主义文明家庭和形成良好的社会风气发挥表率作用。

① 向玉乔、卢明涛：《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主要道德阵地》，《湖南师范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15年第6期。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64页。

③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44页。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165页。

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56页。

（三）新时代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

青少年是全国公民中的一个特殊而重要的群体。青少年是国家的未来、民族的希望，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中国梦的未来主力军。引导青少年健康成长，不仅要提高他们的科学文化素质和身心素质，更要大力提高他们的思想道德素质和综合素质。青少年的思想道德素质直接影响着国家发展和民族复兴的历史进程。习近平总书记说：“青年是引风气之先的社会力量。一个民族的文明素养很大程度上体现在青年一代的道德水准和精神风貌上。”^① 在党的二十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再次提出“加强和改进未成年人思想道德建设”^②的时代命题。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提升青少年的思想道德素质，是新时代思想道德建设的重要目标。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也是新时代公民道德建设的重点。青少年的健康成长呼唤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

第一，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核心和灵魂。针对青年特别是在校大学生，习近平总书记说：“青年从现在做起、从自己做起，使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成为自己的基本遵循，并身体力行大力将其推广到全社会去。”同时，要求广大青年“一是要勤学，下得苦功夫，求得真学问”；“二是要修德，加强道德修养，注重道德实践”；“三是要明辨，善于明辨是非，善于决断选择”；“四是要笃行，扎扎实实干事，踏踏实实做人。”^③ 针对少年儿童，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加强德育工作，引导少年儿童从小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同时，他还要求少年儿童做到“记住要求”“心有榜样”“从小做起”“接受帮助”。^④ 引导青少年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既是学校的事也是家庭的事。习近平总书记说：“要在家庭中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导家庭成员特别是下一代热爱党、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热爱中华民族。”^⑤ 总之，学校和家庭要抓住青少年价值观形成和确定的关键时期，引导他们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学习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是新时代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的主题。

第二，系统地进行思想道德教育。党的二十大报告指出：“用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铸魂育人，完善思想政治工作体系，推进大中小学思想政治教育一体化建设。”^⑥ 系统地进行思想道德教育是大中小学教育一以贯之的内容，具体而言，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52页。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44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72～173页。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外文出版社2014年版，第180～183页。

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55页。

⑥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44页。

一是坚定教育指导思想，以马克思主义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理论成果为指导，在当代中国要坚持用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二是丰富教育具体内容，大中小学要根据不同年龄段学生的心理特征、知识结构和教育目标，建构相互衔接、循序渐进且有逻辑关联的教育内容：（1）进行以共产主义远大理想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共同理想为主要内容的理想信念教育，帮助学生坚定理想信念；（2）进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教育，帮助学生坚定“四个自信”；（3）进行社会主义道德、革命道德和中华传统美德教育，培育学生树立正确的道德观；（4）进行社会主义先进文化、革命文化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文化观，增强学生的文化自觉和文化自信；（5）进行中国精神教育即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和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教育，重点是加强以伟大建党精神为源头的中国共产党人精神谱系教育，塑造学生良好的精神品质；（6）进行中国梦教育，引导学生把个人梦与中国梦结合起来，在为实现中国梦的奋斗中实现自己的人生梦想；（7）进行社会主义法治教育，帮助学生增强法治意识，树立正确的法治观；（8）进行劳动教育和审美教育，帮助学生树立正确的劳动观和审美观。三是开好思政课，思想政治理论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性课程，因此大中小学要开好思政课，引导学生坚定“四个自信”，厚植他们的爱国、爱党与爱社会主义的情怀。四是把思政课程与课程思政有机结合，全方位、立体式地推进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五是改进教育方式方法，根据不同教育对象、教育层次和教育目标要求，结合互联网和新媒体技术创新教育方式方法，不断增强教育的实效性和针对性。六是坚持理论教育与实践教育相结合，将思想道德理论融入实践教育中，让学生在实践中锤炼思想品德。总之，大中小学要有条不紊地开展思想道德教育，全方位塑造青少年学生的良好道德品质。

第三，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文化育人是新时代思想道德建设的新内容和新举措。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五千多年智慧的结晶，是中华民族的根和魂。在经济全球化和文化多元化时代，对青少年学生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显得更为重要。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培育和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必须立足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决议指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中华民族的突出优势，是我们在世界文化激荡中站稳脚跟的根基，必须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好。”^①从伦理理念看，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包含“自强不息”“厚德载物”“仁者爱人”“与人为善”“道法自然”“天人合一”“知行合一”“天下为公”“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老吾老以及人之老，幼吾幼以及人之幼”等优秀道德理念。教育实践表明，加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不仅有助于帮助青少年树立文

^①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46页。

化自觉和文化自信,还有助于涵养青少年的思想道德品质。就学校教育而言,把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教育贯穿于思想道德教育、文化知识教育和社会实践教育的各个环节,让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走到青少年心中,与青少年零距离接触,在接受传统文化教育中感悟传统美德,领悟传统美德,涵养自己的德性。

第四,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形成合力。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工程,需要学校、家庭和社会协同发力。其中,学校教育是加强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的主阵地和主渠道。学校教育与家庭教育应保持密切的联系。家庭是人生的第一课堂,父母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习近平总书记说:“广大家庭都要重言传、重身教,教知识、育品德,身体力行、耳濡目染,帮助孩子扣好人生的第一粒扣子,迈好人生的第一个台阶。”^①家庭教育还要注重家风家教,用良好的家风、家教引导孩子养成良好品德。同时,还需要特别指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总是在宏观的社会环境中进行的。马克思指出:“环境的改变和人的活动或自我改变的一致,只能被看作是并合理地理解为革命的实践。”^②“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③人是环境的产物,同时人也能改变环境。因此,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要与时俱进地适应网络化、信息化和智能化时代的环境变化,也要主动改造环境、净化环境和优化环境。也就是说,社会各界要同心协力为青少年思想道德教育和健康成长创造良好的物质环境、制度环境和精神文化环境。总之,只有学校教育、家庭教育和社会教育要紧密结合、协同发力,才能有力推进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进而实现提升青少年思想道德品质的目标。

三、新时代思想道德建设的着力点和主体向度的关系

人是思想道德建设的主体。思想道德建设既是每个人的事、每个行业的事,也是全社会的事,需要每个人的积极参与,需要每个行业的积极参与,需要全社会的积极参与,从我做起,从现在做起,从一点一滴做起,从一言一行做起,使每个人每个行业成为践行社会主义道德、中华传统美德和革命传统道德的典范。“作为社会道德规范的主体,在全社会大力倡导,以使家喻户晓,人人皆知,人人皆信,人人皆行。历史和现实都表明,道德在一个社会中的作用大小,并不一定取决于道德规范的多少,而往往取决于作为主体的基本道德规范在社会成员中的知晓度、信奉度和践行度。”^④从道德概念看,道德是道德之知与道德之行的内在统一。中国传统道德哲学特别强调道德主体的自觉性和能动性,倡导道德修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55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5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57页。

④ 罗国杰主编:《建设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相适应的思想道德体系》,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35页。

养,注重道德实践。人们常说,道不可坐论,德不能空谈,于实处用力,方可取得实效。加强新时代思想道德建设贵在知行合一。简言之,思想道德建设最终必须落实到主体向度的实践层面。从思想道德建设目标看,新时代思想道德建设就是要引导人们积极践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和新时代公民道德规范,树立良好的社会道德风尚,争做社会主义道德的示范者和良好风尚的维护者。

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矛盾的普遍性与特殊性是相互联系的。普遍性寓于特殊性之中,并通过特殊性表现出来,没有特殊性就没有普遍性;特殊性也离不开普遍性,世界上的事物无论怎样特殊,它总是和同类事物中其他事物有共同之处,不包含普遍性的事物是没有的。公民道德建设属于普遍性范畴,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和官德建设属于特殊性范畴。也就是说,新时代思想道德建设要把普遍性的思想道德建设与特殊性的思想道德建设有机统一起来,或者说将普遍性的公民道德建设寓于特殊性的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和官德建设中。当然,特殊性的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和官德建设也离不开普遍性的公民道德建设。无疑,诚信美德建设、生态道德建设和网络道德建设作为新时代思想道德建设的三大着力点,自然要落实到主体层面即普遍性的公民主体和特殊性的领导干部和青少年主体上。只有把诚信美德建设、生态道德建设和网络道德建设落实到主体层面,才能收到实效。或者说,只有每一位公民积极践行诚信美德、生态道德和网络道德,新时代思想道德建设的着力点才能取得实效性进展。需要特别强调的是,新时代思想道德建设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为引领,以马克思主义道德观、社会主义道德观和共产主义道德观为主要内容,把诚信美德建设、生态道德建设与网络道德建设,既要融入普遍性的公民道德建设中,也要融入特殊性的官德建设和青少年思想道德建设中,使其相互渗透、相互影响,全面提升全社会的思想道德水平和文明素养。

On Key Point and Subject Dimension of Ideological and Moral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Chi Chengyong

Abstract: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grity, ecological morality and network morality are the three key points of ideological and moral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oral subjects, citizens are universal subjects, while leading cadres and teenagers are special subjects among the citizens of the country. Strengthening the construction of official morality and teenagers' ideological and moral

construction is the focus of the ideological and moral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The ideological and moral construction in the new era should be guided by the socialist core values.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grity, ecological morality and network morality should be integrated into the construction of universal civic morality, as well as the construction of special official morality and the ideological and moral construction of teenagers, so that they can penetrate and influence each other, and comprehensively improve the ideological and moral level and civilization of the whole society.

Keywords: Integrity; Ecological Morality; Network Morality; Official Morality; Teenagers' Ideology and Morality

[责任编辑: 闫惠惠]

左翼电影中红色基因的影像建构与当代启示^{*}

黄芳芳^{**}

【摘要】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将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与中国具体实践相结合，为电影艺术注入红色基因形成左翼电影，成为中国红色电影的开端。梳理左翼电影中红色基因的影像建构方式，回顾其如何通过功能化响应抗战与革命的现实诉求，通过本土化确立民族叙事话语，通过大众化彰显以人为本的主体性。概览左翼电影在文艺阵地的红色话语建构，引发对当代的现实启示，从而进一步传承红色基因，讲好中国故事，坚定文化自信。

【关键词】中国共产党；红色文化；红色基因；左翼电影；文化自信

红色电影是红色基因和红色文化的传播载体，它“从形式与内容上看是伴随着新中国成立而诞生的，但源头可追溯到20世纪30年代的‘左翼电影’”^①。在事关民族危亡的20世纪30年代，正是中国共产党的引领，为电影作品注入红色基因，左翼电影得以产生。红色电影出现后，中国电影艺术的面貌由此焕然一新。梳理左翼电影的影像叙事逻辑，剖析其如何通过功能化、本土化、大众化建立起红色话语的影像叙事表征，对于当下的艺术创作具有重要启发意义。

一、左翼电影中红色基因影像建构的历史语境

“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②左翼电影是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社会实践双向选择的产物。中国选择

^{*} 本文系南京大学文科卓越研究计划中长期研究专项“中国道路的文明基因研究”（项目编号：14914205）的阶段性成果。

^{**} 黄芳芳，南京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暨马克思主义社会理论研究中心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

^① 峻冰：《百年电影 百年党史——国产电影作品中的“红色记忆”及现实意义》，《艺术评论》2021年第7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12年版，第11页。

了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也在中国落地生根并迸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回看近代中国电影的发展理路，随着左翼思潮的传入与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在中国文艺界的影响越来越大，逐渐成为早期中国共产党人指导文艺事业发展的主导思想。左翼电影建构起红色话语体系在文艺阵地上的表达，中国电影界由此掀起一股影像建构的新浪潮，促成了红色基因的影像建构。

（一）左翼电影与左翼电影运动

左翼电影，一般意义上来说，是以底层民众的艰难生活为表现对象、反映阶级矛盾和社会不公的影片，通常与左翼思潮有关。20世纪30年代，国际政治、经济、思想和文艺等诸多领域都处于大变革大动荡之中，世界范围的左翼思潮和左翼运动高涨。社会矛盾的激化呼吁人们打破现状、重建美好生活。“三十年代‘红旗漫卷大地’卷来的是人们对更合理的社会模式的向往”^①。这种向往反映到电影艺术中，就是由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又称革命的现实主义）电影”、日本的“倾向电影”、美国的“流浪汉电影”以及意大利的“新现实主义电影”等为代表合力构成的全球左翼电影思潮。中国的左翼电影正是在这样的国际大环境中萌生的。

中国的左翼电影特指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团结领导左翼电影人，以反帝反封建和革命抗战为主题创作的一系列反映民众反抗国民党腐败及反抗日本侵略者的影片。据夏衍等人后来确认，当时总共摄制的左翼电影约74部^②，代表性的作品包括1933年夏衍编剧、程步高导演的《狂流》，1934年蔡楚生导演的《渔光曲》，1935年田汉和夏衍编剧、许幸之执导的《风云儿女》等。这些电影叙事主题直指当下面临的现实困境，具有很强的现实性。其中，以《风云儿女》为代表的一系列优秀作品更是为支援抗日救亡特地打造的，其主题曲《义勇军进行曲》以激昂的旋律唱出了时代之声，后来也成为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这些影片不仅反映了人民生活的水深火热和反帝反封建的决心，也反映了当时为民族解放而斗争大背景下民众的觉醒和成长。随着日本帝国主义的入侵，时代对电影的社会作用和意识形态表现提出了新的要求。

“左翼电影运动”这一提法最早见于1931年9月通过的《中国左翼戏剧家联盟最近行动纲领》，以纲领的形式提出了“左翼电影运动”的概念。到1963年，随着由夏衍审定、程季华主编的《中国电影发展史》的出版，“左翼电影运动”的提法由此流传开来，并在左翼电影人的口述史与回忆录中得到支撑和呼应，后来逐渐成为学术规范表述。

① 郑绩：《从〈良友〉看左翼思潮在大众层面传播》，《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丛刊》2005年第3期。

② 参见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局党史资料征集工作领导小组、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编：《中国左翼电影运动》，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年版，第229～344页。

（二）左翼电影中红色基因的注入

电影作为一种重要的影像叙事手段，深度参与近代以来中国的革命建设和改革。从清末民初发轫之际对外国的粗浅模仿，到自主建构红色话语的影像叙事逻辑，从为观众编织“鸳鸯蝴蝶的封建迷梦”到警醒国民观照现实奋起抗争，近代中国的电影业经历了一个从自在到自为的转变过程。左翼电影中红色基因的注入既是中国红色电影从萌芽走向壮大的发端，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引领人民争取民族独立、人民解放和实现国家富强、人民幸福而团结奋斗的起点。

黑格尔指出：“每种艺术作品都属于它的时代和它的民族，各有特殊环境，依存于特殊的历史和其他的观念和目的。”^①近代以来，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华中心观”的固有思维被打破，救亡图存成为中华民族面临的首要主题。20世纪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加紧对中国的侵略，民族矛盾和阶级矛盾空前激化。另外，当时也是国民大革命失败后国共两党政治斗争最激烈的时刻，“这时有两种反革命的‘围剿’：军事‘围剿’和文化‘围剿’”^②。伴随着国共两党对文艺领域意识形态的高度重视，电影业也成为双方争夺的重要的文化阵地。1933年3月，瞿秋白领导成立了党的“电影小组”，中国共产党人在电影阵地上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与国民党展开了文化领导权的争夺。在这种内忧外患的局势下，马克思主义在解释中国现实问题上显示出巨大的理论穿透性与彻底性。

20世纪30年代内忧外患的局势，呼唤电影作为一种艺术责任体的“文化与兵器”意识的觉醒。这种觉醒的直接体现就是党的文艺工作者开始为中国的电影注入红色基因，助力红色电影的生发，发挥电影这种艺术形式的“文化与兵器”作用，推动电影事业在内容与形式上实现从理论到实践的突破性变革。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指导，使左翼电影的影像叙事具备了坚实的理论基础与科学的实践走向。

理论上，左翼电影在方法论上以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唯物辩证法、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为理论支撑，强调在历史发展中真实地反映社会本质。“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的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③中国共产党早期知识分子通过一系列译著，传播介绍了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以及苏联的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电影理论，积极推动理论与实际相结合。尤其是瞿秋白，较早地系统地译介了马克思、恩格斯、列宁的文艺理论，编译完成《现实——马克思主义文艺论文集》。此外，他还对马列主义文艺理论进行总结，

① [德] 黑格尔：《美学》第1卷，朱光潜译，商务印书馆1997年版，第19页。

② 《毛泽东选集》第2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702页。

③ 《毛泽东选集》第4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版，第1471页。

撰写了《马克思文艺论底断篇后记》等作品。^① 这些左翼文艺工作者以辩证唯物主义的创作方法,从根本上突破了“拉普”在创作方法上机械现实主义的理论桎梏,有力地批判了“革命的浪漫谛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引入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丰富内涵和科学价值,为指导当下的文艺工作提供了有力的理论基础和思想武器,“使中国电影界的面貌为之一新,无论从数量上还是质量上都有巨大的变化,它有力量和帝国主义的电影文化进行较量,抵制了他们的文化侵略”^②。

实践上,左翼电影担负起电影的社会责任,助力了“革命与抗战”的时代呼唤。抗战与革命是当时最主要的矛盾,自然也成了中国电影艺术发展的新趋向和主流。电影必须直面现实实践、反映社会矛盾,发挥“宣传与救亡”的职责是不可抗拒的时代要求。以民族复兴为初心使命的中国共产党人选择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并将其作为认识世界、改造社会的工具。这一时期,对好莱坞电影艺术的学习,对苏联电影理论、电影作品的仿鉴,为本土电影实践提供了借鉴和依据。电影摄制技术的发展,有声电影、蒙太奇手法等先进影视技术的“西学东渐”,为影视产业的规模化、商品化生产提供了技术支撑。中国共产党进入电影界建立阵地成立“剧联”影评小组(1932年7月)和党的电影小组(1933年3月),以及以夏衍、王尘无为代表的大量优秀电影人进入电影界同国民党争夺文化领导权,给予了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引领。大量的左翼电影作品将镜头聚焦于最广大的无产阶级,对内忧外患的社会现实进行了深刻揭示、批判与反思,以大众喜闻乐见的影像形式引发人民群众的情感共鸣,广泛动员社会各阶级响应救亡图存的时代感召,履行了电影肩负的时代责任。

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语境下,左翼电影完成了中国语境与范式建构,感应时代律动,引领电影新潮,通过影像叙事有力地鼓舞了人心,配合了抗战与革命的宣传,开启了中国电影创作的“红色电影”时期。

二、左翼电影中红色基因影像建构的三维逻辑

左翼电影通过功能化响应时代的现实诉求,通过本土化确立民族叙事话语,通过大众化彰显以人为本的主体性,以影像形式对革命场域的全景式营造,建构红色基因影像。一方面,左翼电影使观众感同身受,生动地调动了观众在革命场域中的参与性;另一方面,左翼电影有助于革命场域的充实和抗战情绪的调动,让呼吁革命与抗战的表达更加真实生动。电影作为一种现代声光影像的技术手段,因其传播的快速性和广泛性,与日趋紧张的时代氛围相结合,在民族存亡绝

^① 参见傅修海:《瞿秋白与左翼文学的中国化进程》,人民出版社2015年版,第25页。

^② 阳翰笙:《左翼电影运动的若干历史经验》,广播电影电视部电影局党史资料征集工作领导小组、中国电影艺术研究中心编:《中国左翼电影运动》,中国电影出版社1993年版,第3页。

续之秋，宣传爱国主义思想，表现中国的社会现实，彰显中国共产党的红色基因，成为重要的文化宣传阵地。

（一）通过功能化响应时代的现实诉求

影像在传情达意上有着文字无法比拟的优势，这种影音画面上的直观性“在场”，较之于文字的距离和门槛，其所营造的革命场域的“在场”更能线性地沟通观众与现实。左翼电影运动作为一种具有革命性和时代性的文艺思潮，发生于中国社会出现重大历史性的变革时期。在历史境遇突变与意识形态博弈的环境中，中国电影产业格局和创作导向皆因时代的使命和人为的干涉而发生整体转向，在这样的环境中，左翼电影的功能空前加强。

这种功能化直接表现为关注改造现实的“工具性”和强烈的政治倾向性。一方面是改造现实的“工具性”。电影不只是一种文艺现象，更是一个民族、政党的文化领导权和话语权的体现，还是一个国家社会政治环境的表征。20世纪30年代，战争强力冲击电影领域，左翼思潮和苏联电影观念改变了人们的思维与审美。这一时期特定的社会历史语境决定了当时的人们必然会以革命、抗战的“工具性”倾向作为基本出发点。当时的中共电影人迫切想要在电影中传播马克思主义，树立崭新的电影观，实现中国电影发展方向上的新突破，引领中国社会历史进程中的新变革。左翼电影借助影像信息，传达舆论价值导向，促进“革命和抗战”的价值认同。反帝反封建、抗日救亡的民族情绪也日益高涨，鸳鸯蝴蝶主题的电影式微，武侠神怪片数量锐减，抗战爱国题材的影片不断出现。左翼电影借助影像信息传达舆论价值导向，加速促进“革命和抗战”的价值认同。另一方面是强烈的政治倾向性。左翼电影人在创作影视作品时有着强烈倾向性——反帝反封建和宣传无产阶级革命。这便产生了一种新的审美观的确立：“家国一体化”的叙事风格。这种倾向性最直接的体现是对影片摄制题材的选择。当时的电影人为了完成反帝反封建的任务，明显带着“经世致用”的偏好进行创作，有着明确的电影题材选取偏向。“电影必须经党的手，使之成为社会主义的启蒙及煽动的有力的武器”^①，这一思想成为当时左翼电影人创作的信条。对他们来说，现实主义的“精神”和“工具性”比艺术性更加重要。这一点从20世纪30年代的“软硬电影”之争便可看出端倪。夏衍说：“我们不是‘为电影而电影’，我们搞电影有一个鲜明的目的性。”^②这个目的性就是立足“革命和抗战”的需求，夺取电影这一阵地。作为受政治力量特别青睐的传媒及艺术，电影的政治地位高企，凭借政治的力量，加之特定时代其他艺术传播力的受限，电影成了政治

① 王尘无：《王尘无电影评论选集》，中国电影出版社1994年版，第229页。

② 夏衍：《写电影剧本的几个问题》，复旦大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6页。

文化皇冠上的明珠，电影也成了亿万中国人接受最多、接受起来最方便的艺术。^①

总体来说，20世纪30年代的中国电影发展于时代动荡、社会文化纷繁、政治意识形态对抗尖锐的复杂语境，“革命与抗战”的时代语境冲击着中国电影界；在精神思想领域，愤怒的民族情绪冲击着电影人，民众的思想加速发生转变。“大敌当前，委肉虎蹊，电影界同仇敌忾，有了巨大的觉醒，反帝抗日的怒火燃烧起来了。这个觉醒包括整个电影界的从业人员，无论是编剧、导演、演员、摄影、美术、化妆、灯光等，都有很大转变。”^②此时文艺作品的社会政治功能和工具性被推向新的高度，电影的功能空前加强，形成了党强力引领文艺界的局面。

（二）通过本土化确立民族叙事话语

从国家民族主义视角看，左翼电影运动蕴含着中华民族革命解放、抗日救国的宏大叙事，形成了直击当下现实诉求的全新话语体系与表达范式。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作为一种文艺思潮，是现代化大潮的产物，是新文化运动中对外来文化的批判性改造成果；电影作为一种外来文化的典型样式，它的民族主体性建构就不仅包含题材上的转化，还包括艺术创作方法上的转化。20世纪30年代，中国发生了许多新变化，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面临的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十分尖锐。这样的环境对电影艺术产生了巨大的推动作用，也提出了新的历史要求。左翼电影力图对传入中国的苏联革命电影和好莱坞电影进行“入乡随俗”“因地制宜”的本土化“重写”，以阶级意识为武器，推动中国电影运动向左转。

在电影题材选择上，现实语境亟须左翼电影立足现实实践、直击现实痛点。抗日救亡是中国当时面临的最大的国情，中日民族矛盾压倒阶级矛盾成为全国最主要的矛盾，中华儿女的民族意识空前觉醒，人们对家国命运、民族危亡、社会现实高度关注，对现实的危机感更加紧迫。而此时的民族电影界却仍沉陷于“武侠神怪”和“鸳鸯蝴蝶”的泥潭而不自拔。面对时代的需要，电影的主要任务不再是娱乐观众，而更强调严肃的主题和鲜明的观念。“中国的现实起了变化，观众的需要起了变化，抗日影片的受欢迎，说明观众需要的已经不是神怪、武侠、鸳鸯蝴蝶之类背离现实的东西，他们需要的是反映现实生活和斗争的作品。”^③由此，左翼电影形成了一种民族自觉的理性精神，为电影叙事注入红色基因，形成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使民族主义上升到国家宏大叙事层面，进而引发了后来国防电影与抗战电影的高涨。

在艺术创作方法上，左翼电影彰显浓厚的“中国特色”和“中国气派”。中国电影从诞生之初就充盈着浓郁的民族气性，凸显本土文化脉络，内置丰富的中

① 参见朱寿桐、王小波：《中国电影文化百年史》，南京师范大学出版社2018年版，第16页。

② 中国文学艺术界联合会、四川省宜宾市人民政府编：《阳翰笙百年纪念文集》第2卷，中国戏剧出版社、中国电影出版社2002年版，第252页。

③ 程季华：《党领导了中国左翼电影运动》，《电影艺术》2002年第5期。

华母题和原型。^① 20 世纪 30 年代,随着夏衍等一批具有初步马克思主义思想的年轻人,在开展电影创作和评论中以马克思主义哲学思想和苏联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艺术经验为思想武器,结合现实语境中的时代诉求进行本土性转化,建立了新的电影观念、新的主题、新的表现对象,使中国电影的民族气性愈加彰显,形成一种中国电影的本土化叙述模式,一种建立在民族叙事话语基础上的电影叙述模式,“中国电影已经很明显地从颓废的、色情的,乃至一切反进化的羁绊挣脱出来,而勇敢地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②。

简言之,在左翼电影本土化过程中,左翼电影人本着强烈的责任感和使命感,直面社会矛盾、阶级矛盾和民族矛盾,不回避大众关心的问题,把电影与社会进步紧密联系起来,以唤醒观众的革命认同、调动全民族抗战情绪,“这使所有作品都在面对现实中变得朴素、严肃,既扫荡了过去那种神怪淫靡的妖风,也用全力来注意剧本的内容与意识。这时工作者主要的课题,对外是主张坚决地抗拒日寇的侵略,对内是暴露反动政府的媚外无能,与它所造成的农村破产、工人失业、和社会的种种黑暗”^③。这种“民族认同叙事”也使中国共产党获得了电影文化的领导权和意识形态的话语权。

(三) 通过大众化彰显以人为本的主体性

贴近大众的真实诉求和审美旨趣,是追求艺术生命力意识的体现。正如毛泽东所言,任何思想“如果不为人民群众所掌握,即使是最好的东西,即使是马克思列宁主义,也是不起作用的”^④。20 世纪 30 年代中国的劳苦大众文化生活匮乏,文艺作品亟待下沉,实现文艺作品从精英化到大众化的转变势在必行。在“革命和抗战”的时代大背景下,文艺大众化的提出不仅是为了启蒙,更是为了抗日救亡。当时的文艺工作者纷纷发出呼吁,要使艺术最大限度地亲近大众,用大众化、通俗化、生活化的形式武装群众、发动群众,唤起人民的阶级意识和政治认同。“一个国家的力量在于群众的觉悟。只有当群众知道一切,能判断一切,并自觉地从事一切的时候,国家才有力量。”^⑤ 理论一经群众掌握就会变成强大的物质力量。左翼电影的大众化之路经历了曲折的探索,基本实现了观众主体性的培育,将电影天然的“大众性”引向真正的广大群众,以“大众化”达到“化大众”的效果。

左翼电影大众化的主要特征表现在关注民间疾苦、女性命运和知识分子遭遇

① 参见周安华:《论现代民族电影的文化谱系》,《南大戏剧论丛》2021 年第 1 期。

② 中国戏剧家协会编:《洪深文集》第 4 卷,中国戏剧出版社 1959 年版,第 516 页。

③ 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宣传处编:《中华全国文学艺术工作者代表大会纪念文集》,新华书店 1950 年版,第 252 ~ 253。

④ 《毛泽东选集》第 4 卷,人民出版社 1991 年版,第 1515 页。

⑤ 《列宁选集》第 3 卷,人民出版社 2012 年版,第 347 页。

三方面。第一，左翼电影十分关注民间疾苦，如《狂流》《春蚕》《渔光曲》等。这类作品通过聚焦市民生活的切片，展现旧中国艰难世事的生活断层，映射出作为社会主体的人民群众在旧社会中的举步维艰，表达了对弱势阶层民众的同情。第二，左翼电影非常关注女性命运。如《三个摩登女性》《女儿经》《母性之光》等，既表现了妇女在旧社会中遭遇的重重压迫，也在暴露与批判的同时对中国妇女的出路作出积极思考，更意在彰显女性的觉醒与反抗。这些作品通过电影媒介，对女性形象进行重新反思和建构，把无产阶级的女工和具有革命倾向的女性知识分子尽可能地动员了起来，汇聚到革命和抗战的洪流中去，让他们同男性一样，成为革命和抗战的力量，为民族解放作出卓越贡献，同时也为女性自身解放打开另一片天地，提供了一种全新的思路和社会实践路径。第三，左翼电影也对知识分子群体的遭遇颇为关注。电影中塑造的知识分子可以大致分为四种类型，分别对应四种身份：黑暗社会的牺牲品（如《桃李劫》）、彷徨苦闷者（如《十字街头》）、时代的代言人（如《风云儿女》）和革命的追随者（如《青年进行曲》）。在左翼电影中，知识分子投射于社会的身份是随现实环境不断改变的。多重身份在左翼电影中相互交织、流变。这一系列政治身份、社会角色的不断重新定位，生动呈现出知识分子与时代之间的张力关系。电影中对知识分子群体命运的关注，唤醒中国知识分子素来文以载道、经世致用的家国担当，促使知识分子加入时代的洪流，卓有成效地传播了红色话语。

综上，左翼电影借助的是影像表达，而思考的则是人本身。这也印证了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贯彻的党的群众路线和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党的根基在人民、血脉在人民、力量在人民，人民是党执政兴国的最大底气。”^①左翼电影通过大众化实现了以人为中心的主体性彰显，把人民大众作为主要表现对象，把大众日常接触的人物做主角，贴近大众的现实生活，关注社会和时代的现实诉求，充分体现“现实的人”在革命与抗战场域的“在场”。此外，这种以人为本的思想在电影界的渗透，也为革命和抗战的胜利奠定了最广泛的群众基础，凝聚了作为历史主体的最广大人民群众的支持。

三、左翼电影传承红色基因的当代启示

中国共产党人在深刻认清国情、立足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基础上，吸收运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以指导中国革命实践和当下的文艺工作。在马克思主义文艺思想的丰富内涵和科学价值以及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指导下，中国电影の影像叙事拥有了鲜红的底色，具备能够传承的红色基因。左翼电影在党的引领下，在事关民族危亡的20世纪30年代，通过本土化、大众化和功能化在文艺阵

^①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66页。

地上建构红色话语,形塑了中国革命与抗战场域的影像符号,彰显了本民族的文化血性与文化自信。左翼电影作为中国红色电影的发端,虽有其历史局限性,但仍瑕不掩瑜,依旧可以在理论与实践层面观照当下,让我们有所反思。

(一) 坚持党的领导,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稳步从电影大国迈向电影强国

左翼电影立足本土,确立起民族叙事话语;以人民为中心,生产大众真正所思所需的精神食粮;紧密关注现实实践,充分服务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左翼电影优良传统的多样性观照与创造性阐发,以及在近一个世纪以来我国政治、思想、产业、美学情境中迸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有望成就为‘中国电影学派’不可或缺的重要标识”^①。新时代依然要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社会主义文艺创作导向,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从2012年开始,中国已然成为世界第二大电影市场,电影产业成为增长最快的文化产业,民族影片稳定占据了本土市场的半壁江山。为此,浙江大学邵培仁教授提出了“华莱坞”这个概念。^②华莱坞是中国电影的代名词,是中国文化和中国电影产业的符号。由于华莱坞具有华人、华语、华事、华史和华地等“五华”的特点,因此用“华莱坞”向世界讲述中国故事、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宣传中国智慧等,有着其他传播媒介不可替代的作用。^③

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提出,要在2035年完成文化强国的目标。为了达成这一目标,一方面,我们要有高度的文化自觉,在党的领导下,紧密围绕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实践,呈现有中国主体性的电影叙事。“思想政治受洗礼,重点是教育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坚定对马克思主义的信仰、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信念,传承红色基因”^④,将红色基因的内涵与精神品格融入影视文化产业体系,发挥其铸魂育人的功能。在叙事话语层面,促进民族文化与集体认同的融合;在叙事主题层面,促进本土书写与家国表达的融合;在叙事结构层面,促进影像叙事与时代需求融合。另一方面,要用国际化的电影语言来实现文化的国际传播,不断赋予电影艺术以鲜活的理论内容与艺术形式,实现中国话语的铿锵传播。这样才能推动中国影视产业的新发展,增强中国电影的国际影响力,使中国从电影大国真正变为电影强国。

(二) 珍视本土文化精髓,不断赋予本土文化全新的“出场”方式

左翼电影在特殊的历史语境下,响应时代的召唤,彰显出对家国命运的深切关怀、对社会现实问题的紧密关注、对改变底层人民命运的信念以及对建构美好

① 李道新:《左翼电影的生机、优良传统的确立与中国电影的学派标识》,《当代电影》2021年第1期。

② 参见邵培仁:《华莱坞的机遇与挑战》,《东南传播》2014年第2期。

③ 参见张帆:《尊重传播规律 讲好中国故事》,《中国社会科学报》2016年3月25日。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525页。

未来的憧憬,这些优秀品质沉淀在中国电影的红色血脉中。这些宝贵的精神财富,也值得我们传承下去。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要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红色基因就是要传承。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富起来到强起来,经历了多少坎坷,创造了多少奇迹,要让后代牢记,我们要不忘初心,永远不可迷失了方向和道路。”^①在新的历史时期,习近平总书记再次强调:“光荣传统不能丢,丢了就丢了魂;红色基因不能变,变了就变了质。”^②“要教育引导全党大力发扬红色传统、传承红色基因,赓续共产党人精神血脉。”^③

本土文化的现代化转型,必须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的实践中综合定位,从本土文化与当下实践的双向互动中寻求新的生机与活力。不断以发展的眼光审视本土文化精髓、以结合的态度对待红色文化血脉,不断推动经典理论走向当代、直面中国,才能令优秀的本土文化在新时代焕发出新的生机与活力。当今中国实践变化的规模与速度是前所未有的,理论创新必须紧密结合实践,不断推陈出新、守正创新。不断吸收中华民族复兴道路上所形成的思想精髓、时代精华,推动红色基因的赓续与发展,“用实际行动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④。不断以发展的眼光审视本土文化精髓,赋予其新的时代内涵和现代表达形式;以结合的态度对待红色文化血脉,激发其新的生命力与时代活力。着眼于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建设,与时俱进,实现创新性发展。“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⑤,确保红色基因代代相传,红色江山永不变色。

(三) 坚定文化自信,建设新时代中国的文化话语体系

文化自信不是无源之水、无本之木。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革命文化与社会主义先进文化的有机统一,而优秀的左翼文艺作品则往往是集三者于一体的影像符号呈现,三者有机融合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历史实践中。20世纪30年代,中国共产党人通过左翼文艺作品,在思想上和组织上引领建成文艺界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为革命和抗战的胜利奠定了最广泛的群众基础,筑牢了意识形态的思想地基,捍卫了文化领导权和国际话语权。近年来,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在文化输出方面“猛踩油门”,为了应对各种思潮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以及主流意识形态“挨骂”与“失语”问题,提高国际话语权与解

① 《习近平李克强王沪宁赵乐际韩正分别参加全国人大会议一些代表团审议》,《光明日报》2018年3月9日。

② 中共中央文献研究室编:《习近平关于全面从严治党的论述摘编》,中央文献出版社2016年版,第49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515页。

④ 习近平:《用实际行动把红色基因一代代传下去 做对国家人民对社会有用的人》,《人民日报》2018年6月1日。

⑤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2022年版,第65页。

释权，我们更要高度坚定文化自信。“我们党带领人民就是要不断解决‘挨打’、‘挨饿’、‘挨骂’这三大问题。经过几代人不懈奋斗，前两个问题基本得到解决，但‘挨骂’问题还没有得到根本解决。争取国际话语权是我们必须解决好的一个重大问题。”^①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的发展，必然伴随高度的文化自信。“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文化兴国运兴，文化强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没有文化的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伟大复兴。”^② 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和艰巨繁重的改革发展任务，铸牢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之魂，凝聚同心共筑中国梦的磅礴力量，从文化层面彰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自信，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才能真正传承好红色基因，这是在新的历史方位中坚持与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题中应有之义。

The Image Construction and Contemporary Enlightenment of the Red Gene in Left-wing Films

Huang Fangfang

Abstract: In the 1930s, Chinese Communists combined Marxist literary and art thoughts with China's concrete practice, instilling the Red Gene into films and forming left-wing films, which became the beginning of Chinese red films. This paper reviews the image construction methods of red gene in left-wing films, and outlines how they respond to the realistic demands of the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ese Aggression and revolution through functionalization, establish national narrative discourse through localization, and highlight the subjectivity of people-oriented through popularization. An overview of the red discourse construction of left-wing films in the field of literature and art, triggering realistic enlightenment for the contemporary era, is valuable to inherit the red gene, tell a good Chinese story and strengthen cultural confidence.

Keywords: The Communist Party of China; Red Culture; Red Gene; Left-wing Films; Cultural Confidence

[责任编辑：于少青]

① 习近平：《在全国党校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20页。

②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3卷，外文出版社2020年版，第32页。

马克思《资本论》的当代相关性

——《资本论》教学如何回应普遍性批评的思考

吴 楠*

【摘 要】当前对《资本论》的批评观点中有一种论调，即资本主义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使其已经不能解释当今世界所发生的问题。这种观点的根本性问题就在于对《资本论》文本归类理解不当，将其看作一部描述性著作而非理论著作，或是一部关于资本主义历史而非资本主义生产模式的著作。本文针对部分较普遍的批判《资本论》观点进行了理论逻辑层面的剖析，观点主要集中在《资本论》整体和主题研究及一般利润率下降趋势理论中，在教学中对观点争锋的系统性回应能加深学生对原著的理解。

【关键词】《资本论》；批评；整体

引 言

相对于马克思生活的时代，如今资本主义已经遍布全球，体量和模式都有了质的跃迁。正如英国著名文学批评家特里·伊格尔顿所指出的，资本主义制度“自从马克思时代以来，改变得已经难以辨认，这就是他的观点在当代无关紧要的原因”^①。这一观点的前半部分——认可资本主义的改变，是毫无疑问的。但是，如果因资本主义的改变就认为马克思的观点与当代无关，在逻辑上是显然无法自洽的。这种观点的根基在于把《资本论》的研读重点放在事实描述性上，

* 吴楠：中共湖南省委党校（湖南行政学院）经济学教研部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

① 陈世华、宗元勇主编：《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沿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 2020 年版，第 158 页。

而非整体理论逻辑上。因此，本文简要梳理了西方三个较为流行的对《资本论》误读的观点，用具体个案的分析方法来较为深入地解读《资本论》。

一、从整体观来看《资本论》是一部理论著作

首先需要明确的是，《资本论》主要是一部理论著作，而非描述性作品。它描述的彼时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内容与我们在现实世界中观察到的现象不匹配，并不能作为它与当今现实世界无关的证据。引言中特里·伊格尔顿先生观点的偏颇之处，就在于其研究范畴专注于文学领域内的马克思主义，导致他关注文本描述性胜过整体逻辑性。资本主义历经五百多年的发展，尤其是经历两次科技革命，带来了生产力的极大跃升和生产关系的伴随性变化；两次世界大战，造成了国家本体地位和国际关系的本质性改变，在马克思生活时代的资本主义与当今资本主义的具体呈现必然有很大的差异，若没有差异，反而不符合马克思主义的基本原理。

马克思在著书时就已经敏锐地意识到事物变化发展带来的差异，例如在《资本论》第二卷中他就指出：“然而，不是把生产方式的性质看做和生产方式相适应的交易方式的基础，而是反过来，这是和资产阶级眼界相符合的，在资产阶级眼界内，满脑袋都是生意经。”^①实际上，马克思坚定地认为：劳动力买卖双方（资本家和工人）之间是市场关系，“这种关系的基础是生产的社会性质，而不是交易方式的社会性质；相反，后者是由前者产生的”^②。显然，问题不在于资本主义自马克思时代以来是否已经发生了变化，而是这些变化是否真正已经超越了马克思研究的范畴。至少从此处来看，显然只是表象有所改变，研究内容的本质并未超出研究范畴。

事实是，马克思曾预见了这种反对，因此在著述中经常通过区分“科学”和现象描述来反复予以回应。如在《资本论》第一卷中，马克思就解释说：“只有了解了资本的内在本性，才能对竞争进行科学的分析，正像只有认识了天体的实际的、但又直接感觉不到的运动的人，才能了解天体的表面上的运动一样。”^③同样，在《资本论》第三卷中，他再次通过对比现象和本质，批评了专注于描述现象的“庸俗经济学”：“庸俗经济学所做的事情，实际上不过是对局限在资产阶级生产关系中的生产当事人的观念，当作教义加以解释、系统化和辩护……如果事物的表现形式和事物的本质会直接合而为一，一切科学就都成为多余的了。”^④几年之后，在一封写给朋友的信中，马克思再次做了类似的论述：“当庸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3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6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33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68页。

④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7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925页。

俗经济学家不去揭示事物的内部联系却傲慢地鼓吹事物从现象上看是另外的样子的时候，他们自以为这是作出了伟大的发现。实际上，他们所鼓吹的是他们紧紧抓住了外表，并且把它当做最终的东西。这样一来，科学究竟有什么用处呢？”^①因此，必须明确《资本论》整体是一部理论著作，其中对彼时资本主义世界的境况描述是阐述理论之需要，马克思从来不试图通过用这些“事物看待”社会表面的方式描述其组成部分和关系，从而评论资本主义社会“抓住表象”——这恰恰是他批判的“庸俗经济学”的做法。相反，马克思是在从事一门“科学研究”，即在各个部分和它们表面的关系之间“揭露内在的相互关联”。因此，现代人研读和评价《资本论》时，单就其与事物表象如何紧密一致，是否符合当前社会表现，显然是完全不合适的。例如，研究主导经济新闻与资产阶级思想的商业交易和金融市场是否也涵盖在《资本论》中，这种研究舍本逐末，没有真实领会马克思的研究方法和意图。相反，如果研究主导经济新闻与资产阶级思想的商业交易和金融市场的内在关联问题，就还算触及了马克思的基本研究方法。

二、《资本论》修改后的主题更加明确和集中

《资本论》是马克思一本“未完成”的著作，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著述时也在不断进行修改，其中马克思对其著作最重要的一个改动就是对主题的精简。当代西方学者在对马克思的评判中经常谈及其“忽略”和“疏漏”，或认为马克思在处理这些问题时是“不充分的”。例如，《每月评论》的作者希瑟·布朗（Heather Brown）认为：“性别对于了解资本主义十分重要。马克思理论没有提供这方面的充分论述。”^②这种批评是建立在假设《资本论》的目标是“全面探讨资本主义”之上，显然已经严重偏离了《资本论》真正研讨的主旨。马克思的这本著作原书名为《政治经济学批判》，后来在第一卷出版时改为《资本论》是有深刻原因的，其中之一就是它的主题关注点就是资本——价值“自我增值”的过程和阶段，或资本如何成为更大的价值，如何再生产（更新和重复），是关于价值的自我增值如何产生、流通及分配。若需要符合前文所提的希瑟·布朗的批判，那么它更应该被命名为《资本主义发生的一切》，或者是《资本主义面面观》。同时，需要注意对研究对象主题的精简并不代表《资本论》写作是简化了的。具体关注和简化，是两回事。马克思也没有在任何地方暗示过价值自我增值的过程是资本主义唯一重要的事情，其他过程都可以简化为这一过程。

要深刻理解《资本论》主题的具体内容，就有必要了解马克思精简其范围的程度。马克思原来的写作计划涉猎甚广，是试图完成一部内容广泛的批判作

^①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0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290页。

^② 陈世华、宗元勇主编：《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沿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61页。

品，不仅涉及政治经济学，还涉及哲学、法律、伦理、政治、公民生活及其他问题。但在1844年，即《资本论》第一卷出版之前的23年，他就已得出结论：在同一部作品中涉及所有问题，是不会有成果的。因此，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主要探讨政治经济学，只是在最后一个“章节”中才专门批判了黑格尔的辩证法及其哲学。1857~1858年，当马克思重新回到对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时，他起初设想了一套由六本书组成的丛书：第一本关于资本，第二本关于土地财产，第三本关于工资和劳动力，第四本关于国家，第五本是关于对外贸易，第六本涉及世界市场和经济危机。其中有关资本的，包括四个部分：一般资本、竞争、信用体系和股份资本（股份所有权）。“一般资本”部分包括三个主题：资本生产过程、资本流通过程、利润和利息。大约八年之后（1865年或1866年），马克思亲自留下的唯一尚存的纲要，设想一部由四本书构成的作品，分别是资本生产过程、资本流通过程、作为整体的过程形式和“学说史”（即政治经济学理论）。这部作品的前三本，与后来《资本论》的三卷大致相同，而未经编辑的第四卷，是马克思去世后由考茨基编辑出版的《剩余价值学说史》。也就是说，马克思大幅缩小自己打算发表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范畴。为什么马克思会大幅缩小政治经济学批判的范畴？从文本解读和历史背景来看，至少有两个原因。第一，他意识到由于年龄的增长和健康问题的困扰，太过宏大的巨著已经无法完成，加之恩格斯的劝解，把能完成的先完成，于是将写作内容提炼，聚焦到更有说服力的立论点“资本”上来。第二，他最初设想的批判过于雄心勃勃，要查阅、了解、分析、论述的内容太多，以至于不论从写作者还是观看者来看这项任务都变得过于沉重，这从当时旁人无法理解，现在看来非常精彩的《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也能窥见一二。此外，美国学者安德鲁·克莱曼认为：“马克思不是一位了解所有事情的思想家。他是一位辩证的、黑格尔式的传统思想家，也是一位特别小心谨慎和周到缜密的人，他特别努力地避免以‘真实的事情和具体的事情’的形式开始；因为这样会等同于以‘整体的混乱概念’开始。”^①这种对论述的高要求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也有所体现，马克思自己阐述的原因：“由于需要探讨的题目丰富多样，只有采用完全是格言式的叙述，才能把全部材料压缩在一本著作中，而这种格言式的叙述又会造成任意制造体系的外观。”^②此外，马克思总结道，当他没有试图同时阐述哲学方面和主题问题的其他方面时，他的论点就会连贯许多，“把仅仅针对思辨的批评同针对各种不同材料本身的批判混在一起，十分不妥，这样会妨碍阐述，增加理解的困难”^③。可见，马克思为追求叙述中的连贯逻辑主动削减了庞杂的研究材料，也

① 陈世华、宗元勇主编：《国外马克思主义理论前沿研究》，南京大学出版社2020年版，第164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1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111页。

是他个人偏好的一种风格选择。

三、对“利润率下降趋势理论”的误解和正解

《资本论》第三卷中关于“利润率下降趋势理论”是关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批判中最为集中、最有争议的一个焦点。人们普遍有一个错觉——生产效率更高的资本主义应当是一个利润更高的资本主义，而马克思的严谨推演恰好相反。在《资本论》写作的年代，这个规律显然与“革命需求”不符。同时期的大部分理论将资本主义经济危机归咎于特别的可纠正的问题，如低生产力、需求低迷、市场无政府状态、国家干预、高工资、低薪水等，马克思的规律则表明，不断出现的经济危机源自资本主义本身，并且在资本主义状态下是不可避免的。

对“利润率下降趋势理论”的一个典型误解，就是将其与马克思之前的古典经济学家一齐批判。密苏里大学历史教授乔纳森·斯珀伯在出版的传记《卡尔·马克思：一个 19 世纪的人》中提出：“马克思没有称自己是利润率下滑趋势规律的发明者……他认为他的分析首次正确解释了他那个时代政治经济学的一个典型观点。”^① 这个观点由亚当·斯密提出，并在 18 世纪末 19 世纪初的英国得到了广泛的认可。大卫·李嘉图用更严格的方式对其进行了表述，而穆勒则用自己的标准表达方式支持了这种看法。但是，两人都认为，这个趋势会在终局呈现一种静止状态，“在这种状态下经济将停止增长，因为利润率已经低得导致新投资不会有任何盈利——这个最终结局在李嘉图那里是一幅噩梦般的场景，但在穆勒眼中却是近乎乌托邦式的繁荣”^②。

斯珀伯对于大卫·李嘉图对利润率下降趋势解释的批评是有道理的，因为李嘉图的解释源于他的假设——随着越来越多的土地被购买耕作，以供养不断增长的人口，农业部门的平均生产率在下降。比较客观地来看，李嘉图的推断到结论并没有错误，只是他显然没有预见到农业将会发生巨大的技术进步。但是，斯珀伯就此认为马克思解释利润率下降趋势的原因是“源于”李嘉图解释的“改版”，显然是错误的。恰恰相反，马克思曾打趣说李嘉图的解释是逃离经济学，到有机化学中寻求庇护，而他自己的解释却截然相反——认为是增加的而非减少的生产率是利润率下降的根本原因。因此，利润率下降的渐进趋势仅仅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特有的表达，是社会劳动生产率的逐步发展。“利润率下降，不是因为劳动的生产率降低了，而是因为劳动的生产率提高了。”^③

① [美] 乔纳森·斯珀伯：《卡尔·马克思：一个 19 世纪的人》，邓峰译，中信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78 页。

② [美] 乔纳森·斯珀伯：《卡尔·马克思：一个 19 世纪的人》，邓峰译，中信出版社 2014 年版，第 278～279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267 页。

另一类对“利润率下降趋势理论”的误解，主要是认为资本主义的发展使马克思的规律不具有相关性，代表人物主要是保罗·巴兰和保罗·斯威齐。他们在《垄断资本》一书中提出了垄断和寡头垄断作为资本主义公司的出现，让剩余价值呈上涨的趋势，且在评判马克思的观点时认为，“马克思经典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预先假定有一个竞争体制”^①，而不是由垄断和寡头垄断统治的体制。因为体制已经改变，需要适应新体制的规律取代马克思的规律：“用上升的剩余价值规律替代下降的利润规律，我们并不是否定或修正政治经济学上的一条历史悠久的原理：我们只不过是估计到这个毋庸置疑的事实，即从这个原理制定以来，资本主义经济已经经历了一个根本性的变化。”^②两位学者的论断看似非常正确，而且符合资本主义发展的状况，但实际上更深入的分析就可以证明，这种论断实际还是没有深刻和全面地理解资本主义进程，而对马克思结论的所谓“颠覆”，仍旧是将《资本论》看作一部描述而非理论的著作，因此才可以“断言”马克思的规律“预设了竞争制度”，进而没有认真讨论马克思的如下观点：独裁不会引起剩余价值增长的趋势。

在研究中，巴兰和斯威齐也巧妙地回避了为什么垄断和寡头垄断的发展会引起剩余价值的增长，只是简单分析认为在寡头垄断产业中（那些少数大公司统治的产业），降低生产成本并不会降低产品价格。于是，在垄断资本主义中，成本下降意味着利润率不断提高。持续提高的利润率反过来意味着总利润不仅绝对增长，并且作为国民总产值的一部分增长。因此，随着制度的发展，剩余价值趋于绝对和相对地增长。这里出现的逻辑问题在于，巴兰和斯威齐过于关注看似是新事物的东西的出现，而忽略了整个资本主义生产流通的规律，认为个体寡头垄断公司和产业的产品价值的一部分，利润会增加，接着就轻率地得出结论：总利润作为国民总产值的一部分必须增长。

实际上，只需要把研究视野拓展一点，就能够发现正确的逻辑应该是：即使所有寡头垄断企业的利润率都高于平均水平，寡头垄断部门的增长与总体经济有关，总利润作为总产品价值的一部分，并不一定会增长；相反，寡头垄断者的超额利润可能会牺牲非寡头垄断经济部门企业的较低利润，并被这些较低利润完全抵消。后者的这种可能性是马克思赞成的，并以此为基础，马克思提出了他的利润率下降趋势规律。在马克思的理论中，从资本主义生产中的工人身上榨取剩余劳动，是剩余价值的唯一来源。剩余价值又是产权所有者获得各种收入的唯一来源，“直接参与生产的资本家直接占有剩余劳动，不管他以后还要把这个剩余价

① [美] 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垄断资本——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杨敬年译，商务印书馆 2021 年版，第 82 页。

② [美] 保罗·巴兰、保罗·斯威齐：《垄断资本——论美国的经济和社会秩序》，杨敬年译，商务印书馆 2021 年版，第 83 页。

值分成哪些项目，也不管是同土地所有者分享，还是同资本的出借人分享”^①。因为剩余价值的总量是由资本主义生产中发生的事情决定的，不受不同产权所有者之间分配方式变化的影响。因此，如果其中一些人得到了剩余价值总量中的一大部分，其他人得到的份额就会相应减少。

因为《资本论》的未完成性，理解的偏差时常得见。在《资本论》第三卷中讨论了股份公司的出现后，马克思指出其“在一定部门中造成了垄断”^②，并详细讨论了垄断定价及其影响。《资本论》中有 200 页的内容是用来分析垄断定价的特殊情况：土地租金和包括土地租金在内的农业价格，虽然这显然不是现在人们听到“垄断”一词时常常想到的内容。马克思的观点就是前文中已经分析过的类似“零和博弈”的推理：“如果各不同生产部门中剩余价值平均化为平均利润的过程，遇到人为的垄断或自然的垄断的障碍，特别是遇到土地所有权的垄断的障碍，以致有可能形成一个高于生产价格和高于受垄断影响的的商品的价值的垄断价格，那么，由商品价值规定的界限也不会因此消失。某些商品的垄断价格，不过是把其他商品生产者的一部分利润，转移到具有垄断价格的商品上。剩余价值在不同生产部门之间的分配，会间接受到局部的干扰，但这种干扰不会改变这个剩余价值本身的界限。”^③从这个分析逻辑可以看出，马克思的严谨性不仅体现在行文叙述的清晰性中，也贯穿于对整个经济社会的深刻洞察。巴兰和斯威齐的分析，足见其发现新现象的兴奋，但在经典文本阅读和经济社会整体把握上还不够到位。

Contemporary Relevance of Das Kapital

—Reflections on How to Respond to Common Criticism in Das Kapital Teaching

Wu Nan

Abstract: There is a view in the current criticism of Das Kapital that the great changes of capitalism have made so that Das Kapital is unable to explain the problems of the world today. The fundamental mistake in this view lies in misunderstanding the genre of Das Kapital as a descriptive work rather than a theoretical work, or as a history

①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 26 卷，人民出版社 1972 年版，第 65 页。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497 页。

③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 7 卷，人民出版社 2009 年版，第 975 页。

of capitalism rather than a model of capitalist production. This paper makes a theoretical and logical analysis on some of the common critical views on Das Kapital, mainly focusing on the overall and theme research of Das Kapital and the general theory of declining profit rate. The systematic response to the contention of views in teaching can strengthen students' understanding of the original work.

Keywords: Das Kapital; Criticism; Integrity

[责任编辑：鲁法芹]

“大思政课”视域下思政课双线混融教学优化探析

鞠 澈 王建新*

【摘 要】“大思政课”是新时代思政课改革的根本遵循。双线混融教学将现代信息技术与思政课深度融合，能够利用网络跨越时空调动大师资，通过云端资源混融生成大资源，运用双线优势互补生成大教学，经过虚拟现实结合形成大课堂，契合“大思政课”大视野和大格局的要求。“大思政课”视域下优化思政课双线混融教学，要用大师资强化育人合力，用大资源转化课程资源，用大教学促进课堂参与，用大课堂引领社会实践。为此，要塑造师资联动的育人格局，搭建互通共享的大资源库，构建深度融合的教学生态，打造三位一体的教学空间。

【关键词】大思政课；双线混融教学；改革创新

继2016年教育部印发的《关于中央部门所属高校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指导意见》中提出“要推动校际校内线上线下混合式教学改革”^①后，2019年中共中央办公厅、国务院办公厅通过的《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也提出要“大力推进思政课教学方法改革，提升思政课教师信息化能力素养，推动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在思政课教学中应用，建设一批国家级虚拟仿真思政课体验教学中心”^②。以此为标志，双线混融教学正式成为思政课教学改革的方法之一。新冠肺炎疫情暴发以来，大规模思政课线上应急教学积累的经验教训，成为思政课双线混融教学改革的动力。后疫情时代，思政课双线混融教学改革理应成为应对不确定时局的题中之义和必要举措。“‘大思政课’

* 鞠澈，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教育；王建新，华东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思想政治理论教育。

① 《教育部关于中央部门所属高校深化教育教学改革的指导意见》，2016年7月4日，http://www.moe.gov.cn/srcsite/A08/s7056/201607/t20160718_272133.html?from=timeline&isappinstalled=0。

② 《中共中央办公厅 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深化新时代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改革创新的若干意见〉》，2019年8月14日，http://www.gov.cn/zhengce/2019-08/14/content_5421252.htm。

我们要善用之，一定要跟现实结合起来。”^① 习近平总书记的这一指示，不仅为思政课改革创新提供了根本遵循，而且也是思政课双线混融教学改革的目标和方向。

一、“大思政课”视域下思政课双线混融教学的价值意蕴

（一）网络跨越时空调动大师资

思政课双线混融教学以互联网为纽带，联结调动多元育人主体协同参与思政课教学。互联网打破了时空局限性，为思政课教师跨越时空的备课和授课提供了平台。一方面，可以发挥新媒体平台优势，定期开展形式多样的集体备课。具体而言，一是能够发挥每个思政课教师的教学专长，互相学习和切磋以提升思政课教学水平；二是可以邀请全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和哲学社会科学学科等领域的学者参与思政课网络平台集体备课，通过专家阐释和互相讨论拓展思政课教学的理论深度；三是有利于思政课教师和专业课教师协同备课，强化思政课在各门课程中的价值导向，促进课程思政和思政课程同向同行；四是为大中小学思政课教师提供了沟通互动的契机，加强了不同学段之间的知识衔接。另一方面，有助于邀请社会各界典型人物和行业翘楚利用网络进行远程授课。大思政课着眼于鲜活的实践和生动的现实，让实践者讲实践更具真实性和吸引力，彰显了思政课课堂的活力和魅力，让思政课知识更好地入脑、入心。此外，思政课专职教师可以利用新媒体平台与兼职教师提前做好沟通，清晰地传达思政课课程大纲和授课要求，确保受邀教师能够将自己的现实经历讲授与思政课课程教学目标相融合。

（二）云端资源混融生成大资源

思政课双线混融教学，通过新媒体平台的信息化手段整合重构了海量的思政课教育资源，为“大思政课”的课程资源转化提供了技术支撑。首先，新媒体平台提供了丰富的思政课课程资源，有利于思政课教师通过信息化检索查询和使用。通过大数据技术对线下零散的和久远的历史遗址、故居和陵园等所蕴含的历史资源进行采集和凝练，形成区域性历史资源的数据库，实现了思政课所需的历史资源的开发和利用；同时，思政课课程资源还能够随数据变动而动态更新，教师既能获得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最新成果等前沿思想观点，也能获得反映中国精神和中国力量的鲜活的时代性资源。其次，信息技术能够抓取热点问题，精准定位学生关切的实践资源。人工智能技术能够收集分析学生网络点击和

^① 《“大思政课”我们要善用之（微镜头·习近平总书记两会“下团组”·两会现场观察）》，《人民日报》2021年3月7日。

浏览的行为数据,有助于思政课教师掌握学生的思想动态,发现学生的思想矛盾和现实关切,以此为根据选取实践资源。最后,多媒体技术可以具象化思政课程资源。通过文字表述的思政课事例不免“干巴巴的”,枯燥无味,难以迅速唤起学生的情感,而多媒体技术运用图片、视频和虚拟现实技术等能够将抽象的课程资源具体直观地呈现给学生,有助于思政课教师授课时将理论性和亲和力相统一,促进学生对思政课理论知识的接收和内化。

(三) 双线优势互补生成大教学

思政课双线混融教学将现代信息技术与思政课教学结合,将线下传统教学的优势和线上网络教学的优势融通,形成了以学生为中心的大教学。一方面,线上线下教学融合有助于对话教学的开展,拓展课堂交互的深度和广度。这是由于线上教学所使用的交流手段更加丰富,交流时间空间不受限制。一是教师与学生、学生与学生之间可以通过文字、图片、表情等不同的方式进行表达,不受已有框架束缚,减轻部分内向学生线下发言的压力,提升课堂参与度;同时,师生之间还可以就课堂中的问题和生活中的问题随时随地交流互动,有利于解决学生的思想困惑。二是线下教学在现实空间面对面的互动可以观察到双方真实的表情、神态、动作,强调现实中的温暖和关怀,助力双方生命的敞开,避免技术异化。另一方面,新技术赋能思政课课堂教学,增加与增强思政课课堂的丰富性和创造力。通过思政课网络学习平台可以实现线上知识点学习与线下讨论答疑,线下思政课教学能够更多地用于观点碰撞和思想交流,提高思政课效果,有助于发挥学生主体性。此外,通过虚拟仿真技术等能够创造真实可感的思政课教学情境,调动学生的多重感官,实现学生的全身心投入,在新颖的体验中传播思政课教学内容。

(四) 虚拟和现实结合形成大课堂

思政课双线混融教学引入先进的科技手段,通过人工智能技术营造多元拟态的思政课教学场景,增强学生的在场感,作为对思政课社会实践的有益补充。思政课双线混融教学在技术的帮助下贯通了虚拟和现实双重维度,形成沉浸式的大课堂。一方面,线下活动课程是思政课理论课程的延展,让学生在实地体验中加深认识。学生可以在历史纪念馆中追寻历史脉络、提升历史素养,在革命场馆中感受中国精神、坚定理想信念,在新企业、新社区感悟新时代成就、增强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同时,学生还可以身体力行参与各种实践,可以在校园活动中提升合作意识和探究能力,可以在志愿服务中增长见识、增强服务人民的意识,可以在企业实习中磨炼品质、培养责任担当意识。另一方面,通过虚拟现实技术可以还原现实中学生难以直接体验的情景,在身临其境中激发学生学习的积极性和主动性。场景营造能够全方位展示中国现代化的成果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旺盛

生命力,增强国家认同。比如,在虚拟场景中,学生可以与抗疫工作者同赴方舱,与航天员同游宇宙,与航拍机俯瞰港珠澳大桥,等等。此外,场景重现能够投射战火纷飞的革命年代和不屈不挠的英雄人物,加深学生对历史和革命的感悟,引导学生在革命英雄的感召下激昂青春,奋发向上。

二、“大思政课”视域下思政课双线混融教学的主要内容

“大思政课”的课程理念将思政课课堂的范围延伸到社会生活领域,要求调动学校、家庭和社会的全员育人力量,强调挖掘生活中的思政课课程资源,主张实施以学生为主体的教学模式,坚持“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铸魂育人”^①的价值导向。“大思政课”视域下的思政课双线混融教学改革要用大师资强化育人合力,用大资源转化课程资源,用大教学促进课堂参与,用大课堂引领社会实践。

(一) 用大师资强化育人合力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办好思想政治理论课关键在教师。”^②“大思政课”兼具理论的专业性和实践的广泛性,因此“大思政课”视域下思政课双线混融教学改革要充分发挥思政课专职教师、其他课程教师以及社会兼职教师的育人力量,用大师资强化育人合力。第一,要培育专业素质过硬、视野广阔、教学能力强的思政课专职教师队伍。思政课专职教师是思政课教学的主导力量,要树立“大思政”思维,成为学生成长成才道路上的引路人。思政课专职教师要立足马克思主义观点方法,将理论与实践融合,将历史与现实串联,将中国与世界贯通,用所学理论回应学生关切,用真理的力量观照学生思维,引导学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念。第二,要打造政治立场坚定、政治情怀深厚、政治信仰牢固的专业课教师队伍。习近平总书记提出:“其他各门课都要守好一段渠、种好责任田,使各类课程与思想政治理论课同向同行,形成协同效应。”^③专业课教师要挖掘课程中的思政元素,将核心价值观融入教学内容,加强人文关怀,潜移默化地影响学生的思想行为。第三,要建设身份多元、经验丰富的思政课兼职教师队伍。2020年1月,教育部发布的《新时代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规定》指出:“支持高等学校建立两院院士、国有企业领导等人士经常性进高校、上思政课讲台的长效机制。”^④思政课兼职教师要立足自身生活经历,结合思政

① 习近平:《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求是》2020年第17期。

② 习近平:《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求是》2020年第17期。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78页。

④ 《新时代高等学校思想政治理论课教师队伍建设规定》,2020年1月7日, http://www.moe.gov.cn/srcsite/A02/s5911/moe_621/202002/t20200207_418877.html。

课课程大纲讲好思政课,用实际生活经历感染学生,开拓学生的视野。

(二) 用大资源转化课程资源

“大思政课”具有纵横古今、贯通中西、理论与生活衔接的大视野,旨在为党育人、为国育才,培养格局高远、胸怀天下、勇于担当的社会主义建设者和接班人。当前的思政课教学对各类资源的汲取和使用尚不充分,因此“大思政课”视域下的双线混融教学改革要推进各类资源有效转化为课程资源。第一,要用好历史资源,彰显“大思政课”的根基和血脉。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在全社会广泛开展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宣传教育。”^①历史回答了我们从哪里来的问题,显现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遵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规律,蕴含着伟大的中国精神。为此,思政课教师要善用历史资源,要挖掘真实的历史事件、生动的历史范例和丰富的精神资源,在历史情境中把握历史规律,传承伟大精神,赓续红色血脉,引导青年树立“大历史观”。第二,要用好时代资源,将理论资源与现实资源相结合。当前思政课教学运用的部分事例缺乏新鲜感和时代性,思政课教师应该将理论与宏大的时代相结合,在“两个大局”背景下找寻体现中国之治的生动事例,用鲜活的现实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最新理论成果讲深刻、讲透彻。第三,要用好实践资源,回应学生关切。社会生活是“大思政课”的源泉,“社会不仅通过传递、通过沟通继续生存,而且简直可以说,社会在传递中、在沟通中生存”^②。思政课教师要抓住社会实践中出现的新问题,设置议题引导学生讨论,增强学生明辨是非的能力,解决学生实践中出现的困惑。

(三) 用大教学促进课堂参与

“大思政课”遵循改革创新的时代精神,肩负教育强国的时代使命。“大思政课”视域下的思政课双线混融教学改革要顺应智能化和网络化的发展趋势,改革传统教学方式,用大教学促进学生课堂参与。第一,要树立“以生为主”的育人观念。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思想政治工作从根本上说是做人的工作,必须围绕学生、关照学生、服务学生。”^③课程改革,观念先行,有什么样的观念就会有怎样的教学手段。传统的思政课教学观念以知识习得为主,教学手段单一,忽视学生的经验和体会。“以生为主”的育人观念聚焦学生的成长规律和情感需求,重视学生体验和实践,强调学生的“学”而不是教师的“教”,旨在促进学生全面发展。第二,要改变教师教学方式。互联网打破知识垄断,思政课知

① 习近平:《在党史学习教育动员大会上的讲话》,《求是》2021年第7期。

② [美]约翰·杜威:《民主主义与教育》,王承绪译,人民教育出版社2001年版,第9页。

③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77页。

识获取渠道更加多样,传统的讲授为主的教学方式难以满足新时代学生的学习需求。为了讲好新时代的“大思政课”,教师要以学生在学习和生活中的体验为中心,创新教学方式。思政课教师要将案例教学法、议题式教学法、讨论教学法等多种教学方法融会贯通,促进学生对知识的理解和掌握。同时,思政课教师要用好多媒体信息技术,将宏大时代主题下的学习情境用现代化的方式呈现,提高思政课课堂的抬头率和参与率。第三,要增强学生的自主学习意识。要营造开放互动的教学氛围,促进学生主动参与课堂探讨,激发学生学习兴趣。要运用自组织思维,鼓励学生组成学习小组,主动发现问题、分析问题、解决问题,发挥学生的自发性和创造性,提升学生自主、合作、探究的能力。

(四) 用大课堂引领社会实践

“大思政课”是新时代、新使命之下对当前思政课建设的补充和升华,着眼于思政课课程格局的扩展。社会生活是青年汲取养分的沃土,也是思政课格局拓宽的广阔天地。思政课走进社会生活不是空间上的简单位移,而是将波澜壮阔的现实融入思政课教学,关心学生的日常生活和心理世界。思政课要关注学生面临的现实考验,聚焦学生成长成才的需要,将吸引力和针对性相结合,成为既有趣味又有意义的时代大课。当前的思政课教学还存在理论和实践比重不合理、理论脱离现实等问题,“大思政课”视域下的思政课双线混融教学要“把思政小课堂同社会大课堂结合起来”^①,用植根于现实的大课堂引领学生的社会实践活动,让学生在实地研学和亲身实践中觉察时代之变和时代任务,感受人民主体的力量和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自觉投身伟大的新征程。为此,一方面,要用研学体验浸染学生的思想。要根据思政课教学内容和主题,组织学生进行不同的参观和体验,促使学生在校内参观和情境构建中接受熏陶、引发共鸣、增强认知;另一方面,要用社会实践改造学生的观念行为。习近平总书记引用“耳闻之不如目见之,目见之不如足践之,足践之不如手辨之”(《说苑·政理》)强调实践的重要性,思政课教师要引导学生通过亲身实践全方位、深刻地认识社会生活,淬炼品格,踔厉奋发,笃行不怠,超越“小我”,成就具有民族复兴远大理想的“大我”。

三、“大思政课”视域下思政课双线混融教学的优化路径

(一) 塑造师资联动的育人格局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建立党委统一领导、党政齐抓共管、有关部门各负其责、全社会协同配合的工作格局,推动形成全党全社会努力办好思政课、教师

^① 习近平:《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求是》2020年第17期。

认真讲好思政课、学生积极学好思政课的良好氛围。”^①“大思政课”是全员参与的系统性育人工程，要通过“智慧平台”将“许多力量融合为一个总的力量而产生的新力量”^②，塑造师资联动的育人格局。首先，要加强党的统一领导，健全顶层设计。要加强制度保障，配齐建好思政课教师队伍，完善思政课专职教师和兼职教师的任用标准，在选拔、培训、聘用思政课教师的过程中把好师德关和专业素质关，确保思政课教师的办公条件、职称评选、奖励晋升等得到保障。其次，要加强教师培训，提升教师育人素质。通过培训加强教师的网络育人素养，引导思政课教师通过新媒体平台建立常态化的沟通机制，通过教师之间沟通和教师与家长交流促进学校教育、家庭教育、社会教育联合，提升思政课的实效性。最后，运用信息技术完善思政课教师评价机制。要运用大数据对思政课教师备课、授课全过程进行动态分析，在突出教学实效的同时注重师德师风考核。

（二）建设互通共享的大资源库

“大思政课”视域下的思政课双线混融教学改革面临“两个大局”，贯通古今百年历史维度，连接不同学科、不同学段，要构建“从夯基垒台、立柱架梁到全面推进、积厚成势，再到系统集成、协同高效”^③的大资源库，促进思政课程资源共建共通共享。首先，要打破学科壁垒，推动其他学科资源与思政课课程资源融合。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科学研究范式正在发生深刻变革，学科交叉融合不断发展，科学技术和经济社会发展加速渗透融合。”^④既要将其他学科中涉及伦理价值、辩证思维、人文素养等的育人资源融入思政课课程资源，也要将思政课的价值性和政治性元素注入其他学科，拓宽思政课的外延，加强课程思政建设。其次，要贯通不同学段，实现大中小学思政课课程资源一体化建设。要运用信息技术和线下调研把握不同学段学生特点，有的放矢生成不同学段的适切性资源和各学段通用的共性资源。最后，要促进思政课资源共建共享，实现公平分配和优势互补。思政课程的课程资源区域和校际开发利用存在差异，各地区和学校的思政课资源和禀赋各具特色，要推动课程资源体系化建设，统筹各区域、各学校资源，通过互联网实现优质资源开放共享。

（三）构建深度融合的教学生态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运用新媒体新技术使工作活起来，推动思想政治工作传统优势同信息技术高度融合，增强时代感和吸引力。”^⑤“大思政课”视域下

① 习近平：《思政课是落实立德树人根本任务的关键课程》，《求是》2020年第17期。

②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5卷，人民出版社2009年版，第379页。

③ 《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人民出版社2021年版，第38页。

④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4卷，外文出版社2022年版，第196页。

⑤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78页。

的思政课双线混融教学改革不能割裂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要构建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深度融合的教学生态。首先，要做好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内容上的衔接工作。线上教学应该做好知识传授，通过基础知识呈现和拓展性知识的展示，加强学生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掌握。线下教学要聚焦研讨和实践，引导学生运用马克思主义理论解决实际问题，将书本理论转化为价值体系和行为准则，注重学生的品德养成和道德践行。其次，要做好清晰有序的课程安排。课前，教师要对讲解课程安排，明确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的任务，做好系统和完备的双线教学计划。课中，教师要将线上教学和线下教学有序对接，不能因为线上超前学习而课程倒挂。课后，教师要通过数据分析反馈做好查漏补缺，不断精进教学。最后，要做好技术支持。要完善信息化教学所需要的软、硬件设施，为条件困难学生配备必要的线上课程设备，确保双线混融教学的基础设施供给。此外，还要打造一支技术服务团队，在教师设备操作过程或者线上教学出现技术问题能够及时为他们提供帮助。

（四）打造三位一体的教学空间

“大思政课”视域下的思政课双线混融教学改革要打造思政小课堂、社会大课堂和网络云课堂三位一体的教学空间，做到习近平总书记说的“坚持把立德树人作为中心环节，把思想政治工作贯穿教育教学全过程，实现全程育人、全方位育人”^①。一方面，要将思政小课堂、社会大课堂和网络云课堂互相融通，实现全方位育人。要通过5G网络和虚拟现实技术打造虚实结合的智慧课堂，打破物理空间和虚拟空间的壁垒，360度全方位多层次地呈现教学场景。思政课课堂教学也要通过配备纳米黑板、IP对讲筒、AI摄像头等设备实现人机交互、师生交互和生生交互。同时，也要通过物联网联通思政课课堂和学生的日常生活，营造和谐有序、润物无声的育人环境氛围，推动思政课多维教学空间一体化，学生可以在任意时间、任意地点进行学习。另一方面，要提高教师媒介素养，增强教师双线混融教学胜任力。教师要掌握智能设备使用方法，增强智能思维，不断在三位一体的思政课教学空间中探究个性化、创新化的教学方案。此外，思政课教师要坚定马克思主义信仰，树立正确的技术价值观，做好价值引领，观照学生的精神世界，避免技术对思政课教学效果的遮蔽，有效发挥技术的正面优势。

^① 《习近平谈治国理政》第2卷，外文出版社2017年版，第376页。

Optimization of Dual-line Mixed Teaching on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i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Ju Che Wang Jianxin

Abstract: “Bi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is the fundamental follow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reform in the new era. Dual-line mixed teaching deeply integrates modern information technology with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s. It can utilize the network to mobilize teachers across time and space, generate large resources through the mixing and blending of cloud resources, create new teaching methods through the complementary advantages of dual-line, and form a large classroom through the combination of virtual reality, which conforms to the requirements of “Bi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for broad vision and large pattern. To optimize the dual-line mixed teaching of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Bi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we should use big teachers to strengthen the joint force of education, use big resources to transform course resources, use big teaching to promote classroom participation, and use big classes to lead social practice.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hape the teaching pattern of teachers’ linkage, build a large resource pool that is mutually shared, construct a deeply integrated teaching ecology, and create a trinity teaching space.

Keywords: Big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Course; Dual-line Mixed Teaching; Reform and Innovation

[责任编辑：鲁法芹]



动 态

建构汉语哲学视域下“马克思与孔夫子”的 融合会通

——首届“马克思哲学与中国思想”学术研讨会综述

刘冠呈*

【摘要】2022年7月21日，由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主办、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威海）协办的首届“马克思哲学与中国思想”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大学举行。30余位专家学者通过线上线下相结合的方式莅临会议，并围绕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发表学术见解。第一，中国道路的哲学反思。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是一条具备中国特殊性的现代化道路，故反思中国道路的特殊性，既需要马克思哲学的指导，又需要深入挖掘中国哲学的思想底蕴。第二，马儒会通的哲学基础。“两个结合”论断的提出，需要学术界更深入地回答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家哲学能否结合、何以结合的问题。第三，马克思与中西思想传统。马克思哲学具有多重渊源，其形成深受中西思想的多重影响。此外，挖掘马克思哲学与中西思想传统的关系，也是建构汉语哲学的重要任务。

【关键词】马克思哲学；中国思想；汉语哲学；融合；会通

最近几年，我国哲学界关于推动构建“汉语哲学”的相关讨论逐渐增多。“语言是存在的家”^①，每一种语言都构筑了自己语言范围内所属的概念框架，故“汉语哲学”也必定会为当代中国哲学发展找到自立于其上的舞台，助推当代中国哲学从“学徒状态”走向“自我主张”。^②那么，何为“汉语哲学”？刘森林认为：“汉语哲学是哲学发展到今天为了更好地解决当代中国哲学发展的深层问题所提出的一个新的解决方案，旨在反思具有明显西学特质、受到近代启蒙以来

* 刘冠呈，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马克思与中西思想传统。

① [德] 海德格尔：《论人道主义的书信》，孙周兴主编：《海德格尔选集》上卷，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版，第377页。

② 吴晓明：《论中国学术的自我主张》，《学术月刊》2012年第7期。

西学深度影响的哲学,使哲学进一步在中国生根,通过让哲学说汉语、追究汉语表达对哲学的内在影响、注重立足中国人的生活世界所提出和解决的问题指向,来回应人类普遍的哲学问题,特别是对现代性问题作出中国式哲学求解的一种最新努力。”^①也就是说,汉语哲学的根本任务就是让中国学者用自己的语言方式和思维方式来言说作为普遍性的现代性问题,同时来言说具备特殊性的中国式现代化问题。在推动“汉语哲学”深入发展的今天,中国学术界有义务、有责任让哲学言说汉语,并且在汉语哲学的视域下言说中国式现代化新道路,从而在新的时代条件下推动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创造性转化和创新性发展。另外,“汉语哲学”要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思想,积极吸收古今中外有益的思想,以我为主、为我所用,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不断谱写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新篇章。

因此,基于推动“汉语哲学”视域下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思想融会贯通的研究兴趣和需要,2022 年 7 月 21 日,由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主办、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威海)协办的首届“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思想”学术研讨会在山东大学召开。来自南开大学、复旦大学、上海师范大学、北京语言大学、深圳大学、山东大学,以及《文史哲》、《山东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和《周易研究》编辑部等多家单位的 30 余位学者莅临会议。与会学者就“马克思主义哲学与儒学会通的哲学基础”“现代性问题的克服:马克思与中国传统”“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哲学发生与思想特质”“历史唯物主义与中国无政府主义”“辩证法:中国与西方”以及其他相关论题展开了讨论,彰显了山东大学在建构中国自主知识体系上的学术自觉和实践自觉。

一、中国式现代化的学理基础

党的二十大报告强调:“中国式现代化,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现代化,既有各国现代化的共同特征,更有基于自己国情的中国特色。”^②习近平总书记系统论述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基本规定和本质要求,同时促使与会学者进一步加强对中国式现代化之学理意蕴的深入反思。

南开大学哲学院王南湜提出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要求中国哲学的伟大复兴,而中国哲学的伟大复兴必须立足于“中国”与“当代”这两个关键词,即以中国精神的独特性特征应对现代性问题。他认为,人类历史上处理现代性问题的典范是康德哲学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康德哲学的革命性意义在于看到了现代哲学的核心问

^① 刘森林:《汉语哲学与新文科:一种中国性的建构》,《新文科理论与实践》2022 年第 2 期。

^② 习近平:《高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旗帜 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而团结奋斗——在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上的报告》,人民出版社 2022 年版,第 22 页。

题,亦即“人”的有限性问题,故人的能动性只能是有限的能动性;与康德的悲观不同,马克思则指出了人类存在的历史性,表明了人的活动是自由自觉的对象性活动,是按照“美”的规律所进行的创造性活动;近代以来,在应对西方哲学传入所造成的中国精神危机上,牟宗三的哲学是最具代表性的,现代新儒家的代表人物立足于现代世界重释传统儒家思想,使儒学获得了现代性的意义。因此,当代中国哲学的重建需要偕马克思来与以康德和牟宗三为代表的哲学思想进行对话,不能忽视上述任何一种思想的影响。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刘森林从罗素与马克思的自由观入手,探讨了“中国式现代化的自由追求”这一问题。他认为,在罗素看来,中国要追求现代化的自由,需要伦理与经济并重的方案,即坚持经济发展与伦理道德的统一,这样既能实现社会进步,又能避免虚无主义。而马克思在对中国问题的论述中明显不强调道德维度。在马克思看来,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中国只有尽快实现现代化,才能为更多的人提供自由的机会。因此,罗素与马克思关于“中国到自由之路”的方案似乎是不完全一致的。那么,如何实现马克思与罗素的统一?其实,这里首先要对“自由”作出界定。刘森林认为,“自由”有两重含义:在经济社会意义上,自由指“文明社会对所有个人的馈赠”,即确保个人能够激发创造性活力;在个人意义上,自由是“对自我生活的设计与追求”,即惯常所理解的个人自由。在这两种界定中,后者应以前者为基础。如果从这一解释出发去看待中国思想传统,那么儒家一定有一种自由追求,且这种自由追求与西方启蒙哲学以来所理解的自由是不同的。而这一眼光也非常能够融合马克思与罗素对中国自由问题的态度。不过,应当指出的是,二者对中国现代化与自由问题的定位是不同的。马克思解决的是“当务之急”,亟须中国完成现代化转型,并不是未来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而罗素提供的是“未来方案”,在未来社会中实现经济与伦理的共生。因此可以说,罗素为中国指出的目标,与马克思共产主义社会的目标是契合的,二者并不矛盾,且在中国传统自由观的框架下有相互统一的可能。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威海)焦佩从海外中国学的研究视角出发,运用KH Coder文本处理软件,探究了美国左翼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研究与关注。她指出,近年来,在次贷危机和新冠肺炎疫情影响下,美国左翼学者一方面致力于批判资本主义制度,另一方面也在积极探索资本主义的替代性方案,因此尤其对中国的国家治理、外交战略和国际地位等问题有热切的关注。国家治理方面,美国左翼关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在经济改革、政治建设、生态文明建设与抗击新冠肺炎疫情中的表现;外交战略方面,美国左翼围绕中美竞争的性质和前景展开讨论,并对中美竞争的影响和原因展开研究国际地位方面,美国左翼关注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国际影响,特别是对美国主导的现行国际秩序的影响。虽然美国左翼对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研究成果较丰富,不过仍需

指出,这些研究主题之间的系统性不强,而由于立场原因,部分研究的观点失之偏颇。

南开大学哲学院博士研究生刘长春从儒家哲学中“成德”问题的转型出发,探索中国早期的现代性问题。刘长春认为,中国社会在经历唐宋转型之时,儒家学术则历经了以“四书升格运动”为代表的“汉宋之变”。在宋学学术中,人之成德的方式由“行礼”变为“循理”,而“理”的思想蕴含着中国早期的现代性萌芽。在刘长春看来,虽然中国古代没有催生出资本主义,但是在学术史上,宋学完全可以视为早期现代性的学术。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胡贯周从今天的“儒学重新复兴”这一现象出发,评析了黑格尔的中国历史文化观。在黑格尔看来,国家是理性的显现。而对于中国来说,黑格尔则认为中国没有历史,因此也不是理性的展现。所以,黑格尔的国家学说为西方殖民主义提供了理论基础,同时也是近代中国知识分子反思中国问题的基本范式。但是,黑格尔的历史观完全没有意识到中国的现代化转型。而马克思的“社会实践”观既能够弥补黑格尔用“绝对精神”解读历史的不足,同时也能对中国儒学在新时代的复兴作出合理的阐释。故而,他认为,儒学的发展是实践发展的要求,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发展的必由之路,只有在唯物史观视域下才能对儒学复兴现象作出有效的回答。

二、儒马会通的哲学反思

推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新时代哲学社会科学工作的重中之重。儒学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深深镌刻在中国人的言行方式之中。因此,探索马克思主义与儒学思想的会通,既具有十分重要的学理价值,也具有十分重大的现实意义。

上海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研究中心特聘教授张允熠指出了马克思主义来源中的儒家思想元素。他首先区分了列宁关于马克思主义来源说的“直接来源”与“间接来源”。“直接来源”指“马克思主义的三个理论来源和三个组成部分”,“间接来源”指的是“马克思主义吸收和改造了两千多年来人类思想和文化发展中一切有价值的东西”。这两种说法并不矛盾。从这一思路出发,张允熠揭示了马克思主义形成过程中的中国思想元素。首先,就“间接来源”而言,马克思主义虽然诞生于欧洲思想文化背景之下,但是根据诸多中西方学者的研究,欧洲的近代哲学尤其是启蒙哲学却深受中国思想的影响,故马克思主义的来源中存有儒学元素。其次,从“直接来源”中也能找到马克思主义的中国思想来源。在哲学中,孔子的“理性”观——虽然是一种“实践理性”——受到西方唯理论思想家的极大重视,西方的“理性时代”也与中国哲学的传入密不可分;在科学社会主义中,中国儒家的“大同”思想可谓“古代原始空想社会

主义”，后经圣西门等“近代欧洲空想主义”发展至马克思、恩格斯的“科学社会主义”，这是一个否定之否定的过程；在政治经济学中，马克思受到斯密“自由市场”理论和魁奈“重农主义”理论影响，而斯密又是儒家“无为而治”思想的拥趸，魁奈则以中国的重农经济制度为榜样。

北京语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杜运辉认为，张申府是20世纪中国最具原创性的哲学家之一，他倡导中国文化的“成年态度”，不仅要求中国文化“自己做得主宰”，而且要求同情式地理解中国文化、西方文化和马克思主义等一切人类思想传统。首先，在张申府看来，中国思想传统的精华是以“易”“生”“仁”为核心的唯物辩证法，而且他从辩证唯物论的角度探寻中国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一致性；其次，他对西方思想采取辩证否定的态度，虽肯定西方思想的贡献，但并不认为其达到了文明的极点；最后，对于马克思主义，指出“实而活”是唯物辩证法的精髓，并十分重视列宁的思想创新。在这种思想基础上，张申府提出了合孔子、罗素、列宁哲学为一体的“三流合一”的新哲学，认为此三者的思想精华能够在映现人生本来面目与满足人类共同生活需要的过程中相互补充。张申府将中、西、马有机统一的思想，对于我们今天建立人类文明新形态与推动“第三次百家争鸣”具有现实的启示意义。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何中华指出，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相遇具有历史的必然性。从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来看，马克思的全球视野让他不可能忽略东方社会；从中国社会本身的历史际遇来看，近代中国既无法走西方道路，又不能重蹈覆辙，而是走由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着力寻求的“第三条道路”。但是，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会通存在一定的纠结。在时代性维度上，马克思主义是现代思想，儒学是传统思想；在民族性维度上，马克思主义是西学，儒学是中学。但这种纠结只是直观的、表面化的，从本质的深层意义上说，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会通是完全可能的。从时代性维度上讲，马克思、恩格斯的后现代性是对资本主义现代化釜底抽薪式的颠覆，而辩证法则要求在高级阶段要向前现代完成“复归”，因而马克思主义与前现代的儒学具有会通的可能；从民族性维度上讲，中国传统思想与西方欧陆哲学关系颇深，但与英美分析哲学的形态并不一致，而马克思主义又是欧洲大陆的产物，这不得不影响到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关系，比如二者在“实践观”“天人合一”“大同愿景”等思想上就具有内在的亲合力。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冯波从梁漱溟的“儒家马克思主义”观出发，探寻梁漱溟对中国现代化问题的求解之道。在早期梁漱溟的文化观中，中国文化处于“两难”困境，中国文化虽在路向上较西方文化“早熟”，但是由于缺少西方文化中重视“人对物”的一面，中国文化无法适应现代社会的发展，因此中国文化必须实现现代化，走西方文化的“第一路向”。那么，中国文化如何实现现代化？梁漱溟认为，既不能走中西文化调和的路子，也不能走印度文化“取消问题”的路子，前途则是将马克思主义与中国文化相结合，即晚期梁漱溟的

“儒家马克思主义”说。那么，儒家文化与马克思主义为何能够会通？在晚期梁漱溟看来，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同属文化的“第二路向”，而且马克思主义是从“第一路向”中正常发展出来的“第二路向”，既保留了“第一路向”的积极因素，又不像中国文化那么早熟。此外，马克思主义共产主义的社会理想与儒家的“大同”观念，在伦理方面具有互补性。因此，重视伦理本位的中国文化，在理解共产主义时具有启发意义。马克思主义既可以弥补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对于团体生活的缺陷，又可以消除个人本位引发的社会纷争，因此还具有规范性意义。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徐瑜霞从对“物”的物化批判这一问题出发，探索了马克思哲学与阳明心学融合会通的可能性。在历史唯物主义的视域下，“物”的生成（或“成物”）具有规范性路向，而致力于“成物”的“事化”（Versachlichung）具有彰显“物”意义世界之开启，并最终致力于达成每个人自由而全面发展的历史进步意义。但是，在理解“事化”的同时，需要指出“物化”（Verdinglichung）的概念，而“物化”则表现出“成物”的虚假性，也表现出主体性建构的无法实现。从上述阐述中可以看出，目前需要吁求一种包含“人”与“物”的新的交互方式，而阳明心学对程朱理学由“格物”到“成物”之逻辑之惑的洞察，在心学上通过“事”（Sache）关联“心”与“物”，从而担保了“格物”过程中“己物”的意义。徐瑜霞认为，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对“物”的物化批判，与阳明心学思考“格物”与“成物”的思想具有同构性，即在致思路径上，二者都强调“物”之于“人”的奠基性作用。当然，二者之间也存在不可忽视的差异。首先，由于阳明心学未经现代性的洗礼，心学的“事”未能涵盖历史唯物主义的“事化”所表征的现代性内容；其次，由于心学不以政治经济学为切入点，故阳明心学对“物”的物化批判不如历史唯物主义深刻。

深圳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博士后张春光从“天人合一”这一生态文明建构的议题出发，探索马克思主义与儒家思想会通的可能性。他指出，新文化运动伊始，中国的学术重心从传统中国学术转到马克思主义学术，关于“天人合一”的观点亦即从传统《周易》的“天人合一”转向恩格斯《自然辩证法》的“人与自然相统一”。而这种转化的可能性，则要从《周易》与《自然辩证法》的异同点中找寻。在他看来，《周易》的“天人合一”模式不仅凸显了轴心时代的伦理宗教自然观，而且遗留了原始思维的特征；《自然辩证法》“人与自然相统一”模式则凸显了科学文明时代的自然主义观，重视经验科学。当然，二者都是以辩证视角看待问题，且都具有概念实体效力，前者通过道德哲学为人提供精神给养，而后者通过生态科学为人提供知识力量。最后，他指出，“天人合一”这一命题的现代转化意味着，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会通需要在马克思主义的框架下进行，中国传统哲学必须在与辩证唯物主义的对话中收获现代主体的认同，而且马克思主义与儒学会通的现实功力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故需要在现代文化实践中实现马克思主义与儒学的耦合。

三、马克思与中西思想传统的当代诠释

马克思哲学诞生于 19 世纪中叶的欧洲，是 170 多年来影响世界最为深远的思想体系；中国思想是中华民族 5000 多年的内在积淀，西方思想同样也是西方民族的精神营养。作为加快构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建构中国自主的知识体系的必然要求，推动研究马克思哲学与中西思想传统，促进以上思想在新时代开花、结果，是学术界的重大课题，同时也必将为 21 世纪“汉语哲学”的构建与发展提供有益支持。

复旦大学哲学学院吴晓明试图从中西哲学各立于其上的根本入手，探索中西哲学的根本差别，即中西哲学与形而上学的各自关系。正如怀特海所说，西方哲学只不过是柏拉图哲学的系列注脚，因此西方哲学向来都是在形而上学之内的，西方哲学的本质就是形而上学（柏拉图主义）。形而上学要求将超感性世界与感性世界对立起来，指认“真理”“实在”等范畴在超感性世界之中，而感性世界之中的东西，只是因为分有超感性世界之中的观念才有其真实性可言。简单来说，形而上学就集中表现在柏拉图的“理念论”的建制之中。那么，如何理解中国哲学与形而上学的关系？在他看来，无论是儒家、道家还是佛家，都选择了与西方形而上学不同的道路，即遏制、拒绝感性世界与超感性世界的二元分立。抑或说，中国的“形而上学”同时也是“形而下学”。但是，中国哲学的这一定位并不意味着它不能理解“形而上”的层面。强调道器不割、体用不二，“形上之道”与“形下之气”和合共生，是中国哲学最典型的特征。因此，若从形而上学这一建制评判中西哲学孰优孰劣，从一开始就已误入歧途。

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威海）马秋丽从方法论的角度考察了孟子和荀子王霸思想的异同点。首先，从“是”与“应当”的角度出发，孟子更关注王霸之道的道德层面，推崇王道，贬低霸道；荀子在这方面与孔子更相似，对待霸道既有道德上的评判，亦有事功上的肯定，既推崇王道，也肯定霸道，从而避免“危亡之道”。其次，在运用文献的方式上，孟子强调“尽信书则不如无书”，从维护孔子儒家正统的思想出发，在王霸问题上反对法家的暴力思想，主张仁心与道德心的王道仁政；而荀子则不仅对儒家思想进行了批判性扬弃，而且也吸收了其他诸子的思想精华，根据时代的需要，在王霸问题上既提倡王道，也不排斥霸道，从而为中国的大一统提供了思想基础。最后，在思维方式上，孟子提出王道、霸道二元分立的立场，凸显“贵王贱霸”；荀子则主张“王道”、“霸道”与“危亡之道”的三分法，不仅不排斥霸道，还保留了对王道的至高追求，从而避免危亡。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姜涌对马克思《莱茵报》时期的“正义”诉求做了政治哲学诠释。1843 年，马克思痛苦于解决“物质利益难题”，彼时他认

为人的利益问题是人生存与生活于社会共同体中的基础性问题，因此人的利益神圣不可侵犯。而在普鲁士社会，利益只是上层统治阶级的利益，底层民众甚至连拾捡枯树枝的权利也无法享有，这就是当时的社会不正义现象。马克思遂站在黑格尔理性主义国家观的立场上对“物质利益难题”中的“正义”诉求进行讨论。姜涌认为，马克思对“物质利益发表意见的难事”，促使马克思看到了普鲁士国家中“利益”这一客观社会关系的重要作用，从而不仅为社会的分配正义创造了理论基础，而且开启了唯物史观的大门。

山东大学儒学高等研究院暨《文史哲》编辑部邹晓东对哲学史上关于“辩证法”问题的讨论做了断面式梳理，以此探索“辩证法靠什么成为有效的对话求知机制”。首先，回到辩证法的原始定义，在柏拉图的《理想国》中，辩证法是向普遍定义的提升，即追求“至善”。在柏拉图看来，辩证法不是数学问题，而是在对话中、在反驳中提升自己原有的命题。那么，这种方法是否有效？答案是否定的，这种“对反”的方式恰恰容易陷入相对主义和虚无主义，这在赫拉克利特寻求玩世不恭的对立流变论和皮罗寻求心安理得的怀疑主义中能够明显看出。从中世纪开始，信仰认识论出场，而这种信仰认识论是作为“绝对悖论”出现的，这一逻辑要求在启示的引导下不断自我否定，从而达到新的自我。而中国儒家哲学中也有一种对话的认识论，即《论语》式的对话。只不过，儒家的对话是由权威主导的，并不是苏格拉底式的探索对话。如果在现代社会中采用苏格拉底式的对话方式，恐千人千议，不能很好地解决问题。而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民主集中制（以毛泽东为例），既做到了《论语》式的权威传授，也做到了苏格拉底式的聆听转化，民主集中制对苏格拉底辩证法和儒家辩证法的结合，造就了马克思主义认识论的典范。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单提平认为，马克思主义之所以能够在中国取得成功，关键就在于马克思主义能够与中国传统思想达成内在默契并能够互相贯通。由此，单提平梳理了新启蒙运动之后从张申府、陈伯达至毛泽东的一条线索，并认为这条线索对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具有重大意义。张申府作为中国共产党的创立者之一，虽负气退党，但仍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张申府认为，他自己最重要的哲学贡献就在于把马克思、孔子与罗素的思想融为一体。也就是说，张申府既不认同全盘西化论，也不与文化保守主义者一致，而是致力于将中西方思想的精华融会为新哲学。而在这之后，陈伯达也正是借助了张申府的这一思想资源展开了自己的思考。在《思想无罪》中，陈伯达揭示了对中国文化传统的批判继承态度，也无疑预示了未来毛泽东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观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化前景。抗日战争时期，毛泽东正式向全党提出“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这一重大理论命题，不仅巩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指导地位，而且十分重视中国思想传统的资源，实现了对儒家思想的批判继承，既“打倒了孔家店”，又“救出了孔夫子”。

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博士研究生刘冠呈对中国近代的无政府个人主义思潮进行了评析。他首先区分了无政府主义的三种样态——无政府共产主义、无政府个人主义和无政府工团主义，而无政府个人主义在近代中国的主要代表是朱谦之先生。朱谦之的无政府个人主义吸取了麦克斯·施蒂纳的思想，并以唯名论为主要特征，强调个人的绝对自由与解放。但是，这样的一种无政府主义思路最终将会陷入审美虚无主义的陷阱之中。

正如山东大学哲学与社会发展学院刘陆鹏教授在会议闭幕致辞中所讲的那样，中国思想不仅要与马克思主义融合，还要与市场经济融合，这是一种双重激荡。中国共产党人意识到，改革开放和市场经济是中国社会发展不可逾越的阶段，但是在这个过程中也同时带来了社会问题和思想问题，因此“马克思哲学与中国思想”就不仅是一个理论问题，而且是一个实践问题。学界要将马克思哲学与中国思想融合重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着力于建构新的理论形态，为中国特色哲学社会科学的发展贡献智慧与力量。

Construction of the Integration of“Marx and Confucius”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hinese-Language Philosophy

—Summary of the First Academic Symposium on“Marxist Philosophy and Chinese Thought”

Liu Guancheng

Abstract: On July 21, 2022, the first academic symposium on “Marxist Philosophy and Chinese Thought” was held in Shandong University, sponsored by the School of Philosophy and Social Development and co-organized by the School of Marxism (Weihai). More than 30 experts and scholars attended the conference, and expressed their academic opinions on the following issues. First, the philosophical reflection of the Chinese road. The new road of Chinese path to modernization is a modernization road with Chinese particularity. Therefore, to reflect on the particularity of the Chinese road, we need to dig into the Chinese philosophy of the Chinese road. Second, the philosophical basis of combination between Confucianism and Marxism. The proposition of “Two Combinations” requires academic circles to explore the philosophical background

of the combination of Marxism and Confucianism more deeply. Third, Marx and the tradition of Chinese and Western thoughts. Marxist philosophy has multiple origins, and its formation is deeply influenced by Chinese and Western thoughts. Excavat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Marxist philosophy and Chinese and Western thoughts traditions is an important task to construct Chinese-Language philosophy.

Keywords: Marxist Philosophy; Chinese Thought; Chinese-Language Philosophy; Integration; Meention

[责任编辑: 李谷悦]

论点摘编

一 马克思主义视域下文明的进步与先进性探讨

程恩富 戴圣鹏

人类文明历经奴隶文明、封建文明、资本主义文明与社会主义文明的经济根源在于以生产工具为代表的社会生产力的发展状况。从文明进步与社会生产力的关系来分析,文明进步必然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并往往会通过文化进步来表现。从文明进步与社会各领域发展的关系来分析,文明进步可以包括物质文明、经济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军事文明等各领域的进步。文明是在不同力量所形成的合力的最终推动下不断演化和进步的。其中,人的本质力量的发展是最为根本与最为深层的推动力量。从历史演进的维度来讲,文明进步表现为先进文明取代落后文明。对于不同文明发展形态而言,其内部本身也存在发达与不发达之分以及相对先进与相对落后之别。文明是先进或落后需要放到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去认识。关于当今世界主要文明形态的先进程度,要历史地辩证地去把握与认识。有先进因素的文明不一定是先进文明,但先进文明一定有其先进的地方。当今世界主要冲突的实质是霸权主义、新帝国主义国家与各被压迫、被制裁国家和民族之间的矛盾和冲突。客观分析来说,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形成的人类文明新形态相对来说是最为先进的。在守正创新中国式现代化道路上,以生产力较快发展为核心的物质文明、以公有制主体为核心的经济文明、以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为核心的政治文明、以集体主义为核心的精神文明、以人民和谐为核心的社会文明、以自我修复改善为核心的生态文明、以国防自卫自强为核心的军事文明,充分彰显了21世纪的人类文明新形态,也是当今世界最具先进性的人类文明发展形态。

(摘自《文化软实力》2022年第4期)

二 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历史考察与时代要求

王 易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指出：“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二十一世纪马克思主义，是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时代精华，实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新的飞跃。”这一论断科学概括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理论内涵和重大意义，标识了它在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中华文化发展史上的重要地位，重申了我们党不仅不能丢了马克思主义“老祖宗”，而且也不能丢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根与脉”。从这一科学论断出发，系统总结中国共产党百余年来就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取得的理论成果与实践经验，是新时代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应有之义。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创新性体现，其既利于推进马克思主义在中国落地生根，又利于激活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命力。作为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忠实传承者和弘扬者，中国共产党在推动马克思主义中国化进程中科学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契合点，不断推进二者相结合并产生了丰硕的理论成果。新时代继续推进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一要坚持马克思主义“主导意识”地位，把握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方向；二要挖掘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要义，明确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内容；三要聚焦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双创”发展，探索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的路径。

（摘自《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3期）

三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创造与世界意义

孙熙国 陈绍辉

人类文明新形态的理论是以习近平同志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对当代中

国马克思主义、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重大贡献。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我们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推动物质文明、政治文明、精神文明、社会文明、生态文明协调发展，创造了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以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为价值旨归的文明形态，这一新文明形态根源于马克思主义“人的自由全面发展”的科学理论，厚植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的伟大实践，内嵌了中华文明民胞物与、协和万邦、天下大同的文化基因，氤氲于“为世界进文明，为人类造幸福”的博大情怀，是社会主义五大文明相济相生、有机统一的文明形态，既是“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唯一正确道路”，也是实现为人民谋幸福、为民族谋复兴、为世界谋大同的理想图景的人间正道。党中央团结带领人民创造的人类文明新形态是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解决中国问题和世界问题的创造，是马克思主义的时代精华，也是坚守中华文化立场解决中国问题的伟大创造，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时代精华。人类文明新形态是促进人的自由全面发展、实现人民美好生活向往的文明，是“五位一体”总体布局整体推进、协调发展的文明，是占领了真理和道义制高点的文明。人类文明新形态的伟大创造充分彰显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与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科学性与人民性，深刻体现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真理力量与道义力量，是人类文明发展的必由之路，具有重要的世界意义。

（摘自《中国社会科学》2022 年第 12 期）

四 深刻理解“两个确立”的历史必然性

陈 理

党的二十大明确指出：“‘两个确立’是党在新时代取得的重大政治成果，是推动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的决定性因素”，并强调“新时代新征程上把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推向前进，最紧要的是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这是深刻总结党的十九大以来五年工作和新时代十年伟大变革作出的重大政治论断，是学习领会贯彻党的二十大精神要聚焦的核心内容。“两个确立”的历史必然性，一是来源于马克思主义深厚理论渊源和国际共产主义运动实践。“两个确立”的提出不是偶然的，而是有着深刻的理论和实践依据。我们从马克思恩格斯经典著作和马克思恩格斯领导的国际共产主义运动伟大实践中，可以深切感受到“两个确立”深厚的理论渊源。二是来源于我们党波澜壮阔的百年奋斗历程。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历程波澜壮阔，“两个确立”是

从党的百年奋斗中得出的必然结论。回顾我们党的历史可以清楚地看到,不断把党的创新理论成果写在党的旗帜上,加强党的集中统一领导,维护党的领导核心,保持全党思想上的统一、政治上的团结、行动上的一致,始终是我们党坚持的一个重大政治原则和显著优势,是党和人民事业战胜各种艰难险阻、不断发展壮大的关键所在。三是来源于新时代的历史性成就和历史性变革伟大实践。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深刻总结党的百年奋斗历史经验,从新的实际出发,围绕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提出一系列原创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把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维护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摆在更加突出的重要位置,在认识上有深化、实践上有新进展、制度上更加完善,确保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确保党发挥总揽全局、协调各方的领导核心作用,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最根本政治保证,充分彰显“两个确立”对新时代党和国家事业发展、对推动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进程的决定性意义。总而言之,深刻理解“两个确立”的历史必然性,对于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做到“两个维护”的思想自觉、政治自觉、行动自觉,为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而团结奋斗,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摘自《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22年第6期)

五 “两个结合”的历史贡献及实践要求

徐奉臻

“坚持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结合”体现了内容与方法的辩证统一、认识论与实践论的辩证统一,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原创理论。“两个结合”创新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话语体系,形成了“一体三翼”的叙事框架和“一本两基”的内在逻辑,拓展了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时代化的历史深度。用马克思主义立场、观点和方法解决社会主要矛盾,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的生发逻辑。马克思主义同中国具体实际的契合机制,一旦与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伟大社会革命相联系,就会释放出改变中国的磅礴力量。马克思主义既激活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历史变迁的内在潜力,也为理性认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提供了科学的方法论。马克思主义同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相融通,产生了推动伟大社会革命的合力动能。基于“一对二双向互化”和“三翼互促”的历史原则,强化“两个结合”的整体性、系统性和

协调性，其理论意义和实践意义极为重大。一方面，将从理论层面实现“继承与发展马克思主义的辩证统一”“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创造性转化与创新性发展的辩证统一”“推进马克思主义时代化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现代化的辩证统一”；另一方面，将从实践层面推动马克思主义的“原生版”转化为“中国版”、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古代版”转化为“当代版”，在不断回答世界之问、中国之问、时代之问和人民之问的过程中，揭示马克思主义和中国互不辜负之“道”，是践行“两个结合”、继续发展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和 21 世纪马克思主义的实践要求。

（摘自《哲学动态》2022 年第 11 期）

六 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思想的“变”与“不变”

张国祚 李 哲

文化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灵魂所在，事关国家强弱、民族兴衰。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说：“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强盛，总是以文化兴盛为支撑的，中华民族伟大复兴需要以中华文化发展繁荣为条件；要不断丰富人民精神世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不断增强文化整体实力和竞争力，朝着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的目标不断前进。”“文化兴则国运兴，文化强则民族强，没有高度的文化自信和繁荣兴盛，就没有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中国共产党自成立以来，在追求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历史进程中，始终高度重视文化建设。在其百年奋斗中，文化建设在发展进程中有其必须有的“变”，也有其必须坚守的“不变”。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建设思想伴随革命、建设和改革开放的伟大实践而不断发展，历经“文化翻身”“文化改造”“文化反思”到“文化自信”的不断跃升。文化翻身是新民主主义革命必须完成的艰巨任务；文化改造是社会主义改造题中应有之义；文化反思是改革开放拨乱反正的思想先导；文化自信是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蓬勃发展的底气。这些跃升，深刻反映了不断进步的社会存在对社会意识的持续影响，深刻反映了发展变化着的社会实践对文化建设提出的新要求，使中国共产党的文化建设思想既有形式的变化，也有内涵的变化。但这些与时俱进的发展变化并没有背离中国共产党文化建设的核心思想，在形式和内容变化中，始终坚守着一些不变的原则：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的根本方向没有变，以中国共产党为领导的根本保障没有变，以“人民为中心”的根本宗旨没有变，以实事求是为原则的根本方法没有变。

〔摘自《湖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22 年第 6 期〕

七 唯物史观视野下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坐标与世界意义

黄建军

马克思在唯物史观的理论逻辑中揭示了人类现代化生成的“动力源”，全面诊断了西方现代化的“问题因”和“矛盾链”，以人类社会发展规律为依据建构了超越西方现代化的新道路，即“非资本主义的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就是马克思所设想的“非资本主义现代化”道路的成功运用，它构成了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原点。由此展开，中国式现代化的纵向历史坐标表现为中国共产党独立自主探索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历史过程。在这一过程中，中国所经历的现代化形态在历史时序上可分为两个完全不同的历史阶段：一是早期现代化阶段，即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以被迫卷入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体系为标志的“被动型”现代化，这种现代化肇始于洋务运动，可以看作中国近代的“资本主义化”；二是中国共产党领导的独立自主的现代化，即新民主主义革命胜利后，以主动建设“四个现代化”为标志，进而开创“中国式现代化”的历史过程。中国式现代化的横向历史坐标体现为中国共产党秉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超越了西方以资本为中心的“串联式”现代化模式，成功走出了一条复合型的“并联式”现代化新道路。在世界历史坐标中，中国式现代化开创了后发国家走向现代化的中国方案，创造了人类文明新形态，对资本主义文明具有超越性意义，对发展中国家具有借鉴作用，拓宽了科学社会主义实践的场域。所以，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现代化道路具有鲜明的独特性，它“不是简单延续我国历史文化的母版，不是简单套用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设想的模板，不是其他国家社会主义实践的再版，也不是国外现代化发展的翻版”。

（摘自《马克思主义研究》2022年第6期）

八 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一种新型现代发展理论

乔茂林

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提出以前，围绕现代人类发展面临的种种难题，已经形成了多种现代发展理论，并且在不同程度上解决了相应的问题。现代世界

对理解文明史的最大贡献，就在于塑造了“进步史观”或曰“发展史观”。它取“循环史观”“复古史观”“唯神史观”而代之，占据了文明史理解的主流地位。在“发展史观”的视域下，历史的起点被视为人类征服自然实现自由的开端，人类文明史被解读为一部有目标有方向的历史。现代发展理论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皆处于“发展史观”的光照之下。现代发展理论是现代世界发展的理论表征，现代化理论、依附理论、世界体系理论和新自由主义发展理论分别以解决发展中国家、拉美国家、现代世界体系和发达国家的发展问题为直接理论目的。为人类谋划未来的深邃思想均秉承现代世界所塑造的“发展史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亦如此。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主张以发展为第一要务，其思想内涵可以阐释为和平发展论、安全发展论、共同发展论、多元发展论和永续发展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对现代世界新挑战的理解深度，对现代世界新问题根源的把握深度，对现代世界向何处发展的解答深度，皆为现代发展理论所不及。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超越了支配现代发展理论的思维方式，即西方文明中心论、本国发展与世界发展冲突论和最为关键的资本逻辑主导论，准确诊断了现代世界的新挑战及其根源，深刻回答了“人类向何处去”的时代问题，为有力推动世界发展提供了中国方案，从而形成了一种新型现代发展理论。

（摘自《哲学研究》2022年第9期）

九 中华民族发展史中的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

刘同舫

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实践之所以具有“里程碑意义”，归根到底是因为“中国化时代化的马克思主义行”。探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需要将其与党史、新中国史、改革开放史、社会主义发展史和中华民族发展史联系起来予以考察。党的二十大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作为大会主题的重要组成部分，庄严宣告今后一段时间中国共产党的中心任务是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在民族复兴征程上，以中华民族发展史的宏大历史视域考察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时代价值，把握中华民族伟大复兴历史进程和马克思主义的双向互动，进而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创新，具有特殊的理论和现实意义。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中推进马克思主义的创新和发展，需要明确和把握好中华民族发展史、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三者之间的关系。中华民族发展史作为特定的历史范畴具有多重内涵，在其宏大视域中，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这一中国近代以来全部历史的主题

得以凸显；马克思主义尤其是中国化时代化马克思主义在中华民族发展史上具有重大的现实指导意义，一方面实现民族复兴需要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以及中国化马克思主义的历史性开启，而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成果为民族复兴指引方向；另一方面，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是支撑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真理力量，在全面推进民族复兴的进程以实现自身的创新发展。新时代我们需要在中华民族发展的历史和现实中，自觉开掘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真理伟力，充分彰显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光明前景。

（摘自《思想理论教育导刊》2022年第11期）

十 新时代基于意识形态维度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析论

孙绍勇

从内涵和外延来看，文化是意识形态呈现的重要载体和形式，而意识形态隶属于精神文化，是文化的核心层。由此来看，一方面，意识形态与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有着内在的逻辑同构性，坚定和增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不容忽视意识形态领域的复杂形势。另一方面，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的坚定和增强对于提升社会主义意识形态的引领力、凝聚力有着同频共振的现实意义。进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代，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把意识形态建设与坚定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提到了新的战略高度。党的十九大报告进一步阐明了意识形态与文化发展性质和方向的一致性。“十四五”规划纲要明确指出：“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坚定文化自信，坚持以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引领文化建设，围绕举旗帜、聚民心、育新人、兴文化、展形象的使命任务，促进满足人民文化需求和增强人民精神力量相统一，推进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建设。”意识形态建设是文化自信内蕴的本体问题，意识形态自信是文化自信的硬核。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自信和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战略，都有着鲜明的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价值属性。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指导地位的根本制度，以深化意识形态建设来坚定和增强文化自信，才能为建成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导航定向、凝心聚力。着眼思想文化多元化和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一元指导，要辩证地认识和把握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与坚定增强文化自信内在的逻辑同构性和价值内契性，从而不断开辟新时代意识形态建设的新境界，筑牢文化自信和文化强国的精神根基。

（摘自《思想战线》2022年第4期）

中共中央宣传部原部长王忍之题写刊名

《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集刊简介

本集刊由山东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主办，属于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专业集刊。主要研究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文化理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文化理论、中国共产党文化理论、中外文化发展现状、中国传统文化、多领域文化问题（比如经济、政治、社会、生态、外交、军事等领域的文化问题）、国外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世界文化思潮等。

本集刊坚持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立场、观点和方法来观察和分析中外文化理论与实践，积极刊发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研究的新成果；坚持学术第一的标准，大力推荐富有新思想、新观点和新方法的关于中外马克思主义相关领域的文化研究成果。

我们将力争把本刊办成马克思主义文化研究的重要理论园地，并与马克思主义学科建设结合起来，注重前沿和热点问题研究，大力扶植青年学者，推出一系列有分量、有深度、能够引起理论反响与学术争鸣的高质量研究成果，积极为推动马克思主义理论学科建设建言献策，并不断提升学术质量，扩大马克思主义文化理论的影响力，拓展马克思主义思想文化阵地。

ISBN 978-7-5607-7835-8



定价: 63.00元